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经 济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上 册

〔美〕M. 罗斯托夫采夫 著

SINCE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经 济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上 册

〔美〕M.罗斯托夫采夫 著

马 雍 厉以宁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11年·北京

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7.

根据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957 年修订第二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1981 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 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 年 3 月

译者前言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罗斯托夫采夫于1870年10月出生于俄国的基辅，曾就读于基辅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1901年获博士学位，1917年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1920年移居美国，先后担任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教授，1952年10月死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他早期的著作主要是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物研究方面，后来转入西方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1926年初版)和《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1941年版)是他的两部代表作，它们使罗斯托夫采夫在西方古代社会经济史学界得到很高的评价。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迄今一直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权威性的著作。它最早于1926年刊行英文版，1930年出了德文版，1932年出了意大利文版。此书的英文第二版，是罗斯托夫采夫死后于1957年出版的。第二版的出版得到了弗雷泽的许多帮助。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正文并没有多大出入，但注释大大丰富了。第一版是一卷本，既有正文，又有注释；第二版扩充为两卷，第一卷为正文，第二卷全系注释。

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中，罗斯托夫采夫应用的是把西方的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以大量碑

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作为依据，结合古代罗马作家的著述，概述了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和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了关于罗马帝国兴衰原因的看法。他认为，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是以城市资产者的兴旺为基础的，城市的工商业和自耕农的经营使罗马帝国得到充裕的财政收入和农产品的供应，这就促使帝国昌盛。但后来，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不但不注意维护这些资产者的利益，反而压榨他们，摧残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结果使得罗马帝国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终于崩溃。他的这些看法受到了西方社会经济史学界的重视，被认为自成一派，以区别于那些把奴隶占有主与奴隶之间的对抗及其尖锐化作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以及把意大利半岛的居民与罗马帝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居民之间的民族矛盾的激化作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基本原因等流行观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联一些学者把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称为“现代派”，其含义是：罗斯托夫采夫把研究近代现代经济史中惯用的方法和术语（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搬用于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使古代史“现代化”了，从而认为这是反科学的。

当然，罗斯托夫采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出于对十月革命的反感和对苏联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极度不满，在论述罗马帝国兴衰原因时，竭力推崇城市资产者对国家社会经济繁荣的作用，指责政府对城市资产者的掠夺性的政策。这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和分析的。但考虑到罗斯托夫采夫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以及在运用这些史料概述罗马帝国社会经济面貌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这本

书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应对它采取简单否定的做法。

我们原来已将两卷全部译完。但第二卷四十多万字注释一部分是繁琐的考证，对一般读者而言没有阅读的必要，而另一部分则是各种文字参考文献目录，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国内无法找到，因此，其出版的价值不大。我们和出版社商定目前暂时只出版第一卷，分上、下两册。

由于原书排印文字格式颇为复杂，在中译本中，为表示区别，并考虑到排印问题，我们把原作中的斜体字者改为加曲线，把大写字母者改为加重点。又，凡圆括号内之文字均为原作所有（有的圆括号系原作者自己所加，有的圆括号则系译者根据译文需要所加）；六角括号系修订者弗雷泽所加；尖括号内的文字则表示译者对原英文本中之其他文种（多半为希腊文或拉丁文）的专门名词的译称。译名对照表是商经同志参考原书索引后代为编制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这部著作引用的资料极为繁富。由于我们学力有限，译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各位读者不吝赐正是幸。

目　　录

第二版序言(弗雷泽)…… 1

第一版序言…… 4

第一章　意大利和内战 …… 15

第二章　奥古斯都的复原更新政策 …… 63

第三章　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 …… 121

第四章　弗拉维攸斯氏的统治和安东尼努斯氏的开明专制 …… 159

第五章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期的罗马帝国。城市和工商业 …… 190

第六章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期的罗马帝国。意大利和欧洲罗马西部诸行省中的城市与乡村 …… 277

图 版 目 录

1. 一座 C. 尤留斯·恺撒雕像的上半身(安德森摄) …… 卷首

2.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1. 拉丁战士;2. 埃特鲁里亚农民犁耕

图(均为阿利纳里所摄) …… 28
3. 共和国晚期意大利的生活状况:1. 牧猪人(波洛尼亚市博物馆);2. 牡牛和犁(纽约市艺术博物馆);3. 牝牛和大车(同前);4. 猪、绵羊和山羊(同前);5. 农民生活(苏尔莫纳市博物馆) …… 39
4. 欧里萨策斯之墓 …… 55
5. 正门的奥古斯都雕像(安德森摄) …… 62
6. 奥古斯都的主导思想:1. 迦太基的祭坛;2. 和平神祭坛上的一块石板(?)(阿利纳里摄) …… 72
7. 奥古斯都时代的人生观:1. 博斯科雷阿勒村出土之杯(《皮奥氏文物图说》(法文),5,1899 年,图 VIII,2);2. 柏林博物馆收藏之杯 …… 87
8. 罗马庄院:1. 康帕尼亚一所庄院的主要建筑;2. 康帕尼亚的庄院;3—4. 海滨的罗马庄院 …… 94
9. 罗马庄院:1. 康帕尼亚沿海的庄院;2. 康帕尼亚一所庄院的建筑群 …… 97
10. 1. 一所山庄,蓬佩伊;2. 锁奴隶的铁铐,蓬佩伊(《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23 年,第 277 页,图 4) …… 99
11. 1—9. 农具,蓬佩伊(芝加哥自然史田野博物馆) …… 102
12. 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商业活动:1. 康帕尼亚的海港;2. 奴隶买卖(卡普阿博物馆);3. 释免奴隶 …… 106
13. 提贝里攸斯和克劳迪亚斯:1. 阿魁累亚出土之盘;2. 博斯科雷阿勒村出土之杯(《皮奥氏文物图说》(法文),5,1899 年,图 XXXII,1) …… 117
14. 韦丘斯氏宅中的图画,蓬佩伊:1. 酒神巴库斯和阿丽雅德芮女神(安德森摄);2. 收获葡萄(阿利纳里摄);3. 葡萄酒商(安德森摄);4. 卖花人(安德森摄) …… 140
15. 韦丘斯氏宅中的图画,蓬佩伊:1. 香膏业(安德森摄);2. 浆洗业(安德森摄);3. 首饰行(安德森摄);4. 灶姑节(《王家山猫学院珍藏古物集刊》(意大利文)viii. 354) …… 146

16. 蓬佩伊店铺招牌 …… 152
17. 罗马帝国的战争:1. 图拉真出师图。誓师(C. 契科里攸斯:《图拉真记功柱上之浮雕》(德文),图 LXXVII);2. 图拉真和蛮族酋帅们(同前,图 LXXIII);3. M. 奥雷留斯出师图(佩特尔森等,《罗马圆柱广场上的马尔库斯记功柱》(德文),图 LXIX,A) …… 162
18. 罗马帝国早期的繁荣:1. 印度(《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15,1903 年,第 203 页,图 6);2. 万神中之罗马女神(《皮奥氏文物图说》(法文),5,1899 年,第 180 页起,图 44);3. 阿索斯市场(复原图)(美国考古协会) …… 193
19. 外约旦沙漠商道上的城市杰腊萨:1. 杰腊萨的大街及街旁列柱(芝加哥,美国东方学学院耶路撒冷与巴格达分组);2. 杰腊萨的阿尔特米斯女神庙(同前) …… 199
20. 希尔姑兰城:城南地区,正在进行发掘中(那不勒斯,国民博物馆,承 A. 马攸里教授惠许发表) …… 202
21. 希尔姑兰城:一所房屋的内部(同上) …… 202
22. 一个罗马行省里的城市:提姆加德(塔木加迪) …… 207
23. 奥斯蒂亚地方的房屋:1. 迪亚娜的房屋;2. 四层楼的公寓;3. 一所大住宅的内院 …… 212
24. 西方各行省中的实业:1. 牧人;2. 筛谷;3. 制葡萄酒或苹果酒的用具(桑市考古学会);4. 银行业(特里尔,邦博物馆);5. 衣服买卖(特里尔,邦博物馆) …… 222
25. 沙漠商队在远东经商:1. 赶骆驼者和骆驼(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2. 中国的波斯行贩或乐人(费拉德尔非亚艺术博物馆);3. 中国的闪米特行贩(不列颠博物馆);4. 中国的外国商贩(费拉德尔非亚艺术博物馆) …… 228
26. 罗马帝国早期的贸易:1. 意大利的港口(C. 法腊格利亚摄);2. 伊西斯-杰米尼亚娜号(阿利纳里摄) …… 234
27. 帝国时代前期的商业:罗马的石棺(阿利纳里摄) …… 237
28. 高卢的工商业:1. 酒肉零卖业(照片,巴黎照片资料馆);

2.一个零售商人;3.运酒;4.一个鞋匠;5.一个制药坊或肥皂店 …… 242
29. 罗马帝国的商业:内河船只和海船(《高卢与阿非利加镶嵌细工图谱》(法文),ii,第 576 号) …… 248
30. 意大利的工业:1.卖带子和枕头(阿利纳里摄);2.陈阅一段布料样品(阿利纳里摄);3.造船(《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4.一个铁匠(阿魁累亚博物馆) …… 257
31. 奥斯蒂亚地方的生活和行业:1.一个外科医生在进行工作(G.卡尔扎:《萨克腊岛上罗马港的墓地》(意大利文),图 149);2.接生婆助产(同前,图 148) …… 273
32. 奥斯蒂亚地方的生活和行业:1.铁匠的工场(同前,图 150);2.卖水人(同前,图 148)…… 275
33. 意大利的生活和行业:1.意大利的一个村庄(《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20 年,图 IV);2.一个酒窖;3.途中(温泉博物馆) …… 282
34.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代意大利的生活情景(温泉博物馆) …… 287
35. 西班牙的生活和行业:1.西班牙的矿工(《考古学评论》(法文)):2.西班牙的一个疗养地(复制艺术品博物馆) …… 303
36. 高卢南部的农业:一幅绘图农历(艺术与历史照片资料馆的照片) …… 309
37. 高卢的实业:1.高卢阔绰的资产者(G.朱利约:《桑市高卢罗马文物陈列馆》(法文),图 XIII);2.一个高卢实业家(同前,图 XI);3.上:卖芜菁或梨(桑市博物馆);3.下:耨草和锄地(阿尔隆博物馆);4.刈谷(G.朱利约,前引书);5.一个商人和一个向他买货的农民(同前) …… 312
38. 高卢的工业生活:1 和 7.浆洗者;2.鞋匠;3.五金店(同前);4.一个店铺及店内的筐子和提包(同前);5.一个实业家或商人(同前);6.裁缝(同前) …… 316
39. 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商业:1.内河运酒(特里尔,邦博物

馆);2.装运酒桶;3.一只船在卸货;4.爬越一个山坡
(特里尔,邦博物馆);5.沿着河岸替一只驳船背纤(同前) …… 320
40. 不列颠的生活和行业:1.切德沃思地方的一所庄院(A.福雷斯契厄复原,1924 年;承《伦敦画报》(英文)惠赠);2.不列颠的一个犁耕者(不列颠博物馆);3.不列颠的旅行者和牧人(同前);4.不列颠的一个铁匠(约克,约克郡博物馆) …… 329
41. 伊斯特利亚的一所庄院:1.大布利俄尼岛上一所庄院内的三座神庙(《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德文)7,1904 年,附录,图 23);2.这所庄院的主要建筑(同前);3.卡特纳湾和庄院遗址的全景(同前) …… 336
42. 多瑙河流域的经济生活:1.多瑙河旁的埠头和城市(C.契科里攸斯:《图拉真记功柱上之浮雕》(德文),图 XXV);2.达尔马提亚地方一个开鞋铺的财主(《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学术报导》(德文),11,1890 年,第 155 页,图 63—64)…… 339
43.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实业:1.潘诺尼亚的一个银行家(贝尔格莱德博物馆);2.潘诺尼亚的一个矿工(V.斯克腊巴尔,载 *Strena Buličiana*(塞尔维亚文),图 9);3.一个石棺的一端(斯普利特,考古博物馆) …… 344
44. 达尔马提亚的生活和行业:达尔马提亚的一个船夫(同前) …… 348
45. 多瑙河边塞和达契亚塞内地方(图拉真记功柱,K.累曼—哈尔特累本:《图拉真记功柱》(德文),图 V—VI) …… 357

第二版序言

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新版问世了，对此需要稍加说明。这部著作第一版(1926 年)绝版于 1940 年，很快就成了稀有之物。但为了适应研究的需要，首先代之而起的有德文版(1931 年)，继之又有意大利文版(1933 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大家即已认为应当为该书编订一个英文第二版。可是，罗斯托夫采夫当时正措意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随后他的健康状况又遭受损害，因而这项工作显然不可能由作者本人担任而只好由旁人来代劳了。

1952 年，在克拉伦登出版社委员们的敦请下，我终于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应承了这项任务。经过商讨之后，我们决定不增加任何新材料，而只把罗斯托夫采夫最后在意大利文版的正文和注文中所增添的全部内容编入这一新版英文本。我就是按这个原则来进行这项工作的。

我认为这个方案用不着另加说明。因为，事情很明显，任何人不可能指望独力将罗斯托夫采夫此书的资料在各方面都改成最新的资料；而如果用若干人手来进行这项工作，又势必会旷日持久。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考虑到，罗斯托夫采夫这部书虽未必全无疵瑕，但在其所涉及的这个主题方面已经成了一部经典著作，因

此，倘若想用对一部手册发行新版时所采取的方式来大量修订一番，那简直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把作者在意大利文版中对这个主题所提出的一些最终结论补充进去，自属理所当然的事。毫无疑问，这部书显然基本上表达了罗斯托夫采夫经过最后考虑后对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所提出的看法。他的晚年从事于其他方面的活动：发掘杜腊遗址和撰写关于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的巨著。

本版除了增添我所翻译的意大利文版中补充修订的内容以外，基本上照录了原版的正文和注文。然而，它与意大利文版却有许多不同之处，可以说，它已取代了以前各种文版。除正文中稍有改动之外，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订正和增补了注文以及改变了图版的排列。

（一）订正部分。我力所能及地核对了注文中所引用的大量参考资料。这件繁重而枯燥的工作使我改正了最先存在于英文版、后来由于疏忽而仍然保留在德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中的许多错误。引用希腊文著作时的大量错误和引用碑铭、苇纸卷时较少量的错误都改正过来了。无疑地，在注文中，特别是在引用期刊方面，还会有错误存在，但其数量肯定已大为减少。①

（二）对于史料，特别是对于碑铭文和苇纸卷，凡力所能及之处，我都补引了后出而较通行的刊本。这些史料，在罗斯托夫采夫引用时，有些尚未刊布，有些还只刊载在期刊或类似于期刊的出版物上。此外，对罗斯托夫采夫那种漫无条理和使人感到混乱的引用史料方式，我也力图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

① 上文所言错误均指引用文献时的卷、期、节、页数码而言。——译者

（三）为了使图版与它们所描绘的正文更加接近，并使之更加便于装订，我改变了某些图版的位置，其顺序自亦因之而有所改动。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在正文中有极个别的地方，我不得不凭自己的判断来确定罗斯托夫采夫的确凿意思何在，因为在不同的译文之间偶尔有些出入，这些出入似乎并非反映罗斯托夫采夫的看法有所改变，而只是翻译上的错误。这样的情形很少，也无关宏旨，所以我感到没有必要加以标明。

我对参考资料所作的增补，差不多全都加上了六角括号〔 〕。在征引一篇苇纸卷或碑铭文的较新刊本时，我没有一一说明这个新本是否优于罗斯托夫采夫所引之本，但在少数例外情况下，我在新引的参考资料之前加上一个▲符号，用以标志它是较优的版本。

碑铭文和苇纸卷的引得都是我自己编的。此外，我还加了一个古代作家引文引得。

名词和主题引得系伦敦市中心区学院文科硕士 H. C. 奥克利先生所编。我应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因为他一举而使我立时免除了一项额外的负担。

P. M. 弗雷泽序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第一版序言

我写此书的宗旨，并非想在现有的那些罗马帝国史之外再增添一部新作。我的目的并不很宏伟，而且是有限度的。关于罗马皇帝们的外交政策、罗马帝国的法制史、民政与军事制度以及军队的组织等方面，我们均已深知其概况了。在描述意大利和某些行省的都市生活方面，已经有人写出了有价值的著作；同时，也已经有人试图介绍罗马统治下的某些行省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然而，我们还没有一部书或一篇论文全面地研究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探讨其演变的主要路线。谈到某些个别问题或某一特定时期，倒是有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大多是从文物学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学的观点出发来写的（例如 L. 弗里德兰德的精湛之作）。没有一个人曾下过功夫把帝国的社会经济演变同帝国的法制与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或者同皇帝们的内政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本书就在这一方面进行初步尝试。我深知本书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这项工作本来是很艰巨而又复杂的。材料贫乏、零散，没有可资利用的统计数字。对我们手头一点点资料的解释，还大有争论的余地；而近代学者们所下的结论大多出自假设，往往过于武断。但是，尽管有这种种困难，这项工作本身仍然很吸引人。我相信，如果对社会经济状况不进行透彻的研究，要想写一

部罗马帝国通史是办不到的。

为说明我的观点和方法，不妨简单地综述一下我通过仔细研究帝国历史的社会经济现象之后所得出的主要结论。这样一个提纲可能有助于读者通盘了解本书的各章。

罗马元老院议员和骑士这两个特权阶层曾共同构成一个半封建的大地主和商人阶级，他们的物质财富是从开发国家的资源得来的，而他们的政治权力又是从他们的财富得来的。可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在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军阀的领导下终于摧毁了上述两个特权阶层的统治政权。奥古斯都的活动体现了中下层罗马公民的这一胜利，同时也表现了敌对势力之间的一次妥协。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又恢复了这场斗争：他们的政策是要建立一个以整个帝国城市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国家，他们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对共和国晚期的显贵们的余威和愿望予以致命的打击。爆发一次新的内战，证实了由帝国所有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所支持的新型政府已经巩固无虞，于是，弗拉维攸斯氏就把旧显贵阶级的残余分子以及曾经一度取代这个阶级的皇家幸臣统统清洗干净。这个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构成了国家的经济骨干，这是皇帝们有意识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东方行省和西方行省中都同样地一贯推行促进城市生活发展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通过首都中代表他们的团体（弗拉维攸斯氏的新帝国元老院）和外省自治市的权贵们表达了他们不愿意支持这种由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经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朝蜕化而形成的个人武力专政制度，这种制度在韦斯帕西安一度企图重建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之后又在多米戚安的独裁政体下复活了。资产阶级不愿意支持这种制度的结

果是建立了安东尼努斯氏的君主立宪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以整个帝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各城市的自治政府为其基础。君主虽有专制之权，但他被视为罗马人民的最高长官。在他的旁边，有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元老院作为一个咨询机构。皇家的官吏和军队，与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自治团体是平列的。

这种使帝国国家体制适应于占领导地位的社会力量的做法，有一个缺点。帝国的基础，即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以支持大一统国家的机构。因为城市资产阶级事实上是以下层阶级——乡村的农民和城市里的无产者——的辛勤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它也同帝国的贵族与官吏一样，不愿意让下层阶级的人进入它这个阶级中来。所有这三个集团都愈来愈排斥外人，而帝国的社会也愈来愈分裂成两个阶级或两种等第——资产阶级与群众，或 *honestiores*〈豪族〉与 *humiliores*〈寒门〉。于是造成了一种尖锐的敌对状态，而且逐渐采取了城乡敌对的形式。皇帝们想用鼓励都会化运动和支持乡村农民与城市工人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敌对情形，但这种努力无济于事。造成公元三世纪时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敌对状态，当时下层阶级的愿望是由军队表达出来的，同时也得到皇帝们暗中的赞助。塞韦鲁斯氏曾努力设法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建立一种共存状态，结果失败，其后斗争就蜕化为社会性的内战，同时造成了三世纪下半期的政治混乱局面。由此，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各上层阶级都被摧毁，而建立了一种多少适应现状的新统治形式——四世纪与五世纪的东方专制政体，其基础建立在军队、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和农民群众之上。

对社会的演变与那进展虽很缓慢但却在逐步前进的社会生活

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无须加以强调。我绝不打算过高地估计经济现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我坚信，在描述社会生活时，如果不附带描述作为其基础的经济状况，那就会不全面，而且还会令人发生误解。因此，我在研究罗马帝国社会史的同时，尽力对其经济生活发展的总线索作出相应的描述。在这一方面，我也没有前人可资借鉴。帝国的经济状态已经是一个一再被人研究过的课题。对于各个专题，已经有人写出很有价值的著作。但是，以前却还没有人企图探索整个帝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路线，没有人试图说明帝国的物质生活状况是怎样和为什么逐渐改变的，以及帝国早期的繁华生活是怎样和为什么如此彻底地退化成晚期那种原始的、半野蛮的生活的。

根据我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简述如下。在社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大地主和商人阶级统治宣告终结，而在经济方面，作为共和国晚期特征并阻碍古代世界经济正常发展的典型封建资本主义方式也相应地被摧毁了。帝国贵族大批破产，他们的大量财富集中到皇帝手中，与此同时，以商业、工业和科学化的农业为基础的希腊化的城市资本主义在奥古斯都所恢复的和平安宁的太平气象中重新抬头并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资本主义形态的代表人物是城市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及其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重要性都在逐步增加。帝国的都会化运动既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它最明显的表现。其结果是使工商业和农业都得到空前迅速而显著的发展；而城市所积累的资本之不断增长，给整个帝国城市生活的富丽繁华带来了新的刺激。

但是，这种城市资本主义逐渐在退化。城市资产阶级的普遍

愿望是成为坐食年金者:其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使个人或家庭能够依靠一笔即使不太丰裕但却稳定可靠的收入来维持安静悠闲的生活。在帝国早期曾经使帝国每一个地区的工业都迅速发达起来、并促使工商业和农业技术水平大为提高的那种创造力逐渐在萎缩,从而使经济生活愈来愈停滞不前。城市中产阶级的活动蜕化成为对从事辛勤劳动的下层阶级进行一种有系统的剥削。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大多投资在土地上面。商业和工业变成地方性的了;而且,收入主要是依靠农业,经营工商业变成了增加这项主要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已。资产阶级对外人的排斥和经济剥削制度使下层阶级不能上升,也不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福利。另一方面,国家需要更多的金钱和劳动力来维持国内太平无事的局面。政府还像以前一样只注意国家存亡攸关的问题,对经济的发展则不闻不问,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刺激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由于政府袒护城市资产阶级而几乎毫不顾及群众的福利,因而甚至更助长了经济发展的停滞。于是,维持国家生存的负担就全都压到了劳动阶级身上,从而使他们的物质福利迅速降低。但因为他们是城市所生产的工业制造品的主要消费者,所以,他们的购买力降低,也就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由此大大加剧了工商业中业已出现的不景气现象。早在公元二世纪初,衰落现象即已明显开始。二世纪时的战争反映出帝国前途暗淡的经济萎缩,并唤起了皇帝们对经济问题的注意。然而,他们虽认识到这个危机,却无法来医治这病症。他们的措施幼稚愚蠢,丝毫无济于事。他们为了拯救国家而重走古代世界的老路——采取暴力和强制政策。他们对城市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双方面施加暴力和强制,使这两个阶级之间

的敌对情绪更加激烈。结果造成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三世纪时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整个工商业迅速萧条，使原始的经济方式复活，同时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四世纪及以后若干世纪的生活中突出的现象。

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本书中谈到与此发展步调相同的第三个方面——帝国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对生活中的这些方面不作全面的探讨，则这幅图画显然是片面的、不完备的。但是，若要包罗这些内容，就不仅会使本书的篇幅扩大一倍，而且势必会不断地从这个主题的某一方面跳到另一方面，而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作一番适当的研究。在一部以全面描述罗马帝国为宗旨的著作中，必须对这些方面加以阐述；但我已经有言在先，本书的宗旨并非如此。事实上，帝国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也是沿着与社会经济生活相同的道路发展的。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创造了一种风雅的、优美的、高度贵族化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城市中产阶级和群众说来同样是陌生的。上层阶级那种哲学气息浓厚的玄妙宗教亦复如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高级文化逐渐被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并被改造以适合他们的标准和需要。一世纪时的那种优雅的创作由于传播得太广泛，自然也就愈来愈简单、愈来愈通俗、愈来愈唯物化了。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文化，对于下层阶级还是陌生的，因此，他们在攻击城市、攻击城市资产阶级的时候，终于把这种文化也毁灭了。帝国晚期的新文明，一方面是基督教会在群众中所传播的一层古代文明的薄浆；另一方面则是上层阶级——无论是野教徒或基督教徒——的文明，那是一种外来的文明，极其风雅，但却是空虚的仿古货色。

简单介绍一下本书材料的分配和安排，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有用的。谈到共和国晚期的第一章只是一个简要的轮廓。如果对此想作更全面的研究，就需要写一部专著，我希望不久以后，结合对整个希腊化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写出这样一部书来。以下两章论到奥古斯都和论到尤留斯氏与克劳迪亚斯氏两朝的武力专政，但都不如叙述二世纪与三世纪的各章那么详细，这是因为对这一段叙述中的一些最主要之点，我可以向读者推荐近代若干书籍作为参考，那些书对这个主题已经谈得很透辟，而且引用的资料也很完备。我这部书的重点是阐述二世纪与三世纪的那一部分（第四章至第十一章），这是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中最被忽视的一段时期。最末一章又是一个简要的轮廓，用以对罗马帝国早期和晚期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作一极其一般性的描述。

全书分为正文和注文两个部分。在正文中，我尽可能对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明白畅达的概括性描绘，使每一个对这方面感兴趣的人都能理解。注文又分为两种性质。凡是我能够举出一部很好的近代书籍或论文作为对全部详细情节的参考资料的地方，以及凡是我自己的论断以别人的著作为根据的地方，我所加的注文就只是一种纯粹介绍参考文献目录的注释。我自己知道，这份目录是极不完备的。本书既不是一部教科书，也不是一部手册。一般而言，我避免挑选过时的书籍和论文作为参考文献。凡我列举的书籍和论文都是经我仔细阅读并引以为自己论述的根据的；那些对我没有帮助的书籍和论文都没有列入，因为它们对本书的读者大概也无所裨益。通常我尽量避免在注文中批评近代的著作；只有当我引用一部书籍以代表在这个主题方面的主要著作，而

该书的结论却与我自己根据同样史料所得出的结论有分歧的时候，我才予以批评。然而，大部分注文并不是介绍参考文献目录的注释。当我找不到一部近代著作来帮助自己而必须靠自己去搜集史料和解释史料的时候，通常我都插入一些注文。这些注文实际上是对于各个不同专题的短论，其性质是一种附带的讨论或附录。这类注文有些很冗长，引文也很累赘，只有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人才会去仔细阅读。我在正文中所加入的插图并非为了提高读者的兴趣。它们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与注文以及摘自文献档案材料中的引文同样重要。它们取自大量的考古资料，对于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人来说，这种资料与文字资料同样重要和必需。我的某些推断和结论大多就是以考古资料作为依据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列入更多的插图；而且，我也不得不仅限于复制帝国时期的一些写实艺术品，而割舍了那些工业制造品如壶罐、灯、玻璃器、纺织物残片、玉器、金属器等等，因为不可能对这些器物提出一套合适的图片，所以我就干脆把这类图片完全摒弃了。

在序言的末尾列举那些曾对自己的工作惠赐协助的人的名字，这是一个作者深感愉快的一种权利。我所要列举的人名很多。这表示我是多么诚挚地致力于使我的报导尽量没有遗漏，再则也可以由此看出战争和革命对于学者们国际间互助团结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唯一感到遗憾的例外，就是现在的俄国政府使人们不可能为科学的目的而使用它所珍藏的宝贵资料，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本书献给我的挚友 J. G. C. 安德森以表示我对他的合作所致的钦佩和铭感之情，虽则这点意思甚为微薄。安德森先生不仅校

订了我的手稿，将手稿的英文修改通顺——可谓厥功匪浅；他还校对了全部清样，对引文作了一套合理的安排，并核对了许多引文。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教我对许多原文意义含糊的地方作出明确的陈述：显然，在这方面，英国人的头脑与斯拉夫人不同，他们不喜欢不精确的思想或表达方式。他还屡次劝我不要过于轻率地下结论以免错误。最后还要提到的是，他曾多次以其丰富的学识和稳健的意见帮助我澄清了我原先尚未明了的一些问题。我唯一的希望是，当他对本书尽力以后会说：他日念此，当觉快慰。在校样过程中，乔治·麦克唐纳博士慨然自愿协助安德森先生，对这位著名学者，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其次，我必须感谢克拉伦登出版社。一部书能够在这个出版社出版的确是难得的幸运：该出版社负责人员的豁达大度和科学精神是举世皆知的。当我见到本书竟印得如此精致、图版印得如此美丽时，不禁喜出望外。

我在写有关罗马行省各章时，以及为本书搜集实物资料图片时，曾承同道诸君给我以最慷慨的援助。在英国，有不列颠博物馆的弗雷德里克·凯尼恩爵士、H. I. 贝尔、O. M. 多尔顿、H. R. 霍尔、G. F. 希尔、H. 马丁利和 A. H. 史密斯，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的 D. G. 霍格思、E. 瑟洛·利兹、M. V. 泰勒小姐和 B. 阿什莫尔，博德利图书馆的 A. E. 考利和全体工作人员；在法国，有已故的 E. 巴贝龙、R. 卡尼亚、J. 卡尔科皮诺、R. 杜索、E. 埃斯佩朗迪厄、P. 儒盖、A. 梅尔兰、E. 米雄、P. 佩德里泽、L. 普安索、E. 波蒂安、M. 普龙；在德国，有 G. 罗登瓦尔德、K. 舒马赫和 R. 察恩；在意大利，有 W. 阿梅隆、S. 阿乌里詹玛、G. 布鲁辛、G. 卡尔扎、M. 德拉·科

尔特、A. 明托、R. 帕里贝尼、A. 斯帕诺和 P. 斯蒂科蒂；在奥地利，有 R. 埃格尔、J. 凯尔和 E. 赖施；在波兰，有已故的 P. 宾科夫斯基；在塞尔维亚，有 N. 武利奇；在保加利亚，有 B. 菲洛夫和 G. 卡扎罗夫；在罗马尼亚，有 V. 帕尔万；在比利时，有 F. 曲蒙和 F. 马英斯；在美国，有纽约市艺术博物馆的 E. 鲁宾逊和 G. F. 里克特小姐、芝加哥自然史田野博物馆和威斯康星大学与图书馆——以上各位在各方面均曾尽力使我在写作此书时顺利迅速地完成任务。我请求他们接受我最诚恳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 S. 罗斯托夫采夫夫人，本书引得是她负责编排的。

〔罗斯托夫采夫在德文版(1931 年)序言中又表示了他对 A. 马攸里教授、M. 阿布拉米奇教授、A. E. R. 博克教授和密执安大学考古发掘工作委员会、H. 杰恩先生和菲斯克·金贝尔先生即开罗博物馆主任和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主任，以及对 M. A. 梅尔兰和 R. 帕里贝尼教授等人的感谢。

他在意大利文版(1933 年)序言中又增加了对 A. 马攸里教授、G. 卡尔扎教授和 G. 圭迪教授的感谢。〕

第一章

意大利和内战

奥古斯都所建立的罗马帝国，乃是动乱不宁的内战时期的产物，这次内战在意大利和罗马行省中断断续续地拖延了八十多年之久。至于这些内战之所以引起，则又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罗马和意大利在公元前三世纪和前二世纪时在文明世界的事务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这种统治地位才建立起罗马大一统国家；其二，罗马和意大利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战争在逐渐发展，这与罗马大一统国家的成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内战进行的过程也正是受这两个原因的支配。

因此，要描写罗马帝国社会经济的演变，就必须首先对于造成意大利君临文明世界因而在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中引起内战的种种原因作一简单扼要的概述。

我们可以这样地描述在罗马和意大利爆发内战以前的古代世界的面貌。在所谓希腊化时期，文明生活的中心逐渐从西方移到了东方。尼罗河上的亚历山大里亚、奥龙特斯河上的安蒂奥克和凯库斯河上的佩尔加蒙代雅典而执文明之牛耳。从经济观点来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时即已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希腊，特别是雅典，到这时候开始逐渐丧失其重要

性了。希腊本土的经济生活一直下降的首要原因在于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时那些经常发生的、几乎不断的、席卷了许多城市的战争。虽然也曾多方努力来缩减这些战争的破坏作用，并使战争受到邦际的某些约束，但这些战争还是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残酷，愈来愈使参战者——无论胜方或负方——全都遭受损害。蹂躏敌方的土地，销毁敌方的谷物、葡萄园和橄榄林，焚烧敌方的农舍，掠卖掳获的人畜，用被侵伐的地区的物资来给养军队：这些行动都愈来愈普遍。有些邦，例如埃托里亚联盟和克里特诸城，专门以在陆上和海上进行抄掠为业，而其他的邦也相继走上这条趋于灭亡的道路，乃至那些希腊化的君主专制国家也不例外。

就在进行对外战争的时候，希腊本土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城市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无休止的阶级战争，这是由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在逐渐成长而群众相应地趋于贫困所引起的。这场阶级战争使希腊很难以成长和发展起一个巩固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当然就使得各城邦的内部几乎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生活。希腊城市中的斗争性质愈来愈近于纯粹的社会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和重新调整劳资之间的关系以求提高生产，而是为了重新分配财产，这种目的，通常是靠暴力革命来达到的。战争的口号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口号——γῆς ἀναδασμὸς καὶ χρεῶν ἀποκοπή，即所谓重新分配土地和废除债务。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口号已到处流行，所以雅典人才会在公元前 401 年的赫利亚法庭审判官誓言中列入一条，禁止将这类争端付诸表决。在亚里士多德和伊索克腊特斯的思想中经常反映出公元前四世纪时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心理，而科林斯联盟曾在公元

前 335 年组织了一个联合机构来防止社会革命。在克里特的伊塔诺斯城的市民宣誓中曾列入禁止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这一项，这件事足可说明公元前三世纪及稍后的时期中的希腊形势。

像这种以重新分配财产为目的的革命，对希腊是极端有害的。革命和反动势力，此兴彼衰，都只维持一段很短的时间，并都以大肆屠杀或流放最优秀的公民为务。结果，那些被流放者或设法回来向他们的敌人报仇，或流落到东方君主专制国家里去充当雇佣兵，到希腊化的国君们在东方各地新建的城市里充当移民，在希腊化的国家里充任文官，或做商贾。极少数的城市，如雅典等，多少没有受到这些周期性危机的影响，因而，相形之下还比较繁荣。

欧洲大陆和大多数岛屿上的希腊城市所丧失了的东西，被希腊化的君主国、尤其是被东方的希腊城市得去了。这些城市，大多数处在希腊化的国君们直接的或间接的控制之下而享受不到政治自由。其结果是使这些城市内部每一次发动社会革命的企图都被希腊化的国君们的暴力所扼杀，同时也使它们很少被卷入对外战争之中。这样一来，在东方，积累资本和介绍先进的工商业方法都比在希腊本土进行得更为方便和更有成效。因此，公元前四世纪时这些希腊城市的商业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高的发展水平，这种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近于作为公元十九与二十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东方的希腊化城市有一个很大的内部市场供它们自由活动。它们彼此互相竞逐地进行着起重要作用的、并在稳步发展的对外贸易。它们借助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而逐渐改进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技术，在所有的希腊化王国里，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都有长足的进步；它

们在农业(包括畜牧业在内)和工业中,都采用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它们史无前例地为一个不定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们发展银行和信贷业;它们不仅能够订出海上贸易的公共规章(即所谓罗得海上公法),并且还能够订出一种公共民法,这种民法在整个的希腊化世界中都产生法律效用。在设法稳定金融、或至少是想在各个独立的贸易国家的货币之间建立稳定比价的企图中,也可以看出那种走向统一的趋势。希腊化的国君们在他们国家的工商业生活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和商业事务在外交决策中所占的特殊重要性,很容易使我们把这些君主国的经济情况比之于近代欧洲史上的重商主义时期。

然而,不久以后,由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上述那种稳定的经济发展首而停滞,继而逐渐衰萎。正和公元前四世纪时候一样,连续的战争是主要原因之一,这时候,整个的希腊化世界几乎不断地爆发战争。在此处,我不能对这一方面详加叙述。这些事实和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从经济观点来看,这些无休止的战争逐渐成为希腊世界的一场真正的大灾难。这不仅限于大片土地受到蹂躏、城市遭到洗劫、居民被贩卖为奴隶而已,而且远为重要的是这些战争迫使希腊化各邦,无论大小,都集中力量来准备战争,来尽量地扩建陆军与海军,来发明军事工程方面的新器械,因而耗费极多的金钱——例如迪米特里厄斯·波利约尔策特斯围攻罗得的情形就是这样。各邦的收入几乎完全用在军备上。这样一来,起先是使希腊化的国君们彼此竞逐地作稳健的努力,企图用一种合理的、科学的开发土地天然资源的方法来增加他们土地的收入。但是,渐渐地,像这种正常的、进步的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就被一系列轻率

的、只顾眼前利益的措施所代替。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对生产和交换二者采取国有制(*étatisation*)[①],至少在某些希腊化的君主国里是贯彻了这项措施的,尤其是在埃及。我所说的国有制,就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最主要的部门归国家集中管理,也就是归国王及其官吏们集中管理。这种制度,初行虽有利于国家,但逐渐造成官吏方面进行欺诈和不法行为,同时又使国民方面在个人能力上的自由活动和竞争几乎完全趋于消灭。

在趋向于国家控制的潮流同时,一套十分严密的课税制度被精心规划出来了,这种课税制度涉及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这是以东方君主国的经验为依据的,但在发明新税名目和改进征税方法这两方面都更有甚焉。赋税的负担沉重地压在希腊化世界的居民身上。对土著居民经常施行自古相传的强制劳役制度,即*corvées*〈徭役〉,因而这一部分人的负担更重。这个制度,和课税制度一样,是希腊人那种逻辑性和创造力很强的头脑精细制订出来的,在希腊化君主国里,国家和国王用一大套义务来束缚他们的臣民,而徭役就逐渐变成了这套义务中的一个新添的正规项目。

希腊化的国君们的国有制政策和精密的财政制度的主要受难者并不是新迁居于东方的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是希腊人。他们懂得怎样躲避这些负担,或怎样把这些负担移到土著居民的肩上去;而事实上,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国王用来作为压迫土著居民的工具——如担任包税人、徭役的监督人、得到国家特许的工商业经

① 本书中所用"étatisation"一词涵义甚广,它包括国家管理、国家统制和国家所有三个方面。——译者

营者、大地产的管理人等等。

希腊化君主国的这种摧残性的经济制度在大多数土著中产生了有增无已的不满情绪。例如，从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埃及的土著居民就曾一再地起来反抗外来的压迫者。这些叛乱的首领往往是土著祭司。他们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把外国人，包括国王在内，一起赶走——埃及人在亚述人和波斯人的统治下都曾经追求过这同一目的而往往获得成功。这些叛乱迫使国王们去扩充他们的雇佣军，许赐外国压迫者以新的特权，进一步增加赋税和劳役的负担。托勒密王家也曾屡次试用过相反的方法，答应向土著居民让步，但这样一来，反而鼓励了他们，使他们更相信政府的力量薄弱得不足以强迫执行它的要求，因此情况弄得更糟。这些发展情形使希腊化君主国不能够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这些君主国几乎毫无例外地保持着它们最初的原状，那就是，武力专政制度统治着被奴役的人民而恃雇佣军为其最后之手段。

因此之故，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一直没有变成一种希腊—东方式的文明。它差不多仍然是纯希腊式的文明，所掺杂的东方因素极少。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的主要的新面貌不是它的希腊—东方性，而是它的世界性。由于它具有世界性，所以东方和西方新兴的各种不同的民族国家都能接受这种文明。然而，在东方的新兴国家中——安息、大夏、印度、亚美尼亚等——没有一个全盘接受希腊文化的。希腊的风格和希腊人的观念只是在带有地方色彩的、纯东方式的实体上加一层薄薄的表面装饰而已。而且，希腊影响在东方只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并不曾及于群众。在西方各民族——意大利人、克勒特人、伊伯利安人和色雷斯人——的生活

中，希腊影响是要深入一些。但是，在西方，希腊文明也还是保持其原来的状态和真正的面目。它始终是一种城市的和市民的文明。因此，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仅仅是希腊城市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变态。就是在希腊化君主国本部——在小亚细亚、在叙利亚、在埃及、在黑海沿岸——乡村里的人民大众也从来没有受过希腊文明的影响，他们墨守着自己的旧风俗习惯和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

罗马在布匿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对文明世界的事务突然加以干预，但这并没有使局面改善。甚至还可以说，罗马的干预更大大地使局势复杂化，更有力地助长了破坏力量。正在成长中的罗马共和国的目的就在于防止东方出现任何足以危及罗马国家的强大的政治组织。那儿的骚乱愈多愈妙。独立国家的数目越多，对罗马越发有利。而每一个国家的内政中纠纷越多，罗马就越有希望成为控制东方的力量，也就是统治东方的力量。在第一次（有时称为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希腊的城市都宣告独立了，而在反对安戚约库斯三世的战争前、战时和战后，亚洲的希腊城市也相继宣告独立，这使得这些城市的内部情况几乎陷于绝境。希腊本土不断增长的那种经济凋敝现象也落到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身上来了。另一方面，罗马的威胁，使那些较大的希腊化君主国更加紧继续发展它们的军事力量，从而损害了近东最繁荣地区的正常的经济发展。然而，除了马其顿以外，其他希腊化君主国积累起来的物资并没有用于反抗罗马的斗争，而用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内部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那些较小的国家反倒受罗马的保护和援助而致力于耗损那些较大的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耗损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的力量。

罗马之干预东方事务，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第一个局面，即

第一次(或称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反对安戚约库斯三世的战争期间的局面(如前所述)是防御性战争的局面,进行这些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设想中的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帝国主义趋势以保护罗马与意大利。在首次给马其顿和叙利亚以致命打击以后,紧接着转入第二个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罗马成了希腊城市以及某些较小的希腊化君主国的正式保护者,它设法防止那两个受挫的强国卷土重来。第二次(或称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这段时期中最突出的事件。马其顿竭力使自己摆脱罗马干涉的严重压迫,但它已彻底被击垮,而不再是希腊化世界的政治领导力量了。由于马其顿不再是希腊化世界的领导力量,因此罗马的保护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不太严厉的统治方式。这是罗马干预活动的第三个局面。罗马把希腊城市和希腊化君主国都一律视为必须唯命是从的藩邦了。

马其顿和希腊,被罗马使用强力时的残暴手段所激怒,都想从罗马统治下解放自己,恢复自己的政治独立地位。罗马则把它们的企图视为叛逆,而用可怕的残酷方式把它镇压下去。它对待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造成了对自己和对这两国都非常危险的混乱局面。在所有住在东方的希腊人中,反对罗马的仇恨心现在成了超乎一切的感情。加之,希腊和马其顿的民族力量不再足以防御它们北方边塞外的蛮族——克勒特人、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在小亚细亚也逐渐产生了同样的情况。最后,希腊各城市的内部生活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混乱了。阶级战争席卷了整个希腊和小亚细亚。它采取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是受罗马保护的贵族阶级与国民中其他那些既反对本地贵族阶级又反对罗马统治的人们之间的激烈斗争。

这些情况使罗马与希腊—东方世界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那就是彻底降服的局面。罗马现在把它统治迦太基本土（阿非利加行省）及先前的迦太基辖地（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班牙）时所采用的行省制度加之于东方，这种制度具有一种长期军事占领的形式，由罗马派一员一年一任的长官来总领其事。在东方的希腊地区，马其顿最先成为了罗马行省。几年以后，佩尔加蒙的末代国王阿塔卢斯三世在临死的时候，考虑到最明智的办法莫如把他的王国改归行省制度。他大概认为：一个藩侯，一个受奴役的国王，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国土来应付小亚细亚那日甚一日的混乱局面。因此他把他的王国遗赠给罗马元老院和罗马民族。他死以后，随着发生了一场流血的社会革命，罗马镇压了这场革命，然后把佩尔加蒙王国改为亚细亚行省。我们从昔兰尼地方的一篇碑文* 中得知，与阿塔卢斯同时代的托勒密·欧尔杰特斯二世也仿效他的政策，至少就昔兰尼而言是如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罗马把希腊—东方的一个地区变成罗马的行省，同时对于其他形式上还保持独立的希腊化国家施行严格的约束，这样使东方的希腊地区暂时趋于安定。对外战争和内部阶级斗争两者都被罗马的铁腕同时扼断，希腊与希腊化东方的经济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开始复元了。但是，不久就可以看出罗马的统治及其行省机构远远不能胜任。罗马不大考虑它的新领土的繁荣。爱琴海和黑海上的海盗不断增多，这便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些海盗在希腊世

* 《希腊文金石录补编》，ix，7。

界中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状况的正常发展。而罗马的统治却一天比一天更自私。罗马的行省长官和资本家可以说是毫无顾忌地在各行省中渔利，他们通常是以最自私的精神和为了自身的利益来这样做。他们的行为在希腊人中引起了日益强烈的不满情绪，使希腊人去支持米特拉达悌，虽然那只是短时期的支持，但却是全心全意的，米特拉达悌是著名的本都国王，他挺身而出，成了为希腊自由而反抗罗马压迫的战士。

与米特拉达悌战争同时，在意大利发生了激烈的内战。我们将要在下面谈到这些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罗马那些争权夺势的政治党派的敌对领袖们把东方仅仅视为一个渔利的场所，视为一个可以供给他们金钱的源泉。由于内战大多在希腊人的地方进行，所以希腊与小亚细亚受害最深。征粮来供给交战双方的人马，征调劳动力、运输工具和征用驻宿士兵和军官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被迫支持一个不幸而战败的领袖的那些城市所课加的沉重负担，几乎把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蹂躏得不遗余地。罗马的资本家更拼命地蹂躏这些城市，只要它们愿意付出超额的利息，他们很乐于先把金钱借给城市。在内战将结束时，东方的希腊地区已被蹂躏得不堪而仆倒在罗马资本家和发战争财的人的脚下。

当东方经济这次逐渐走向凋敝的时候，意大利变成了古代世界中最富足的地方。在罗马征服东方以前，在加图所著的 *De re-rustica*（《农事杂谭》）第一次对罗马的经济（特别是罗马的农业）作一番概述以前，对意大利一般的经济状况，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是很贫乏的。然而，有用的史料虽然非常稀少，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推断出，意大利在有史之初并不是一个贫困的国度。南意大利、撒丁

岛和西西里岛很早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富饶的谷物市场。意大利半岛上的希腊城市把大量的谷物输往希腊，而迦太基辖地（撒丁和西西里的一部分）与埃特鲁里亚则用它们的谷物来供应阿非利加的布匿城市，那些城市专门经营商业和替西方市场——包括埃特鲁里亚本身在内——生产葡萄酒、橄榄油和水果。

除了谷物以外，意大利的某些地区，特别是阿普利亚，以及西西里的部分地方，自古以来就出产几种品质最佳的羊毛。康帕尼亚与埃特鲁里亚不仅农业发达，同时还具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它们都以其金属器皿和陶器著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城市也可能在很早的时期大规模地种植过葡萄和橄榄以与它们的母邦、与阿非利加的布匿城市竞争。而且，这些城市也和阿非利加的布匿城市与海外布匿领土上的布匿城市一样，参与了希腊的经济演变，逐渐变成了希腊化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心。西塞罗在弹劾韦雷斯的演说辞中经常引用耶罗二世的基本赋税法，这篇演说辞所反映的耶罗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的经济组织，与当时其他希腊化国家的经济组织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我们也知道，迦太基本土及其布匿城市是多么繁荣，它们的农业是多么高度地集中于较高级的生产形式上，它们是多么嫉妒地监视着它们的属地、藩邦和盟国，防止这些地方采用那些较进步的耕种方式，只许这些地方生产输往布匿城市去的谷物。迦太基对撒丁和西西里两地所采取的奖励谷物生产的措施，和马果那篇论农业文章的性质，都明显地证实了迦太基的这一政策，马果的文章就是布匿人把希腊人有关农业问题的科学论文用之于北非情况下的一个例子。

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情况与此不同。就我们所能判断者而

言，北意大利的克勒特人过着原始的农民和牧人的生活，而畜牧业盛于农业。养猪和放羊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之一。我们没有任何事实材料能证明北意大利的克勒特人曾参与了其他克勒特部落在高卢所完成的逐渐进步的过程。他们在尚未勃兴以前就被罗马人征服了，大部分人被赶出了最肥沃的地区。埃特鲁里亚的经济组织近似于古代小亚细亚某些希腊城市的经济组织。就史料所及来看，埃特鲁里亚的城市乃是埃特鲁里亚的贵族阶级的居住区，这个贵族阶级是由大地主、店东、工厂主人以及一些富商巨贾所组成的。贵族阶级的富庶建筑在被奴役人民的劳动之上，被奴役的人民就是替贵族阶级耕种庄田、牧养畜群的农奴和在他们的作坊中做工的农奴与奴隶。我非常怀疑的是，在贵族们的近郊园圃以外，埃特鲁里亚其他地方是否采用过较进步的耕作方式。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埃特鲁里亚人的古朴状况（那大概是在开始征服此地时形成的）在埃特鲁里亚城市联盟存在的六百年中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变化。埃特鲁里亚的墓穴中那些描绘埃特鲁里亚人的某些生活情况的壁画，就有关我们所涉及的这方面而言，至少在三百年中（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前三世纪）都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其所画的是整个这段时期中一模一样的燕居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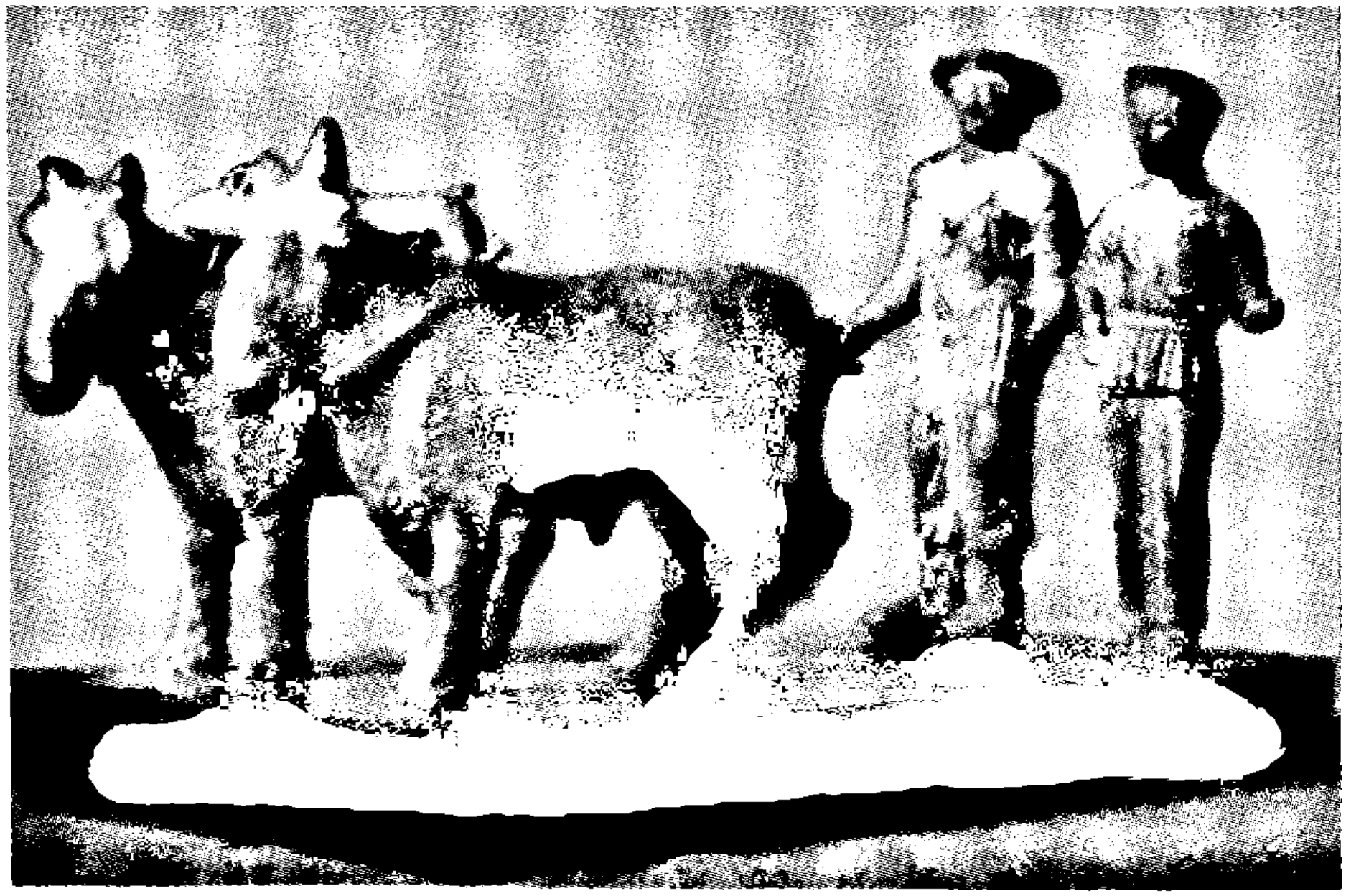
我们对于拉丁人、罗马城以及翁布里—萨贝利人和萨谟奈人的古代经济生活所知者实在太少。大家也都知道，有关古代罗马公社农业生活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是些争论得很热烈的题目。没有一位读者会希望在一部致力于研究罗马帝国的书中充分地讨论这些问题。简短地综述一下我个人认为可能普遍存在于拉丁姆和意大利中部其他地方的情况就够了。不论拉丁姆的经济生活起初

如何，总之，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对于它往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贵族阶级中的某些家族共同形成了上等阶级，他们是罗马的大地主和商人。大部分土著居民被迫去替他们的新主人耕种和做工。罗马贵族推翻埃特鲁里亚王朝并没有改变一般的经济情况。对罗马说来，比这更为重要得多的事情是需要维持和发展一支强大的军事组织，要使这支军力足以保卫罗马以免于受到从北方来的和从其他与罗马为敌的拉丁城市来的攻击。

罗马成为一个农民国家，其基础就是在罗马史上这段历史最不清楚的时期中奠定的。我们不知道早先在贵族手下的农奴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自由的农民，变成了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平民阶级中的成员。大概当时并没有像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所进行的那种急剧的改革，而只是逐渐地演变，随着这种演变，原先的农奴得到了解放，自由的平民地主增多了，这种自由的平民地主在罗马经济生活中，即使在埃特鲁里亚人统治时期，也从来没有匿迹。这两种发展大约都可以用罗马公社的军事需要来解释它，尤其是在生死关头的军事需要，例如在反抗维伊人的战争中、在高卢人入侵时、在和拉丁诸城市以及和沃尔西人与埃魁人的斗争中，还有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拉丁战争和萨谟奈战争中等。塞尔维攸斯变法从形式上看固然如我们所知是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实现的，但这次变法乃是对公元前五世纪那段历史不明的时期中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予以合法化和尊认。

无论这个结果是怎样造成的，总之，在公元前四世纪时，特别是在下半世纪，罗马成了一个农民城市。利契纽斯律令（公元前

1. 拉丁战士



2. 埃特鲁里亚农民犁耕图

图 2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

图 2 说 明

1. 一个普雷讷斯特的妆奁盖上的青铜提梁。发现于“弗朗乔锡区”的帕勒斯特里纳。最初陈列在温泉博物馆，现在陈列在纠留斯庄博物馆（罗马）。大概未曾发表过。W. 赫耳比希—W. 阿梅隆在《向导》（德文），ii，第 1519 号，第 220 页，曾提到过这件东西。在普雷讷斯特的一些 *cistae*〈妆奁〉上，像这类的提梁比较常见，R. 舍恩所撰文，载《罗马考古情报研究所年报》（意大利文），1866 年，第 151 页起，和 1868 年，第 413 页起，第 21 和 42 号，参看第 58 号；《罗马考古情报研究所的文物》（意大利文），增刊 13，14；A. 马乌所撰文，载《鲍利—维索瓦—克罗耳古典文物学实用百科全书》（德文），iii，第 2593 页起；赫耳比希—阿梅隆，《向导》（德文），ii，第 1768 号，第 318 页；G. 马提斯：《普雷讷斯特的镜子》（德文）（1912 年），第 71 页。

这个妆奁（妆奁是浴池、角斗演习所和梳妆台上用以盛物的一种圆筒形的青铜盒，一般均雕有图案为饰，在普雷讷斯特地方的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的墓中经常发现这种盒子）的提梁雕成两个蓄须的战士，全身披挂，盔甲齐全，带着胫甲；斜执重矛。他们抬着一个伙伴的尸体。死者无须，铠甲同他们所穿的相同，但没有戴头盔，也没有矛。人物的一般形象是古老的，但肯定是雕塑这个盒子的同时代的人物形象，其时代不得更早于公元前四世纪。两个战士抬着一个伙伴的尸体是上古希腊艺术中常见的主题。最著名的例子是柏林博物馆所藏的斯巴达的黑花 *kylix*〈双耳杯〉，那个杯上所雕的图形是一列斯巴达人抬着战死的伙伴们的尸体，请看 E. 佩尔尼斯所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16，1901 年，第 189 页起，图 III；E. 布朔尔：《希腊瓶画》（英文）（1921 年），第 92 页，图 XLV。普雷讷斯特的妆奁无疑是模仿这类原品而制成的，不过稍有改变而已。但是，我认为那人物的庄严形象，他们所特具的古风，以及他们的盔甲方面的某些特征（例如头盔），使人一望而知其出自拉丁人之手，很可能是由拉丁人或拉丁化的工匠在普雷讷斯特地方制造的。我觉得还可以肯定，这个妆奁的主人认为这些兵士的形象足以代表自己这方面的军队的成员。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兵士的形象同这个妆奁上的人像相差不大。这一组像很生动，可以作为公元前四世纪

时罗马人和拉丁人生活的一幅很好的写照，当时的罗马国正是以军事力量和牺牲自己的成员为其立国基础的。参看在帕勒斯特里纳发现的另一件骨板上与此相似的人物像，那骨板原先是用来装饰一个木匣的（E. 费尼克：《普雷讷斯特之研究》（法文）（1880 年），第 208 页起，图 III-IV；赫耳比希—阿梅隆，《向导》（德文），ii，第 1768 号，W.，第 323 页起），还可以参看稍晚一些时候的意大利工艺品上的某些玉雕（A. 富尔特文格勒尔：《古玉》（德文），图 XXII-46 和 XXIII-24—29；参看 iii，第 232 页起，第 235 页起，及第 268 页）。关于公元前四世纪时拉丁艺术的一般特征，请看 G. 马提斯：前引书，第 123 页起。

2. 埃特鲁里亚人还愿的青铜人物组像。发现于埃特鲁里亚的阿雷佐附近。原先收藏在基尔凯里雅诺博物馆，现藏纠留斯庄博物馆。赫耳比希—阿梅隆，《向导》（德文），ii，第 1723 号，第 297 页，有参考资料目录。此物属于公元前六世纪。

这一组像（农民身后的米芮尔娃女神像不在其内，因为那是近代人添上去的，非原物所有）所塑的图形是一个埃特鲁里亚农民用犁耕种自己的或主人的田地。这个农民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 *chiton*〈希腊式披衫〉和一块兽皮，大概还穿着靴子。犁是由一片木板制成的木铧托（*buris*）、一块金属制的犁铧（*vomer*）和一个木制的犁柄（*stiva*）构成的。在特拉莫讷附近发现一个与此相似的犁（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877 年，第 245 页；A. 米拉尼：《考古学与古钱学的资料与研究》（意大利文）i（1899 年），第 127 页）。这一组像虽然是埃特鲁里亚的，虽然是属于上古时代的，但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用它来描绘共和国时期拉丁姆地区乡村农民的生活。埃特鲁里亚的农民中大多数人都不属于埃特鲁里亚人的血统而属于意大利人的血统。直到现代，意大利的许多穷乡僻壤的农民仍然使用着这样的犁。

367—前 366 年）限制一个家族任意扩大其占有地或租用地的机会，以此促进了这个农民国家的成长，我认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利契纽斯律令中对最大限度地段面积所规定的 *iugera*〈罗马亩〉数的精确数字，也许是后来在公元前二世纪时的某一条土地法中规定下来的，不过将日期倒填在订立利契纽斯律令的时候，然

而，在早期立法工作中已具有这种限制田地面积的精神。存在着这类的律令，既说明了所谓塞尔维攸斯法制的性质，也说明了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国土之扩张造成罗马农民户口与农民占田面积相应增加这一事实。我们所见到的史料中，有一些史料把某些罗马城的贵族家庭描写成富裕农民的家庭，其生活与其他罗马公民相同，这种记载看来并无可疑之处。

因此，在公元前四世纪时，罗马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农民经济，是一种原始的务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每一家的全体成员都在田地里辛勤劳动，而在例外的情形下，使用一些奴隶和一些自远古以来由于宗教束缚而依附于贵族之家的靠客来帮助他们自己。农民经济和专门从事谷物生产是拉丁姆一般经济生活的主要面貌，所有那些新并入 *ager Romanus*〈罗马领土〉之内的诸部(*tribus*)的领地和新建立的罗马屯市[①]与拉丁屯市的辖区，情况当然也是一样。每一个新建的罗马移民区就是一个农民新村，每一个都会生活的中心地、每一个新建立的屯市就是一个筑有城堡的农民村庄。

我们对于拉丁姆与康帕尼亚之间的高地、萨宾山地、翁布里亚、皮切努姆和萨姆纽姆等地的情况所知道的一点点材料，说明这些地方与拉丁姆的一般情况非常相近，不过在这些地方，大概主要的是属于各部的牧场，而土地私有制和农业是次要的。这些地方的都会生活发展甚为迟缓，而且大多只限于与康帕尼亚的希腊城

---

① Colony 一词，旧译多作“殖民城”或“移民城”，今改译作“屯市”。相应地，colonists 译“屯户”，military colony 则译“军屯市”。——译者

市和希腊化城市的市区接界的地域。即使在康帕尼亚，像蓬佩伊这样的城市，其古老的房屋既有带房廊的前庭，又有园圃，这种城市并不是富商大贾和大地主所居住的城市，而是富裕农民所居住的城市。

罗马的势力愈强大，它所征服的新领土也就愈辽阔；它的屯市愈多，农民经济在意大利的传播也就愈广。那些孤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心就在这个时候衰落了。南意大利的希腊城市的历史用不着再加以复述。它们一个个相继沦为它们附近的萨谟奈人的牺牲品，能幸免者很少。其中有些被毁灭了；有些——康帕尼亚所有的城市，只有那不勒斯和少数几个城市除外——开始过着萨谟奈城市的新式生活，那就是说开始过着像蓬佩伊那样的农民城市的生活；没有几个城市还保持其纯粹的希腊特色。我们不知道埃特鲁里亚城市在被罗马征服以后的命运如何。其中大多由罗马移民侨居；有些大概还过着它们古老的生活，即地主与农奴的生活。

布匿战争一方面使意大利和迦太基领地上（当然连同西西里的希腊地区一道）的少数几个进步的经济生活中心加速衰落，另一方面扩大了罗马屯垦事业的范围。罗马和拉丁的屯民遍布于意大利北部那些从前为克勒特人所居住的地方；有些人移居到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荒地上。罗马的新行省——西西里和撒丁，可能西班牙也一样——并没有立刻吸引大量的罗马屯民。它们还保持着罗马征服以前普遍存在的经济生活面貌。原先属于耶罗的王国，仍然以耶罗的精神和方法统治之。西班牙、撒丁和西西里的布匿地区，对于罗马国家说来也和以前对于迦太基一样，仍然是国家的谷仓和各种金属的储藏库。事实上，如西塞罗所描述的，就是西西

里的希腊地区也被罗马人降为了罗马的一个谷仓。尽管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罗马民族与元老院〉吞并了第一批新领土，罗马国家暂时还是一个农民国家。消灭腓尼基人的是罗马的农民军，征服东方的也是这些农民。至于征服东方的情节，前面已经说过了。

罗马征服迦太基和东方各国的经济后果是什么呢？我们要记住，这些胜利一方面是罗马国家的胜利，即罗马农民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的军政领袖们的胜利，这些军政领袖们就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罗马世袭贵族阶级的成员，亦即罗马元老院的议员。这些胜利既然是国家的一种成就，因此，它们意味着国家财富大量地和稳步地增加。除了获得不计其数的钱币和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罗马还变成了一个大地主。大片的谷田和草地、森林、湖泊和河流里的渔场、矿区和采石场等，不论是在意大利或是在原先归迦太基统辖而现在变成罗马行省的地方，全都成了国家的财富。逐渐增多的谷田大多分配给那些移居到农民新村去的罗马公民。但是，罗马与拉丁公民人数的增加并不是与罗马领土的扩大等速并进的，即使在意大利也是这样，特别是在高卢战争和布匿战争以后。新屯市的设置，受政治动机的支配甚于受经济动机的支配。大多数屯民被遣送到意大利北部去保卫该半岛，以抵抗北来的侵略，这是不足为怪的：罗马一直没有忘记它被高卢人攻陷过的往事，也没有忘记高卢人曾以其最精锐的军队资助过汉尼拔的事情。意大利南部既然遭到了破坏，正在凋零之中，其危险性较小，当然也就不大吸引罗马和拉丁的移殖者，其中只有康帕尼亚是例外，但康帕尼亚也只有一部分地方为罗马屯民所移居，整个说来仍然保

持其萨谟奈的面貌。我们不能不认为，康帕尼亚的大多数城市在布匿战争中一直是忠于罗马的。

大块的土地，也包括谷田，就这样变成了罗马国家的财产，但不是罗马农民们的私有财产。然而，因布匿战争和东方战争而致富的并不只是国家。罗马的公民们也分享了财富。分肥最多的是罗马军队的将领们、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成员。从远古以来，他们就是罗马农民中最富裕的人，像拉丁城市和同盟城市中与他们相当的阶级一样。他们在扩张领土的战争中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大量的人畜都落入他们之手。当劫掠城市的时候，大多数战利品归他们所有。他们回到意大利时，“腰带”（或者如我们所说就是衣袋）里都兜满着金钱，而且，只要他们不把钱一下子挥霍掉，就能拥有成群的奴婢和牲畜。不仅如此，元老院派去统治新行省——原先的迦太基领地——的人也都是属于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领地和西西里的希腊地区——耶罗二世的王国——都保持着它们早先的状态，或者换句话说，这些地方都被罗马人民视为他们财产的一部分，视为罗马全民的地产（*praedia populi Romani*）。因为它们是被征服的地方，所以要受罗马将军、受罗马人民的长官的统治，他们在这些地方的统治权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如前所述，对于在东方所吞并的领土也采用这同样的制度。行省政府于是变成了元老院议员阶级一个发财致富的新源泉。最后，由于事势所趋，由于他们财富日增的结果，使这个阶级参与了信贷事业——我们已经看到这是征服东方以后的必然后果；同时还不顾严格的禁令而参与了商业活动——这是资本集中到罗马与意大利的公民手中的后果。

除开罗马元老院议员阶级和意大利同盟城市中的一个相当于元老院议员的阶级之外，大群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也分享了由于罗马君临文明世界而得来的财利。在罗马和在意大利都兴起了一个人数众多而势力强大的商人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们最先是帮助国家——包括同盟城市在内——来利用国有的大规模不动产——谷田、矿区、森林、渔场、房屋、店铺等等，借此起家而发展起他们那生计兴隆的事业。在扩张领土的战争期间，他们以粮食、衣服和武器供应军队；他们从国家、从将军、军吏和士卒手中收购战利品；他们将各种各样的货物卖给前线的士兵，以及进行诸如此类的活动。当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把由这些活动赚来的钱借给罗马的盟友和藩属，无论其为国王或为城市；他们承包税收和国家在各行省中的其他收益；他们之中迁居到各行省去的人也不断增多，他们在东方高度发展的商业生活中大肆活动，例如充当放债者、商人、地主、畜群主人、城市中的房东和店东等。

这些商人中，有些人一直没有离开过意大利。有些人到东方去，长期居留在那里而逐渐在当地落了户。不过，这些精明强干的逐利之徒，大多数大概都是在去东方赚得金钱之后，再回到意大利来投下他们的资本。当高卢、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以及西西里、撒丁变成了罗马行省时，罗马商人当然也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这些行省中去。在这个新兴的资本家集团中，最富裕的成员是骑士阶级，他们大多住在罗马本地，渴望能被选上一官半职，借此而获取加入元老院议员之列的荣耀。但其他大多数成员则仍然住在他们本乡的城市中，或住在意大利的罗马屯市和拉丁屯市中，或住在与罗马联盟的城市里。他们在那些地方，即使没有正式成

为自治市议政会议员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地位也仅次于这个阶级，他们和这个议员阶级共同形成居民中的上层。

金钱、奴隶、各种各样的货物、牲畜，都从各行省流入意大利，使意大利的经济生活受到刺激。现在集中在罗马公民手中和意大利各城市居民手中的资本，有一部分留在行省中，而大部分来到了意大利。这些暴发户大多是靠投机发财的。他们既已发财，自然希望找寻一种尽可能最安全的投资方法来投下这笔财富，他们希望这种投资能保证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要能在城市里过着无所事事的安闲生活，最安全的投资莫过于置办田产，其次就是放债和投资于意大利的工业。大资本家的这种倾向是受到国家欢迎的。我们已经看到，国家这时候在意大利和各行省中都得到了大笔的不动产。除非对这么多的富源都废置不理——当需要金钱来供应公共建筑、水管、修筑驿道、民间敬神以及包括各项竞技在内的种种开支的时候，这样做当然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否则就必须用某种方法来开发这些富源。唯一的办法就是吸引私人的资本，使之参与这些富源的开发工作。因此，国家当然奖励新兴的资本家投下他们的资金，首先投之于大片荒废了的谷田和牧场，在高卢战争和布匿战争的惨局之后，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田地尤为荒芜。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的方法来重新开垦这些土地。住在意大利而以务农为业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了，这不仅由于战时的死亡，还由于不断地向外移徙，首先是迁移到东方去，而后来也向西方迁移。因此没有农民来屯垦荒地。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群的奴隶，同时还有一批愿意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人。无怪乎罗马元老院给予这些人以种种的

方便，或由执掌这方面事务的户籍官按正式手续把大片的土地租给他们，或允许他们非正式地占有土地，不过必须把这种重新开垦的土地的一部分收入缴纳给国家，总之，是让他们来恢复意大利遭受破坏的经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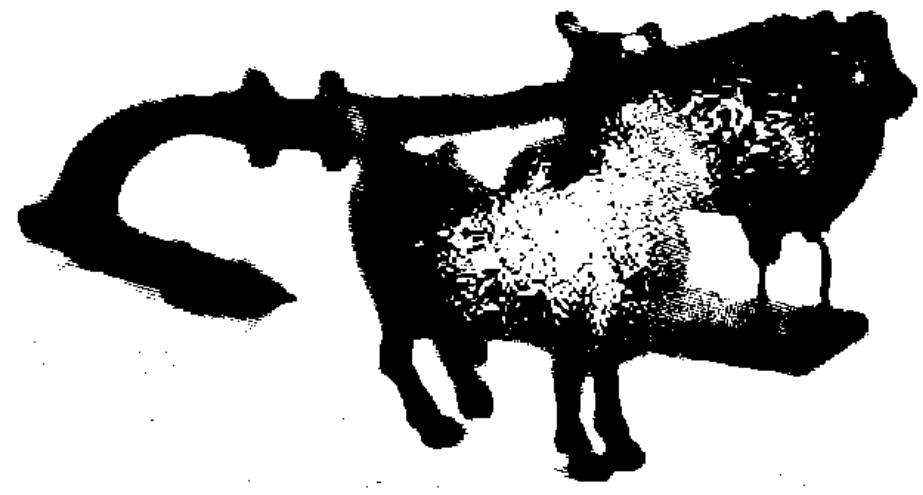
公元前二世纪时之所以一度逐步产生土地迅速被兼并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此。那些地主们要不是罗马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的成员，就是意大利城市——无论是同盟城市或罗马和拉丁的屯市——居民中一些最精明强干和最勤俭的人。这些人从来不曾打算住在农庄上和亲自耕种土地。他们自始以来就是地主，而不是庄稼人，因此他们增加了住在城市中的地产所有者的数量，而相应地减损了住在乡下并真正经营农业的农民。另一方面，这个阶级的人也投资于工业和创办一些借奴隶劳动来经营的新商店和新工厂，因此，他们牺牲了自由的小手工业者而恢复了康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旧有的工业。

罗马和意大利新旧贵族阶级的成员，大多数是在东方发财致富的，他们已经熟悉东方所流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这套制度介绍到意大利的农业和工业中来。他们在致力于这方面时，借助于希腊人关于科学的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农业的手册，这些手册都从布匿文和希腊文译成了拉丁文，因此在意大利人人都能读懂它们。我们不妨认为在工业方面也有过这类的手册，至少有一些旨在普及推广希腊工业技术的手册。在希腊化的东方，资本家在农业范围内的活动几乎完全集中在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酿造业上，这两种产品是希腊化的地主们主要的输出项目；也有人靠用科学方法饲养牲畜来发财；谷物生产则几乎完全让给了农民，所谓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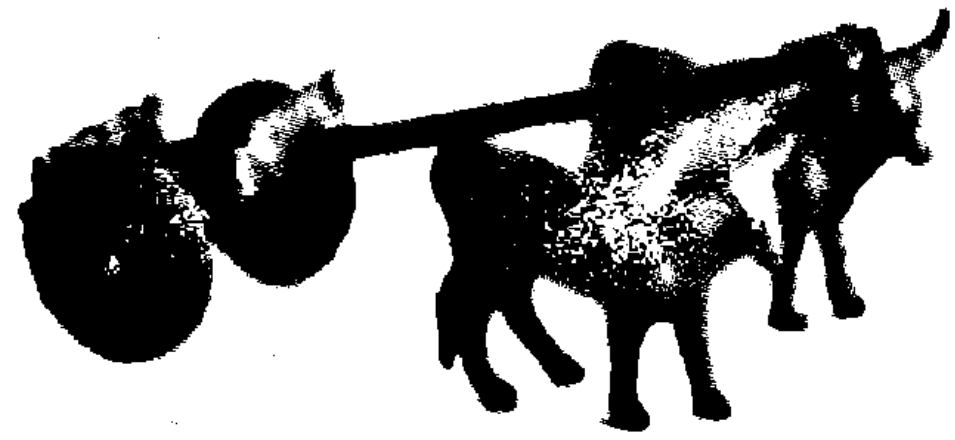
或者是小地主、或者是大地主的佃户和农奴。罗马和意大利诸城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是希腊化的地主们的衣钵继承者，他们之接受这种制度是毫不足怪的。这些人还把资本主义制度应用于工业管理上，特别是在罗马、埃特鲁里亚和康帕尼亚。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就意大利许多地区而言，公元前二世纪的资本主义潮流和意大利农业中之采用希腊化的方法，都不是新鲜的事，而是恢复古代的经济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顺利发展，除了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和意大利丰富的天然资源使它便于发展这种制度这两种因素而外，还有许多有利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劳动力多而价廉。大群的奴隶流入了意大利，他们大多来自希腊和小亚细亚——其中有些是熟练的工匠，有些是习惯于在希腊化的国王和希腊化的资产阶级以科学方法经营的庄田上做工的人——这股人口迁徙的潮流自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整个时期内不曾间断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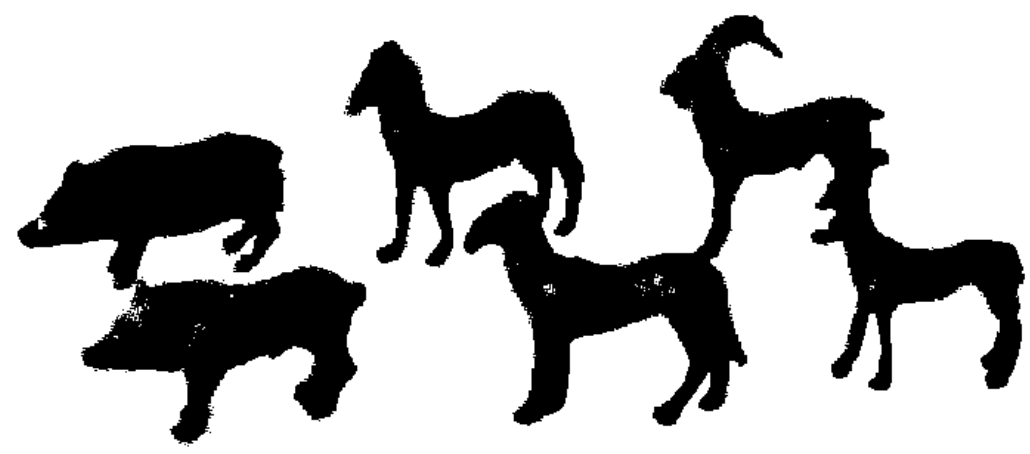
从另一方面看，意大利所生产的商品现在有了很好的销售机会，特别是销售橄榄油、葡萄酒、金属器皿和陶器。意大利的主要市场是古代世界的西部：一方面是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另一方面是北方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自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不再执西方商业之牛耳了。它的活动只限于改进它的农业，尤其只限于大规模的园艺和种植葡萄与橄榄。迦太基所一直保持的地位落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之手，这些希腊人原先是迦太基的竞争者，而现在是罗马的忠实盟友。希腊世界的东部这时正在经济逐渐凋敝之际，所以没有分享这种地位。迦太基



2. 牡牛和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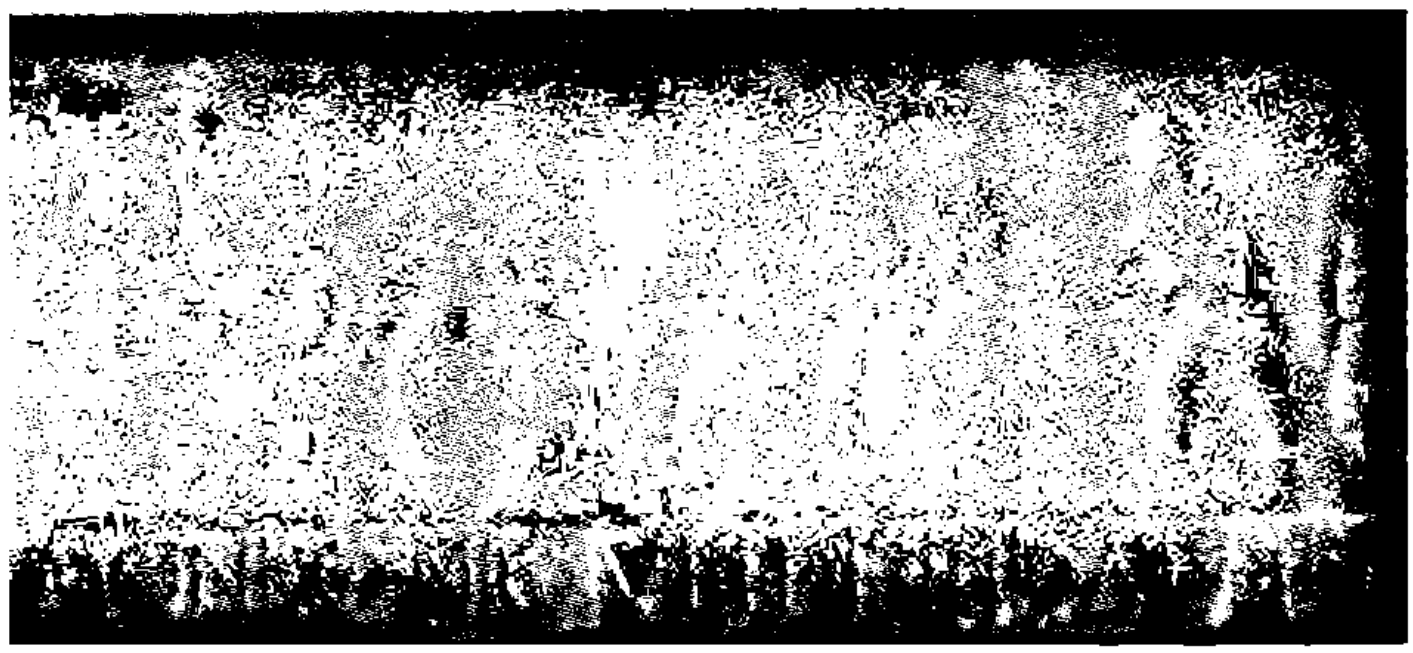


3. 牝牛和大车



4. 猪、绵羊和山羊

1. 牧猪人



5. 农民生活

图 3　共和国晚期意大利的生活状况

图 3 说 明

1. 波洛尼亚地方所发现的墓碑。波洛尼亚市博物馆。杰塔诺·达洛利奥:《波洛尼亚附近雷诺河床中罗马露圹碑文》(意大利文)(1922 年),第 121 页起,第 59 号,图 27;《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898 年,第 479 页起,第 15 号,图 3。

这块碑上的铭文是一段韵文,为告诫观者不要污损本碑而作:文中并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所雕的人物图形是一个 *suarius*(牧猪人),他穿着一件束腰的紧身衣,倚杖而立;他的前面有一群猪,共计七只。要知道,从史前时期到罗马时期,北意大利一直以产猪著称;波利比攸斯书 ii.15.3 曾说到波河河谷地带所产的猪肉不仅足可供应意大利居民食用,而且还可供应军队食用;斯特腊博书,V.I.12(218c)补充说,这个地区把大量猪肉运往罗马。参看公元一世纪初期的一个 *mercator frumentarius*〈粮商〉的墓碑,达洛利奥,前引书,第 118 页,第 58 号,图 26。

2—4. 青铜像群。大约发现于卡斯特拉纳镇。纽约市艺术博物馆。G.M.里克特撰文,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公报》(英文)1910 年,4 月号,第 95 页起,图 1;《纽约市艺术博物馆青铜器目录》(英文),第 712—725 号;海伦·麦克利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日常生活》(英文,1924 年),第 109 页起;M.罗斯托夫采夫:《一所埃特鲁里亚晚期的田庄》(德文),载《古代雕塑》(德文)(W.阿梅隆记录),第 213 页起,图 17。年代不能确定(见下文)。

这一组像包括两匹牡牛、两匹牝牛、一只公猪和一只母猪、一只牡绵羊和一只牝绵羊、一只牡山羊和一只牝山羊。此外还有双架轭两具,犁一部,大车一辆。图 2—4 的次序是按照纽约市艺术博物馆的次序排列的。一望而知,两匹牡牛架着一具双架轭正在拉犁,两匹牝牛架着另一具双架轭在拉大车,或者拉车的是牡牛而拉犁的是牝牛。所有这些东西全面地描绘了一个农庄上的牲口和农具。犁与图 2-2 的犁相似。它是木制的,木制原件接榫处经过细心复制。犁柄用钉子钉在铧托上,而犁铧用皮条或绳索绑扎在铧托上。那辆大车"只不过是一块底板,在前后各加一块木板,装在实心轮子上而已"。这些东西都是纯现实主义的作品,就其风格来看,其时代不得更早于希腊化

时代;但就其制作来看,则是意大利人的作品,不是希腊人的作品。在埃特鲁里亚、意大利和撒丁的古墓里,经常发现古式的船只,那些船只上制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家畜群,与此极为相似。最好的例子是韦土洛尼亚地方的酋帅墓中所见到者。在那个墓中所发现的船只的舷沿上,缚着一只狗、一对牝牛架着一具轭(还有一部铁犁的残余)、猪、山羊和绵羊;差不多全都备有盛饲料的筐子。船内装满了秤糠或谷穗。如果我们把卡斯特拉纳镇这些小雕像归之于希腊化时代不算错误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习惯竟维持了几百年,丝毫未改变,其时间之长久令人惊异。请看法尔基撰文,载《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887 年,第 503 页和图 XVII;同作者:《韦土洛尼亚》,第 109 页起;蒙特留斯:《意大利的原始文化》(法文),图 184—188;D. 兰德尔-默基佛:《村夫和上古埃特鲁里亚人》(英文)(1924 年),第 118 页,图 XXII-1。

5. 一块墓碑的一部分。苏尔莫纳。市博物馆。M. 贝涅撰文,载《法兰西古物学会论文集》(法文),第七辑,1,1906 年,第 242 页起;M. 罗斯托夫采夫所撰文,载《古代雕塑》(德文)(参看上文 2—4 下),第 215 页,图 1。公元前一世纪晚期,或公元后一世纪早期。

这块残碑上所见到的是农民生活的景象。左面一个农民,倚杖或倚犁而立,看守着他的羊(和猪?)。其右面为另一个农民,手牵着两匹马或骡子,拉着一辆载货的大车。再往右是一个妇人,大概是这个拉大车的农民的妻子。这幅浮雕所描绘的也许是一年一度从山地徙居平原(或从平原迁回山地)的情形。残缺不全的碑文如下:"我告诫人们;不要不信任你自己":那意思就是说,"心情舒畅地工作,你就会发财享福"。

的覆灭最后彻底断送了这个布匿城市,使它不再成为一个商业上和经济上的力量。蓄意毁灭这个城市的大概是以加图为首的意大利资本家和地主。他们现在是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大生产者,他们有种种理由来致力于消灭一个劲敌,致力于把迦太基的领域从一个经营园艺、葡萄园和橄榄林的地方变成一大片谷田。

我们绝不可以低估西方和北方市场的重要性和它们的购买力。高卢是一个富裕之邦,非常需要购买葡萄酒、橄榄油和工业制造品,

但在高卢本地的希腊城市以及(在公元前二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罗马人所占据的高卢地区,这些物品的生产量是不够的。西班牙和不列颠的生活情形大致与高卢相同。不列颠的统治阶级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阶级都属于克勒特种人。西班牙半岛上的伊伯利安人地区几百年来已经用惯了希腊和腓尼基的进口货。就是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也逐渐熟悉使用希腊—意大利的商品了。

我们已经叙述了公元前二世纪时意大利所发生的演变,这个演变对于意大利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罗马不再是一个受地主贵族阶级——其中大多数是富裕的农民——统治的农民国家了。现在,在全意大利不仅兴起了一个有势力的商人阶级,而且还兴起了一个实际上相当富裕的城市资产阶级。意大利事实上到公元前二世纪时才趋向希腊人所谓的都会化。许多古代城市,有一些是希腊的或埃特鲁里亚的城市,都意想不到地恢复了旧日的繁荣。许多市镇、村庄、市集和小村墟都不仅采取了一种城市组织,而且在社会经济面貌上也的确像一个真正的城市了。这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城市里的店东和地产所有者那个阶级日益占重要地位而造成的,当他们住在希腊化东方的时候,即已逐渐习惯于舒适的城市生活,受到资产阶级理想的感染,所以他们回到意大利来提倡城市生活和资产阶级的理想。

这个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积极参加活动。领导地位仍然为罗马贵族阶级所把持。资产阶级太忙于组织它的经济生活和城市建设了(例如蓬佩伊城以及城内那些火山岩时期的美丽房屋,装饰着艺术性的门面和华丽的壁画与镶嵌细工),所以他们并不热衷于在京都的公众活动中显露一下头角。

他们的物质利益和政治理想，大致上与罗马贵族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理想相符。他们像贵族阶级一样，一般都投资于意大利的土地，那些土地主要是开垦成葡萄园和橄榄林，或用作牧地。因此，对于罗马对付迦太基的残酷政策，对于元老院禁止在西方新置的罗马行省中种植葡萄之类的政策，他们都表示缄默的支持。像元老院议员和罗马骑士们一样，他们也投资于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葡萄园和橄榄林。因此他们也支持元老院对东方的政策，而整个说来，在对各行省的财政剥削和经济剥削中他们也占有一大部分。所以当政府一开始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时，他们是政府的坚决拥护者。

罗马公民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这两个上层阶级的日益富裕，对罗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起了强烈的影响。大笔资本投人葡萄园和橄榄林，抬高了意大利许多地区的地价，引起许多农民出卖自己的产业而迁到城市里去住或迁到东方去。在适宜于种植葡萄或橄榄、或适宜于按资本主义方式来饲养牲畜的地区，农民户口都逐渐减少了。自从击败汉尼拔以来，罗马元老院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战争，这些战争削弱了意大利农民的经济力量。为什么资本不仅在意大利南部、而且也在意大利中部——那儿是意大利农民坚守的阵地——攫取了大片的土地，为什么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农民从地主一变而为替罗马及各城市的资本家耕种庄田的佃户，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在埃特鲁里亚，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上半期，这个不幸的转变即已普遍发生。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区普遍存在的特点来理解这一点。因为从远古以来，埃特鲁里亚已经是一个有大庄田和有大群农奴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所有这些重要的演变在意大利产生了一场严重

的危机。随着农民人口的减少与奴隶和佃户数量的增多，随着资本的积累，特别是罗马城资本的积累，罗马共和政体受到危险重重的威胁。传统的罗马贵族政体是以一支农民军为其基础的，这种政体逐渐退化成一种富豪显贵之家的寡头政治，而以意大利农民为其基础的意大利军事力量也衰落下去了。我们应当记得，只有地主才有到罗马军中服兵役的义务——顺便说一句，这也是那些不胜兵役之苦的农民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财主而自己却仍然以佃户身份留在土地上的另一个原因。

这时候开始在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舞台上演出的第一幕就是由提贝里攸斯·格拉古首先倡导而在他死后由他的兄弟加攸斯·格拉古继续推行的一个激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提贝里攸斯和加攸斯二人都受到意大利乡村居民和意大利城市里没有土地的无产者的支持。他们的主要目的与希腊城市里许多革命领袖的目的相似。重新分配土地和由此必然恢复旧日的农民与军队，这就是他们进行改革的出发点，也是他们进行改革的目的，但像这样的一场革命所必然导致的结局，是产生一个由单独个人来领导的得民心的政府。佃户和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之全心全意地支持格拉古兄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在这里详述在初次尝试政治和社会改革之后带来的内部纠纷。在这里，只用几句话说明一下使这次运动具有特殊而复杂面貌的原动力就够了。

格拉古兄弟并没有制止住罗马国家的严重危机。他们的活动连一次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都没有办到，更远远谈不上彻底改变罗马国家的政治结构或一度恢复罗马旧日的农民。罗马农民国家不可能再恢复：它是一去不复返的了。当然，是重新划定了一些

地段给农民，是把一些产业分给了没有土地的无产者，是有一些大地产被没收了。但是，没有多久，寡头统治者们的顽强抗拒首先阻碍了这些事的进行，而终于使它完全停顿下来。格拉古氏革命的唯一后果，是它鼓动了意大利广大的人民群众，并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在富人同贫人之间、在“压迫者”同“被压迫者”之间划下了一道明显的鸿沟。这样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旦开始便不可收拾。

然而，斗争的主题——土地问题——在意大利内部纠纷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中却多少含糊了一些。在一段时期内，另一个纯政治性的问题代替了土地问题，或者说继土地问题而起，占据了首要地位。这就是罗马人的盟友的政治权利问题，特别是意大利城市中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问题。他们希望成为罗马共和政体中的成员，希望与罗马公民有着同等的权利，他们这些愿望已经被格拉古兄弟的诺言所唤起，而现在看来又被寡头们的反动势力所粉碎了。但是这些盟友们并不肯甘休。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流血战争，这场战争摧残、蹂躏了意大利中部，特别是北萨谟奈部落所占据的繁荣地方。结果双方妥协了。盟友们放弃了他们的新意大利联邦计划，而罗马人也真正地把公民权许给了同盟城市中所有的市民。盟友的要求是不可忽视的，否则，意大利—罗马国家就会不再存在。

在这段插曲之后，主要的斗争又恢复了，规模较前更大。罗马公民集团中加入了意大利人，使不满意的人数更增多了，在他们之中，大大增加了的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他们几乎全都准备积极参加斗争。而另一方面，自治市的资产阶级加强了支持现存秩序的阵容。斗争不仅因新参加者而扩大化和复杂化，并且它的外貌也几乎完全改观了。在“社会”战争以前不久，某些克勒特—日耳曼

部落曾大举入侵意大利，情势非常危急，这次外患和“社会”战争本身都反映出旧日只征调国民中一部分人——主要只包括地主在内——加入军队的这个原则不能再沿袭不改，从而，罗马军队在性质和社会成分方面都逐渐发生了一次剧烈的改变。自从马里攸斯开始着手改革以后，罗马军队就不再是一支意大利农民军，而变成了一支多少带有专业性的长期服役的军队，它是由无产者和贫穷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另一方面，在“社会”战争之后，罗马人民议会所包括的罗马公民人数少得可怜，它不能再真正地代表罗马公民的愿望，而变成了乖巧的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工具。就表达大多数罗马人的愿望而言，比人民议会远为重要的是新军，就作为有野心的领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而言，比人民议会远为有效的也是新军。

新军之兴起，不仅是由于蛮族的威胁和内战所造成的，而像内战本身一样，主要地是由于罗马人的帝国（*Imperium Romanum*）、由于罗马人的大一统国家所造成的。没有一支这样的军队，大一统国家就不能维持下去；它肯定就会土崩瓦解。在东方的大战结束以后和马里攸斯进行改革以前，罗马所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反映了这一点。就像在阿非利加平定尤古尔塔之役和在西班牙平定克勒特—伊伯利安人之役这样一些小规模的战争，都使罗马在人力和财力方面遭受很大的损失，而没有给罗马军队增加丝毫的光荣。而克勒特和日耳曼部落人侵意大利这一严重的局面彻底显示出罗马民军的弱点，同时显示出非专业化的将领没有能力改变这种民军使其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因此，必须进行两个密切相关的改进工作：要建立一支多少具有常备军性质的军事力量，同时要有一批新的专业化的将领，他们必须毕生致力于军事问题。

新式军队既然是罗马的一支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它的统帅们就必然不仅只代表国家的军事力量，而且也变成国家的政治领袖，这样一来，就逐渐使元老院议员阶级和罗马人民议会，即罗马民族与元老院，丧失它们原有的地位。这些新领袖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城邦制度来适合于一个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把它转变成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使它能够统治现在构成罗马帝国的那片辽阔的领土。因此，格拉古兄弟所发动的这场斗争本是作为恢复旧日农民国家的一场战斗；这场斗争曾经得到没有土地的无产者和贫穷农民的支持，他们是在“重新分配土地”这个陈旧的战斗口号下进行斗争的；而现在呢，这场斗争却变成一场争取彻底改造国家和争取把这个国家的机构改造成更能适合于一个大一统国家需要的工具的斗争了。

最先理解到这个斗争的新面貌、并利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新因素来贯彻自己政策的是 L. 科尔芮留斯·苏拉，他是“社会”战争中的一个罗马将军。他在一场激烈的革命战争中反击那些支持格拉古氏纲领——“全权归于由城市无产者选出来的长官所领导的罗马政治议会，恢复旧日农民国家”——的人们，他之所以反击他们，其主要政治思想就是要改变少数元老院议员的统治使之适应于帝国的需要。在这个新型的国家里，他本人所担任的是促成者和调节者的使命，他之所以能操纵国家大事，其基础在于他个人在军队中和在一大群罗马公民、特别是上层阶级中的声望。看来很奇怪，在这样一种性质的斗争里，支持他的竟是一支由无产者和贫穷农民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这些人似乎应当站到他的对手一边。但是我们应当想到，新军往往只看到它本身的利益；而苏拉许给他

军队的利益比他的敌手所许的要多一些和更实际一些——他在和米特拉达悌作战时许给军士们以战利品，在军士们返回意大利以后许给他们以土地和金钱，并且使他们在自己本乡的城市里有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度其余年(这个诺言的吸引力也并不小)。我们还必须记住的是，苏拉的军队也还包括一群旧罗马公民，他们是害怕那些因“社会”战争而获得公民身份的大批新公民的。马里攸斯和他的同党及继承者们则支持这些新公民的要求。

苏拉死后，内战立刻又恢复了，但这时的内战本质上已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势的斗争，这是元老院议员阶级中能力最强和野心最大的一些贵族彼此之间为了在政府中夺取压倒优势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人没有标榜任何固定的政治纲领，没有提倡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或经济改革。这是为了个人势力和个人野心而在京城和战场中同时进行的一场战争。在大一统帝国的复杂的政治军事生活中，周期性地出现极端混乱的局面，混乱局面的唯一出路就是产生一种特任军事指挥权，这种特任军事指挥权使罗马贵族阶级中最有才干的一些人得到机会来和军队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借报酬和诺言使军队亲附于自己；而这样自然就使军队的领袖只要一天得到军士的拥戴，就能做一天国家的主人。对手方面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和手段。于是，内战实际上变成了由野心政治家所率领的组织严密、训练精良的军队之间的战争。罗马大多数公民并没有积极参加这次战争，行省居民当然也一样。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和平与秩序。参与战争的人都是罗马帝国的职业军人。他们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敌对行动停止时能得到一笔丰赡的报酬，那就是土地和金钱。

内战这出悲剧的下一幕——恺撒和庞培之间的竞争——为什么会那么复杂，它的主要争端为什么会那么含糊不明，其原因就在于此。恺撒得胜了，而恺撒之所以能得胜是因为他是一个更优秀的组织者，一个有军事天才的人，一个在他的兵士中个人声望极高的人。在国家大事方面，庞培的道路和恺撒的道路所不同者非常细微，而这点细微的不同当然更非双方军队的兵士们所能理解。庞培支持元老院制度，甚至连元老院的议员们也未曾予以重视。他们要选择一个在他们看来危险性比恺撒小一些的人物来作为他们的领袖，而且他们希望这个领袖在得胜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主子。罗马的公众除了在被迫的情况外没有参加任何一方。

恺撒在他即将着手开展内政工作以前，死于一群阴谋者的手中。如果他能有时间去重新整顿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无从判断。从一些征象看来，他心中曾有过一套明确的改革方案，但我们不可能将这个方案详细地重建起来。古代某些史学家和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肯定认为恺撒打算建立一种真正的君主政体，不仅以罗马公民团体为其基础，而且要以整个罗马帝国为其基础。他们都认为庞培与恺撒相反，认为他所体现的理想是获得罗马上层社会广泛同情的，那就是希望建立一种“元首制”或者说由群贤——即指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成员——之首来统治。

在谋杀恺撒者与恺撒手下的将领及其嗣子两方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呈现出一种争权夺势的斗争所常有的混乱。恺撒手下的旧兵宿将支持安东尼和屋大维，因为这些人指望他们、也只有指望他们来实践恺撒曾经许以土地和金钱的诺言。一些热诚者，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相信恺撒是专横残暴的，相信元老院和谋

杀恺撒者所代表的自由是幸福的，所以他们站在布鲁图斯和卡休斯一边作战。其他参加双方作战的人之所以来打仗，是因为他们是被动员来的，因为许给了他们土地和金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恢复和平与秩序而战斗。

屋大维和安东尼之战胜谋杀者们并没有使局面澄清。这时候，屋大维——他过继给恺撒以后有时称屋大维安努斯，后来称奥古斯都——渐渐设法在意大利的人们中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认为恺撒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纯粹的君主政体，而安东尼现在正在力求达到同一目的(这种说法本是谋杀者用来作为宣传的手段)。因为屋大维差不多一向留在意大利，而安东尼差不多一向都在海外，住在东方，所以屋大维这种宣传非常成功。屋大维散布谣言说安东尼之志在于把意大利变做埃及的一个行省，这当然是胡说，但是安东尼所犯的错误，即他对克娄巴特拉先奸后娶的关系，却使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更容易轻信这个谣言。

然而，罗马公民也真怕会有丧失他们特权的可能和被外省居民占去上风的趋势。因此，在屋大维和安东尼的斗争中，罗马公民，特别是整个意大利的势力强大的城市资产阶级连同那些上层阶级、即元老院议员和骑士中的大多数人，都愿意支持屋大维来反对安东尼，而这并不是仅仅为了得到土地和金钱。亚克兴之役，战胜者不是那些为自己物质利益而战的武装无产者，而是意大利的公民群众，他们是在争取自由和为了罗马国家的生存向东方的野蛮风气与奴役制度作斗争的这种思想的鼓动下进行战斗的：这种情形在内战中还是第一次出现。屋大维在进行内战的最后一仗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争夺个人权力的革命领袖，而俨然是一个捍卫

罗马文明的战士，一个捍卫罗马的过去和未来的战士。他为了这些目的而向一个东方式的国王政体的魔影作战。如果屋大维想要继续保持他因亚克兴之役而得到的权力，那么，对他说来最紧要的就是永远不要忘记他在这一仗中是怎样和为什么取得胜利的。

内战时期是罗马国民几乎人人都遭受大苦难的时期，不仅意大利如此，外省也一样。在意大利，许多人牺牲在战斗中，或在出征时受折磨而死。许多著名的领袖人物在政治恐怖风气重新抬头的时期中被杀掉了，许多人不论穷富都丧失了自己的财产，领袖们把这些财产拍卖来充实他们空虚的府库，或分给打了胜仗的兵士和革命军退役军人。经济情况一直没有稳定过。每一个人都有朝不保夕之虞。意大利的人心是完全动荡不安的，这里有一个需要，也只有一个需要，那就是和平。

例如，从贺拉西和维吉尔早年的诗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渴望和平的心理多么强烈。已经有许多人研究过贺拉西在菲利皮之役以后的黑暗时期中的心理变化，进行这种研究是很有用的。和罗马帝国成千上万的国民一样，尤其是和罗马公民一样，贺拉西在一段悲观绝望时期以后，终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奥古斯都的最后胜利上面，因为奥古斯都有过结束内战的诺言。奥古斯都对于帝国国民普遍存在的心理了解得很清楚。和平是一致的呼声。每个人都愿意承认奥古斯都和他的统治，只要他能恢复和平和安宁。因此，奥古斯都便担起了恢复和平的使命；可以说，他要继续保持他的权力，这就是一项必须履行的条件。我们在下一章中就会看到奥古斯都认识和了解到人民的感觉，并顺而行之。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恺撒生前和死后就可以看出国民的心情已

完全改观了，但是意大利的社会经济情况在内战期间显然没有很大的变化。意大利仍然是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的中心，它的繁荣富足仍几乎和以前完全一样。瓦罗在内战后半期时曾指出意大利在自然富源和垦殖方面是世界上最繁盛的地方。他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内战并没有暗中摧毁了往日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在拉丁姆、在埃特鲁里亚、在康帕尼亚，山头上和海边上到处都闪露出一些漂亮的庄院，有着大理石的圆柱走廊，围绕着绿荫浓密的园林，和以往一样地漂亮。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遍布着和以往同样形式的农庄，这些农庄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都是仿照希腊化的农庄组织起来的，有大群奴隶住在庄上，他们在监工（监工们本身也是奴隶）的监督下在葡萄园、橄榄林、园圃、田地和草地上做工。这些 *villa rusticae*〈山庄〉的主人都是罗马的大资本家和自治市里有钱的资产阶级。从十八世纪以来，在蓬佩伊、斯塔别和希尔姑兰城附近发掘出这类庄院的遗迹，其中有些大概属于公元前一世纪。阿普利亚、萨姆纽姆、拉丁姆的某些地区和西西里、撒丁与科西嘉等地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牧放牲畜的草地，在那草地上有着成群的武装牧奴牧放着成千上万的绵羊、山羊、公牛和母牛。相反地，埃特鲁里亚的一部分地区、翁布里亚、皮切努姆和波河河谷地带等地则仍然以小地主的零星农庄和村庄为主。在这种形式的农庄和村庄里，住着大地产所有者的佃农，他们为自己和为附近城市的市场生产谷物。在意大利这些地区内，像多米丘斯·埃诺巴尔布斯（与恺撒、庞培同时）这类人物所占有的土地之多，竟使他们可以允许他们手下数以千计的无土地的兵士能每人得到足以维持其生活的一小块土地。他和庞培都

可以从他们的佃户(*coloni*)和奴隶中组成一支大规模的正规军。庞培说过,他只要在地上顿一顿脚就可以得到几千兵士,这并非夸大之词。毫无疑问,他主要是指那些旧部曲而言,他们都是他的靠客和他的田庄上的人。

在意大利的城市里住着一个相当富裕、有时甚至可说是很阔绰的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是地主;有些人是出租房屋的房东和各种各样店铺的店东;有些人放债和经营银行业。最大、最富的城市是罗马。公元前二世纪与一世纪时,罗马城的发展异常迅速。最好的地皮都为罗马的达官贵人、元老院议员和骑士们的华丽的府邸所占据。在罗马那块大公共场地——广场——中的卡斯托尔神庙附近,每天都进行着交易活动。这里拥挤着成群的人们,他们在买进和卖出包税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各种各样现金交易或信用交易的货物、意大利和外省的农庄与地产、罗马及其他地方的房产与铺面、船只和货栈、奴隶和牲口等等。在广场及其附近的街道上的店铺里,有着成千上万的自由手工业者和店东,有着成千上万个属于有钱的资本家的奴隶、代理商、工人们在制造商品和将商品卖给顾客。在罗马城里较偏僻的地方,有着大批失业的或半失业的无产者,他们住在大杂院里,为了过日子,只要谁能有钱付给他们,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赞同票和拳头卖给谁。

恐怖政策像浪潮一般,内战像痉挛一般,一阵过了,又来一阵,接连不断。它们卷走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团体中的某些成员。但是,那些团体本身并未遭到破坏,丝毫未起改变,它们所丧失了的成员又为继起者与新加入者所代替。住在意大利某个城市里的一群地主们开始丧失了他们祖传的土地,于是,他们在乡间的房屋、

他们的田地、有时还连同他们在城里的住宅，就转手让给了革命军的退役军人——这些人是出生于意大利的——或转给了庄稼人、农民和别的地主们。失去产业的地主们当然是破落了。他们迁移到大城市里去或到外省去，也变成了失业的无产者，或投入革命军等等。但是就整个意大利而言，是感觉不出这种改变的。退役军人都是罗马公民。他们全都是、或者说几乎全都是出生于意大利山野之间的。世代相承的城市无产者是几乎不存在的，即使在罗马城也不存在。今日之无产者即昨日之地主，而明日又成了一个军人或一个做买卖的代理商，成了一个手工业者或一个厮仆。不论是在乡下或在城市里，像这样一小群移居者的新村很快地就被一个人口稠密之区兼并了。从蓬佩伊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的兼并是何等的容易，在该处，有一个苏拉手下退役军人的屯市，这个屯市和该城原来的居民逐渐合为了一体。

诚然，我们不能缩小内战期间周期性地重新分配地产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根据审慎的统计，在这段混乱时期最后五十年中，在意大利获得产业的人数不下五十万。在“社会”战争历次大变动以后，这些重新分配产业的现象可能是意大利走向罗马化和拉丁化的历史中最有力的因素：以蓬佩伊为证，那儿的奥斯坎语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几乎完全被拉丁语所代替了。另一方面，我们若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却不能夸大这种改变所有权的重要性。即使我们假定大多数退役军人都亲自耕种土地，都是像正式农民似的庄稼人——事实上当然其中只有一部分人是这样——那么，这类新农民的置产立业也不可能改变经济潮流，经济潮流的趋向是使田庄归那些从来不住在田庄上的人们所占有，这些人只把田庄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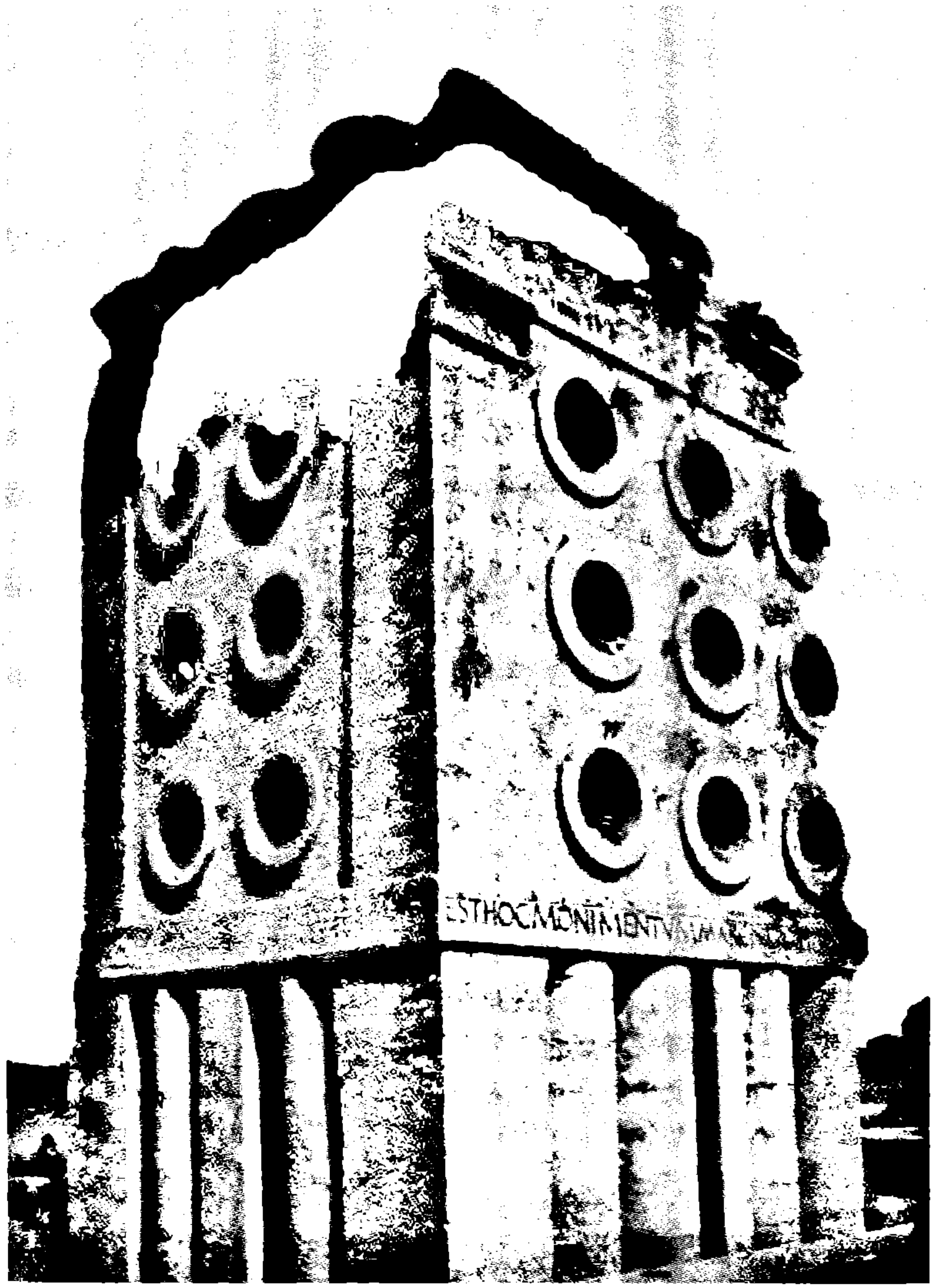


图 4　欧里萨策斯之墓

图 4 说 明

M. 韦尔季留斯·欧里萨策斯的墓碑。罗马,卡西利纳路,靠近马乔列港。卡尼纳—O. 雅恩所撰文,载《罗马考古情报研究所年报》(意大利文),1838 年,第 219 页起(碑)和第 214 页起(浮雕);参考《罗马考古情报研究所未发表过的文物》(意大利文)ii,第 58 页;H. 布吕姆讷尔:《工艺学与术语学》(德文),i,第 2 版(1912 年),第 40 页起,图 13—15(摄影)。属于共和国晚期或奥古斯都时代早期。

这座墓碑形式特殊,不容易说明。这位欧里萨策斯的想法是要藉墓碑的形式与碑文和浅浮雕,使观者能想象他的行业。墓碑四面重复地刻着同样的碑文:*Est hoc monimentum Marcei Vergilei Eurysacis, pristoris, redemptoris; apparet*(四面刻文略有出入)。请看《拉丁文碑铭集录》i. 1013—15; vi. 1958 年;戴索:《拉丁文碑铭选录》7460 a-c,参看此人妻子的墓碑,《拉丁文碑铭集录》i. 1016; vi. 1958 年;戴索:《拉丁文碑铭选录》7460d,还参看此人一位朋友的墓碑,《拉丁文碑铭集录》i. 1017; vi. 9812。碑文的意义如下:"这是马尔库斯·韦尔季留斯·欧里萨策斯的墓碑;他是一个面包师和承包商;同时又是一个 *apparitor*(长官供奉户)。"现在根据《罗马考古情报研究所未发表过的文物》(意大利文)所描的图将这座碑上的浅浮雕复制于下,这些浅浮雕描绘了制面包行业各个不同的作业过程:第一步是筛谷和洗谷,第二步是磨成面粉,第三步是揉面,第四步是擀面和烤成面包(1 和 2),而最后画出将面包递送到欧里萨策斯所供奉的长官那儿去的情形(3)。这是对共和国晚期或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一个大企业公司的有代表性的图画,在这个企业公司内工作的有几十或几百工人,其中既有奴隶,也有自由人。

3

1

2

欧里萨策斯墓碑上的浮雕

自己收入来源之一而已。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随着内战的进行，即使把土地许给退役军人，经济潮流也并不是愈来愈趋向于新农民设置产业，而是愈来愈趋向于城市居民增置新产业。给予退役军人的产业面积之不断增加正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因此，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在意大利，退役军人不是增加了农民的人数，而是增加了城市居民的人数；不是增加了劳动阶级的人数，而是增加了资产阶级的人数。土地之重新分配也不曾影响大地产的增加。在内战中被军事首领们没收的大地产也可能分配一些给小地主。但是，一般而论，这类地产要不是被国家临时统治者留作他们个人势力的基础——他们的个人势力是以依附他们的靠客的多少为基础的——就是被卖成现金以充实他们那不断匮竭的府库。

行省中的改变比意大利远为重要。虽然在各行省中，除了住在该处的罗马公民以外没有人积极参加过内战，但是真正受灾难的还是各行省。它们必须承担起这些战争的大量费用。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东方各省身上，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让

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的情况吧。

在罗马历史上，从意大利向西方各行省进行一次有系统的移民运动还是新鲜的事。所以 C. 格拉古和他的一些后继者想在西方、特别是在阿非利加贯彻这样的移民运动的企图终于徒劳无益，没有收到什么重大的效果。但是，在内战中，罗马移居者的浪潮，接二连三地涌入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最值得注意的移民区是由革命运动的领袖们所建立的新的罗马屯市，特别是马里攸斯在阿非利加建立的屯市* 和恺撒、安东尼、奥古斯都在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甚至在东方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小亚细亚等地所建立的屯市。然而，在内战期中，各行省里并不仅只出现这些被组织好的移居者。有许多重要的意大利人团体为了自身利益而移居到行省里来。他们以商人、放债者、包税公司代办等身份同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努米底亚等地诸城市的罗马移民和本地人交际往来。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许多城市的历史都反映出这类罗马公民团体在这些地方的城市生活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举阿非利加的土加镇和努米底亚的努米底亚王都契尔塔城为例。这两个移民区原先都不是军屯市（契尔塔直到公元前 44 年才被承认为一个罗马屯市），但是，在这两个城市的居民中，罗马公民都在社会经济生活里起着主导作用。毫无疑问，也有这类的移居者迁到西班牙南部与罗马最先建置的高卢行省中那些希腊城市和半希腊化的本地城市里去。同时，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供引证，我们也能设想到，意大利那些大田庄的主人们一定劝田庄上的穷 *coloni*

* 见下面第七章，第 454—455 页。

〈佃户〉乔迁到阿非利加的乐土上去，因此，从意大利迁出去的某些人，即这些佃户，一定很乐意接受他们主人的劝告而迁到阿非利加去，在那里从外省阔绰的地主手中租到更好、更大的份地。

较早的时候，罗马公民本来大多向东方流徙，而这样一来，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就转而向西方。东方的情况是那么恶劣，威胁着罗马移居者的危险（如从米特拉达悌的屠杀所见到的）是那么千真万确，而罗马政治局势的混乱又使他们的发展机会大为减少，因此，大群的移居者都宁愿到西方新地方去试试自己的运气了。如果说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多少开始了罗马化的话，那么这种结果是由于内战期间加紧向这些地方移民造成的。新的资本、新的动力、新的生活习惯，从意大利伸到了西方各行省，而在意大利人之后，随着又来了希腊人和东方人。我们不知道这些新迁去的人中间究竟有多少人是到行省里去当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其中大多数人肯定不是普通的农民、佃户和工匠；多半都是不住在乡间而住在城市里的地主、大商贾和一般做买卖的人。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概括的公式来表达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简短而全面的公式。从政治上看，罗马国家就法权而论是一个由罗马公民群众统治着的帝国，但事实上，罗马公民群众是以富贵显达的公民、即元老院成员们所组成的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外省被视为这个统治集团所共有的地产。在这个集团内部，城邦的结构仍然保留着，几乎毫无改变，只略有损益而已。从社会上看，这个集团还包括了一个较小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住在罗马城中，大多是意大利和外省的大地主。元老院议员阶级加上一个人数众多而势力雄厚的

商人和地主阶级，共同构成京都以及意大利诸城市的居民中的上层阶级。这些商人中，有些人家赀不可胜算，有些人则仅称小康。他们大多过着坐食年金者的生活。真正的劳动阶级则包括有城市中的零卖商贩和工匠，有官衙里和资产阶级店铺里的奴隶，有乡间的自耕农，还有一大群、并且人数仍在不断增多的奴隶和佃户，他们都在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的田庄上做工。在外省的罗马公民团体中，各个集团的分配与此相同。

从经济上看，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与希腊化时期以前和希腊化期间存在于东方的资本主义几乎完全属于同一类型。在罗马国内，在罗马及其邻邦之间，货畅其流。贸易中最重要的项目不是奢侈品的买卖，而是主要必需品的买卖——谷物、鱼肉、油、葡萄酒、亚麻、大麻、羊毛、木材、五金和手工业制造品。食品和原料出自希腊—罗马世界的边远地区；油、葡萄酒和手工业制造品出自希腊城市和意大利。金融与银行业几乎完全为意大利所垄断，首先是为罗马所垄断，因为绝大多数的钱货都集中在罗马资本家手中。政治状况不仅大大地促使这种行业为罗马所垄断、特别是为京都本地的银行家所垄断，而且还造成它具有高利贷的性质，这种高利贷性质严重地阻碍了一个正常成长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固发展。另外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工业成长相当迟缓，工业技术不向前发展，作坊没有进一步变成真正的工厂。作坊一直是主要的生产方法，而且，即使有同一种行业的若干店坊属于同一个人这种现象，也不曾使这些作坊转变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厂。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作坊中的工作是高度分工的，大多数作坊、特别是大工业中心城市的作坊都不是为专门订货而

是为一个不定市场制造货物的。在古代世界那些大工业中心城市之中，某些意大利城市开始占据显著地位，例如卡普阿和卡累斯之于五金业和陶器业，塔兰土姆之于毛织业和银器业，阿雷丘姆之于一种特殊的红色釉陶业。但是，意大利始终未成为工业发展的领袖。东方的希腊城市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

图 5　正门的奥古斯都雕像

（罗马，梵蒂冈）

第二章

奥古斯都的复原更新政策

关于奥古斯都的活动的性质和意义，现代学者们的看法彼此分歧很大。奥古斯都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替罗马国家创立的那种政体遵循着他所奠定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至少有二百年之久，这是毫无疑问的。古代世界的历史因他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即我们通常所谓罗马帝国时代的纪元，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现代所有的学者对于这几点都完全表示同意。但是，当我们想要进一步断定我们所谓的奥古斯都改制的性质的时候，分歧就立刻出现了，而且这些分歧看来是不可调和的。有些学者坚持认为奥古斯都的事业是复原事业，而且仅仅是一种复原事业，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古代的罗马国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给奥古斯都加上革命改制者的头衔，认为他能够假托某种古代的典制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体、一种由罗马军队的首领统治的真正的君主政体。还有一些人又采取介乎二者之间的态度。

我并不打算讨论这种种各持一端的议论，而只打算陈述若干事实和提出我自己对这些事实的阐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中有关社会经济的方面。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过，内战之结束是出自罗马帝国国民——特别是其中比较活跃和有影响的那

一部分国民，即意大利和外省的大多数公民——几乎全体一致的意志。在有公民身份的国民中，各个阶级全都坚持着同一个主要的主张：结束内战，恢复和平。如果奥古斯都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那么，他首先必须使恢复和平成为可能。每一个人都疲惫了、厌倦了，每一个人都满怀信心地指望亚克兴之役成为内战的最后一次战役。

但是，帝国中居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国民并不是愿意漫无选择地接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罗马的公民之所以作战，是为了恢复罗马人的国家，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使这样的制度处于伪装之下也不行。他们要求和平，但他们是为了罗马人的国家而要求和平。这就是说，只要奥古斯都在恢复和平时愿意、而且能够维护各个阶级的罗马公民曾经在国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他们是愿意支持他的。奥古斯都同安东尼作斗争的时候曾乞援于罗马公民的爱国情绪，他亲自提出了保证，要缄默地遵守他许给罗马公民的诺言，那就是：绝不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权，甚至还多少增加一点，或至少要把这些权利和特权更好地规定、巩固下来。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罗马公民们才愿意欣然承认奥古斯都是他们的领袖，承认他是罗马社稷、即罗马民族与元老院的合法首领。

仅就这点而言，奥古斯都的任务是很清楚的，而且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任务主要就是一项复原工作。人们并不需要或盼望什么远大的改革。在使罗马原来的城邦政制适应一个大一统国家的需要方面，奥古斯都的前人，即内战期间罗马国家的军事领袖——马里攸斯、苏拉、庞培、恺撒、安东尼，和奥古斯都本人都已经推行了大多数必要的改革。现在唯一的需要就是再开动罗马的国家机

器使它发挥作用而已。

但是，如果仅仅只求复原，那么，罗马国家的持久复兴就不可能求其有所保证。内战已经在国家机器中创造了两个新的因素，不能只求其复原而漠视或抛弃这两个新因素，因为它们是国家机器中的主要动力。这两个因素就是现有的常备军和这支常备军的主帅元戎奥古斯都，即 *Imperator Caesar divi filius Augustus*〈元戎—恺撒—神子—奥古斯都〉。军队就摆在那里。不能够遣散它，因为迫切地需要军队来保卫国内国外的和平。倘若没有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和军饷充裕的军队，那就不可能有安宁和秩序，不可能有和平和繁荣。同时，如果罗马公民仍想继续在帝国中居于主宰者的地位，那么，这支军队，或至少是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必须是一支罗马公民的军队。另一方面，从内战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一支纪律严明的常备军，也只有在单独一个人的统率下，在一个被军队奉为首领的人的统率下，才能发挥效用，这样的一个人不是由罗马人民和罗马元老院委任的，而是要得到将士爱戴和信任的（即使说不是由军队正式推举的）。在这里就产生了罗马帝国新局面的一个大矛盾。新国家一方面要恢复旧国家的原貌，要恢复共和国时期法治国家的原貌；但同时，它又必须保持革命时期的主要工具，保持一支革命军队和它的革命首领。奥古斯都的前人曾经提出过许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苏拉或者庞培提出的，那就是：军队应当交还给元老院，而军队的首领则应当以罗马国家一个普通长官的资格来行使职权。另一种解决办法似乎是恺撒所策划的，那就是：军队仍然由罗马人民的最高长官来统领，完全不让元老院同军队发生任何关系。奥古斯都大体上选择

了第二种办法。

把军队交还给元老院，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这样做，就会卷入一场新的内战，因为军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奥古斯都也只可能继续担任军队的首领、主帅，而不可能听任旁人来平分兵权。实际上，这就意味着，随着法治国家的恢复而新建立起一种军事专制制度；在正规的国家行政组织之外再维持一个革命机构。同时，这又意味着，就理论上说，如果一个主帅不再受到军队的爱戴和信任，或者不能履行他对军队的许诺，那么就公开地允许军队推出另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一点也并非不重要。

因此，奥古斯都的政治工作并不是恢复内战以前所存在的那种局面，而是巩固和调整由于内战而形成的新局面。从政治角度来考虑，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军队尽可能不起危害作用。凡是选军都不驻扎在意大利而驻扎在罗马国家的边塞上。驻在意大利的只有一小部分军队，即皇帝的禁卫军。选军和禁卫军完全由罗马公民组成，并且完全由属于罗马公民两个上层阶级——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的军官指挥。由外省补充的辅军被看成是非正规的军队，看成是“盟友”的军队，但由罗马军官指挥。驻扎在意大利的水军人员都是最下层的罗马公民、免奴、外省人。京城里的七营消防队员也由免奴充役。他们和京营配合在一起充当罗马城的警察。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军队才是国家的主人，而在重新恢复的罗马共和国中，皇帝通过军队，和只要军队愿意支持他、服从他，就可以统治一切。由服役十六年、二十年或二十五年（服役期限各因他们属于禁卫军、或选军团、或辅军部门而有不同）的职业兵组成的一支军队，由正式的罗马公民或准

罗马公民、由罗马人民中正处于统治地位或即将处于统治地位的分子组成的一支军队，自然不可能轻易地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而它既没有被排斥于外，它就必然在实际上（虽不是在法制上）成为有决定性的政治力量。

此外别无其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些帮助奥古斯都打了胜仗的罗马公民们如果仍要成为这个帝国中的统治阶级，那么他们就必须履行他们的第一项义务，那就是捍卫国家防御敌人和保护他们自己在帝国内部的权利。军队必须是常备军，必须是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任何一种国民军都无力保卫罗马国家的边塞。这个时代的军事技术已经复杂得很，非短期内所能学会。在罗马帝国中，不可能有短期服役的军队，因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必须经过多年的辛勤训练。如果要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由职业军人长期服役的军队，那么，它当然就不可能采取强迫征集的办法。只要有足够的人愿意应募，它就必然或多或少地在自愿投军的人中招募新兵。强迫征来的人绝不会成为准备效命守职的优秀的职业军人。这样一来，军队必须得到相当的酬赏，而且要尽可能地使当兵这个行业具有吸引力。于是，军队的开支便成为国家财政中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了。

但事实上，在奥古斯都长期统治的全部时间内，军队始终是安定的，甚至到他统治的末期，当多瑙河和来因河上的严重纠纷——潘诺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的“叛乱”和日耳曼诸部落的“联合战线”——使得服兵役成为非常危险的事而使得增补选军、京营和*alae*〈翼军〉的任务十分困难的时候，军队也还是很安定的。而且，就是遇到这几次不得不采取强迫征发的手段的时候，军队几乎毫

无骚动，毫无参与政治生活的打算。我们从奥古斯都时期军队组织的性质中可以找到说明这种现象的道理。

奥古斯都的军队不再是一支无产者的军队。服兵役，特别是在奥古斯都统治初期服兵役，是比较有利可图的事，也没有太大的危险。有功可立的职务就是意味着有飞黄腾达的机会，而在正规服役期满以后，这种飞黄腾达的机会并未完结。优秀的中下级军官或继续留在军队，享受优俸；或厕身于文官之列，作为皇帝的私人代表。普通士兵在服役期满后准能得到一小块土地或一笔丰裕的赏钱，足够使他成家立业，或养活他事实上（如果未经合法手续）在服兵役期间即已开始成立的一个家庭。因此，有许多人，甚至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都愿意加入行伍。而且，这时的军队并非完全由出生于意大利的人组成。内战以后，意大利本部已经无力再向军队补充新兵了。所以，罗马化了的各行省，甚至连东方某些地区，都来支援，这些地区提供了优秀、忠实的军人，他们之中大概没有什么无产者。他们并非全是罗马公民，但是，奥古斯都在需要的情况下愿意把公民资格许给每一个新兵，只要他答应做一个好军人，只要他的罗马化程度已经足够说拉丁话和写拉丁文，或者他所受的教育已经能使他很快地、很好地学会拉丁语文就行了。这些外省的士兵也许比意大利人更忠诚、更可靠些，因为对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说来，在军队中服役意味着社会地位提高了很多。由外省人组成的辅军是同样地可靠，这一部分外省人只稍微受了一点罗马化，或甚至简直没有沾染过什么希腊文明或罗马文明。但是，对他们说来，入了军籍就表示在服役期满后得到罗马公民资格，而这是一种很高的特权。因此，如果说他们大概根本不存在什么政

治问题和政治欲望，那倒并不足为奇。

然而，最重要之点在于，军队是从帝国各处的居民中普遍抽出来的，它代表了国民中所有的阶级——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意大利和各行省的罗马公民，东方各行省中罗马化和希腊化的居民(不论他们住在城市里或乡村里)，以及还没有分享古代都会文明的无数部落和种族。这样一来，军队就反映了国民的心理状态。并且，罗马公民从远古以来就已经养成了服从国家的习惯。国家现在体现在奥古斯都个人身上，他是国家合法的领袖，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承认他这种地位。因此，服从于他乃是每一个忠诚的罗马公民的义务，也更是每一个盟邦人民和外省居民的义务。毫无疑问，奥古斯都在整个帝国的人民群众中受到异常的拥戴，如果我们能用这个现代名词来形容罗马人对这位新统治者所怀的半宗教性的敬畏的话。在他们看来，他真正是一个超人，一位神人，救世主，拨乱反正的人物，和平和繁荣的使者。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看法来说明内战结束的原因。我们可以说，内战之所以停止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国民已经疲惫了、厌倦了，不愿意再打下去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于内战之不可能再起，奥古斯都的个人作用占有一种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即使我们相信(我并不作如此想)奥古斯都的贡献只不过是采集在他前人时即已成熟的果实，我们也绝不能忘记，帝国的国民群众是把和平和繁荣的恢复归之于奥古斯都个人的。

现代某些学者用“宣传部”来形容奥古斯都时代诗人的活动，据我看来，这个名词毫无疑问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维吉尔和贺拉西是配合梅策纳斯和奥古斯都而行动的，承认他们

竭力传播这两个人的思想，鼓吹这两个人的计划——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太狭隘了——那么，我们必须说，他们的宣传完全成功。他们在整个罗马世界中享有煊赫的声望，便是他们善为说辞的明证。如果宣传没有抓住群众的普遍心理，如果它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宣传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维吉尔和贺拉西的主导思想就是罗马帝国成千上万的人民的思想，这些人民和贺拉西（对于他个人说来，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诗思）共同相信奥古斯都是一位在凡间显灵（ἐπιφανής）的尊神，是梅尔库里攸斯神、或是阿波洛神、或是埃尔库勒斯神，相信他是伟大的、神圣的罗马帝国的救世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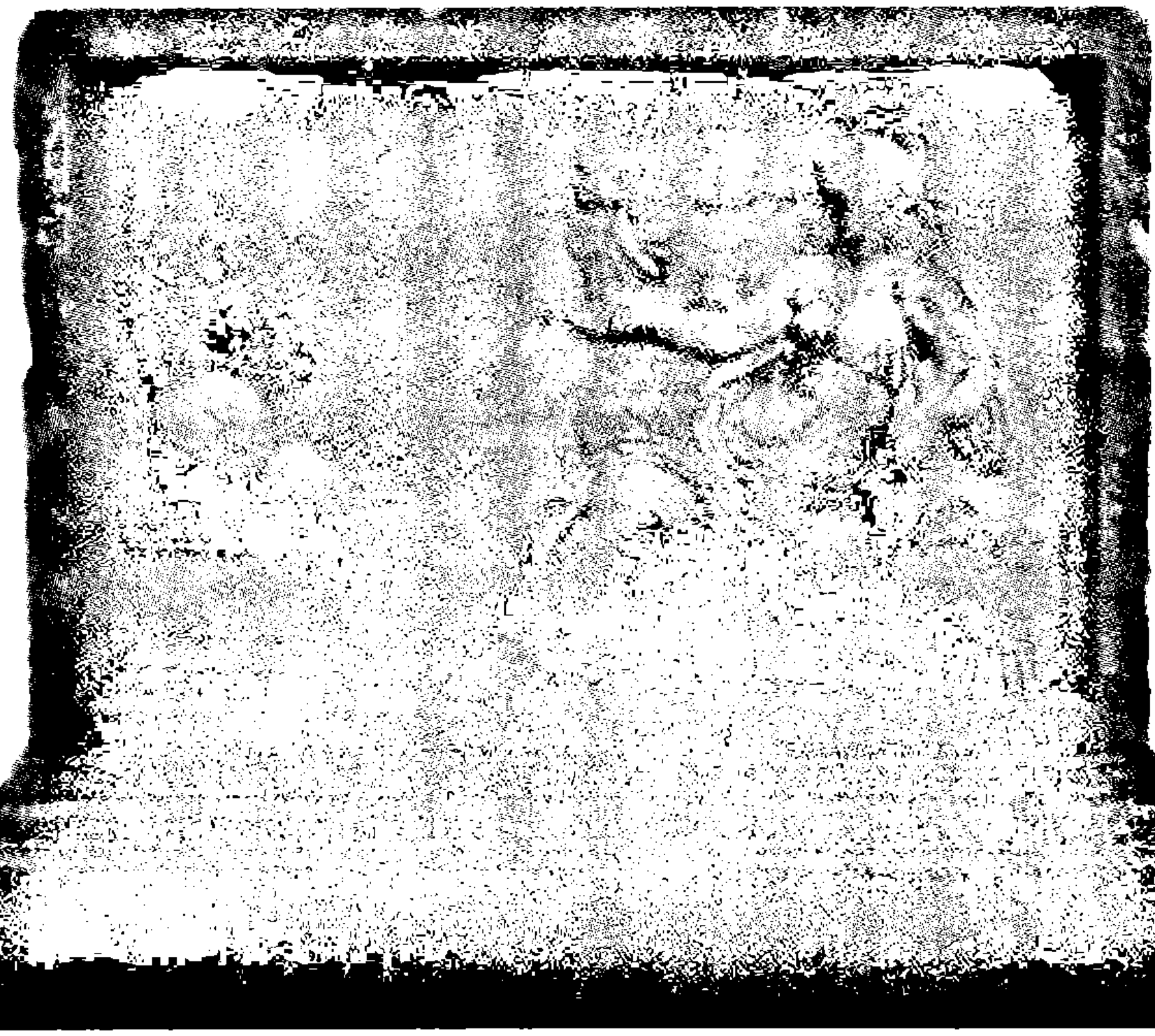
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宣传部”，那就是元老院、罗马人民和罗马城若干公民私人为敬仰奥古斯都而建造的那些美丽的艺术纪念物。这些纪念物在国民心中的印象深刻，并不是因为它们美丽，而是因为它们用形象代替语言说出了诗人们所表达的那同一种声音，人人都感到这种声音是出乎至诚的。我们可以举出那座祭 *Gens Augusta*〈奥古斯都氏〉的神坛作为许多纪念物中的一个例子，它是在迦太基地方一个罗马公民修建的一座私人祠庙里发现的。这座神坛大概是模仿罗马城中一座相似的纪念物的复制品。神坛上有一幅雕像刻的是伟大的罗马女神，她被安置在一堆兵器上。她的左臂靠在一个盾牌上；她的右手伸直着，捧住一根柱子，柱子上面挂着一面圆形的 *clipeus*〈盾〉，这面盾是元老院和人民献给奥古斯都、装饰在帕拉丘姆山上奥古斯都的住宅中的。从天上降下来的胜利之神正好把这面盾带来交给罗马女神的手中。在女神的前面，可以看到一个祭坛，上面放着一支很大的 *cornucopi-*

ae〈富饶角〉，角上挂着一根 *caduceus*〈和平标〉，在这两件东西的前面有一个球——那就是 *orbis terrarum*〈地球〉。

难道这还不是一件美丽而且十分真实的标识，用来象征奥古斯都的罗马、象征奥古斯都所巩固的大一统帝国的吗？罗马女神的庄严法相意态安闲。战争结束了，罗马胜利了，再不需要什么兵器了。它们现在可以用来作为罗马权力的主要基础了。和平恢复了。罗马骄傲地注视着她的大一统帝国的标识：基础是虔诚，奠定基础的是宗教，那座神坛说明了这一点；它体现了由富饶角、和平标和那个球所代表的世界繁荣。

在罗马的 *Ara Pacis*（就是建立在马尔斯广场上的和平神祭坛）上，那些表现出最高尚的罗马精神的古典雕刻，特别是那些田园景色以及被自然环境所环绕并象征着奥古斯都所恢复和保障着的大自然创造力的地母神的形象，也都表示出和上面所说的相同的观念。

前面谈到罗马帝国国民普遍的心情，并不是说，那就等于每一个人的看法都是如此。当然会有例外的，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元老院议员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谁也不能想象那些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会把奥古斯都看成神人，看成同样神圣的尤留斯的嗣子。他们把他看做他们自己这个阶级中的一员、比他们自己更为顺利的一员。他们之中有些人憎恨奥古斯都，因为他实际上结束了元老院独断的统治；有些人憎恨他是由于私人关系，有些人憎恨他则是受嫉妒心的驱使，他们认为自己和奥古斯都同样地有权成为国家的领袖，成为 *principes*〈元首〉。因此，经常发生危害奥古斯都生命的阴谋诡计。不过，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态度是无关紧要的。何况，



1. 迦太基的祭坛

2. 和平神祭坛上的一块石板

图 6　奥古斯都的主导思想

图 6 说 明

1. 迦太基所发现的一座大理石祭坛的一面。迦太基，圣路易山附近的索马涅教堂内。A. 梅尔兰所撰文，载《史学著作委员会考古学公报》(法文)，1919 年，第 clxxxvi 页起和第 ccxxxiv 页起，注 1；M. 罗斯托夫采夫：《奥古斯都》，载《威斯康星大学语言学与文学学报》(英文)，15，图 1；同作者所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38/39，1923—1924 年，第 281 页起；G. 加斯提芮耳所撰文，载《考古学评论》(法文)，1926 年(1)，第 40 页起；S. 格塞耳所撰文，载《史学评论》(法文)，156，1926 年，第 12 页起；L. 普安索，《突尼斯政府·备忘录与档案》(法文)，10，1929 年，《奥古斯都氏祭坛》；J. 西夫金撰文，载《日规》(法文)，7，1931 年，第 16 页起(评上面所引普安索的论著)。

这个祭坛所属的神庙上有着如下的铭文：*Genti Augustae P. Perelius Hedulus sac(erdos) perp(etuus) templum solo privato primus sua pecunia fecit.* “终身祭司 P. 佩雷留斯·埃杜卢斯用自己的钱在自己的土地上修盖这座神庙奉祀奥古斯都氏，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关于这幅浅浮雕的说明，见第 70 页。

2. 一块雕像的大理石板，现在被安置在复原的和平神祭坛的建筑中〔请看 G. 莫雷提：《和平神祭坛》(意大利文)(1948 年)，第 232 页起〕。1568 年发现于罗马。一般认作罗马马尔斯广场上奥古斯都的和平神祭坛的神殿中装饰一个殿门的一块浅浮雕。关于这幅浅浮雕的详尽的参考资料目录和对它所作的精确的说明，见斯特朗夫人的《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期间的罗马雕刻》(意大利文)(1923 年)，第 38 页和图 VI〔请看 G. 莫雷提，《和平神祭坛》(意大利文)，引得 xvii〕。

这幅浅浮雕很美丽地描绘出奥古斯都最仁慈的思想。图的正中是 *Terra Mater*〈地母神〉，她坐在一块环绕着花和谷穗的岩石上，衣裾上有果子，膝上有两个婴孩。她就是贺拉西的 *Carmen Saeculare*〈百龄节歌〉中的 *Tellus*〈地母〉(第 29 行起)：

Fertilis frugum pecorisque Tellus

Spicea donet Cererem corona;

Nutriant fetus et aquae salubres

Et Iovis aurae.

〈五谷丰而牲畜蕃兮

愿地母饰稷神以谷冠;

祈天帝其风调而雨顺兮

赐吾人以丰年。〉

地母神脚旁的两个动物代表农业(牡牛)和畜牧业(绵羊)。左右两边坐着两个人物,一个坐在一只天鹅上,另一个坐在一条海龙身上,这两个人物是河流和海洋的化身,或者是空界和水界的化身,也许是贺拉西所提到的 *Aurae* 〈风〉。我认为她们是河流、海洋与风结合在一起的象征:和煦的风缓缓地吹过海洋和河流。参看奥古斯都雕像的铠甲(图 5)和阿魁累亚地方出土之 *patera* 〈盘〉(图 13—1)上与此相似的人物图像。

元老院和元老院议员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欢迎重新恢复和平的,他们尽量表现卑躬屈节、奴颜婢膝的姿态,而不再汲汲于夸耀共和政体的精神了。

在行省中也时时发生骚乱,这些骚乱使我们看出奥古斯都是怎样地始终不能感到彻底的安定,看出他和行省的长官们是怎样地考虑及时对骚乱采取适当的措施。有一次这样的骚乱——当然是无足轻重的——就发生在公元前 7—前 6 年,或稍早一点。

然而,奥古斯都和行省长官们的忧虑无疑地是过分了一些。尽管罗马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潜在的矛盾,但是,军队的态度是镇定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人民普遍的情绪,它使奥古斯都得以贯彻复原的工作,不致因爆发新的内讧而受到干扰。他履行对罗马公民的诺言,不仅仅意味着维持他们的政治特权,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避免损害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自然也就是要使他们比帝国其

他阶级的国民有着更多的优先机会。在这里，又一次看出，所要求于奥古斯都的并不是一项复古的工作，而是要巩固他所见到的在罗马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的现象，以及大部分由内战所造成的现象。

在进行内战期间，罗马公民各阶级之间的差异并未消失。元老院议员阶级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唯我独尊。骑士们意识到他们在国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而把地位和财产比不上他们的人简直不放在眼下。意大利各城市中也存在着相似的这类阶级。元老院的权贵，自治市议会的议员，其中有些是罗马骑士，形成了上层社会。与他们在一起而地位低于他们的是一群家道富裕的资产阶级，其中还有一部分男人和女人并非自由民出身。无论在罗马城，或在意大利的 *municipia*〈自治市〉，这些上层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差异都是非常显著的。在元老院议员之中，只有那些贵族阶级的成员和那些能在自己的祖先里举得出一个执政官的人才被算入 *nobilitas*〈世族〉之列。在这些 *nobiles*〈世族子弟〉眼中，所有其他的人，至多只能算是暴发户。顺利地突破了元老院权贵们的壁垒的罗马骑士，被视为闯进来的生客。京城里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们嘲笑自治市的 *gransignori*〈豪绅们〉土头土脑。而这些豪绅们又看不起有钱的免奴和其他的人。和他们这一切的人完全分开而站在另一方面的是自由民中的各个下层阶级，有大群的自由农民、自由工匠、半自由的庄稼人和手工工人。而在这些下层阶级之中，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人又瞧不起农民，瞧不起这些 *pagani*〈村夫〉或 *rustici*〈乡下佬〉。在这个背后，有着大批的奴隶——仆役、工匠、种地者、开矿者、划船者等等。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并不是外省的情况，

而只是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中的社会分划。

奥古斯都从来没有想改变这些情况;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所进行的工作就是使这些差异更加尖锐,使各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更深,并且派定每一个阶级在国家生活中尽其一定的职分。罗马公民如果要当主宰者、统治者,那么,他们之中的每一个团体必须在统治大一统帝国的艰巨事业中担负起自己一份特殊的任务。奥古斯都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大家所熟知的,我想用不着再加以详叙。元老院议员阶级充任帝国最高议会——元老院——的议员,充任罗马城的一些长官,充任行省总督(或由元老院任命,或以钦差资格驻在皇帝直辖的行省中),充任将军以及公民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骑士阶级充任罗马法庭的陪审官,充任一部分行省总督、舰队和驻在罗马的陆军的司令官,辅军的将领和选军中一定数额的将领,最后还要充任不断增多的大批文官为皇帝私人效劳。意大利的诸城市必须为禁卫军和选军提供精锐士卒,并为禁卫军、选军以及辅军提供士官,唯城市的上层贵族阶级不在其内,因为他们大多属于骑士阶级。免奴充任海军中的水手和京都的消防队员。最后,一个高等奴隶和免奴的阶级——即那些属于皇帝的奴隶和免奴——供奉内廷各衙司,其分司遍布于全帝国。

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这种不平的待遇并不是新现象。这从共和国后期以来已经相沿成习了。区划的主要标准是纯粹从物质条件着眼的。出身对于划分界线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但主要之点在于物质财富,视财产之多寡而定 *census*〈户籍〉之高下。当然,谁也不要求专门定出一种教育标准。用教育来作为区别一般上层阶级的一种标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对于京都和意大利诸城

市的贵族子弟和自由民出身的青年所要求的唯一的教育训练，是某种程度的军事体育训练。因为从一个阶级提升到另一个阶级里去，实际上要取决于皇帝，所以，效忠于皇帝也就被视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意大利的情形就是这样。这就是对内战期间即已普遍存在的形势加以巩固和神圣化。奥古斯都在各行省方面也推行着同样的政策。没有进行任何重大措施使行省分担管理国家的职权。各行省和过去一样仍然是罗马人民的地产。外省人也和过去一样难以获得公民资格。就这一方面而言，奥古斯都的政策比起庞培、恺撒和安东尼的政策算是一种反动。至于把外省城市提升到自治市那么高的地位，也就是说使它们的权利可以与意大利城市以及那些已经和意大利城市有同等权利的外省城市相比，在这方面，他也简直没有进行过什么工作。罗马帝国最早的一个行省西西里所受的待遇算是唯一值得提到的例外，这个行省大概像波河地区一样成了意大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内战结束后奥古斯都当政时期内，向这个方向的进展是相当迟缓的。他所做的，大多在内战混乱时期和内战刚结束之后就做过了。

然而最先体验到新制度好处的却是外省，尤其是东方各行省。奥古斯都对行省的行政制度没有作丝毫改变，但他能大大地改进政府的实际工作。行省仍然由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成员统治。他们或者以皇帝的名义、或者在他的坚强控制下行使职权。但是，就是像这样形式的元老院议员阶级的统治也终于告一结束，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措施变得公正得多和合乎人情得多。随着和平局面的建立，征发和摊派都停止了。罗马高利贷者的垄断行为也随之告

终。直接税逐渐成为定规，因此，罗马收税人一伙也就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这一伙人日益匿迹，而逐渐由政府的经管人员所替代，这些人员是直接和纳税人打交道的（例如奥古斯都新添的专门由罗马公民缴纳的税项就是如此）。赋税并没有减少。对于某些部分的国民来说，甚至还加多了税。但是，税收制度的改善对各行省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而且，外省人现在很清楚地意识到，假使他们通过各城市那些每年聚会去参加皇家祀典的代表而向皇帝和元老院有所申诉的话，他们所得到的同情的倾听和获得的满足，都会比过去所得的多。行省议政会在和总督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可以直接谒见皇帝本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外省人十分清楚地知道，皇帝通过他的私人代表、皇家财务使，对各行省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很了解，这些皇家财务使在院辖行省中经管皇帝的私人财务而在皇帝直辖行省中负责征税。

东方各行省（埃及除外）的城市在处理内部事务上仍然和以前一样地独立自主，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更独立自主一些。这些行省大多是希腊城市和希腊化城市的结合体，对于这些行省原先流行的社会状况，奥古斯都毫不打算改变。城市行政组织以及它们的长官和它们的议会（βουλή），乃是下达于居民群众的一种非常好的居间者，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制度就是一种企图改变自然演变途径的愚蠢想法。

在奥古斯都时代，东方的希腊城市从来没有幻想争取恢复古代城邦的自由。它们默认自己的政治自由一去不复返的事实。它们愿意保持它们的地方自治。罗马政府为本身着想，希望这些城市充满着安宁、有秩序的气氛。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要保证这些城市内部局面的稳定，最好的办法是让最有钱的市民来进行统治。保护这样一个社会阶级是罗马人自从插足于东方以来一直遵循的传统政策，也是奥古斯都的政策。

如果说奥古斯都对待东方行省的政策中有什么新的特点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看得出来的新特点就是对希腊化时代某些统治者所首倡的一种运动予以新的动力，那种运动的目的是要把不归城市管辖的地区迅速地改变成正式的城邦。奥古斯都对整个东方的政策一成不变地追随着庞培、恺撒和安东尼而反对元老院的政策，他在许多村庄、聚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邦。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只有埃及的情形例外，因为埃及自远古以来的组织形式和希腊城邦的制度大相径庭，相去甚远。

我对于奥古斯都在东方的事业的评述的一个铁证得之于昔兰尼地方所发现的五篇奥古斯都诏令中的两篇（即第一篇和第四篇；并参照第三篇）。这两篇诏令涉及城市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涉及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居住在昔兰尼的罗马公民和昔兰尼城或彭塔波利斯地区诸城市中的全体希腊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希腊人不一定都是公民。那些寓居在昔兰尼而混杂希腊血统的罗马公民——他们大多不是很富裕的——的特权仍然保持如故，不过也有些稍微的改变，使希腊人确实感到地位改善了不少，特别是在司法组织方面和在派差与市税方面。把特权许给希腊种出身的新罗马公民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这些人大概已经从庞培、恺撒、安东尼和奥古斯都本人那里集体接受了公民身份。奥古斯都决定把他们视为罗马公民中只享有有限权利的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在缴纳赋税和应派差役时仍然是希腊人团体中的成员，只有那

些曾经个别受到特赐 *immunitas*〈复除〉的人不在此例；就是所谓复除权也只是对于已有的财产生效，而对于此后获得的财产却无效。

奥古斯都对西方——对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所采取的政策和对东方的政策原则相同。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他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部落制度中传入都市生活，而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中恢复都市生活。这里不是我们充分谈论这个题目的地方。使西方各行省的社会经济生活趋向都会化的政策，对于这些地方的前途是多么重要，这一点每个读者都会很清楚。在这些新城市里，领导阶级当然是有钱的公民，他们是罗马制度的坚强支持者。

主要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许多地方的外貌差不多彻底起了变化。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这种变化不大显著，因为在这里（如前所述）从亚历山大大帝或更早一些时候以来就已经开始把部落、村庄和寺院土地变成都市地区了。但在西方各行省中，这个变化非常显明。山顶上的克勒特人的村镇、坞壁和市集都绝迹了。统治着克勒特部落的贵族们移居于法兰西和西班牙一些大河流近旁的平原上。他们在这里修盖房屋和建立通常的公共建筑物。这些新的生活中心吸引了商人、工匠和水手们。一个真正的城市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在阿非利加，迦太基这个大都市又重新建立并再度繁荣起来了。沿海一带古老的腓尼基村社开始过着一种新的生活。阿非利加和努米底亚的肥沃平原上那些布匿人和柏柏尔人杂居的村社——在某些村社中寄居着一个罗马侨民团体——从内战时所遭受的破坏中复元了，继续恢复了它们的经济活动。在罗

马军队的保护下，东、南、西三面都形成了新建立的集中住宅区，这些住宅区不久就具备了正规城市的形式。和在来因河上、多瑙河上与西班牙等其他地方一样，在阿非利加，由店铺和住宅组成的范围很大的新村叫做 *canabae*〈营市〉，它们环绕着选军和辅军的军营以及在通往军营的大路旁发展起来，形成了后来的城市的核心。退役的军人加入这些新村的住户之中，或者作为一个团体接受一块土地以供他们定居和建设城市之用。

由于罗马帝国统治者有意识的努力，这个帝国于是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组成的集体。奥古斯都不仅仅堪为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的罗马公民的领袖，而且堪为帝国中所有的都市居民、也就是说那些有教养的君子们的领袖，堪为一个确实能得到这些人支持的领袖。罗马皇帝的禁卫军和罗马皇帝的选军的组成就明显地表示了这一事实。它们都是罗马公民和帝国的都市居民二者的代表，当然罗马公民在其中更占重要地位。至于不住在都市的居民，那些附属于城市的部落和乡村，在帝国生活中只能起次要的作用。他们必须工作和服从，就古代对于自由这个名词的意义来说，他们是受约束的。

我们现在转而阐述奥古斯都的经济政策。他主要的努力就是履行他恢复和平和繁荣的诺言。在这个任务上，他的成就是很可观的。但是我们绝不要忘记，在奥古斯都的背后，有着罗马的历史传统，有着武功辉赫的光荣记录，有着大多数罗马公民对和平的渴望。罗马公民们需要和平，但他们需要体面的和平。对罗马人说来，这就是说要在征服和吞并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我们也必须记住，奥古斯都本人是一个罗马贵族，他的想法和罗马所有的领

袖人物的想法一样，辉煌的武功和威望、胜利和凯旋乃是人生最值得追求的成就。何况，罗马帝国的结构还远远没有完成。奥古斯都是恺撒的嗣子，而人人都知道恺撒有两个主要的愿望：在北方和东北方要巩固罗马的力量；在东方和东南方要重振罗马的声威，因为在这方面由于克拉苏的败绩和安东尼的功业未遂而使罗马的声威大为减损。

关于奥古斯都的对外政策，说几句就够了。奥古斯都的统治并不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罗马帝国的和平不是靠消极的防守政策来巩固，而是靠顽强的、积极的军事活动来巩固的。主要的问题是要为帝国找寻并且建立一条既能保证坚固又能保证安全的边防线，这样才有可能造成长久的和平。由于奥古斯都本人、他的僚友阿格里帕以及他妻子前夫之子提贝里攸斯和德鲁苏斯的努力，使阿尔卑斯山区、高卢和西班牙彻底平定下来。至于征服不列颠的事，暂时搁下了。巩固帝国北边和东北边、即来因河和多瑙河上的边防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致力解决这个问题比征服不列颠更迫切得多。这个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那就是在和潘诺尼亚人与达尔马提亚人进行长期血战以后平定了多瑙河以南的地方。这个任务的第二步，即把罗马边防线推进到易北河的任务并没有顺利地完成。瓦鲁斯在日耳曼尼亚的失败是一次惨重的挫折，不过还不算致命的挫折，它迫使奥古斯都放弃了把日耳曼尼亚兼并为罗马化的行省的念头。我们必须记住，这场惨败发生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后期，那时候他已经老了。决定罗马和日耳曼尼亚之间的关系的步骤不是由奥古斯都承担，而是由他妻子的前夫之子兼他的继承者提贝里攸斯承担起来的。

对于东方，并没有在军事上作出任何重大的努力来洗雪克拉苏败于安息人的耻辱。为了满足舆论的要求，对安息人施加压力，使他们面临一场大战的威胁，因而安息人同意把他们所掳获的罗马军旗交还给罗马。奥古斯都的外孙加攸斯·恺撒之远征亚美尼亚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扩大和加强罗马在东方势力的主要动力是外交和贸易。但是，外交和贸易得到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在埃及、在阿拉伯和在北阿非利加也奉行着同样的政策。埃留斯·加卢斯远征阿拉伯人虽没有大获全胜，但无论如何在从埃及去印度诸港的商道上替罗马商人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港口。

由于这样一些措施，罗马帝国的持久和平得到了保证。在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上为“和平女神奥古斯塔”(*Pax Augusta*)而修建的壮丽的祭坛，就是和平已经压倒战争这一事实的象征，现在也就是奥古斯都统治的显著特征了。雅努斯神庙的大门一再关闭[①]，以及为了庆祝随着奥古斯都降临于文明世界的“新黄金时代”而举行的竞技会，都象征着同样的观念。罗马女神现在可以安置在虔诚之神的底座上，安静地躺在那保护和平和繁荣的手臂中了。

在海上和陆上建立和平的局面，对于帝国的经济生活极端重要，这一事实毋须乎加以强调说明。在几百年不断的战争之后，文明世界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和平。古代世界一些首脑人物的梦想，经过了一世纪又一世纪，终于实现了。在辽阔的帝国中，经济生活普遍地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复兴景象，这是很自然的事。

① 偃武修文的表示。——译者

希腊化时代的鼎盛时期又重新出现了，所不同者只是那许多为政治目的而消耗经济资源的独立国家彼此敌对的割据局面已不复存在，而整个文明世界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大国，它囊括了希腊化时期一切的王国在内。互相竞逐的国家已被消灭了，现在的竞争只是商人们之间纯经济的抗衡，这种竞争的进行并没有受到政治动机的阻挠。

无论罗马国家或皇帝都不去干涉这种竞争活动。国家和皇帝都让经济生活顺其自然地发展。帝国内部贸易的唯一障碍是每个行省边境上所设的关税，这些关税并不很高。我们不知道国家课之于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赋税负担有多重。但是，以罗马公民在继承遗产和释免奴隶时所缴纳的税额（二者都是百分之五）为例来看——前一种税是奥古斯都新设的，后一种是经过他调整的——不能说是很苛重。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除了国家赋税以外，各自治市还有着种种的税收，我们对于市税知道得很少。然而，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外省，城市的繁荣都在蒸蒸日上，这就说明了这种市税并没有沉重到足以真正妨碍私人企业和经济活动的发展。除了赋税而外，我们就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他经济性的措施。奥古斯都以及紧接着他的几代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国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即在一定程度上由国王所代表的国家垄断工商业的政策。埃及可以说是一块典型的实行 *étatisation*〈国有制〉的土地，在这里，国家对经济生活各个部门的干预有着复杂的制度，然而，即使在埃

及——奥古斯都在打败了克娄巴特拉和安东尼以后就把埃及保留作为在他个人统治下的一个行省——也推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减少国家控制的压力。例如，他保护埃及私有地产的发展，国家对这种发展予以保证，其方式和其他行省相同。在埃及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属于私人所有者、特别是属于罗马退役军人的兴旺的田庄。

在帝国的经济生活中，共和国时期的大资本家似乎仍然占着优势；他们之中有些人属于元老院议员阶级，有些人属于骑士阶级，而大多数人都是过去的奴隶，即免奴。最大的一个资本家就是皇帝。奥古斯都与那些把国家产业视为私人产业而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希腊化君主不同，他像当时其他的富豪一样，使用他的奴隶和免奴来经营他那规模庞大的私产。但是，不管他本人的愿望如何，他不可能把他的私产同他以罗马共和国最高长官的身份、以许多行省的统治者的身份、以直接继承托勒密氏而为埃及统治者的身份而享有的钱财划分得一清二楚。皇家的、或者说内廷的财政（*arca*〈内府〉）势必很快地就和他居官所掌握的资产（*fiscus*〈国库〉）混淆在一起，而且很容易使他用同样的方法和同一些人来兼营这两种产业，这样也是很方便的。于是，内廷的奴隶，皇帝的家宰，特别是他的“主计吏”（*a rationibus*）就把内廷的财政和埃及的财政、其他行省的财政统统总揽在他们的手中了。

罗马军队的主要部队都驻扎在皇帝直辖的行省中，元老院要想摆脱掌管这些行省财政的艰巨任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财政权转交给皇帝，让他自己做主去征收赋税和任意处置这笔收入。我们可以设想，像境内有来因河边塞的高卢、有多瑙河边塞的多瑙河流

域诸行省、有幼发拉底边塞的叙利亚等处的耗费开支会要比它们所缴付的收入多得多，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些地方的财政，包括军费在内，势必经常亏空，而这项亏空得由皇帝的私囊来偿付。

因此，由于环境所迫，由于奥古斯都在内战期间积累了大笔私人财富的影响，在罗马帝国中造成了与希腊化君主国极为相似的一种情况。这位皇帝在公共事业上花费得愈多——用以赡恤罗马无产者，用以改建罗马城使它成为世界的京都，用以修浚台伯河河道，用以修筑遍于全帝国的军用驿道等等——就愈难以把他的私人财源和国家收入划分清楚。这并不是说国家吞蚀了皇帝的财产，倒可以说是皇帝有权用处理他自己私人资财的办法来处理国家的资财了。提贝里攸斯及其继承者们承袭了这套成规，他们逐渐习惯于把国家的收入看成他们自己的个人收入，而随心所欲地来动用它。

皇帝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享有一大笔私有财产的人。我们不知道，自从内战之乱以后，究竟还有多少旧贵族之家保持着他们的财富。奥古斯都经常救济那些穷困了的贵族之家，从这个事实看来，许多贵族家庭已经十分破落而完全依赖皇帝的施舍度日了。但我们知道，罗马城的贵族中最富有的人都是那些和奥古斯都关系密切的人——他自己家庭中的人和他的私人朋友阿格里帕、梅策纳斯等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测，有许多出力辅佐奥古斯都的贫寒之人，因为和他的关系密切而享有了大笔财产，并且他们的财产有增无已。

然而，这些人虽然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们却并不代表奥古斯都时代经济生活中的头面人物的主要典型。皇帝的宠臣为数并不太 多，而且大概大多数都依靠俸禄为生，或者，如果他们增殖了自

1. 博斯科雷阿勒村
出土之杯

2. 柏林博物馆收藏之杯

图 7　奥古斯都时代的人生观

图 7 说 明

1. 博斯科雷阿勒村出土珍品中的一个酒盅。发现于博斯科雷阿勒村(蓬佩伊)附近的一个庄院废墟中。路夫勒博物馆(巴黎)。A. 埃隆·德·维厄福瑟撰文,载《皮奥氏文物图说》(法文),5,1899 年,图 VIII-2。

这里所复制的酒盅是一对以人骨架为图饰的酒盅中的一个,其中有些图形表达了希腊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这张照片中的图形最足以显示出那些酒盅图饰中所体现的精神。图的背面为一座祭坛,坛上放着两个头盖骨;它的后面有一根柱子,支着三位幸运女神中的一位女神的雕像(上面刻着 Κλωθώ〈克珞梭,一位幸运女神的名字〉)。左边那个头盖骨的上面有一个钱袋,袋上刻着 Σοφία("智慧"),与此对称的是放在另一个头盖骨上的一卷苇纸卷,卷上刻着 Δόξαι("臆测")。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面排满了三具大骸骨。最靠近柱子的一具骸骨的右手中拿着一个装满钱币的钱袋,左手里是一只蝴蝶(象征灵魂),那是送给第二具骸骨的。钱袋旁边刻着 Φθόνοι("嫉妒")。第二具骸骨正在把一顶花冠往头上戴。这两具骸骨之间有一具小骸骨在弹弄七弦琴,上面刻着 Τέρψις("愉快")。第三具骸骨注视着它自己右手所拿的一个头盖骨,它的左手拿着一枝花,上面刻着 Ἄνθος("花")。在第二具骸骨和第三具骸骨之间也有一具小骸骨正在作拍手状。它的顶上刻着一行字,概括了这位艺术匠的主要思想:Ζῶν μετάλαβε, τὸ γὰρ αὔριον ἄδηλόν ἐστι——"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

2. 一个绿釉陶酒盅。柏林博物馆。R. 察恩:(《追求和享用》),文克尔曼氏简报第八十一号,柏林,1921 年,图 I—III。

一具人骸骨,四围是一个花圈、一块火腿、一支箫、一支笛子和一把双耳酒壶。左右两边是两个跳舞的侏儒,其中之一拿着一个钱袋。在这具骸骨头部的左右两边刻着:ντῶ, χρῶ("追求和享用")。参考《希腊文碑铭录》xii. 9. 1240(艾德普索斯;普罗伊讷尔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40,1920 年,第 39 页起):一个老船主,临终时手头还有一艘船,他的遗诫见于他的墓碑铭文中,那正是:追求和享用。

这两个酒盅只是一大堆物件中的两件样品，像这类表达希腊化时代晚期流行的人生观的物件甚多，而这种人生观到了罗马时代早期更为流行。有许多例子经常被人收集和加以描述，譬如佩特罗纽斯的小说（*Cena*（《筵席》），34.8）中那位暴发户特里马尔基约就有一个装饰餐桌用的小银骸骨架，诸如此类的例子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概不用再提。这里之所以复制这两个酒盅的图样，是因为它们非常生动地描绘出罗马帝国早期人民普遍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城市中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从奥古斯都以后，随着内战混乱局面的结束而降临了一个太平繁荣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浅薄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庸俗的享乐主义精神。“且尽生前乐”这句话成了一时的格言。“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现实的东西，至于那些哲学家和诗人，他们本身尚且终不免于死亡，他们的玄想只不过是臆测（δόξαι）而已；又如特里马尔基约所说，“eheu nos miseros，quam totus homuncio nil est. sic erimus cuncti，postquam nos auferet Orcus. ergo vivamus，dum licet esse bene”〈“唉！我们真可怜！我们全都是芸芸众生而已。谁也免不了要见阎王的。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吧。”〉（《筵席》，34.10）。我们最近发现埃皮丢斯·伊梅努斯的一所住宅，其 *triclinium*〈餐室〉墙上所题的箴铭，虽然也是享乐主义的，但措辞尚不太偏激，它使我们联想到奥维德的作品；把上文所说的那种人生观和这种不太偏激的享乐主义对比一下是很有趣的，关于后者，详见 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印度—希腊—意大利学评论》（意大利文），8，1924 年，第 121 页。

己的产业，那么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和那些较勤勉、较有生产性的实业家阶级一样，和平和秩序之恢复首先就是对这个实业家阶级有利。这些实业家并不只住在罗马城内。事实上他们大多不住在罗马而住在意大利诸城市和外省里。他们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城市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公元前二世纪和一世纪时在意大利和西方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受内战的打击不如罗马贵族上层（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高级骑士）所受的打击那么严重。一当和

平与秩序恢复以后，这些人立刻就大规模地恢复了他们的实业活动，而且其中大多数人无疑是成功的。

这个阶级的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南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中的退休富商，免奴特里马尔基约，对他的形象，佩特罗纽斯描写得很生动。他一生中从事活动的时光当然是在奥古斯都时代。佩特罗纽斯描写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他的毕生事业也已经完成了。他起初是一个奴隶，得到他主人的宠信，从他主人那里承继了一大笔财产，他把它投资于商业，特别是在葡萄酒的批发生意方面。到了暮年，他住在康帕尼亚一个城市里的漂亮私宅中，依靠他的大片庄田的收入和放息为生，他所放的债都有可靠的保证。特里马尔基约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他住在康帕尼亚而不住在罗马，这一点就很有代表性：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个时代，在康帕尼亚置一笔大产业要比在罗马置产好得多。还有一点也很有代表性，那就是，他的主要行业以经商为先，下一步才经营农业和银行业，当然他也可能仅代表免奴，不过我倒认为佩特罗纽斯之所以选择一个免奴作为典型正是为了尽可能地使这个 *nouveau riche*〈暴发户〉的形象更符合一些常见情况。我毫不怀疑，像蓬佩伊这类的康帕尼亚城市中，有许多自由民出身的、也许还受过教育的居民经营产业的经历一定也和特里马尔基约相同。他们就是奥古斯都时代蓬佩伊、斯塔别、希尔姑兰等城中那些宽敞而漂亮的住宅和别墅的主人，这正是一个具有最精致、最生动、最富有艺术风格的装饰画非常流行的时代；住宅里装饰的图画既具有最生动、最富有艺术性的风格，那么，它们的主人一定受过很好的教育，同时在事业上也一定很顺旺。关于奥古斯都时代蓬佩伊城中领导阶级的成分，我们

知道得很清楚。其中大多数人是苏拉手下的退役军人的子孙，还有一些人是蓬佩伊城的萨谟奈旧贵族阶级中的人士，其中极少数人是免奴。像普特约利之类的大城市以及希腊化东方的情形也是这样。我确信，在奥古斯都时代，无论意大利或外省，经济生活都是非常活跃的。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些懒汉，在他们之中以食利生活为理想的人并不比我们今天的资产阶级中怀有这种理想的人更多。

把意大利各城市的遗址全盘考察一下，对上面的论点可以找出最有力的证据。虽然其中某些城市在内战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在公元前一世纪时，这些城市还不至于萧条不堪。不过，就意大利而言，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奥古斯都时代。甚至，只要走马观花地看一看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遗址，特别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遗址，也能看出其中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基本定型的，那些最美丽、最适用的建筑物也都是在这个时代修建的。我并不是指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城市如都灵、苏萨等和其他北意大利的城市而言，甚至也不是指阿魁累亚而言。不过，假使我们看一看翁布里亚诸城市，看一看那些几乎没有工商业而只是农业生活中心的城市——佩鲁西亚、阿西休姆、伊斯佩卢姆、阿魁努姆等——或者看一看皮切努姆和埃特鲁里亚的某些城市，同时阅读一下关于这些城市现存残迹的记载，我们就会看到大多数最讲究的建筑物都是在奥古斯都时期修建的，但并不是奥古斯都本人修建的。他自己只专务于修建宏伟的意大利道路网，而各城市是由城市资产阶级去建造的，他们之中既有古代自治市的旧家子弟，也有新迁来的客户，即内战中的退役军人。到一世纪末年，增加了某些新建

筑物。有些城市到二世纪时还很繁荣，但是，如前所述，这些城市和建造它们的资产阶级（他们之中仍然以自由民出身的人占多数）的鼎盛时期是奥古斯都时代，即公元前 30 年至公元后 14 年之间的一段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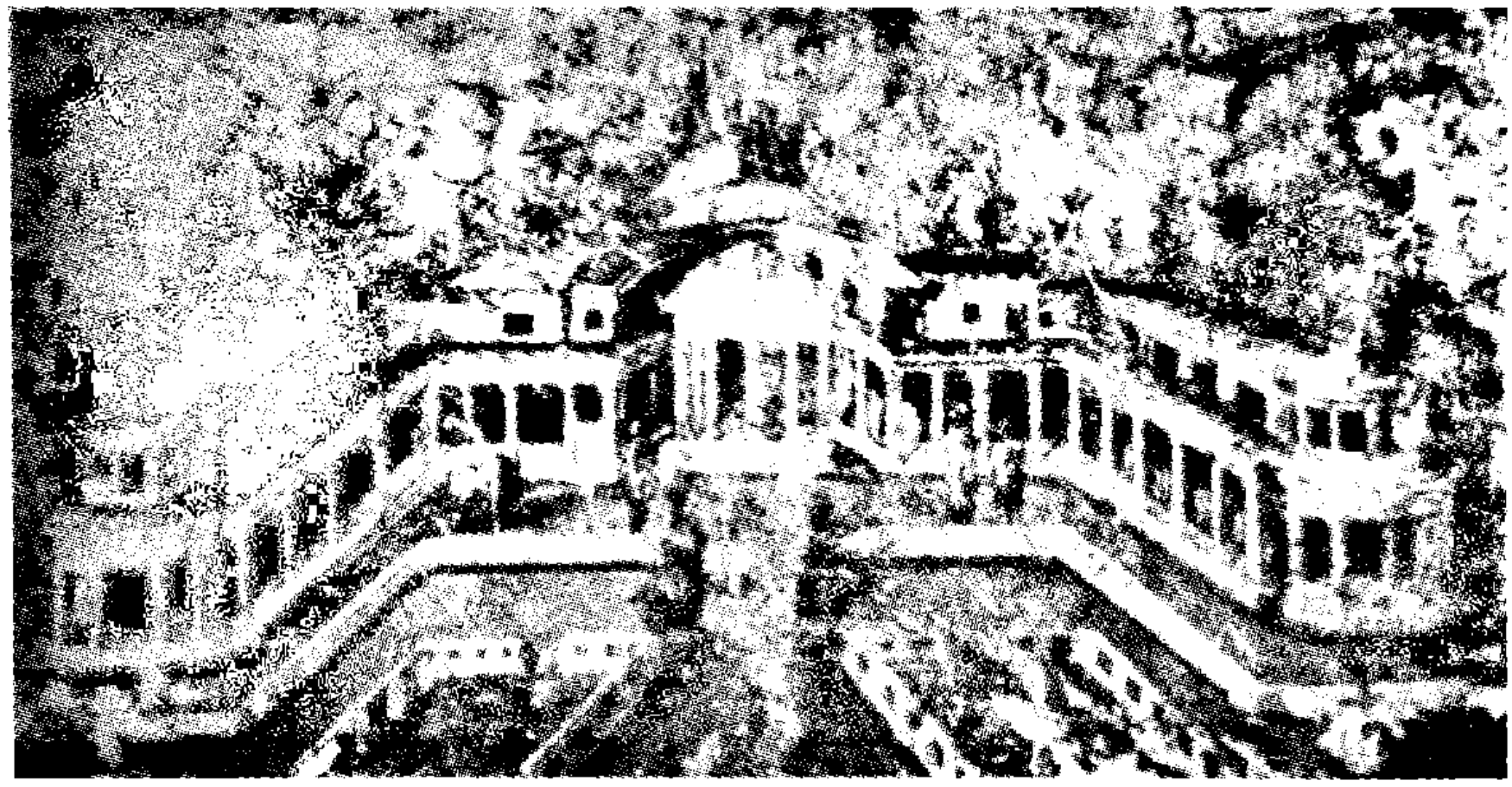
另一个证据就是奥古斯都时代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我们对当时的原始材料中所见到的情形略加考察，就会了解得很清楚。固然，我们所见到的记载几乎完全只限于意大利和只限于意大利所流行的经济情况。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吗？或者说，难道这还不能表示意大利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是居领导地位的地区吗？东方所损失的力量恢复很缓慢，而西方各行省要立刻使经济生活发展得很繁荣又还不够成熟。不过，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东方在工商业方面的复元比在农业方面快得多了。

我们已经看到，内战并没有影响意大利农业的发展。内战结束以后，农业生活的环境除了比以前更稳定而外并无其他变化。土地关系的基本面貌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大庄田不断地增多，主要是兼并了农民的小块田地。除了大庄田而外，中等规模的和小规模的产业也增加了几分重要性：这一个过程主要是由于退役军人分领没收田地而造成的。无论大型或中型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它们都是根据科学的和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的，它们的业主都不住在田地上而住在城市里。从苏拉、庞培、恺撒和奥古斯都手上接受土地的退役军人几乎都属于这样一个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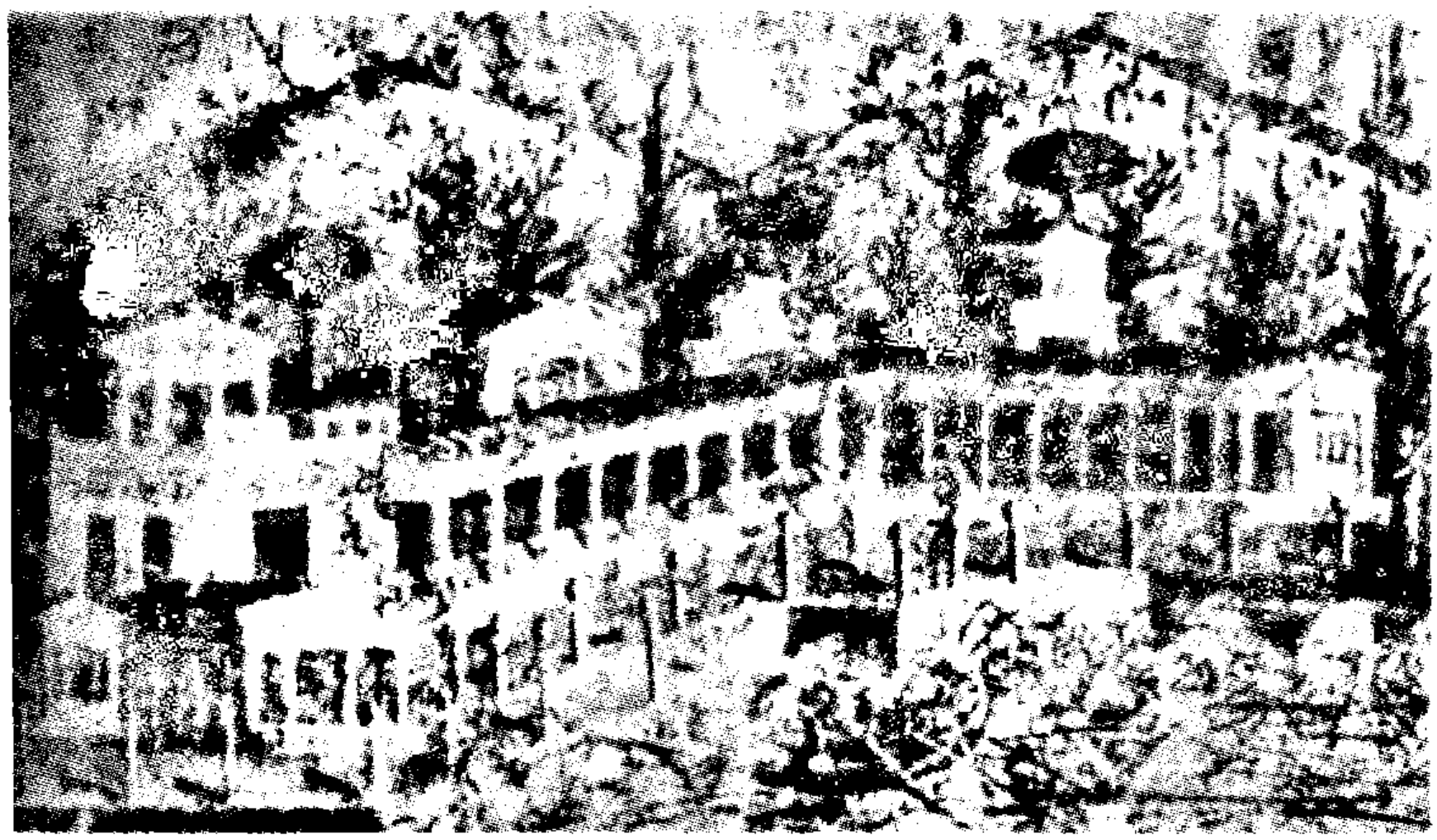
贺拉西对于他在萨宾的庄田的描写，正好描绘出中等规模的产业的经营状况。他从梅策纳斯那里接受他的 *Sabinum*〈萨宾庄〉，这是作为礼物而接受的，因此他也就和那些革命首领手下的

退役军人属于同一类型的地主了。I. 格里符兹精密地研究了贺拉西谈到自己庄田的一些零散的随笔，从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贺拉西这块庄田是一片很大的田地，其业主的收入相当可观。这位诗人对他的产业非常关怀，他把其中的一部分改变成按科学方法经营的标准农庄。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上头花费许多时间。经营的工作并非由他亲自进行而是由他的管家（*vilicus*〈管庄〉）——一个奴隶——来进行的。从经济上来看，这块庄田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个标准的农庄，由业主使用八个奴隶来经营它；另一部分是五段地，分佃给五家佃户，他们原先可能都是业主，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现在以贺拉西的佃农身份来替他耕种的这段地的业主。在标准农庄内，一部分土地开成一个葡萄园，再有一部分是蔬菜和果木园，而最大的一部分是谷田。归贺拉西所有的草地和林地则用来饲养一大群牛、绵羊、山羊和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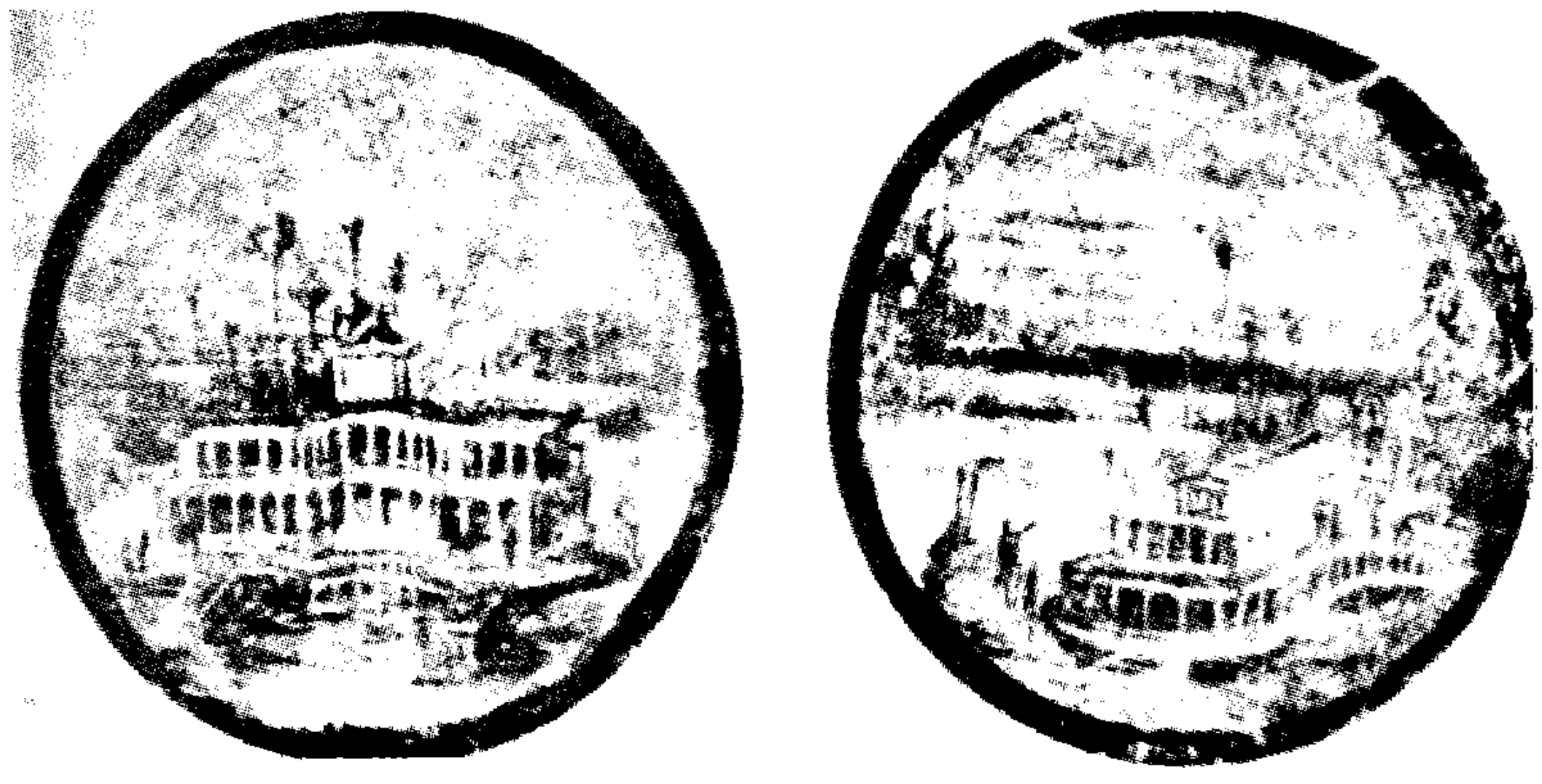
规模、性质与此相似而属于住在城市里的人的田庄，无疑地是意大利中部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中型田庄对自耕农的田产的危害大概比大地主的 *latifundia*〈大地产〉还要严重。意大利南部的农庄情形稍有不同。我们知道蓬佩伊、斯塔别和希尔姑兰境内某些农庄的情况。它们的遗址差不多统统用科学方法被发掘出来。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庄大多数不是某一块大地产 的组成部分。如果农庄属于从不住在庄上的大地主，它就不会有一套舒适的、相当奢侈的房间，因为这样一套房间应当是被庄主用作寓所的。因此，可以推定，这些农庄的主人们大多数原先都是蓬佩伊、斯塔别和希尔姑兰的市民和住户，而不是住在罗马城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就我们对这些庄院遗址加以精密研究后所能判断者而



1. 康帕尼亚一所庄院的主要建筑



2. 康帕尼亚的庄院



3—4. 海滨的罗马庄院

图 8　罗马庄院

图 8 说 明

1. 蓬佩伊地方卢克雷丘斯·弗龙托的住宅中的 *TABLINUM*〈餐厅〉内的一段壁画。蓬佩伊。拙著，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19，1904年，第 103 页起，图 V－1。详细说明见第 104 页以下。属于奥古斯都时代。

一所华贵的庄院的正面，包括美丽的长廊(两层)和通往正厅(*atrium*)的大门。我们看到，在这大门前有一座屋顶呈穹隆形的庙亭。庄院后面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园内各处点缀着形形色色的建筑物。长廊两翼的中间有一块英国式的草坪，坪内设有花坛。

2. 同图 1。拙著，同上，图 VI－2。

另一所式样相同的庄院的正面，由一列长廊构成。庄院后面突起两座小山，顺着两山的山坡是一个华丽的花园；长廊后面的庄屋就隐约出现在这花园周围。长廊面临一个小海湾或一个内陆湖的湖岸。岸边筑有一个船埠，埠头安着石柱，柱顶雕成埃尔姆斯神像〈吉祥之神，保佑商旅〉。岸边有两座小庙。海(或湖)中横着一艘游艇。

3. 斯塔别地方一所房屋中的一段壁画。那不勒斯，国民博物馆。拙著，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26，1911 年，第 75 页，图 VII-1。

一所宫殿式的庄院，位于三面环海的岬角地带。门前的走廊有两层；后面露出正厅上高耸的阁楼，还有高大的松树。海边的船埠筑有两道石堰或防波堤以资防护。

4. 同图 3。拙著，同图 3 所引，第 76 页，图 VII－2。

一座巍峨的避暑凉殿，修建在一个海岬或一个岛上，形式像一座三层楼的 *basilica*〈市政厅〉。这所庄院后面是一个松树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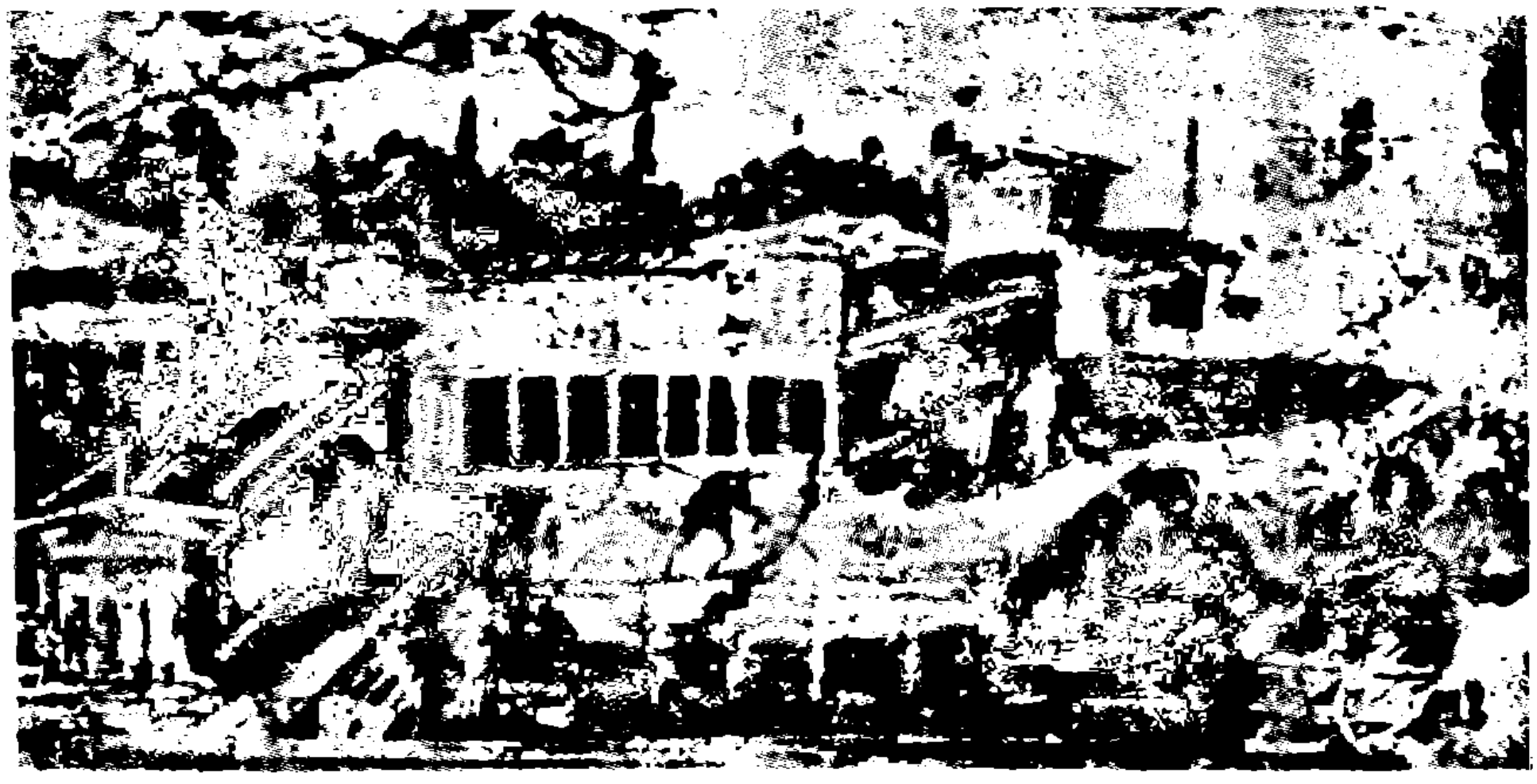
帝国时代的壁画中有许多与此相似的风景画，这些画很生动地描画出贺拉西及其同时代人笔下所描写的情景，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贺拉西和当时一般舆论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奢靡风气所施的抨击并不是夸大其词。旅客们沿着康帕尼亚、拉丁姆和埃特鲁里亚海岸以及沿着北意大利一些湖岸旅行，无论从陆路或从水路走，所见到的景物中最触目的当然就是这些宏伟华丽的庄院了。这些庄院的主人自然不会完全是皇亲贵戚和高级贵族，其中也有不

少是富裕的免奴。

言，康帕尼亚的农庄多少有些近似于贺拉西的田庄，它们包括维苏威山坡上的草地和林地。从那些宽敞的贮藏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库房看来，这些庄子一定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们的主要产品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这些无疑是供销售用的。由于这些农庄中的房间的设计和分配情况与瓦罗和科卢梅拉二人的描写都极为符合，显而易见，它们都是按照科学的农业手册来经营的，使用的劳动力都是奴隶劳动。在这些农庄上简直没有像贺拉西的 *coloni*〈佃户〉分佃的那样的小块田地。康帕尼亚的农庄完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没有保留一点以往的农民经济的残余。

毫无疑问，大地产上那些生产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部分是由较小的农庄组织起来的，它们的形式正与在蓬佩伊附近所发掘的那些小农庄相同。康帕尼亚的大地产当然是若干 *fundi*〈份地〉和若干 *villae*〈庄院〉的一种组合形式。根据贺拉西、提布卢斯和普罗佩尔丘斯等人提到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埃特鲁里亚、撒丁和阿非利加各地区的大地产的情形来看，它们显然是另一种形式。从这些诗人眼中看来，这些地方的地产上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使用成千的奴隶、牛和犁来耕种土地。因此，我们不能不这样设想，地产的中心是一座大庄院，它的四周环绕着一个村庄，住着奴隶和佣工。

农民逐渐绝迹，他们大多变成了地主的佃户，和奥古斯都同时代的人对于这种现象看得很清楚。古代的意大利消灭了。对于维吉尔、贺拉西、普罗佩尔丘斯和提布卢斯之类富于浪漫精神的人来说，这是值得叹息的现象。但是，感到恐慌的却并不止是富于浪漫



1. 康帕尼亚沿海的庄院

2. 康帕尼亚一所庄院的建筑群

图 9　罗马庄院

图 9 说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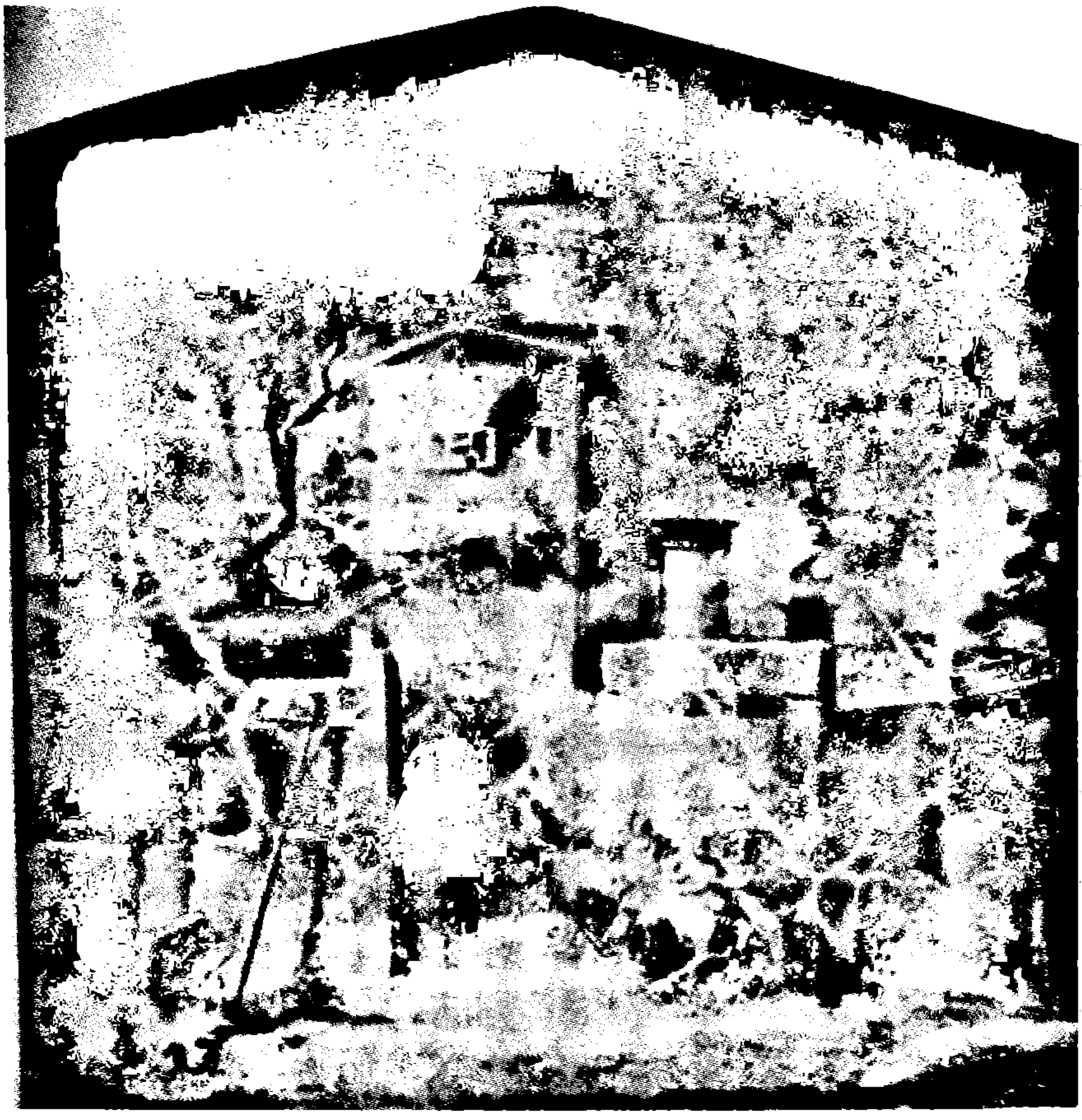
1. 斯塔别地方一所房屋内的一段壁画。那不勒斯,国民博物馆。见拙著,"希腊化—罗马时代的建筑景色"(德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26,1911 年,第 75 页,图 VIII-2。

一所华丽的庄院,建筑在海边,大概是在康帕尼亚地方。向海中突出一个有拱形走廊的船埠。靠近船埠的港内有一艘船。船埠上有几个人在闲逛,另外有一个渔夫拿着他的渔具匆忙地跑过。这所庄院及其前面美丽的长廊就沿着海岸,一路曲曲折折。后面是一些别的建筑物和一个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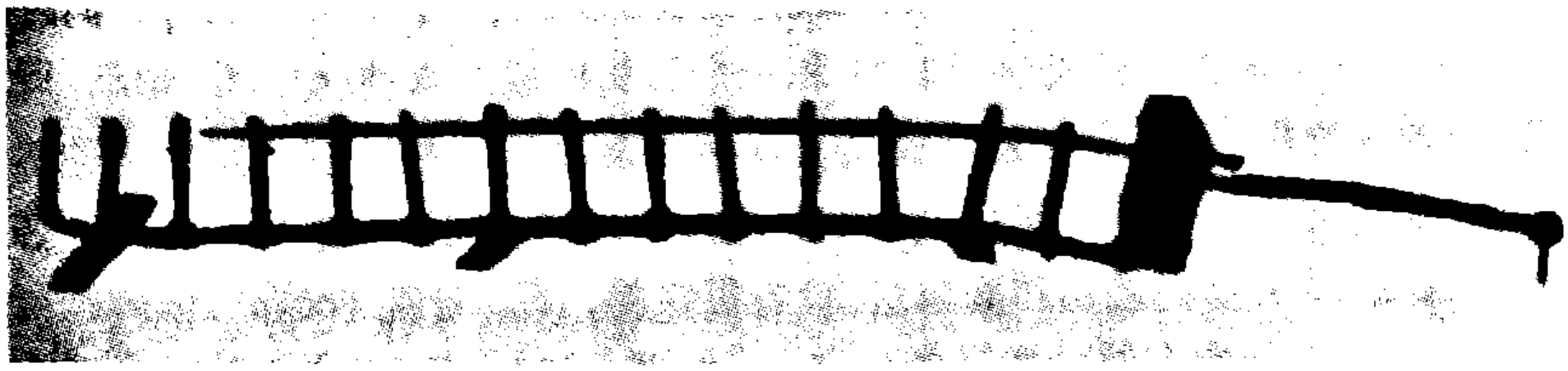
2. 蓬佩伊地方卢克雷丘斯·弗龙托的住宅中的 *TABLINUM*〈餐厅〉内的一段壁画。蓬佩伊。拙著,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19,1904 年,第 103 页起,图 VI-1。

另一所修建在海边的庄院。长廊和船埠的形式均与上图相同,但这里的船埠似乎被当作草坪使用。长廊后面是一个幽雅的园子,园中古树成丛,树丛中可以看到一栋一栋的建筑物,络绎相属。背景是一些有趣的矮山。

精神的人。意大利社会面貌在逐渐改观,奴隶和免奴的人数有增无已,甚至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这原先都是意大利农民的根据地——也是如此,农民都变成了佃户,这些现象虽然都不完全是新出现的,但却使人们感到非常惶乱不安;它们是国家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信号。贺拉西某些诗无疑反映了梅策纳斯和奥古斯都在饮宴时的谈话,从这些诗可以看出,农民绝迹的现象乃是奥古斯都时代的领导人物中经常谈论的话题。忠忱爱国的罗马人向奥古斯都发出了一致的呼声,吁请拯救农民。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听说他在这方面采取过什么措施来干涉意大利土地租佃的情况。诗人们对当时社会首先的攻讦、对富人奢侈浮床的攻讦,都与



1



2

图 10　1.一所山庄,蓬佩伊;2.锁奴隶的铁铐,蓬佩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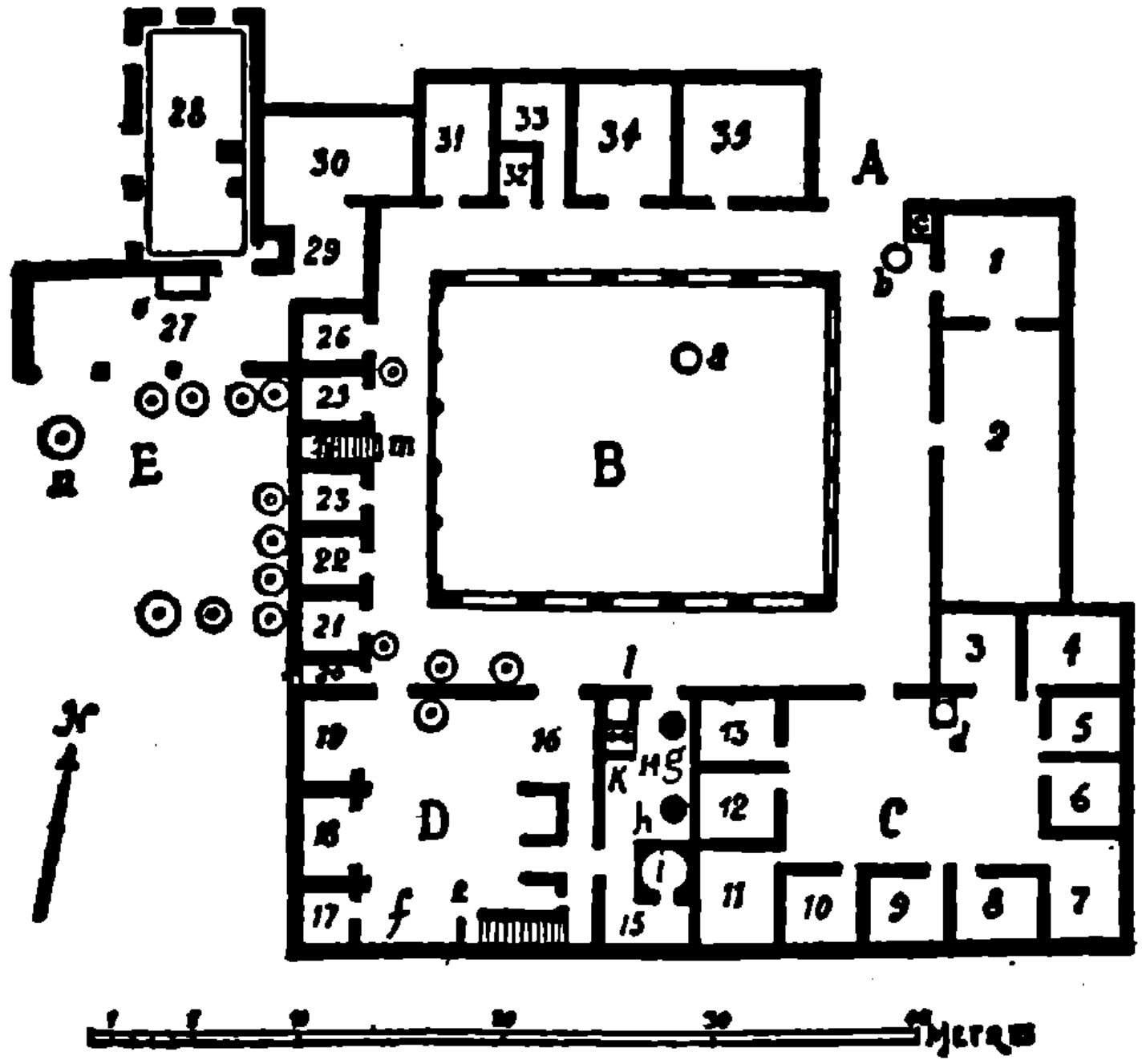
图 10 说 明

1. “丰塔纳-皮科拉”的一所房屋中的一段壁画。蓬佩伊：卡萨-德拉-丰塔纳-皮科拉。拙著，“希腊化—罗马时代的建筑景色”(德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26，1911 年，第 95 页，图 XI-1。

一所阁楼式的村舍，坐落在一个被围墙环绕的院子里，院子的大门很宽。我们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棕榈树和其他树木，树荫遮住了房子的一堵墙，正好挡住阳光，另外有一栋高起的建筑物，像一个亭子，也许画的是井亭。大门旁，一边放着一具犁，另一边有三个妇人坐在板凳上聊天。这所建筑物的外貌很难使我们认为它与蓬佩伊附近发掘出来的庄院属于同一类型。它倒有些像一个埃及农民的住宅，但我未敢肯定如此判断。这幅画可能画的是一个康帕尼亚农民的住宅，而其形式不同于蓬佩伊和斯塔别附近的庄院；参照图 33－1。

2. 格腊尼亚诺附近的一个 *VILLA RUSTICA*〈山庄〉里发现的铁铐。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23 年，第 277 页，图 4。

最近在“马尔凯提低地”(在格腊尼亚诺市)发掘出一所庄院，在这所庄院的 *ergastulum*（牢房）里发现了这样一些铁铐，这是一个山庄用来锁禁奴隶的。我们在正文里曾谈到过蓬佩伊附近的山庄，这所庄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参看第 52 页)，特别足以代表其中经营产业的部分。我现在按照《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所发表的图样将该庄院的平面图复制于下。(见第 101 页)平面图说明。庄主或管庄的住房没有发掘出来。*A*. 大门。*B*. 正院，院内包括(1)门房和(2)厩房(*stabulum*)，在这里发现马和牝牛或牡牛的骸骨，同时发现两个赤土陶制的秣槽(*a* 和 *b*)和一个石头砌成的水槽(*c*)。*C* 和 *D*. 后院，有奴隶的寝室、各种东西的储藏室及其他杂屋。*D* 院中有一间房子是牢房，*C* 院中有一间房子大概是一个小规模的制酪坊。在这两个院子之间的第 14 号和第 15 号房间被用作面包房，设备很完善。*E*. 货院(*cella vinaria* 和 *olearia*〈葡萄酒窖和储橄榄油的栈房〉)，堆着大坛(*dolia*)的葡萄酒、橄榄油和谷物。第 28 号房间是一个榨酒房(*torcular*)。第 27 号房间中有一个棚子，棚子下面藏着一大堆木料。在此处发现的一些梁木现在保存在蓬佩伊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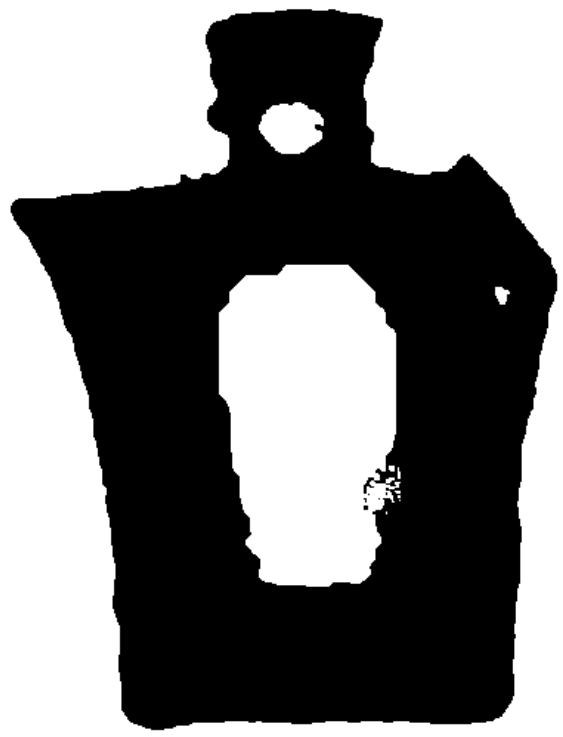


庄院平面图

物馆内。这所庄院的整个结构正好证明了瓦罗对一个山庄的描写是精确可靠的。这是一个工厂型的大农业行庄，使用奴隶劳动来经营，尽量做到自给自足，形成一个无求于人的小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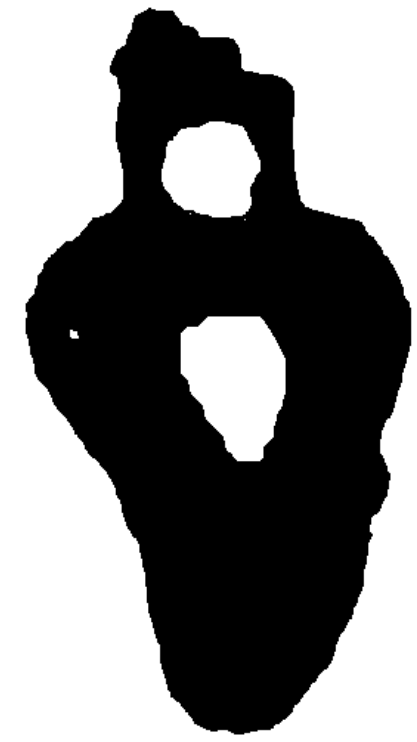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的某些法令符合一致。但是，在内战结束以后，我们没有听说有过任何土地法。而且，即使有一道紧急施行的土地法，它也会过于流露出内战时期的特色而不能作为依据。

在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中，除了农业以外，主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商业了。内战结束之后，帝国人民进行商业活动的良好机会很广泛。文明世界统一了；它真正变成了一个大一统国家；国内外太平无事；海上因受到罗马海军的保护而毫无危险——罗马海军现在是一支常备军；宽平的道路不断增多，这些道路本为军用而筑，但也便于商业往来；国家不再干涉私人的商业活动了；在高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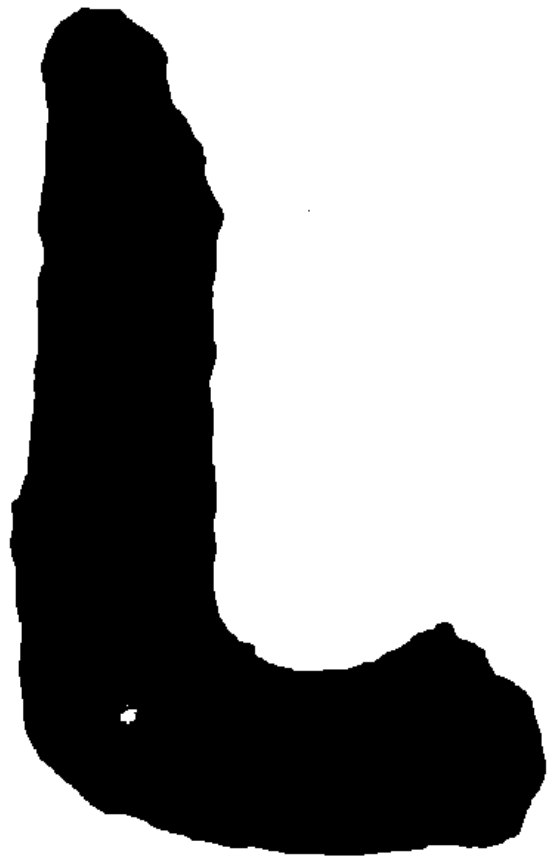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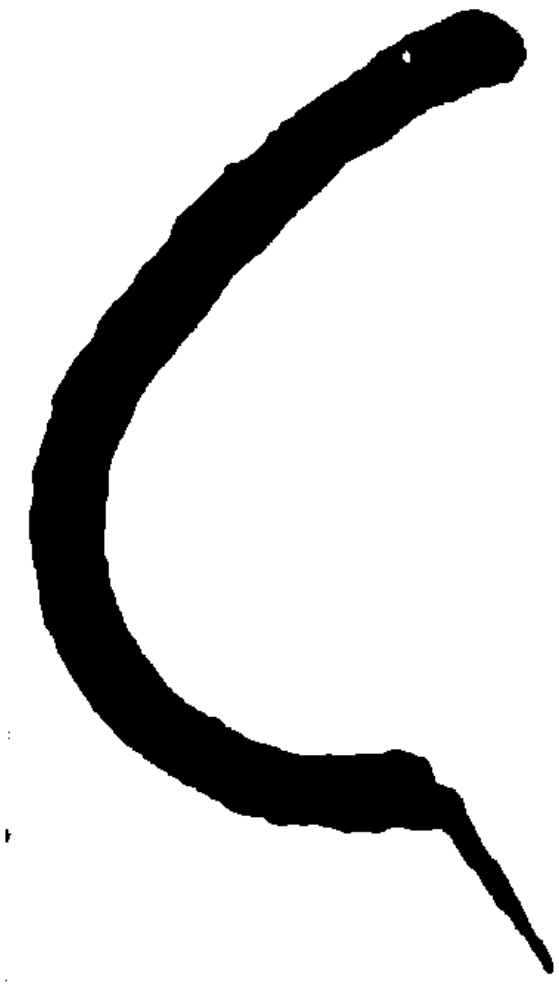


3



4

5



6

7

8

9

图 11　农具，蓬佩伊

图 11 说 明

1—9. 蓬佩伊出土的铁制农具。发现于博斯科雷阿勒附近的 L. 埃兰纽斯·弗洛鲁斯氏的大庄院(通常称之为 P. 凡纽斯·西尼斯托尔氏的庄院,但请看 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那波利斯》(意大利文),2,1915 年,第 172 页)。芝加哥自然史田野博物馆。H. F. 科乌:《自然史田野博物馆所藏博斯科雷阿勒出土古物》(英文)(田野博物馆出版书刊,152,人类学专辑 7.4),1912 年,第 210 页起,及图 CLXIII—CLXVI;参考博斯科雷阿勒地方这所著名的庄院中发现的其他类似的工具,见《王家山猫学院珍藏古物集刊》(意大利文),1897 年,第 436—40 页。那不勒斯博物馆中可以见到大量这类的工具。

(1) 常见的罗马式的镐头。

(2) 六齿耙。

(3) 尖头镐。

(4) 钩刀,大概是用以芟刈的工具。

(5) 尖嘴锄和手斧。

(6) 镰刀。

(7 和 9) 叉。

(8) 凿锄。

这些东西大多是葡萄园中最常见的工具。在意大利和法兰西,至今某些这类工具仍保留着古老的形式。例如,我在勃艮第就见过许多。在蓬佩伊最新发现的遗迹中有一家店铺,店里列满着这类工具。店主是一个姓尤昆迪亚努斯的人。在他的店内发现了 *falces stramentariae*〈割草镰〉,*serae*〈门栓〉,*compedes*〈脚镣〉,*falces vinitariae*〈割葡萄镰〉,锁链以及其他一些不用于农业上的家具(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印度—希腊—意大利学评论》(意大利文),7,1923 年,第 113 页)。在这家店铺附近有另一家 *faber ferrarius*〈铁匠〉铺(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同前引,第 115 页)。

西班牙和多瑙河流域各省逐渐开辟了新的安全的市场;阿尔卑斯

山区安靖了;迦太基和科林斯都恢复了,还有其他等等情况——凡此种种因素结合起来,使帝国中的商业活动焕然复兴并显著增长。

和邻邦以及和中国、印度之类的远方异域通商,在早期帝国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这类商业曾经激起当时人产生幻觉,正如它激起现代某些学者产生幻觉一样,他们都过分夸大了这类商业的重要性。就拿锡来说,主要也是来自西班牙而并非来自不列颠。况且,锡是用来制青铜的,而青铜在罗马帝国生活中已经不再像在希腊化时代那么重要了。从日耳曼尼亚来的是琥珀、某些皮毛和奴隶。南俄罗斯仍然供应希腊以粮食,并输出一定数量的大麻、皮毛、蜡,大概还有蜂蜜。若干黄金可能来自乌拉尔山脉。撒哈拉的贝都因人可能输出椰枣和大批黑奴。比较重要的是埃及和中非洲的贸易:主要商品为象牙、某几种珍贵的木材、黄金、香料和种种调味品。同阿拉伯也发展这类贸易。奥古斯都曾派出一支专门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占取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彼处主要的出口物为香料、调味品、宝石和骆驼。印度与埃及之间,印度、中国(丝)与叙利亚之间也进行着一种类似的奢侈品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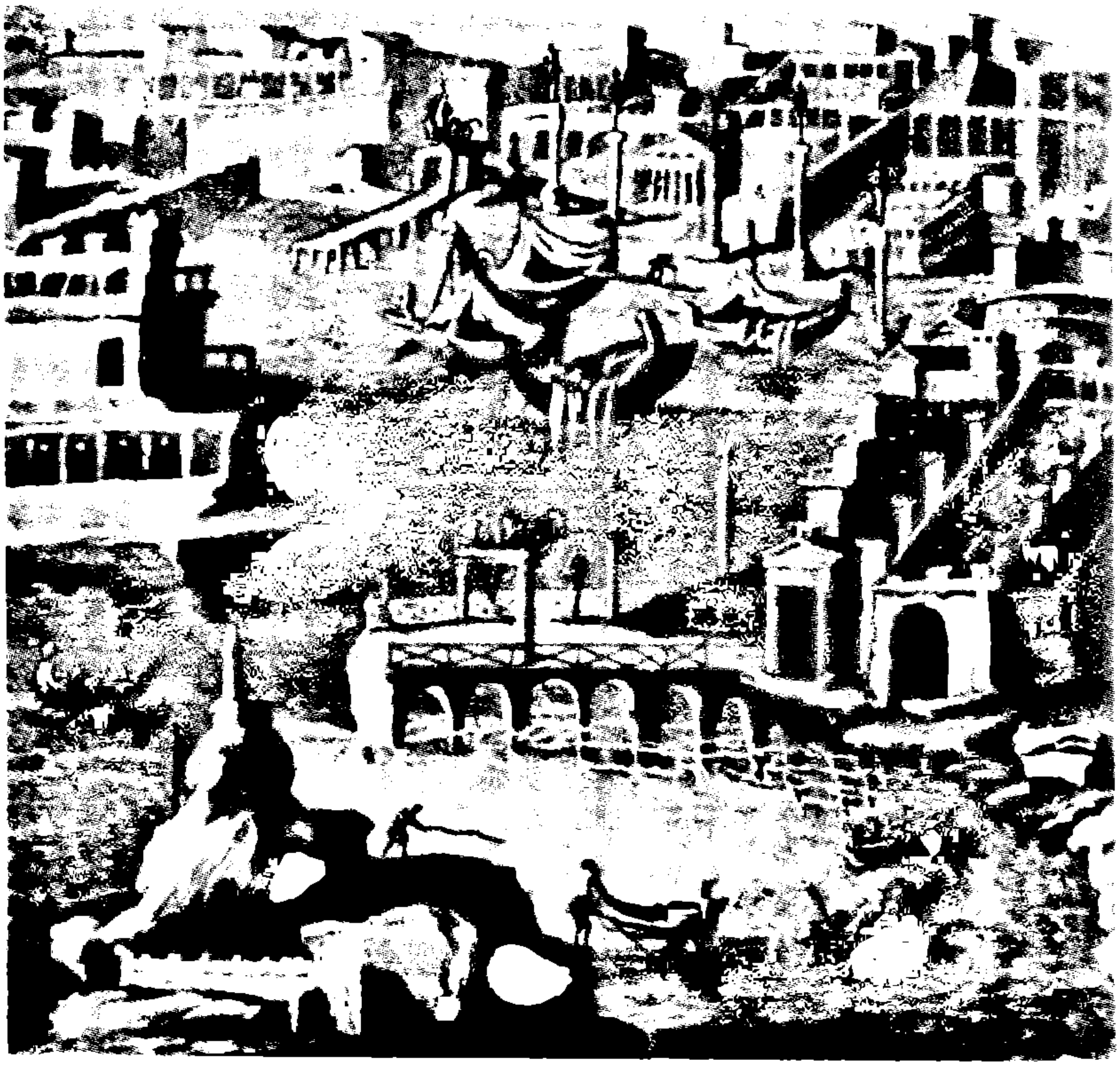
在北方,对于国外输入的商品几乎完全以输出橄榄油、葡萄酒和工业品作为抵偿。对东方的货物,无疑地一部分如普利尼所说靠银币和金币偿付,而大部分靠帝国的制造品、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制造品来偿付。概括地说,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是奢侈品的贸易,对于帝国经济生活毫无实际重要性。

远为重要的是帝国的国内贸易,就是意大利和外省以及外省与外省之间的贸易。正如希腊化时代一样,这主要是生活必需品

的贸易。谷物的输入量和输出量都很大。意大利本土所产的谷物是不足以自给的。希腊和希腊诸岛的情形也是如此，但西西里却不然，尽管西西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牧场和葡萄园、橄榄林和果园的地区。沿海的许多工商业城市宁愿从海道获取谷物，而不愿花费大笔的运输费从陆道得到谷物。由于造船的需要，木材无疑是大量输出和输入的。著名的卡土卢斯的船就是用小亚细亚伊达山的木材制成的。蜡、大麻、松香和柏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大量生产，但所有制造航海船只和内河船只的行省都需要这些东西。意大利需要金属铸造钱币，大大小小的金属工业中心也需要金属，然而，无论在意大利，或在以金属业著称的城市（例如南意大利的卡普阿和塔兰土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也许还有小亚细亚和希腊的某些城市，高卢的某些地方）的邻近地区，所产的金属都不敷供应。金属主要开采于西班牙、高卢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东方的矿在帝国时期似乎不甚重要。硫磺几乎完全取自西西里的矿区；它是所有种植葡萄的地方所必需的东西。

橄榄油和葡萄酒的贸易仍和以前一样在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其最大的消费者之一当然是罗马军队。希腊和小亚细亚的橄榄油和葡萄酒供应罗马的东方各行省和黑海沿岸，特别是北岸地区。意大利则主要供应多瑙河流域各行省、日耳曼尼亚、不列颠和阿非利加。也许连高卢和西班牙还多少从意大利输入一些橄榄油和葡萄酒。

工业品中除奢侈品外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极其发达。埃及仍然是唯一制造亚麻料衣服和苇纸的中心。大量的毛织品从小亚细亚、意大利和高卢输出。意大利的红釉陶器垄断了所有的市场。



1. 康帕尼亚的海港

2. 奴隶买卖

3. 释免奴隶

图 12　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商业活动

图 12 说 明

1. 斯塔别地方一所房屋内的一段壁画。发现于格腊尼亚诺。那不勒斯，国民博物馆。《希尔姑兰图画集》(意大利文)，ii. 图 LVI－0(本图即根据该图复制)。参看 K. 累曼—哈尔特累本：《地中海的古代港湾建筑》，载《克莉约》(德文)，增刊 14(1924 年)，第 224 页起，并参看 G. 斯帕诺：《"普特约利堤岸"》，载《王家那波利艺术考古学院报导》(意大利文)，8，1930 年，第 295 页起，特别是自第 323 页以下，关于蓬佩伊的海港，见 L. 雅科诺所撰文，载《那波利斯》(意大利文)，1，1913 年，第 353 页起。

一个典型的康帕尼亚海港，有着防波堤、各种各样的建筑、一个小岩石岛、"凯旋"拱门和以雕像为柱头的圆柱。它是否具体相当于康帕尼亚沿海某一个港口(如普特约利)，还无法肯定，但是我们可以断言普特约利的一般外貌当与此图相似，当然，其每一处的规模都要较此为大。

2. 卡普阿地方一块墓碑的片段。卡普阿博物馆。H. 贡梅鲁斯撰文，载《克莉约》(德文)，12，1912 年，第 500 页起；参考 B. 劳姆所发表的阿尔隆地方的一块浅浮雕，载《日耳曼尼亚》，2，1918 年，第 108 页。属于共和国晚期或奥古斯都时代早期。

这块碑的上段是两个站着的男人像，两个像的下面刻着铭文中提到的萨土尔和斯特帕努斯，那铭文是：*M. Publius M. l. Satur de suo sibi et liberto M. Publilio Stepano. Arbitratu M. Publili M. l. Cadiae praeconis et M. Publili M. l. Timotis*〈马尔库斯之免奴马尔库斯·普布利留斯·萨土尔为自身以及为免奴马尔库斯·普布利留斯·斯特帕努斯出资。公告人马尔库斯之免奴马尔库斯·普布利留斯·卡迪亚和马尔库斯之免奴马尔库斯·普布利留斯·提莫斯作证〉(《拉丁文碑铭集录》X. 8222)。这块石碑的下段就是本图所复制的浅浮雕。石座上立着一个裸体人像。他左边的那个人做很快地转向他的姿态，大概正在指着他说他；这个人穿着一领希腊式披衫和 *chlamys*〈短氅〉。其另一边也有一个人，穿一件 *toga*〈拖袈〉，安闲地把右手伸向这个裸体人。这幅图无疑画的是奴隶买卖。裸体人是奴隶，穿希腊装的人是卖主，*togatus*〈穿拖袈者〉是买主。看来，显然是那两位执行普布利留斯·萨

土尔的遗嘱的人想刻画出萨土尔早年生活的一个片段，即他被他的主人买进时的情形，他的主人后来成了他的 *patronus*〈靠主〉。这是为了表示出这么一个出身贫贱的人后来变成了卡普阿地方的大人物，他的为人和生平大概在卡普阿是人尽皆知的。特里马尔基约也有着与此相似的想法，所以在他的住宅的一排圆柱上画下他自己生平的各个片段，而为首的一幅图就是“venalicium cum titulis pictum〈引以为荣而画上去的卖身像〉”（佩特罗纽斯，*cena*〈筵席〉，29.3）。

3. 瓦罗凯氏收藏品中一件浅浮雕的断片。马里厄蒙（比利时）。F. 曲蒙：《瓦罗凯氏收藏品》（法文），第 70 号；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iii，第 1585 页，图 4827（Ch. 莱克里汶）；E. 曲克：《公元一世纪时用释放杖释免奴隶的一个场面》，载《碑铭与文艺学学院报告》（法文），1915 年，第 537 页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164 页，3〔＝《马里厄蒙博物馆》（法文）（1952 年），第 138 页，号码 R. 14，和图 49〕。属于公元一世纪（?）。

这块浅浮雕残片所刻的图形是 *manumissio vindicta*〈用释放杖释免奴隶〉。被释放的奴隶中有一个正跪在主人面前，他的主人用一根释放杖（*vindicta*）触他。他戴着一顶 *pileus*〈尖顶毡帽〉，这是获得自由的象征。另一个人已经被释免了，正和他的主人、或者说和他原先的主子握手（表示在他和他的靠主之间建立了 *fides*〈信任〉）。我看没有理由认为这块残片是近代的赝品。

卡普阿和亚历山大里亚的五金用具是独步一时的。玻璃器皿产于叙利亚、亚历山大里亚，而且也大量产于南意大利。陶灯是意大利主要特产之一。琥珀制的梳妆用品专门在阿魁累亚制造，该处从日耳曼尼亚输入琥珀原料，制成小巧玲珑的镜子、匣子、瓶子等出口。罗马帝国内还有许多小地方以特种工艺品驰名，这些特产品大量推销于帝国其他地区，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这些小地方的名字。

虽然我们所见到的某些原始材料，例如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的作品，在谈到罗马的奢侈的时候专门大谈这方面的特殊物品，然而，如我们所指出的，奢侈品的交易要比生活必需品的交易次要一些。但是，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 *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 *delicatessen*〈美味〉，这也足可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事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专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

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在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这不是仅仅因为罗马城愈来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之一而造成的现象。整个的意大利，包括它的无数城市，对文明世界其它地区说来是一个巨大、富足的市场。我们很值得花费些时间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推敲一下在蓬佩伊所发现的那成千上万的东西，弄清楚哪些是本地制造的，哪些是从外地运来的，而在外地运来的东西中又有哪些是从意大利其他城市运来的，哪些是从海外各省运来的。但是，如果肯定地说罗马和意大利用各行省缴纳给罗马的贡税来偿付这些输入的货物，那大概是错误的。我们虽无统计资料，但从可能收集到的有关意大利工业生产力的资料来看，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输入商品都是用一批价值相当的输出商品换来的。

输出品中最大一项就是意大利的葡萄酒和橄榄油。我们如果不假定意大利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大量输往帝国西部和北部各行省、甚至输往东方的话，我们就无法说明康帕尼亚这样一个大葡萄园的现象，也无法说明北意大利葡萄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南意大

利的主要港口是普特约利，普特约利和康帕尼亚的其他港口的营业中，很大一部分是葡萄酒和橄榄油的买卖，北部的阿魁累亚也是这样。我们应当记住，特里马尔基约就是靠输出葡萄酒而发财的，而且，他是和阿非利加方面有关系的。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以外，意大利还向西方输出大量的工业品。我们已经指出过，阿雷丘姆的陶器和早期的 *terra sigillata*〈陶餐具〉曾经在一个短期内独霸世界市场，远及于北方的不列颠和东方的黑海沿岸。甚至在高加索和卡马河这样遥远的地区也发现过大量的卡普阿金属器皿。奥古斯都时代的一种特产，特殊的奥契萨安全栓，在西方各省、甚至在黑海沿岸都很有销路。在木提纳附近发现的福尔斯工厂制的油灯都是真货(并非当地伪造品)，而且在奥古斯都时代曾大量制造出来。在罗马帝国每一个地区都发现过这些油灯。在南俄罗斯许多属于奥古斯都时期的墓里发现大量康帕尼亚仿造的叙利亚吹制玻璃，的确是非常美观的样品，它们是和叙利亚的原件在一起被发现的。看到这样一些事实，难道我们能说意大利的生产规模简直小得不足以抵偿输入品的价值吗？如果说罗马和罗马政府用从埃及、叙利亚、高卢和西班牙得来的金银偿付一部分输入的谷物和斗兽场上杀死的野兽以及皇帝们的奢侈品，那么，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就用生产品来抵偿贸易差额，而从各行省运货来的船只也大都是满载而归的。

虽然葡萄酒、橄榄油、谷物和木材、五金等类原料在帝国各行省之间的商业交易中占重要地位，但是，我们在估量奥古斯都时代的商业时，也不应当忽视了工业制造品(如前所述)。单就工业而言，罗马帝国中最发达的地区当推意大利，而在意大利之中当推康

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滕尼·弗兰克教授已经搜集了有关这个论点的证据，他最近写出的两部书专门研讨这个题目，无须我来重复他这两部书的内容。他指出，为了大量消费和大量出口而在埃特鲁里亚进行大量生产的红釉陶器，不断地愈来愈占重要地位。大家也都知道卡普阿制造的青铜器和银器特别著名，质地优良。我们方才还提到过畅销于北意大利的油灯的工厂。还可以补充一点，在奥古斯都时代，康帕尼亚的城市模仿亚历山大里亚并和亚历山大里亚竞逐，因而发展了许多种新型工业，这都是早期在康帕尼亚几乎没有见到过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漂亮的玻璃器皿，特别是上色的和雕花的器皿。在这行买卖方面，康帕尼亚几乎彻底地打垮了叙利亚和亚历山大里亚，我们在南俄罗斯发现的物品表明了这一点。同时，康帕尼亚诸城市无疑地开始利用它们盛产的上等橄榄油来制造香膏，并且开始恢复古代的珠宝业，这一行业在希腊化时代盛行于埃特鲁里亚而现在转移到了康帕尼亚。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再谈到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羊毛衣服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南意大利的品种优良的羊毛就是用于这一方面的。

在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并不是只有康帕尼亚和埃特鲁里亚两地发展工业。当时的阿魁累亚又发展成了第二个普特约利，那儿形成了北方一个繁荣的商业兼工业中心。我们已经谈过这个城市以及它同多瑙河流域和亚德里亚海西岸所进行的葡萄酒贸易在商业上的重要性。阿魁累亚原是一个屯驻罗马退役军人的屯市，这些退役军人都是些积极的、进步的地主，他们很快地就把屯市的郊区变成一片茂盛的葡萄园，同时把葡萄酒输往多瑙河流域而大发其财；因此，阿魁累亚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它本身商业发展前途所

提供的优越性很快地表现出来了。平定了诺里库姆，使阿魁累亚市民很容易进入那儿的铁矿区。葡萄酒之输出使大量的琥珀输入了阿魁累亚。阿魁累亚又出产质地优良的沙砾和粘土，因而大可以就本地制造（不是从外地输入）玻璃和陶器，倾销给多瑙河地区的消费者。意大利西北部的青铜工业历史悠久，而邻近的诺里库姆、雷戚亚和达尔马提亚的矿区所藏铜矿和银矿又很丰富，这些条件使本地青铜匠和银匠大为活跃。农业用具和铁制兵器都在这里制造：在该地发现的一块碑铭中曾提到一个 *aciarius*〈兵刃匠〉，可资证明。在维鲁努姆附近发现金矿大大地便利了珠宝匠，他们同时还利用该地区所发现的含有杂质的宝石。这样一来，阿魁累亚不仅逐步成为一个葡萄种植者和商人的城市，而且也成了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当你参观这个城市的博物馆时，那么多精致而别具风格的玻璃制造品，特别是那些仿古的石刻、玉雕和各式各样的花瓶，那么多的琥珀器皿，那么多的铁器，一些珍贵的青铜和银制的镂刻艺术品（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奥古斯都时代），以及那么多的金饰品会使你感到惊叹不止。而在各个方面，最古的样品都是属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毫无疑问，早在奥古斯都时代，阿魁累亚即已成为意大利北部的普特约利了，这大概由于奥古斯都本人及其家族中一些经常住在该城的成员们的努力所致。像巴尔比攸斯氏和斯塔丘斯氏之类的人显然不仅是阿魁累亚商业的先驱者，而且也是阿魁累亚工业的先驱者。

意大利工业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生活之逐渐工业化不仅限于像普特约利和阿魁累亚之类的大都市（它们都是大出口港和重要商道的中心），而且也出现在一些小的地方性中心城市和

港口。蓬佩伊就是一个好例子。蓬佩伊一向是一个农业发达地区的中心，是对于它附近的内地城市相当重要的一个港口，同时，它无疑地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地方工业的中心，它的作坊里的制造品不仅销售给本城的消费者，并且还销售给邻近城市和近郊农家的消费者。早在加图时代，某些农具就在这里制造。从苏拉以后，而特别是在奥古斯都时代，其他方面的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了。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显著的标识就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羊毛料子和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种贸易是怎样发展的，以及这个城市怎样愈来愈工业化的。在这里只要提到这个过程开始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够了。蓬佩伊另一种特产——一种著名的鱼酱，名叫蓬佩伊的 *garum*〈鲙卤〉——大约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生产或恢复生产的。

弗兰克把蓬佩伊的工业组织描写为一种小工厂和零售商店的结合形式，这种组织可能是一个小型地方工商业中心的特色，正如蓬佩伊那种有正厅和周围绕着圆柱式的房屋是一种较古式的市镇的特色一样。在奥斯蒂亚的发掘使我们看出，早在公元一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更为近代化的房屋和店铺，那种形式表明了另一种情况，那是更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一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仅对意大利的福利尼奥或乌尔比诺的店铺加以研究，或对美国麦迪逊的店铺加以研究，就对欧洲或美国的经济生活下断语。

遗憾的是，关于奥古斯都时代大都市生活的材料，无论就意大

利或就外省而言，我们都感到非常贫乏。那些较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没有一个被我们发掘出来过；有许多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被发掘出来了。奥斯蒂亚还只刚开始让我们见到它早期的生活面貌；在普特约利、那不勒斯和布林迪西不可能有什么大规模的发掘；在阿魁累亚，发掘的机会虽然很好，但工作还才开始。外省的情形亦复如是，在那些地方的许多中心城市里，工业生活都重新繁荣起来了。在亚历山大里亚，事实上工业从来没有停顿过，它一直在为本地消费者、为埃及的市场和向外地输出而生产着大量的商品。但关于这个城市的工业组织，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同时必须交待一句，如果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仍然是这么贫乏的话，我们关于古代工业概况的报导就没有完备的希望。据我个人对于俄罗斯南部所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的研究来看，亚历山大里亚的工业生活在内战后的繁荣景象是前所未有的。亚历山大里亚为整个文明世界生产苇纸卷、某几种亚麻布、香膏、某些玻璃器皿（特别是念珠）、象牙制造品、一种特别的首饰、一大部分在古代世界里到处流行的银器及其他等等产品。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康帕尼亚曾打算把这些工业中的某几种行业介绍到它自己的城市中去。

在东方希腊人地区内，发展工业生活的并不止亚历山大里亚一地。叙利亚发明和改进了吹制玻璃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久就被意大利一些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城市学去了。叙利亚的珠宝首饰和亚麻布与亚历山大里亚的产品彼此竞争。在小亚细亚，自古相传的羊毛工业开始再度兴旺起来。从这里往外输出的不再只限于粗毛毯了。这个地区现在专门从事于织造染色的毛料和衣服，而在这种专业方面，只有叙利亚可以与它抗衡。当然，意大利也生产一

些质地优良的原色羊毛织物，其中一部分也在本地染色（让我们回想一下蓬佩伊的 *infectores*〈染坊〉）；同时，在罗马帝国其他地区也和意大利一样，家庭工业可以为家里人供应一些日常穿着的朴素的纯色衣服（不过我却认为就连这类衣服也是从市集上和商店里买来的，城市中的商店供应着廉价的着色衣料和衣服）。尽管如此，在织造染色羊毛和亚麻织物方面，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是没有对手能相比的。只要想一想莫斯科织造的染色毛料输往家庭工业仍占优势的中央亚细亚、甚至输往印度的输出量有多大，你就会明了当时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染色毛料织造业是多么重要了。

奥古斯都时代的经济情况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这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的。我们已经说过政府对于帝国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必须重复一句，奥古斯都没有任何专门的经济政策。劳动力的问题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说他采取了某些保护性或限制性的措施，他这样做也不过只是为了一种政治上或道德上的原因。例如，节制奢侈的法令（*leges sumptuariae*〈禁奢令〉）或者被拟订过的保护意大利农户——意大利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措施都属于这类性质，关于后者，贺拉西曾在他某些颂诗中宣称是奥古斯都拟订的，但一直未付诸实现。普遍执行的是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政策。我们必须着重指出的第二点是意大利在帝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意大利仍然是帝国中最富足的地方，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与之相比。它在西方是农业、商业和工业上最大的中心地区。意大利的经济霸权是会引起对手的挑战的，而且这个时刻似乎就要来到，正如它本身曾经向希腊、亚历山大里亚和小亚细亚的霸权挑过战一样。但是我们还几乎感觉不到丝毫征兆能标

识着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还同希腊时代和希腊化时代一样，最有价值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仍然集中在少数地区，特别是集中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和腓尼基，以及意大利；帝国的其他地区大都生产原料。但是，即使在西方各省中，一般的经济生活也愈来愈复杂，它们得到解放的日子也愈来愈临近了。

奥古斯都避免干预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他也奉行同样的政策，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政策。在这两方面他都保持原状，而只有在绝对必要改变的时候才稍加改变。在经济范围内，他的政策也是一种复原和更新的政策，这种政策事实上就是一种适应现状的政策。

1. 阿魁累亚出土之盘

2. 博斯科雷阿勒村出土之杯

图 13　提贝里攸斯和克劳迪亚斯

图 13 说 明

1. 阿魁累亚地方所发现的银盘。维也纳博物馆。这个 *patera*〈盘〉经常被人发表;见 S. 赖纳赫所列目录,载《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146 页,1;参看 E. 勒维:《一件罗马工艺品》,载《东方史研究》(纪念 J. 斯特尔齐果夫斯基专号)(德文),1923 年,第 182 页起,和图 XX。

这个图组(浅浮雕)是罗马人的一件仿古品,或者说是一件略为变动的复制品,它是用新阿提卡派的风格来处理的,它的原样品就是那有名的希腊化埃及式的"Tazza Farnese〈釉土扁瓶〉"。图中把一位天神化的罗马皇帝画成一位新式的特里托勒莫斯①,他给大地之神带来了肥沃和繁荣,大地之神的形象是一个斜躺着的半裸体妇人,她身旁是一头憩息的牝牛(参看图 6-2)。这位皇帝刚刚从一辆由蛇拖着的双轮车上下来,他正把一件牺牲献给德梅特尔②;德梅特尔高高地居于靠后的地方,坐在一株老橄榄树或无花果树下面的一块岩石上。天顶上有一个天神宙斯的半身像。皇帝身旁环绕着四季之神(*Horae*〈季节女神鄂蕾们〉),其中有两位在饲喂和抚弄着蛇。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充当 *camilli*〈法童〉。男孩们捧着两个盘,女孩提着一只篮子,篮内盛着水果和谷穗;她身后还有一只篮子放在地上。很难判断这位皇帝究竟是谁。我想,把他认作卡利古拉或芮罗要比认作克劳迪亚斯可靠些。我认为这些小孩并不是克劳迪亚斯的儿女;他们象征着黄金时代普遍的富饶和繁荣。这个盘很足以表现出一世纪的皇帝们极力想继承奥古斯都的思想,并极力强调他们也像奥古斯都一样是和平与繁荣的赐予者,是伟大的保护农业者和重振农业者。

2. 博斯科雷阿勒出土珍品中之银杯。发现于蓬佩伊附近的博斯科雷阿勒。E. 德·罗特希尔男爵收藏,巴黎。A. 埃隆·德·维厄福瑟撰文,载

---

① 特里托勒莫斯为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埃娄西斯人,稷母神德梅特尔派他把农业传给人类。——译者

② 德梅特尔为希腊神话中的稷母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策蕾斯。——译者

《皮奥氏文物图说》(法文),5,1899 年,第 31 页和第 134 页起,图 XXXII-1、2; 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第 92 页起;拙撰,载《各家学者向碑铭与文艺学学院提出论文集》(法文),14,1924 年;参看拙撰:《皇帝提贝里攸斯和对皇帝的宗教崇拜》,载《史学评论》(法文)163,1930 年,第 1 页起。

这个杯子的一面已制成图版,兹将其全部图形摹绘在本页上,即上面两幅摹图中的第一幅(采自《雅典与罗马》(意大利文),6,1903 年,第 111 页起),这个杯子可以称为奥古斯都—提贝里攸斯杯。在这里,提贝里攸斯把奥古斯都尊崇为武功辉赫的大英雄,为重振罗马军威的伟人,为尤留斯氏神圣家族的太祖。和奥古斯都一同出现的有提贝里攸斯的母亲,她已经成了神了;同时还出现提贝里攸斯本人,他成了皇帝最忠诚、最贤明的辅佐者,也是皇帝独一无二的继承者。杯子的一面可以看到奥古斯都坐在一张 *sella curulis*〈贵人椅〉上,手中拿着一个圆球和一个卷子(表示他是 *orbis terrarum*〈地球〉的主宰者和立法者)。他的面孔朝着身右边的一排神人:有把胜利神像献给他的维纳斯圣母(她的形状却是莉维雅?〈莉维雅系奥古斯都之妻、提贝里攸斯之母。——译者〉),有荣耀神,还有象征罗马人民英雄气概之神。他的左边有战神马尔斯,这是尤留斯氏的神祖,马尔斯率领七个被征服的民族排成一行。在这杯子的另一面,奥古斯都当着提贝里攸斯面前接受苏甘布里人的投降;他们就是被提贝里攸斯征服的。这个杯子明显地证实了提贝里

攸斯及其继承者们尽力把他们自己和人们对奥古斯都的尊崇联系起来(参看《史学评论》(法文)中上引那篇论文所研讨的伊西翁地方的碑铭)。本页第二幅摹图是另一只杯子上的浅浮雕,雕的是提贝里攸斯战胜苏甘布里人(?)后凯旋的景象。

第三章

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

奥古斯都去世时,他的大权落于他晚年所过继的嗣子提贝里攸斯之手,提贝里攸斯是他妻子前夫之子。提贝里攸斯的继承者卡利古拉是他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卡利古拉由他的叔父克劳迪亚斯继承。而克劳迪亚斯的继承者芮罗是他的第二个妻子阿格里皮娜[①]的儿子,阿格里皮娜是卡利古拉的妹妹。因此,政权一直掌握在奥古斯都的家族里达一百年左右。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元首制这时已成了一种世袭君主制。事实上,政权由奥古斯都家族里的一个成员传给另一个成员,完全是凭仗奥古斯都得到罗马军队将士拥戴的结果。公元一世纪中的皇帝们几乎全都是由军队、特别是由禁卫军推定的。只有提贝里攸斯是例外,军队曾毫不犹疑地向他宣誓尽忠。按法律说,按国家体制说,皇帝都应该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手中接受大权。但实际上,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所履行的元首制乃是以军队的欢心为基础的。

---

① 阿格里皮娜为克劳迪亚斯做皇帝以后的第二个妻子,实系他第四次结婚之妻。——译者

关于这一点，罗马帝国中每一个人，首先就是皇帝本人，都很明白，也都视为当然。这些皇帝深知他们的统治完全凭仗他们和奥古斯都的亲属关系以及凭仗军队对他们的支持。他们也知道，就理论上讲，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资格担任帝国的最高长官。他们懂得这些关系，他们的行动也就从这里出发。由此，他们在京都里实行了专横、无情而残忍的统治，他们时刻害怕自己会变成一次逆谋的牺牲品，他们有系统地杀害奥古斯都家族里所有的成员以及帝国贵族阶级中所有的首脑人物，他们这些杀人如麻的暴行都被塔西佗非常生动地描写下来了。正由于这样，所以他们才对于禁卫军和罗马城的居民几乎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也正由于这样，所以他们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不堪；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朝不保夕之君〈caliphs for an hour〉”。

奥古斯都氏王朝所有的皇帝都迫切地感到需要巩固他们的权力，需要在单单的法律基础以外替他们的权力找寻更多的基础。元老院的决议当然会对皇帝的权力予以合法的承认，把奥古斯都曾经执掌的、以及曾经使他成为罗马城与罗马帝国最高长官的一切权柄都赠给了新任的元首。但是，皇帝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更高的、更可靠的承认，那种承认根本不以元老院的意志为依据，要使他们不仅根据元首制政体应当执掌这些权柄，而且从皇帝的本身来说就应当执掌这些权柄。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卡利古拉和芮罗一再努力倡导对皇帝的宗教崇拜并使之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其道理就在于此。也正由于这样，所以才作出许多努力给在世的皇帝加上神名，使他具有神性，并且把他和希腊罗马泛神教中某些神人，特别是和阿波洛神或埃尔库勒斯神合为一体——因为这

两位神人都是文明生活的启迪者和保护人类反抗黑暗势力的神。这些办法的目的正是要把帝国国民的宗教感情同在世的皇帝本身联系起来。提贝里攸斯和克劳迪亚斯都是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他们都受过哲学思想的训练。他们深知这类主张的妄诞,并且对于特别是从东方各省传来的谄媚阿谀的习气和虔诚的宗教感情的表现两者都加以反对。在拉科尼亚的伊西翁地方所发现的铭文可以证明提贝里攸斯的态度,这篇铭文的内容是皇帝的一封短信。伊西翁城派一位专使向提贝里攸斯和他的母亲献上神号。提贝里攸斯在他的回信中非常简短地声明了他的原则;据塔西佗的记载,他后来向元老院所作的一篇著名的演说辞又详细地发挥了这个原则。* 提贝里攸斯作这篇演说是为了答复外西班牙行省所提出的请求,该省请求为皇帝和他的母亲建立一座神庙。演说辞和回信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凡人,神号只属于奥古斯都,他才是人类真正的救世主。"苏韦托纽斯曾提到提贝里攸斯的一道敕令,提贝里攸斯大概是由于东方提出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请求才颁布这道敕令的。** 克劳迪亚斯从同样的动机出发,也抱有和提贝里攸斯相似的看法。关于这一点,有一件苇纸卷可作明证,这件苇纸卷发现于费拉德尔非亚,它的内容是克劳迪亚斯写给亚历山大里亚居民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断然拒绝接受任何神号。但是,即使是提贝里攸斯和克劳迪亚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接受某些把他们当作神来崇敬的仪式,特别是在东方各省

---

* 塔西佗,《罗马帝国编年史》,iv. 37,38。

** 苏韦托纽斯,《提贝里攸斯传》,26。

和西方新并入的一些行省中。

不管怎样，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血腥残暴的统治只是奥古斯都死后罗马帝国生活的一个方面。在暗中，奥古斯都所开始的那种改造帝国结构的缓慢过程仍在继续进行，并未受到罗马城中流血斗争的干扰。这个过程中最显著的现象是官僚机构逐渐发展，元老院被排于行政工作之外和行政工作集中于皇帝之手。这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皇帝掌握了罗马国家全部资源，只有他一人才有权处理罗马帝国的收入和安排支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征课，间接税的收集，罗马国家田产的经营管理，所有这些都逐渐集中在皇帝内廷之手。元老院最后只保留下对院辖行省中各城市向罗马人民的国库缴纳的那些款项的经管权。

在这方面，提贝里攸斯的统治和尤其值得注意的克劳迪亚斯的统治都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用不着重述 O. 希尔施费尔德及其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克劳迪亚斯的成就。这位皇帝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具有决定性的步骤，并且为皇家官僚机构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统治时期的发展）创造了可依据的先例。例如，保留下来的大量碑铭和苇纸卷上抄录了他的敕令和信札，我们的文献材料上也有许多地方提到了这类的文件，这些史料都说明了克劳迪亚斯对整个帝国行政机构最细微的琐事都甚为关心。在特杰亚发现的一项关于帝国驿传事务（*curous publicus*）组织的敕令的断片和上面所提到的给亚历山大里亚居民的信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例子了。在这封信中，涉及了亚历山大里亚市政组织的一个复杂问题（议会问题）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同希腊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克劳迪亚斯表现了惊人的丰

富知识,他不是从理论上着眼,而是从实际出发对现实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表现了他具有非凡的机智。简直不能理解像这样的一位人物怎么会同时又是他的妻子和免奴们手下的奴隶。他所签署过的所有文书无疑全是他亲笔写的或亲自仔细修改过的,因为这些文书不仅表现出同一人的独特风格,而且还表现出同一人的独特逻辑和同一人独具的推理方法。但是,如安德森先生所提出的,实际情形是这样,他只是在晚年智力不断衰退的时候,才被他最亲近的人的意志所左右;再者,塔西佗和元老院议员阶级其他作家也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元老院从来不抗议皇帝在这些方面侵夺了它的权力。原因和在奥古斯都时期一样,害怕对国家必需的浩大开支负责。元老院现在的收入比元首制初期还要少,更无法应付这笔开支。但皇帝们却与此相反,他们在内战中一跃而为帝国中富豪之首,他们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手中承继了埃及的资产,他们经常因抄没和继承而增加财富,因此,他们随时愿意用自己的收入来帮助国家,如改建和经营都城,赡养罗马城居民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赏赐军士并为退役军人设置一笔恩俸基金,在意大利和各行省修建道路及其他种种浩大的开支费用,他们都愿意承担下来。在这方面,他们处处都步奥古斯都的后尘。皇帝们既然这样地帮助国家,他们当然就担起一件非常吃重的责任,同时也就有权利要求由他们控制和管理国家的财政。皇帝承担这份责任促使行政系统逐步改善,特别是使各行省的行政系统有所改善,因此使新制度在大多数国民中愈来愈受欢迎,而相应地削弱了元老院的权威。元首制于是开始确立,成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

在描述帝国历史这个基本特征的时候，我要选择两个重点先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两点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着重谈谈可能还是有些好处。

罗马城的行政管理是罗马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必须使罗马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使它配称为世界的京都；必须使罗马城不断增多的居民在生活基本需要方面得到保障，如水源供应、排水、卫生设备、防火防洪、铺平街道、修筑台伯河上的桥梁、一支有高度效率的警察部队等等——这些设施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世界所有较重要的城市里都曾具备过——除此种种而外，为了赡养罗马城居民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还得付出浩大开支。住在罗马城中成千上万的罗马公民很少关心政治权利。他们欣然同意奥古斯都逐步把公共集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形式的做法，当提贝里攸斯连这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也加以禁止的时候，他们毫无反抗，但是，他们却坚持他们在内战期间所获得的权利，那就是要由政府来赡养他们和满足他们的文娱需要。任何一位皇帝，哪怕就是恺撒或奥古斯都，也不敢触犯罗马无产者这种神圣的权利。他们最多只敢减少和固定领公粮者的名额，以及定出一种适当的分配制度。他们也规定了罗马城居民一年能在戏院、竞技场和圆剧场里看几天好戏。但他们一直没有侵犯过这种制度本身。他们并不是害怕罗马的贱民；他们手下的禁卫军足以平定任何可能发生的叛乱。然而，他们情愿让罗马城居民保持愉快的情绪。在罗马公民中有着这么一大群享受国家特别津贴的人，其人数在二十万左右，都是古代罗马部落的成员，因此，皇帝们每当出现于凯旋、献牲、主持竞技赛马或角斗等群众集会中时一定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久而久之，就需要

有一种特别热烈的欢迎,为此,他们举办额外的赛会,添补钱谷的犒赏,设筵席招待成千上万的宾客,布施各种各样的物品。仗着这些手段使居民保持心情愉快,并且还"制造"了罗马城的"舆论"。制造舆论的花费,再加上维持罗马城优良条件的花费,无疑是一笔巨款。我们已经说过,元老院的财政收入现在仅限于院辖行省的直接税,所以元老院是没有力量来支付这笔巨款的。如果元老院把整个事业完全交托给皇帝,皇帝们就欣然担承起这个责任。在这方面也和在执掌兵权方面一样,这乃是帝国早期的 *arcana imperii*〈皇家内务〉之一。

与国家收支集权于皇帝手中同时,皇帝们对于院辖行省的行政组织也加强了监视。从一开始起,皇帝们就在院辖行省——这些行省总督是由元老院指派的——中设置皇家财务使或皇帝私人代表来管理他们的私产。这些皇家财务使自始就是皇帝派到这些行省里来的"耳目"。他们不断向皇帝报告行省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因此皇帝能够在需要的情况下在元老院里提出政绩恶劣的问题;而元老院在舆论的压力下自然不愿意用自己的威权去包庇它的总督们。由于皇庄的增多以及由于间接税改归皇帝私人代表负责征收,驻在各行省中的皇帝私人代表的员额加多了,他们的员额愈多,皇帝对院辖行省的控制也就愈加有力。另一方面,皇帝们通过推荐候补人和定期复审议员名单的方式来干预元老院新议员的任命和旧议员的黜免,这种干预的范围愈大,皇帝们在选择议员去统治行省时的旨意愈有决定性。事实上,早自公元一世纪起,行省总督差不多已经完全由皇帝任命:对于皇帝所辖的行省直接任命,而对于院辖行省则间接任命。于是,皇家行政组织越来越变成了

一个官僚体制，从而出现了一个由皇家官吏组成的新社会阶级——其中大多数人是皇帝的奴隶和免奴——这样一个阶级在奥古斯都时代仅处于萌芽状态，而到了他的继承者们的时代，特别是在克劳迪亚斯统治时期，在人数上和势力上都迅速增长了。

皇帝们使帝国都会化的工作，也就是说使东方和西方的罗马行省都会化的工作，亦复同样重要。关于帝国市政组织方面已经有人写了许多书籍，但其中没有一本谈到这个都会化运动的问题，所谓都会化运动就是指原先的部落、村庄、祠庙等发展成为新型都市而言。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份完备的表，具列各行省里的都市，按照它们正式成为都市的年代次序排列。无疑地，我们在其中就会看出每一个行省里都有许多都市是在内战结束以后才开始出现都会生活的。其中大多数是奥古斯都时代的产物，有一些是他的继承者们所增加的，特别是在克劳迪亚斯时代，克劳迪亚斯在这方面也和在发展皇家官僚体制方面一样地终始很积极。譬如，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这就是明证。他把阿瑙尼部落并入特里登土姆自治市，又把 *ius Latii*〈拉丁人特权〉赐给佩尼纳谷中的鄂克托杜鲁斯城民和岑特罗芮斯人。这就等于使他们过都会生活——他们的都会生活中心就是瓦兰休姆—克劳迪亚斯镇和岑特罗努姆—克劳迪亚斯镇。这些都和这位皇帝致力使罗马帝国各个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都会化的工作完全配合的。本着同一精神，克劳迪亚斯在一次地方战争结束后把毛里塔尼亚地方一部分土著部落拨归毛里塔尼亚的沃卢比利斯，使他们以 *incolae*〈客户〉资格附籍于该城。他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奖赏沃卢比利斯城对罗马国事的忠诚，而且还为了在居民仍保持若干部落生活方式的乡

村里建立起罗马城堡。毫无疑问,各行省之都会化始于奥古斯都,而在克劳迪亚斯统治时代有迅速的进展。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下面研讨罗马帝国城市和乡村的一般问题时就会谈到它。

谈到了在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统治下帝国都会化运动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运动一方面是行省中一种自然发展过程,而另一方面又是皇帝们一种有意识的政策。它之所以是行省的自然发展过程,因为与城市组织有关的高级文明生活吸引了行省居民;它之所以是皇帝们有意识的政策,因为他们力求推进这一过程,并使它成为自上而下的运动,以便扩大他们的权力基础。要知道,皇帝们的权力所依靠的是帝国中的文明分子,是城市居民。最简便的途径就是顺着"社会"战争所走过的道路前进,差不多所有的革命领袖,像苏拉、庞培,尤其是恺撒等人都曾经走过这条道路;再就是把罗马公民资格赐给帝国里所有过着都会生活的人们。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奥古斯都之获得胜利主要由于意大利的罗马公民的支持,而这一部分公民对于他们的特权和他们在罗马全国中所占的优势是非常吝惜的。因此之故,奥古斯都和提贝里攸斯两人每当把公民资格许赐给外省人的时候都很犹豫、很审慎;因此之故,克劳迪亚斯才会遇到强烈的反对,使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奥古斯都的传统而比较审慎地把罗马公民资格这种特权赐给外省人,这大概是违背他的初衷的。元首政体是罗马公民创造出来的,他们现在又一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所推举出来的人,终于使元首政体中所不可避免的政治平等化过程尽可能地减慢速度。

至于在鼓励发展帝国国内都市生活方面，皇帝可以自由得多，因为这个政策没有遭到上层社会或一般罗马公民的反对。奥古斯都，甚至提贝里攸斯，而尤其是克劳迪亚斯，之所以非常愿意建置新都市，其原因就在于此。因为缺乏大批新的罗马公民，所以，他们促使都市居民的数量源源不断地增加。他们都意识到，那些都市居民只要一旦沾染上文明生活，就会积极支持一种显然能使他们享有大好良机的制度。我们必须记住，除了罗马公民而外，广大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外省的资产阶级也曾支持过奥古斯都，并且也愿意支持他的继承者，只要这些继承者能保证他们享受和平与秩序，能保证他们在外省乡村居民群众中享有特权地位。但是，就目前而言，那些既非罗马屯市又非拉丁屯市的城市还不得不满足于二等公民资格，即“友邦”或附庸城的地位；不过，不久就到了弗拉维攸斯朝，到那时候就对帝国内的古老城市和新城市采取更加一视同仁的政策了。

这个运动的后果，使罗马帝国的结构愈来愈像希腊化君主国了。但其间还存在许多根本的差别。罗马皇帝的权力也像希腊化君主的权力一样建立在军队上面。但是，罗马皇帝却不是一个外国人，他的权力并不依靠外国人和雇佣军人的支持。他是一个罗马人，是帝国统治民族中的一员，是罗马公民中的第一位公民。他的军队是一支罗马公民的军队，它不是为皇帝个人服务，而是为罗马国家和罗马神祇服务的。皇帝本人固然就是一位神，但是，对他的顶礼膜拜并不像对希腊化君主那样地具有个人崇拜的性质。他只有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也只因为他在统治着国家，他才是一位神。国家的神圣庄严具体体现在他个人身上。在他死后，他可以

被列入天上诸神之列,但同样也可以不被列进去;这完全取决于他是怎样统治这个国家的。

奥古斯都家族的统治,即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的统治,随着芮罗的自杀而告终,这是由一次军事革命引起的,其结果造成一场延及一年左右的内战,这一年就称为"四帝争立之年"。使罗马国运遭到这样一次新危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提贝里攸斯、卡利古拉、克劳迪亚斯和芮罗的权力实际上都建筑在罗马军队上面。由于环境的关系,在推举一位新皇帝的时候,决定之权并不属于整个军队而仅属于禁卫军,因为禁卫军驻扎在罗马城和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凡是禁卫军推举出来的人选,外省军队一般都毫无异议地予以承认。然而,这种惯例逐渐蜕变为一种禁卫军的独裁形式。谁愿意对他们的支持给予报酬,他们就支持谁。当这样一个事实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以后,在整个帝国中,特别是在驻扎在外省的军人当中就形成了一种对他们和他们所推举的人选表示嫉妒、猜疑和嫌恶的气氛。再者,奥古斯都朝最后几个皇帝忽略了他们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们几乎从来不到军队里去。他们变成了独自坐守罗马城的皇帝,意大利和外省绝大多数军士和普通住民几乎都不认识他们。还有,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征收钱币以供应私人的开支,以便于铺张浪费来保证自己长期获得罗马驻军和民众的欢心,因而必然加重了行省的负担;而同时他们却又不像奥古斯都和提贝里攸斯那样汲汲于监督他们的行省官吏和总督。最后一点,这些统治者的淫秽的私生活,他们的恐怖罪行,他们那玩世不恭的态度,与罗马人、特别是外省军队的军人心目中的第一公民和罗马国家元首全不相称。姑且不论别人,最突出的是芮罗,这个

杀害自己母亲和兄弟的人，这个艺人和御者[①]，这个从来不到军队里去而只在下等市民和希腊人中间消磨日子的皇帝，彻底摧毁了奥古斯都朝的威信。

因此，公元 69—70 年的革命性兵变是外省军队以及整个帝国国民对于奥古斯都继承者们堕落的武力专政的一种抗议。它一开始的时候是克勒特人反对芮罗统治的叛乱，但立刻就形成了西班牙和日耳曼尼亚驻军反对这个皇帝的兵变。西班牙军士宣布加尔巴为罗马皇帝。加尔巴起先得到军队和元老院的承认，不久以后，禁卫军把帝位出卖给芮罗的一个亲密的朋友鄂托而杀死了他。同时，日耳曼尼亚的选军宣布维特留斯为皇帝；他终于击败了鄂托和禁卫军。但是，他表现出毫无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且还不得不对付这个时候从东方发出的一道新的革命檄文。东方的军队推举韦斯帕西安为皇帝，他得到多瑙河区驻军的承认：一些军官用他的名义打垮了维特留斯。

我深知我对于公元 69 年的内战的这种看法和当今流行的看法不一致。凡是谈到四帝争立的这一年的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次流血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外省和外省军队方面的一种割据运动，他们认为这种运动表达了外省人的感情。我却看不出丝毫痕迹能设想罗马军队有割据主义的倾向。当然，高卢人曾借助这次革命来满足他们非常含糊的民族愿望，但罗马军队的第一个行动就正好和它首领的意愿相反，他们正好是去粉碎高卢的地方性叛乱。而

---

① 芮罗特别爱好希腊的竞技活动，自己经常参加表演，亲自驾马车参加赛车，所以称他为“艺人和御者”。——译者

且,罗马军队的主力依然是选军,而选军大部分是由原籍意大利的人组成的,他们大多数人甚至出生于意大利和在那里受教育。很难相信,这些人会轻易地忘本,很难相信他们会丧失作外省主人翁的感情,而想把外省的愿望强加给罗马国家。

如前所述,真实情况应当是这样,罗马军队对于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最后几个统治者所掌握的元首政体的形式表示不满。军士们表示只有他们才能操纵局势,他们毫无尽忠于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一族的义务。他们希望由元老院议员阶级中最优秀的罗马人来担任元首,来担任帝国的最高领袖和罗马军队的元帅。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大多数罗马公民的舆论完全一致。他们也和大多数罗马公民一样,并不想取消元首政体;而且,他们坚决努力反对分裂罗马帝国,例如起先有高卢的克勒特人而后有某些辅军(大多是来因河驻军中的日耳曼人)发动过分裂叛乱,都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这次运动本身是一次健康的反抗运动,它反对芮罗那种堕落的武力专政,反对他所倡导的那种东方暴君式的淫秽的私生活,反对他对于一切文武职责的玩忽,反对他公然同情于种种不合于罗马人习惯的事物——他在这方面虽然不是有意模仿卡利古拉,却真正步他之后尘。反对芮罗的斗争其所以逐渐转变为一次正式的内战,因为头领们怀有政治野心,而罗马军队各个部队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和竞争。

但是,这次内战受到压力而迅速结束了,我们可以设想,这是来自舆论的压力,特别是在意大利,那里是敌对双方的战场,又是大多数军士们的故乡。我们必须记住,军队中大多数人仍然是罗马人,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教育与意大利市民和农民所受的相同,他

们依然像在意大利一样地讲得一口好拉丁语，他们在意大利会遇到许多老退役军人，那些人身上有着奥古斯都军队的传统精神。关于内战在罗马军士以及在意大利一般人民中间所造成的厌战情绪，我们可以引用两段记载来说明一下。这两段文字都是引自史学家中一位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内战所作的绝妙的描写。塔西佗在他的《罗马史》(iii. 25)中写道："一个名叫尤留斯·曼苏韦土斯的西班牙人被征入伍，在扫荡军中当兵，家里丢下了一个小儿子。这孩子长大了，又被加尔巴征到第七军里当兵。他在战场上遇见了他的父亲，把他打倒在地。当他正要去劫夺这个垂死的人的时候，他们两人彼此认出来了。他伸出手臂抱住了这个遍身是血的躯体，满眼含泪、声音哽噎地哀求他的父亲灵魂安息，不要嫌恨他是一个弑父的人。他悲号道，我们偏偏干出这种事情来：一个兵不过只是内战大洋中的一滴水珠而已！他说着就把那尸体抬起来，挖一个坟墓，为他的父亲尽了最后的孝心。他身边的人都看到了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别人那里，一直传遍了全军，在全军里引起了惊叹、恐怖和反对这场残酷战争的诅咒。"塔西佗接着说："虽然如此，他们却并没有减低残杀和劫夺自己同胞、亲戚、兄弟的热心。"塔西佗这点说得很对，军士们尽管感到不满，却并没有停止打仗；但是，不满情绪无疑在增长，同时，从意大利公民同胞对待他们和他们的行为的态度上可以使他们想到自己对战争的责任，会使他们想到继续打下去是多么无聊。第二段记载也是塔西佗所写的。在一场对阵交锋和短期围攻以后，克雷莫纳城被韦斯帕西安一边的人攻下来了。接着出现了一片恐怖的景象——大抢大杀和奸淫一番。意大利对这件暴行的愤激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塔西佗写

道:“安东纽斯对这件惨案感到内疚,同时,他也明白公众的谴责越来越多,因此他就颁布一项公告,声称不得将克雷莫纳城民掳作战俘;说实话,这种战利品对于军士们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整个意大利已经约定了不购买这种奴隶。于是,军士们开始屠杀他们的俘虏,当这件事被传出去以后,他们的亲戚就偷偷地把他们赎出来。”(《罗马史》iii. 34)

那么,显而易见,公元 69—70 年的内战本质上是一次政治运动。然而,它被另外一些动机弄得错综复杂起来了,以至于它严重地威胁了帝国的前途。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洗劫克雷莫纳的惨剧,无论胜败双方军士之在意大利和在罗马城大肆屠杀富人,这一切都说明了即使在选军军士中(辅军更用不着说了)对意大利统治阶级及其支持者,就是那些代表意大利城市居民、特别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禁卫军,怀着滋长的仇恨心。我们不要忘记,韦斯帕西安在内战结束后首要措施之一就是逐渐减少由意大利(包括意大利北部)征集的选军的人数。在意大利招兵的事虽然一直没有完全停止,就是到阿德里安时期也还在意大利招兵;但是,弗拉维攸斯氏和图拉真时代的罗马选军就已经不再代表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了:因为大多数军士虽然还是罗马公民,却是罗马化的行省里的公民。这是因为意大利在韦斯帕西安争位的斗争中没有支持他而许给意大利的一种特权吗?这是因为认识到意大利无力为选军供应足够人数的军士吗?我的意思觉得,这原因还得在别的方面去寻找。

我们已经知道,罗马选军通常不是强征来的,而是招募来的。韦斯帕西安的前人已宁愿在意大利北部招兵,而不愿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招兵。韦斯帕西安一反惯例,他不让意大利的投军者进

入选军，而只许他们进入禁卫营，这个事实说明他的措施并不是赐给意大利一种特权。怎么样解释这个事实呢？我的看法是这样，韦斯帕西安必定透彻地了解内战的历史和起因，因而对意大利投军者的抱负和政治态度感到害怕。他必然希望选军中不再有出生于意大利的军士，因为这些军士是从居民中招来的一些桀骜难驯、心怀不满和穷凶极恶之徒，也就是意大利城市和乡村里的无产者。值得担心的是，军队可能又变成共和国晚期那种由罗马城无产者组成的军队，而再回到内战时代。看来，大概意大利的良家子弟都在禁卫营里服役，从而能够保证自己获得较高的军职，所以只有那些穷苦的意大利人才到选军里去服役。当韦斯帕西安裁减意大利投军者的员额时，对于军官团体和禁卫军的组织却仍然保持原状，而只大力使选军变成外省人的军队。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我这个看法完全符合韦斯帕西安在整个西方各行省中的活动。从罗马化的外省城市招来的兵士不代表无产者，而代表居民中的上层阶级。

但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意大利存在着相当多的无产者这一点，应如何解释呢？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在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朝的皇帝们的统治下帝国经济发展使意大利生活产生的变化。

要把奥古斯都时代的一般经济情况和尤留斯、克劳迪亚斯二氏统治时期特殊的经济情况作一比较，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想在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朝和弗拉维攸斯氏朝之间划下一条分界线则更加困难了。但是，把这些区别弄清楚还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罗马帝国经济生活的演变。我们应当想到，自从奥古

斯都之死到韦斯帕西安即位,已经经历了半世纪有余,半个世纪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像公元一世纪这样变故很多、事物日新的年代。研究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时代经济情况之所以感到困难,是由于我们的史料的性质和证据的贫乏造成的。史家们对于帝国的经济生活不感兴趣。比较有价值的材料都见之于第二种史料来源——伦理学家的著作和科学著作:对于伦理学家而言,一世纪时的经济情况为他们同时代人道德的败坏提供了很好的说明,而对于写科学著作的作家而言,他们或者直接涉及经济问题,或者在讨论各种科学问题时不得不提到经济现象。因此,塔西佗、苏韦托纽斯和迪约·卡休斯关于公元 14 年至 70 年之间的帝国经济情况虽然报导得很少,但我们可以从两位塞芮卡、佩尔休斯,甚至像卢坎等作家那里找到补充材料,而其中最重要的作家,一是佩特罗纽斯,二是老普利尼和科卢梅拉。但遗憾的是,除了对佩特罗纽斯和科卢梅拉的材料而外,对于其他这类材料,还没有一个人尽力收集过和解释过。研究这段时期经济史的人仔细地研究金石考古资料,特别是蓬佩伊出土的材料,也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在这本简短的书中,不可能作这样一番全面的研究。我只好仅仅把我反复阅读上述一切材料以后所得的印象写出来。

乍看起来,奥古斯都时期的经济情况和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时期的经济情况似乎并没有差异。在描写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时期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杂乱使用材料,不仅引用弗拉维攸斯时期的拉丁作家和希腊作家,而且还一方面引用维吉尔、贺拉西、提布卢斯、普罗佩尔丘斯和奥维德,另一方面又引用佩尔休斯、佩特罗纽斯、塞芮卡、普利尼和科卢梅拉。主要的现象的确依然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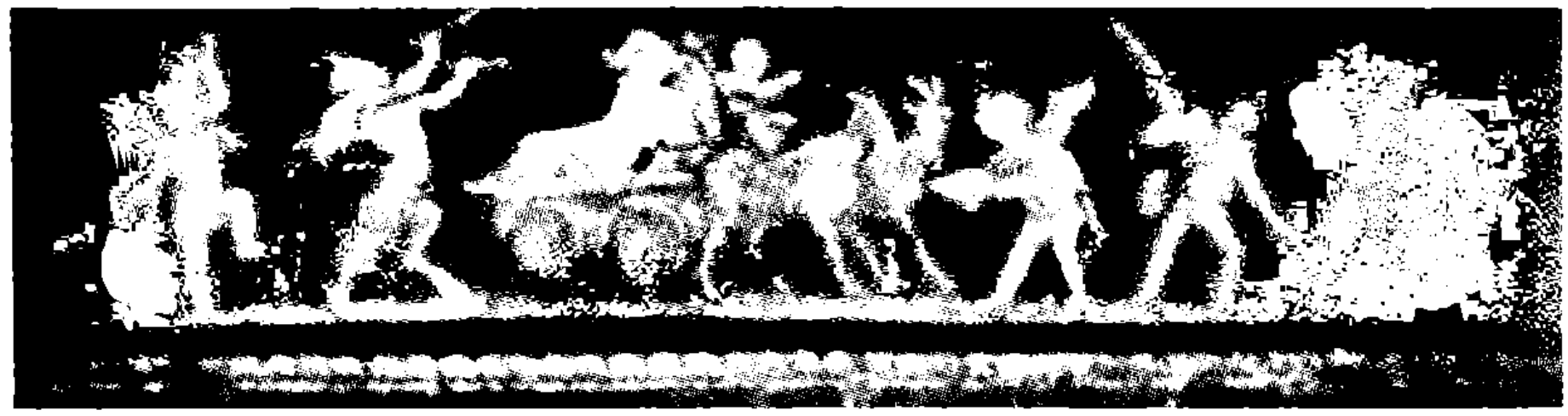
故。差别在于它们的发展程度和某些新因素的出现。这段时期的皇帝们对待经济生活的态度，他们的经济政策，或者说他们之没有经济政策，仍和奥古斯都时期一模一样。流行的是一种自由放任政策。在灾难严重的时期，国家感到有责任拯救灾民，如提贝里攸斯时候小亚细亚大地震以后的例子一样。某些措施可能对一般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例如，改进税收办法、增加新税、有关运输情况的措施等等。但是，采取诸如此类的措施往往是单纯从财政着眼的；其目的在于改善国家的财政，而不在于改善或调整经济情况。经济发展的进行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国家方面的干扰。它的主要特征和奥古斯都时期的特征相同，但由于自然力量的自由发展，这些特征比原先显著得多。

这些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外省经济生活的逐渐复兴。在东方，这种复兴气象非常显目。即使我们草草地阅读一下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碑铭以及埃及的苇纸卷，泛泛地看一看这些地区的古城遗迹，我们也能看出东方经济发展进度在奥古斯都时期是多么迅速，而在他的继承者们的时期更是加速进行。西方各省，特别是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也恢复了它们的经济活力，那是过去首先在被征服时而后又在内战期间停滞下来的。恢复经济活力的标识之一就是都市生活的勃兴，这固然受到皇帝们的鼓励，但主要还是依靠这些地区的自然发展。至少在西班牙和阿非利加，都会化运动是早在罗马人来到以前很久即已开始的一个演变过程的继续。西班牙和希腊、罗马一样，早先经常是一个城市很多的地区。至于阿非利加的都会化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早已由迦太基人和由迦太基统治下以及努米底亚国王、毛里塔尼亚国王统治下的土

著居民推行了。

从经济观点来看,都会化运动意味着一个城市资产阶级的形成,这是一个地主、商人和经营工业者组成的阶级,他们寓居在都市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积极发展实业。因此,都会化运动也就意味着一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传入西班牙和高卢的部分地区,和再一次传入阿非利加,这种经营方式与意大利和东方所盛行的方式很类似。在农业方面,这个运动的内容就是从农民经济转变为地主经济,这些地主们是按资本主义方式、按科学方法来经营他们的田产的。它的内容还包括一种改变作物的趋势,那就是以栽培利润更大的作物、特别是葡萄和橄榄树来代替种植谷物。就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大部分地区以及高卢的希腊城市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地区本身原来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不过由于公元前二世纪时大地主们的自私政策和后来公元前一世纪时的内战,使它们的发展受到阻滞。到了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葡萄和橄榄树的种植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葡萄种植业盛行于高卢,橄榄树种植业首先盛行于西班牙,而后盛行于阿非利加。意大利人之迁居于西部各省,加速了这个过程,关于迁居问题,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属于同一类型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工业逐渐转移到了外省。高卢从最早起就表现出在发展工业方面得天独厚。在罗马统治之下,高卢继续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并且立刻就在制造雕花陶瓶和金属器皿之类最富于意大利特色的物品方面成了意大利的劲敌。法兰西水道之纵横,高卢与不列颠、日耳曼尼亚之间早就存在的交通往来,都是有利于高卢工业迅速发展的条件,我们在高卢南部格罗



1. 酒神巴库斯和阿丽雅德芮女神

2. 收获葡萄

3. 葡萄酒商

4. 卖花人

图 14　韦丘斯氏宅中的图画，蓬佩伊

图 14 说 明

1—4. 蓬佩伊地方韦丘斯氏住宅中暗室板壁下部支板上的四幅图画。蓬佩伊,韦丘斯氏住宅。A. 马乌:《蓬佩伊的生活和艺术》(德文),第二版(1908 年),第 350 页起;同作者,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11,1896 年,第 1 页起;A. 索格利亚诺所撰文,载《王家山猫学院珍藏古物集刊》(意大利文)8,1898 年,第 233 页起;拙撰,载《圣彼得堡考古学会论文集》,1899 年(俄文);P. 赫尔曼:《古代理想画的画匠》(德文)(布鲁克曼,明亨,1904—1931 年),第 29 页起,图 XX 起。

1. 酒神巴库斯和阿丽雅德芮女神的凯旋行列,前行者和后随者为一些男精灵库皮德和女精灵西采等,还有一位牧神帕恩。

2. 收获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图左画的是几个男精灵库皮德在爬上树的葡萄藤上采摘葡萄,图右(此处仅复制其一部分)的一些男精灵库皮德利用很长的杠杆在转动葡萄压榨器上的绞盘。(最近,在《米斯特里庄》(意大利文)一书中由 L. 雅科诺复原了一个压榨器的全貌:请看 A. 马攸里:《米斯特里庄》(意大利文)(1931 年),第 89 页起。)参看 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85 页,3。

3. 葡萄酒商。在一间存放着大批酒坛的小屋里,一个乡下佬来买葡萄酒,他左手拿着一根杆儿,正要尝尝卖主递给他的样品。卖主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城里人,他的奴隶们正替他向另外一个杯子里倒上另一种葡萄酒的样品。

4. 卖花人。花是从花园里摘来的,由一头山羊驮着。那些男精灵库皮德正在做花圈。花圈放在一个专用的架子上出售,有一位漂亮的妇人来买花,她正从那架上取下一串花圈。一个库皮德向她翘起两个指头说价钱(表示两个 *asses*〈阿斯,罗马铜币单位。——译者〉)。参看 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86 页,8;第 92 页,1 和 2。

这房间中的装饰以卖酒和卖花作为景物中的主要部分,显见得房主韦丘斯氏在蓬佩伊附近拥有许多庄田,而且他们是卖酒和卖花行业中的大商人。我认为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我尚未读过 M. 德拉·科尔特关于韦丘斯氏住

宅的精辟论文以前早就具有上面的想法，他的论文《蓬佩伊的住宅及其居住者》载于《那波利斯》(意大利文)，2，1915 年，第 311 页起。德拉·科尔特指出韦丘斯氏在蓬佩伊和斯塔别两市的市郊内拥有许多经营葡萄酒的农庄，他们家在葡萄酒业界的买卖很大，很占势力。他们的商品有着各种不同的商标，在他们的住宅中所发现的大量酒坛上的题识提到了这些商标。我们举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条题识如下：(1)“XV Kal(endas)Ian(uarias)de Arriano dol. XV”(“12 月 18 日，来自阿里亚努斯庄，第 15 瓮”)，《拉丁文碑铭集录》iv. 5572；(2)“Idibus Ian(uariis)de Asiniano racemat(o)dol. I”(“正月 13 日，来自阿西尼亚努斯庄的蒲桃酒，第 1 瓮”)，《拉丁文碑铭集录》iv. 5573；(3)“Idibus... de Formiano dolio XXV”(“……13 日《或 15 日》，来自福尔米亚努斯庄，第 25 瓮”)，《拉丁文碑铭集录》iv. 5577 。我同意马乌的看法，这些瓮里的葡萄酒是从韦丘斯氏兄弟的各个农庄运来的，各个农庄栽种着品种不同的葡萄，每一种葡萄酒都分别标上瓮号。我们的题识中所提到的盛酒的 *diffusio* 〈瓮〉，见于英斯—布朗德耳府中的浅浮雕图，本书图 33-2。同时我们指出，这所住宅的 *vestibulum* 〈前院〉里的常见画图中画着一个显著的徽识(即园圃神普里雅普斯拿着钱袋和水果的图样)，住宅的装饰图画中到处见到男女精灵库皮德和西采等摘花的图样。蓬佩伊的许多其他住宅中也见到这类的标识，例如属于 L. 科尔芮留斯·普里莫杰芮斯的梅拉杰尔的住宅中有一幅著名的图画，画的是稷母神策蕾斯或德梅特尔坐在那里，财神梅尔库里攸斯把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放在她的膝上(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那波利斯》(意大利文)，2，1915 年，第 189 页)。据我想，这所住宅的主人韦丘斯氏就是贵族韦丘斯氏家中的免奴。

弗桑克地方考古发现的遗物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克勒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市场上开始看不到意大利的制造品了。

商业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新颖的、意想不到的气象，尤以东方为甚。我们已经知道，与阿拉伯和印度之间几乎专门交易奢侈品的贸易如何在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时代商业关系中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埃留斯·加卢斯的远征是怎样一部分由

于需要保护这种日益兴旺的贸易而促成的。经过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时代,这种贸易稳定地向前发展。印度贸易和中亚贸易的主要商道是从印度起,或直接地、或通过阿拉伯到达埃及,而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其总站。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佩特腊是北阿拉伯的大商业中心。在希腊化时代早期,印度和阿拉伯的商品从佩特腊通过勒乌克—科梅、艾拉或加扎到达埃及,当叙利亚和腓尼基落入条支王朝之手的时候,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们企图把阿拉伯商业转引向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各个港口,因而排挤了他们的埃及对手。从这个目的出发,他们特别施惠于希腊化时代早期在外约旦建立的旧军屯市,尤其重视安莫尼特人地区(拉巴特—安蒙)的费拉德尔非亚,杰腊萨境内的安蒂奥克、贝雷尼切、加达腊和迪雍等军屯市,企图把它们变成正规化的沙漠商队城市,使它们保障沙漠商队从佩特腊取道来到大马士革和叙利亚的港口。条支王朝始终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佩特腊仍然效忠于托勒密王朝。随着罗马宗主权的开始建立,情形大变。外约旦的希腊城市早先大部分被有宗教狂热的亚历山大·延芮乌斯(公元前 102—前 76 年)所摧毁,后来得到庞培的保护才开始恢复起来,不过直到公元一世纪末尾以前,它们并没有真能兴旺如故。帝国所建立的和平安定局面,使它们能够长期把佩特腊贸易的相当多一部分引向叙利亚和腓尼基诸港来,而同时并没有严重地损害亚历山大里亚的地位。

印度和中亚的贸易从远古以来走的是另一条路,那就是取道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到了希腊化时代末,先有安息人和条支王国之间的敌对,后有安息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敌对,再

加上幼发拉底河沿岸到处骚乱不宁，以致把这条避免通过沙漠到佩特腊而改由波斯和波斯湾转运的老路废弃了。到公元一世纪中，罗马人和安息人之间建立了一种 *modus vivendi*〈共存状态〉，情形就改变了。通过幼发拉底河谷的道路又重新开放了。阿瓦梅部落所居住的小村帕耳米腊，因为是幼发拉底河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中途站，同时又紧靠着沙漠里的一口新泉水，所以就大享地位之利。于是帕耳米腊就能（当然是在罗马人和安息人的协助与保障之下）把附近沙漠里的部落联合起来，为从塞琉契亚—切西丰来的沙漠商队的安全创造了条件（因为再往北走，即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缺少这种安全的保障）。当斯特腊博写他的材料时，帕耳米腊事实上还不存在；但到了奥古斯都和提贝里攸斯之时，它已经建立了一些叙利亚最美丽的神庙，并且在安息人和罗马人双重保护之下变成了一个宏大、富足的沙漠商队城市，有着漂亮的街道、广场和一些吸引人的公共建筑物。

尽管如此，东方商业范围是非常大的，所以虽然开辟佩特腊—外约旦—大马士革的商道和重新开放帕耳米腊的商道，并无损于亚历山大里亚。从埃及到阿拉伯、从阿拉伯到印度这一条线上的海上贸易仍然和古代一样重要。在多米戚安时期，一个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写了一本有趣的手册，名叫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埃里特雷海航程录》），其中描叙了通印度的海上贸易发展之迅速，关于这方面，老普利尼也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在印度发现大量罗马钱币使我们能证实文献材料的论述。看来，一直到克劳迪亚斯和芮罗时期为止，这边的商业都集中在阿拉伯诸港。阿拉伯商人成了埃及商贾和印度商贾之间的中介人。如前所述，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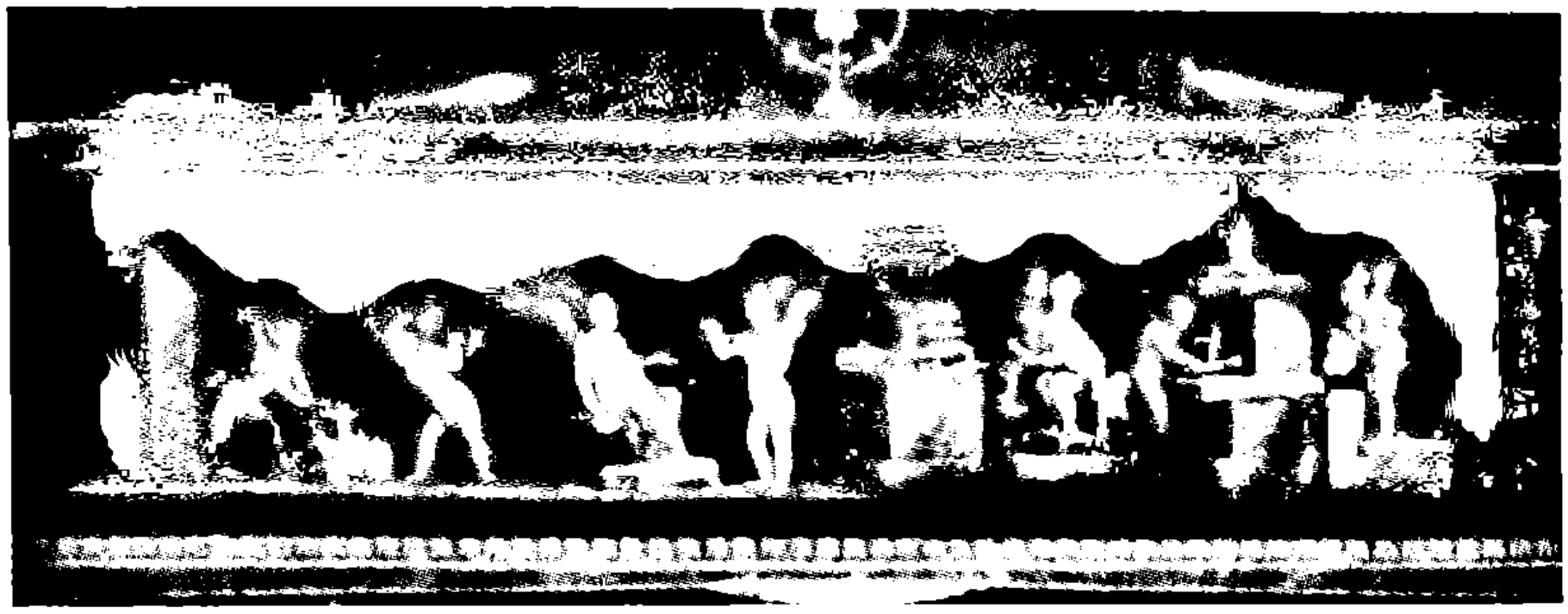
商业大多以交易奢侈品为主。罗马人通常用金银来换取这些奢侈品。这种方式的交易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主要通过中介人来进行的贸易。

这种贸易发展下去的自然趋势使它超出了仅仅是奢侈品贸易的范围,也使它不再只是单方面的被动的贸易。同时,在托勒密王朝末年或罗马时期初年,亚历山大里亚的伊帕卢斯发现了季候风。由于这两个原因,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终于开辟了直接的航线。这时贸易的主要中心是亚历山大里亚。阿拉伯诸港丧失了它们的重要性;其中有些港口(如阿达纳,也许还有索科特腊)已被罗马人占据,用作水手们的供水站和避难处。它们也像克里米亚的水陆两路的商栈一样,用以保护商人们免受海盗的掳劫。这一改进要归功于帝国时期埃及商人们的努力,他们得到罗马政府(最先在奥古斯都时期,后来在克劳迪亚斯和芮罗时期)的积极帮助。这条新商道是在写那部 *Periplus* 〈航程录〉的时候全部通航的,也就是在多米戚安时期全部通航的。和印度的贸易渐渐发展成为埃及与阿拉伯、印度之间的各种各样货物的正常贸易。从印度来的最重要的货物中,有一宗是棉花;还有一宗大概是丝。这两宗产品都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工厂里加工——相当晚出的书 *Expositio totius mundi et gentium* 〈万国通志〉第 22 节似乎表示丝主要是在腓尼基诸城市里加工——再送出去换玻璃、金属器皿,可能还交换亚麻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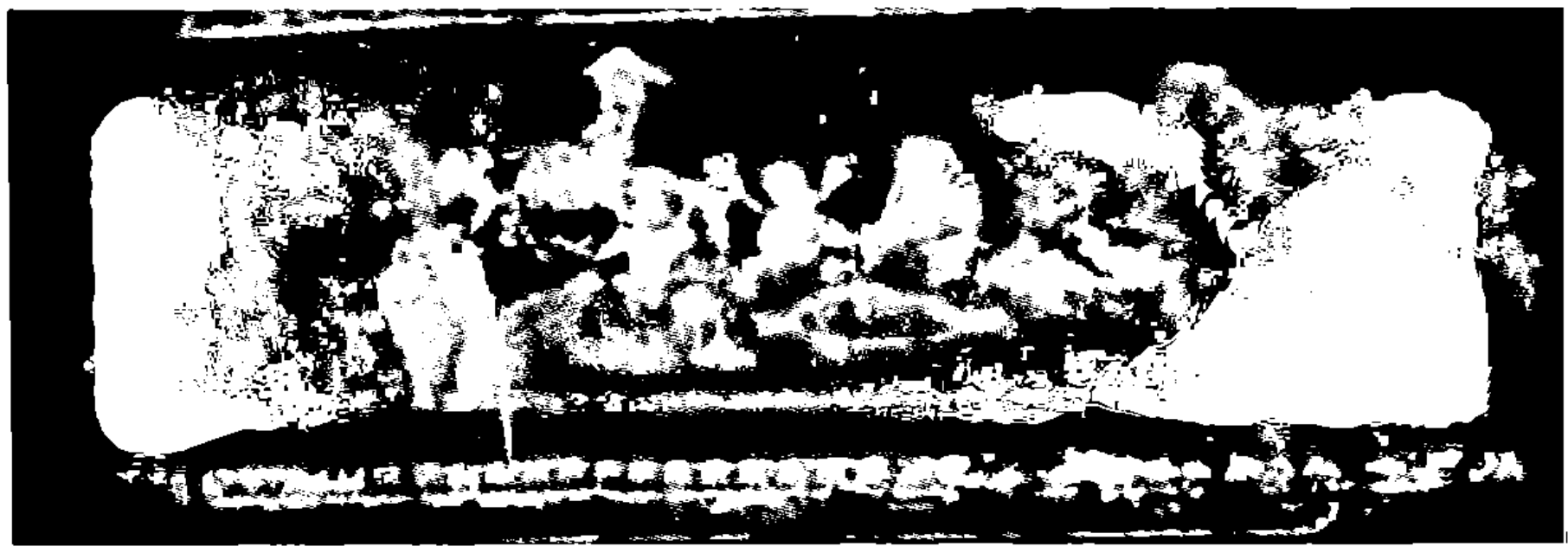
罗马对北方的贸易也有很大的进展。我们从零散的文献资料和在德意志东部、斯堪的纳维亚(瑞典和挪威)以及俄罗斯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中得知,在克劳迪亚斯和芮罗时期,罗马商人实际上同德意志东部、挪威和瑞典维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往来。他们到丹麦、

1.香膏业

2. 浆洗业



3. 首饰行



4. 灶姑节

图 15　韦丘斯氏宅中的图画，蓬佩伊

图 15 说 明

1—4. 韦丘斯氏住宅中暗室板壁下部支板上的四幅图画。蓬佩伊,韦丘斯氏住宅。参考图 14。

1. 香水或香膏的制造者和贩卖者(*UNGUENTARII*)。一种特别商标的上等橄榄油是用一种特型榨油器(见图右)榨出来的。榨出以后将油熬沸。在沸油里渗入特制的香料(大概是花精)。再往左就是掌柜的柜台了。掌柜的身旁有一个橱柜,柜里放着大小形式各不相同的许多瓶子,瓶内储有各种不同的香料(?)。图中其余的部分画的是把这种香膏卖给一个妇人,那妇人带着她的婢女进店来了。请看 M. 马乌所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15,1900 年,第 301 页起;参阅 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86 页,4;第 91 页,2。

2. 浆洗行(*FULLONES*)。在大槽里踩衣服,刷洗毛料衣服,点查衣服和折叠已经洗好的上衣。

3. 金匠(*AURIFICES*)。图的右端是一个大熔炉。熔炉后面,一个男精灵库皮德正在专心专意地錾一个金属做的大碗,大概是一个青铜碗,准备拿去镶银的。(曾经在一家 *negotiator aerarius*(铜货商)的铺子里发现过一个镶银的青铜碗,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印度-希腊-意大利学评论》(意大利文),6,1922 年,第 104 页。)另一个男精灵库皮德拿着一根吹火筒在看管熔炉,同时还拿着一把火钳夹住一块金属物在熔炼。第三个男精灵库皮德正在把一小块金属片放在砧上锤打。他的旁边是一副柜台,柜台上三个打开的抽屉,还有大小天平各一架。一位女顾客和店主在商谈一件首饰的分量。在他们的另一边,另有两个男精灵库皮德把一大块金属物放在砧上锤打。毫无疑问,这幅图画的是首饰生意的情景(A. 布朗歇:《法兰西古钱学会上的口头报告》(法文)1899 年,第 xvi 页起和第 xlviii 页起;参看《古钱研究》(法文)2,1901 年,第 195 页起和第 224 页起;A. 马乌所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16,1901 年,第 109 页起)。奇怪的是,有许多著名学者竟会对这个看法有争议,认为画的不是一家首饰行,而是一个造币局(《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22,1907 年,第 198 页起;《古钱学年

鉴》(英文)1922 年,第 28 页起;P. 赫尔曼:《古代理想画的画匠》(德文),第 37 页)。一位女顾客到造币局去做什么呢? 我认为,有种种理由相信在蓬佩伊发现的某些银器就是在本地店铺里制造出来的,例如该市一所大房宅的主人累留斯·埃拉斯土斯的店铺之类就是这种店(《拉丁文碑铭集录》x. 8071·10,11,和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那波利斯》(意大利文),2,1915 年,第 184 页)。参考最近在蓬佩伊发现的皮纳里攸斯·策里亚利斯的店铺,这人是一个 *caelator*〈雕匠〉,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印度-希腊-意大利学评论》(意大利文),8,1924 年,第 121 页。

4. 灶姑节的宴会。餐桌上是一些男精灵库皮德和女精灵西采。后面可以看到灶姑维斯妲的神驴。参加宴会的人是一些面包师(*pistores*)吗? 参看另一幅主题相同的壁画,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88 页,3。

这所华丽的住宅的主人韦丘斯氏之所以选择这些专门行业画在住宅内最讲究的房间里,很可能(如前所述)是因为他们同这些行业有切身的利益关系;同时也由于这些行业实际上是整个康帕尼亚的主要行业。同样看得很清楚,这些有钱的蓬佩伊人画出这些朴实的行业——稍为带一点浪漫风格(如用精灵库皮德等来代替真人)——是为了夸耀于他们的朋友,他们有钱有势就是靠这些行业挣来的。城市资产阶级并不以他们的职业寒贱为羞:例如,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特里马尔基约在谈话中、在装饰自己住宅的图画中和在他的墓碑上都毫不隐讳地吐露他一生的事迹;还有另一个蓬佩伊富商法比攸斯·欧波尔算是特里马尔基约的前辈,他也在一张选举名单上傲然自得地在自己的名字下添注"princeps libertinorum"〈"免奴中第一人"〉(《拉丁文碑铭集录》iv. 117),这些都是明证。

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德意志东部去的最古老的路线是从高卢北部的海港由海道往东。就在这个时候前后,罗马的货物开始从多瑙河口、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取道第聂伯河而运往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同时,第聂伯河流域逐渐为日耳曼人所占据。但最安全的道路是从阿魁累亚经过卡尔嫩土姆和马罗博杜乌斯王国而到达德意志东部,再从那里前往斯堪的纳维亚。这方面贸易

的主要商品是青铜和玻璃,这两者无疑都是康帕尼亚的产品。

意大利并非一开始就感觉到外省这种缓慢的经济解放运动的后果。和以往一样,意大利的地主们仍然在他们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庄上生产大量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和以往一样,康帕尼亚和意大利北部的作坊仍然活跃非凡。但是,却开始显出了一种隐忧。科卢梅拉和普利尼仍然鼓吹尽可能大规模地种植葡萄。然而,他们都感到有必要来刺激一下意大利地主们的活力,因为这些地主们并不太愿意投下资本来维持现有的葡萄园和开辟新的葡萄园。普利尼说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谈到意大利某些以生产葡萄酒为业的人的惊人成就。但是,地主们并不热情地听从他的这些劝告。他们宁愿把土地租给佃户,因此逐渐恢复农民经营的农业和恢复谷物的生产。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趋势呢?一般的看法均认为他们不想亲自经营自己的农庄。说他们懒惰成性、游手好闲。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主要的缘由。我也不能相信劳动力的缺少是科学化的农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奴隶劳动力还是很充足的。在家务、作坊、商业、银行业和帝国行政机构等方面都使用着大群的奴隶。在农业方面当然也不缺少奴隶。如果说,从向来运出奴隶的地区运进奴隶已愈来愈困难,那么,鼓励奴隶结婚和生育子女的办法却愈来愈普遍了。

真正的原因是由于西方行省经济的发展促使市场情况每况愈下,虽然普利尼和科卢梅拉忽略了这一原因,但地主们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意大利中部和康帕尼亚是主要的受难者。就意大利北部而言,多瑙河流域的市场还在向它开着门,并且还越来越重要了,所以意大利北部对情况改观的感受不如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之深。

葡萄酒的生产过剩开始日益成为问题，这正是现代意大利，甚至法兰西所常见的一种现象。这种景象虽然还不算灾难，但已够严重。我们在第六章里将会看到，这些情况在多米戚安统治时期如何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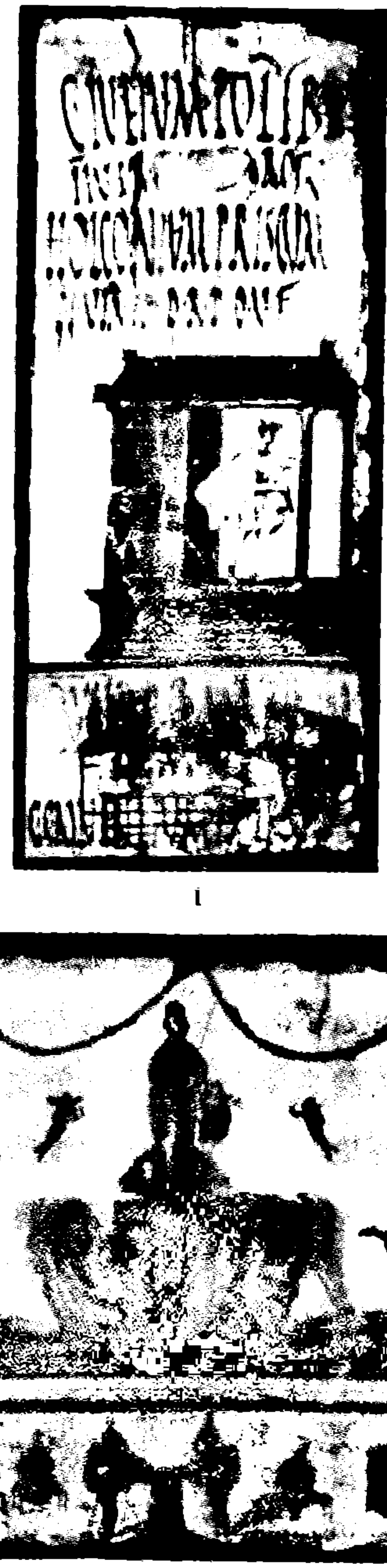
在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地产逐渐集中于少数富豪手中。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外省，土地都在集中，尤以阿非利加为甚。普利尼曾谈到在芮罗时代，有六个地主就占有阿非利加一半的领土，* 大家所熟悉的这段叙述或许有些夸大，但是，大地产为该行省土地情况的显著特征，仍然是事实。大地产的增长也是埃及的特色。当奥古斯都时期，特别是在克劳迪亚斯和芮罗时期，埃及出现了许多大 οὐσίαι〈产业〉。其中大多是皇帝们赐给他们所宠幸的妇女和男子的礼物。然而，我们绝不能夸大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也决不能把盛行于阿非利加和逐渐在埃及发展起来的情况普遍地推之于别地。阿非利加自远古以来就是大地产的乐土，是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富翁们经营的特种农场的所在地。埃及的大地产是皇帝们一手造成的，他们把大片土地赐给和卖给皇族中人以及他们的宠臣。我们简直没有听说过在高卢和西班牙也有类似的现象。而在意大利，这个过程似乎相当缓慢。但是，毫无疑问，在意大利，也是大地产越变越大，而且逐步兼并了中等规模的农庄和自耕农的小块田地。塞芮卡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他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即使不是克劳迪亚斯和芮罗时代意大利的首富，也是第一流富翁中的一个，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大业主。前文中所描述的那种农业

* 《博物志》，xviii. 35。

情况也是解释这种现象的理由。中等规模的田庄因市场不景气而逐渐亏损,自然很快地卖给了大资本家。这些大资本家当然设法简化他们产业的经营方式,同时,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一种租额虽低但却安全可靠的地租,所以就情愿把他们的土地租给佃农并以生产谷物为主了。

因此之故,意大利又渐渐变成了谷米之乡。这个结论和普通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有人问,意大利怎么会认为生产谷物比生产葡萄酒更为有利可图呢?外省廉价的谷物不是供应很方便吗?意大利有可能与它竞争吗?自从奥古斯都和提贝里攸斯进行改革以后,许多行省是否仍然以谷物作为贡赋,对于这一点,我深表怀疑。运入意大利、特别是输入罗马的谷物来自埃及和阿非利加两地的皇庄。这些谷物成为皇帝们的主要收入,他们用之于维持他们权力的必要开支上——发给军粮和赡养罗马城内的市井无赖。剩下的谷物,他们也像其他地主一样地卖掉。价格是受市场情况决定的,而这些情况都有利于卖谷者。罗马帝国内并没有谷物生产过剩的现象。在所有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东方,行政组织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就是负责居民必需的粮食供应的部门(εὐθηνία)。然而,在帝国的都市生活中,饥荒还是极常见的现象。皇帝们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奖励谷物生产和限制谷物买卖的自由,特别在埃及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生产谷物当然是有利可图的,大概比生产葡萄酒的利润更大,或至少比生产葡萄酒的利润要稳定些。

在意大利和外省大地产不断增多的同时,不少大地产很快集中到皇帝们的手中。皇帝们与元老院议员阶级贵族之间的激烈斗



1

2

图 16　蓬佩伊店铺招牌

图 16 说 明

1—2. 蓬佩伊市丰富路一家商店大门前壁柱上的两幅壁画(登录 IX,铭文 X,第 7 号)。M. 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12 年,第 176 页起,图 2 和 3,以及载《印度-希腊-意大利学评论》(意大利文),7,1923 年,第 110 页起(有参考资料目录)。

右边壁柱的上部分画着一所小小的神庙,修建在一个 *podium*〈台基〉上面,神庙有一间两楹的 *pronaos*〈前殿〉。庙的 *cella*〈神龛〉里露出财神梅尔库里攸斯的神像,衣装整齐:头戴 *petasos*〈远游帽〉,脚著带翼的靴子,身穿 *chiton*〈古希腊式披衫〉和 *chlamys*〈短氅〉,手拿 *caduceus*〈和平标〉和钱袋,看样子像是准备出门,大概要去拜访韦雷昆杜斯的店铺。在这所神庙底下那个方框子里画着一家适意的商店,店中央端坐一个妇人,她正在向一个顾客谈话,手里拿着两只彩色的拖鞋。顾客坐在一张漂亮的长靠椅上,正在和那妇人交谈。店主面前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摆满了店中所卖的货品——彩色的毯子或袍子,以及拖鞋——而店门前的街上放着一个木制的货台,用以晾干货物(《律令大全》43.10.1.4)。在这神庙和商店图形的顶上空白处涂满了选举人的招贴,而没有神庙和神的图画。

在左边壁柱的上部分,用鲜明的颜色画着蓬佩伊的保护女神维纳斯·蓬佩雅娜,她头戴一顶壁冠,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城隍娘娘一样。她的左右都有精灵库皮德在飞翔;她的儿子本身就是一个库皮德,他向她献上一面镜子。她乘坐一只小船,船由四匹阿非利加的大象拖着。她的右边,命运女神站在一个圆球上;她的左边,元神手执一 *patera*〈盘〉和 *cornucopiae*〈富饶角〉。这块地方的下部画着一个小工厂,看来那个妇人所卖的货物好像就是在这个工厂里制造出来的。图中央有四个工人正在烘焙羊毛,准备用以制毯。左边另外有两个工人,右边另外有一个工人,都坐在一条板凳的后面,姿势就和一般常见的鞋匠一样。在右角上,那位店主(他的名字韦雷昆杜斯就写在他的像下面,并且重描了一次,好像粗刻一样)洋洋得意地摊开一段已经织好的材料——一幅厚毯。这店铺的图画上面涂写着一条选举人的广告,其文字为:"Vettium Firmum aed(ilem)quactiliar(i)rog(ant)"〈"毯商们请投票选举韦丘

斯·菲尔木斯为市政官”)(《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12 年,第 188 页,第 29 号〔=R. 卡尼亚与 M. 贝涅:《一年来的碑铭学》(法文)1913 年,94〕)。在这块店铺招牌上涂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大概不会是外人,而只会是店主和店里的工人们自己。我们应当观察到,这条广告并没有侵犯那女神像所占的地方。这图表明韦雷昆杜斯是一个 *coactiliarius*〈毯商〉或 *lanarius coactiliarius*(《拉丁文碑铭集录》vi. 9494),一个毛毯制造商(参看《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12 年,第 136 页,第 2 号〔=R. 卡尼亚与 M. 贝涅:《一年来的碑铭学》(法文),1913 年,85〕)。他可能还做过裁缝;参看《拉丁文碑铭集录》iv. 3130:“M. Vecilius Verecundus vestiar(ius)”〈成衣匠 M. 韦契留斯·韦雷昆杜斯〉,还有一行粗刻,其文为“tunica lintea aur(ata)”〈金边亚麻下衣〉,这两条铭文都被德拉·科尔特引用过。关于一般店铺招牌的情况,可看 A. 马乌所撰文,载《鲍利-维索瓦-克罗耳古典文物学实用百科全书》(德文),ii,第 2558 栏起,还可参看库比切克所撰文,载《鲍利-维索瓦-克罗耳古典文物学实用百科全书》(德文),第二编 ii,第 2452 栏起,第 2565 栏起。本插图上的图画表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商业处在宗教的庇佑之下”。主要的神为财神梅尔库里攸斯;和他一道的还有蓬佩伊的保护女神,那就是神通广大无往不利的维纳斯·蓬佩雅娜,她保护该城市的商业贸易和保证它的繁荣,每一个市民都崇祀她和画上她的神像。她相当于女王,因此之故,在画中,她也像希腊化时代的国王和罗马皇帝们一样,排着凯旋的仪仗,驾着御用的坐骑大象。补充一点,在丰富路的另一处地方最近又发掘出本图所见的店铺以外的另一个毯商的店铺(德拉·科尔特所撰文,载《印度-希腊-意大利学评论》(意大利文),7,1923 年,第 113 页),还有一家 *infectores*〈染坊〉(同上引文,第 112 页)——可以同一家 *offectores*〈漂洗坊〉作一比较(德拉·科尔特所撰文,同前杂志,4,1920 年,第 117 页起)——以及许多 *fullonicae*〈浆洗店〉,其中有两家的门面很大(德拉·科尔特所撰文,同前杂志,7,1923 年,第 114 页和第 123 页)。

争在芮罗统治时期告一结束,其结果是最富有的和最悠久的元老院议员家族几乎被杀尽斩绝。残留下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家族,而且是那些势力最小的家族。许多家族的绝灭也由于贵族们不喜

欢成家和生儿育女。由于这两种因素的结果,使得大量产业或通过抄没、或通过承继落入皇帝们手中。凡是被判 *lèse-majesté*〈大逆不道〉的人的土地被没收以后,按法律上讲是归了国家,而实际上却归了皇帝所有,这是从内战时期流传下来的继承财产的办法。许多富裕的人,特别是那些鳏夫们,往往把他们的一大部分财产遗赠给皇帝,是为了使他们的私生子或选定的继承人能够保证得到剩下的小部分财产。这些情形,大家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毋庸多加论证。在抄没和继承过来的财产中,大多数是不动产。一所房子或一块土地不可能隐匿起来,而钱币就比较容易处置了。于是,皇帝们成了罗马帝国中最大的地主。这个现象不仅从政治观点看来很重要:它在经济史上也很重要。虽然大地产仍然是帝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的人员改变了。古老的巨室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皇帝们,还有一部分是皇帝的宠臣们,不过后者也相继不存在了。现在与皇帝并存的是些新兴的富裕地主,他们属于自治市权贵之列。皇帝位居这整个阶级之首。对于皇帝们来说,经管皇家地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怎样从这些大块的土地上得到可靠的租赋呢?他们怎样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留待后面再作讨论。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的时代是一个抄没和集中的时代,还不是一个进行组织的时代。

我已经一再地谈到了各行省,特别是东方各行省在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统治之下日益繁荣起来。虽说这段时期整个说来是一个一直上升的时期,但是也有某些迹象说明这个进展过程并非没有中断过。我们没有太多的确切材料;但如果我们把菲洛褒颂提贝里

攸斯时代罗马政权给埃及带来繁荣之词和同一作者描述卡利古拉与克劳迪亚斯时代的埃及简况*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提贝里攸斯的嗣君们的统治对埃及并无恩泽。在法尤姆地方发现的大量史料更加强了这种印象，从那些史料中我们知道有些一度繁盛过的村庄在芮罗时代荒废下来了，大概是由于财赋上的负担过重和灌溉系统失修的缘故。灌溉系统失修之咎，可能归因于大地产在埃及的增长，以及归因于罗马政府之牺牲农民和小地主来照顾罗马显贵。有名的 Ti. 尤留斯·亚历山大的敕令**提到他发现埃及情况不佳，大有革新的必要。虽然公元一世纪末期埃及的凋敝可能是一个例外情形，因为这是由于皇帝们把埃及视为一块私人的田庄和视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而加以强征暴敛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我却认为芮罗晚年胡乱的浪费还大大地促成了意大利局部凋残的现象。

这些情况如何使帝国社会面貌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罗马城的旧贵族阶级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人物：有些出自意大利自治市的权贵，有些出自多少罗马化了的外省，有些出自行险侥幸之徒和皇帝宠幸之辈。虽然统计数字可能不完备，但足可看出这个逐步发展的进程。无论意大利或外省，骑士阶级贵族的人数都在日益增多。大多数骑士住在意大利和外省；他们一部分人是家道小康的地主，一部分人是军官和皇帝所雇用的官吏。

---

* 菲洛，《加攸斯皇廷奉使录》自 8 以下，参看自 47 以下，自 141 以下（提贝里攸斯）；参看《致弗拉库斯》，5（军人的品行），150（地产的抄没），93（搜查武器）。

** 迪滕伯格尔：《东方希腊文碑铭选录》669〔＝▲埃维林·怀特—奥利佛，《伊比斯神庙》（1939 年），ii，自第 25 页以下，第 3—4 号〕。

意大利的日益繁荣、东方行省的复兴、西方行省以及东方某些行省的都会化运动,在整个罗马帝国里创造了一个势力强大、人数众多的城市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成了帝国的领导力量。其中年岁较大的人是城市议会的成员,是行政长官和祭司集团的成员。年岁较轻的一辈到军队和禁卫军中去充职,或任军官,或任军吏,或充兵卒。为了胜任军职,他们都先在他们所在的市俱乐部 *collegiaiuvenum*〈青年社〉里受严格的训练,这种组织以在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朝时期最有势力和组织得最好。皇帝们的权力的最后凭借,除了军队之外,还有这个资产阶级。

在这个自由民出身的资产阶级之外,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中成长起一个克勤克俭的阶级,这就是免奴阶级。不能过分高估他们在帝国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行政组织中,他们和皇家奴隶一道成为皇帝的辅佐者和代理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皇帝们仍然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罗马显贵的生活,他们也采取其他罗马贵族同样的方针来组织他们的"家业"(*domus*),那就是说,在他们的私人奴隶和免奴的帮助下经营它。他们的家业虽不像希腊化君主的家业一样等于国家,但事实上至少也和国家机构同样重要,或许还更重要一些,因此他们的奴隶和免奴——*Caesaris servi*〈皇家奴隶〉和 *liberti Augusti*〈皇家免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权贵阶级,其富裕可与自由民出身的元老院议员阶级、骑士阶级和自治市资产阶级相提并论,而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的权势当然也不会比他们低。

虽然如此,这些皇家奴隶和免奴在罗马世界的奴隶和免奴中究竟只占一小部分。奴隶是帝国经济生活中的栋梁,特别是在工商业界,在这方面,他们为各种各样的作坊主人供应了劳动力。固

然，这些店铺主人本身原先大多也是奴隶，他们顺利地取得或赎回自己的自由，并且还弄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自治市的免奴形成了自治市权贵阶级或财阀阶级的下层，正和皇家免奴形成皇家权贵阶级下层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有权势的阶级，所以，自治市的各种祀典中的 *magistri*〈掌教〉和 *ministri*〈司役〉的组织（后者有时甚至是奴隶），尤其是崇祀皇帝的 *Augustales*〈祭皇典董事〉的组织，使他们在自治市的社会活动中占一席之地。他们的义务是捐献钱财以维持祀典，而其报酬是给予他们以“祭皇典董事”的头衔和市政活动中的某些特权。①

意大利经济生活的开始变化以及大地产和佃户人数的增多，造成了或增加了城乡的无产阶级——在城市里是失业者，在乡村是佃户和长工。其中大多数人——像罗马城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像许多寄寓在意大利和外省城市中的客户一样——的祖籍并不在意大利或外省本地。他们大多是东方人，被贩为奴隶运进来的，而且保持着他们不同于罗马人的特征达若干代之久。无怪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很愿意到军队里去供职。不仅从政治上着眼，就是从军事上着眼，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居心叵测的，这也就不足为怪。韦斯帕西安之所以情愿抛弃他们正是理所当然之事。

① 掌教为市民宗教团体或半宗教性团体的首领，司役为这种团体中的执事。祭皇典是帝国城市居民把皇帝当作神一样来崇祀的一种祀典。免奴不准参加公民一般正式的公共祀典，唯独可以参加祭皇典并担任其董事，所以“祭皇典董事”的头衔可以提高免奴的社会身份。——译者

第四章

弗拉维攸斯氏的统治和安东尼努斯氏的开明专制

内战的纷扰局面随着韦斯帕西安之战胜维特留斯而告终，这显然是由于受到意大利的舆论的压力，并因为军士们相信他们已经达到最后目的的缘故。他们已经表明，皇帝不应该由禁卫军任意推戴，而应当是军队以及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所公认的帝国最优秀的人物，无须考虑到他是否与奥古斯都家族有关。因此“四帝争立之年”只是一段插曲，不过这段插曲对帝国的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元首制的历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

这个新的变化是在韦斯帕西安及其子提土斯两朝的复原政策下开始出现的。这两朝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奥古斯都和提贝里攸斯初年相似。首要的问题是恢复和平。韦斯帕西安初即位的措施之一就是封闭雅努斯神庙的庙门；他所修建的最辉煌的建筑是摹拟奥古斯都的和平神祭坛的 *forum Pacis*〈和平神广场〉；同时，在他的钱币上又重新出现了和平女神奥古斯塔的形象：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偶然，而是明显地说明了韦斯帕西安的指导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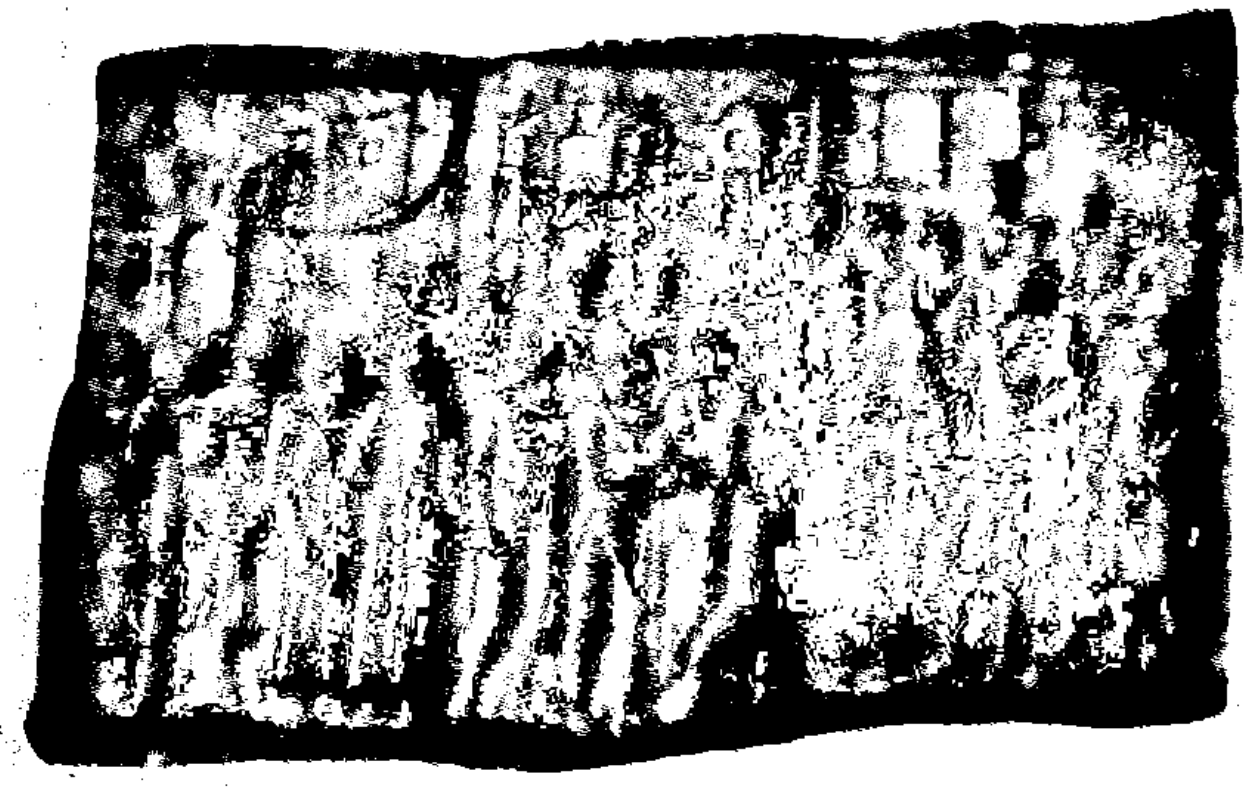
和平的基本条件就是军队的安定和服从。要使禁卫军和行省军队的行伍中恢复宁静和纪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由于在四帝争

立之年的恐怖局面以后军队的情绪沮丧，并且由于意大利和外省舆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件事比较易于着手进行。但是，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未必会保持长久。因此就有韦斯帕西安的军事改革。我所说的军事改革不是指他对部队的重新部署，也不是指他解散了某些军团和设立了某些新军团而言。这些改革固然重要，但并不能够保证今后维持和平局面和军队的安定。我所说的主要之点是指从社会观点来改变军队的组织。我已经说明过，韦斯帕西安在这方面的主导原则看来是：把意大利的无产者从军队行伍中排除出去。除了一部分禁卫军以外，全部军队都将成为一支外省人的军队；不过，并非取自罗马世界所有各个地区的外省人，而不顾及他们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诚然，即使对于弗拉维攸斯氏时期兵士的籍贯问题，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也很少，至于他们属于什么社会阶级当然就更说不上了。然而，这些兵士在提到他们的原籍时一般都是指某一城市，而韦斯帕西安也像奥古斯都和克劳迪亚斯一样始终赞助帝国的都会化运动，始终愿意尽最大可能把罗马公民资格和拉丁公民资格惠赐给那些已经都会化了的地区，特别是西方各地区，这些现象说明韦斯帕西安的政策虽是把军队变成外省人的军队，但并不是要把它变成蛮族的军队。我们有种种理由认为，允许乡村和部落集体建立城市组织以及把罗马公民权或拉丁公民权许给那些现存城市，这都不是单单赐予特权，同时也是课以义务，并且以它们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罗马化或希腊化为前提。新组织起来的城市的第一件义务就是把城市的青年送到选军里去。值得注意的是，当弗拉维攸斯统治时期，意大利候补兵士的训练所青年社这种组织又复兴起来了，而且推广到西方各省。

由此，弗拉维攸斯氏时期的罗马选军主要是一支由帝国内已经都会化了的地区的上等阶级即最文明最有教养的阶级中征募来的。用社会主义者到处滥用的一个时髦字眼来说，这是一支资产阶级的军队，是一支从外省城市里的有产阶级、从地主和庄稼人——他们或住在城里或仍然住在他们的农庄上和乡间住宅里——中征募来的军队，而不是从城市无产者或乡村无产者征募来的军队。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在大多数新旧的外省城市中，无产者并不属于公民团体。因此，在外省就比在意大利更易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军队之外。

韦斯帕西安本着同样精神所推行的另一个改革措施就是建立新的征募辅军的制度。很可能他放弃了过去的政策。按照过去的政策，辅军是几乎专门从那些根本没有都市生活的各族人民和部落中征募来的，因此这些人是各省居民中文化程度最低的分子。从韦斯帕西安的时候起，选军和辅军之间的本质区别逐渐消失了：这两种军队都是从行省里征调来的，在这两种军队中我们都能遇到一些罗马公民出身的兵士，这两种军队里都有相当多的人（在选军中占多数，在辅军中占少数）在出身和受教育方面属于国民中接受都会文明的阶层。此外，虽然辅军各有其种族番号，但并非仅限于包含某一部落或某一地区的人。例如，在一个 *cohors Thracum* 〈色雷斯步兵营〉里并非只有色雷斯人，同时还有其他种族的人。这种把各民族、各部落混合于军事团体中的政策是多民族国家的一种明智的政策，沙俄就长期奉行过这种政策。也是从韦斯帕西安的时候起，在一个行省的辅军中，本地征调的辅军部队不再占多数了。如就埃及或阿非利加的辅军而言，本地的步兵营、翼军和

1. 图拉真出师图。誓师



2. 图拉真和蛮族酋帅们

3. M. 奥雷留斯出师图

图 17　罗马帝国的战争

图 17 说 明

1. 图拉真墓碑上的一块浅浮雕，罗马城图拉真广场中的圆柱。C. 契科里攸斯：《图拉真记功柱上之浮雕》（德文），图 LXXVII，正文 III，第 169 页；K. 累曼—哈尔特累本：《图拉真记功柱》（德文），图 49，第 104 号。

图拉真带着他的幕僚们站在一个 *podium*〈台基〉上，正在向他的远征军的军士们演讲（*allocutiones*〈誓师辞〉）。站在最前列的是一些手执无敌棒的人（*signiferi*〈执仗之士〉），他们的后面是选军步兵和骑兵。这幅图和圆柱上另外一些雕刻一样，把图拉真描绘成罗马人的伟大领袖，描绘成罗马人中第一人，即为罗马的幸福和光荣而孜孜勤劳的 *princeps*〈元首〉。

2. 图拉真圆柱上的另一块浅浮雕。契科里攸斯，前引书，图 LXXIII，第 262—4 号，正文 III，第 142 页起；K. 累曼—哈尔特累本，前引书，图 46，第 100 号。

图拉真被他的幕僚们围绕着，他们全都穿着文官礼服。图拉真正在接见一个使节团，这个使节团至少包括八个敌国酋长团体——日耳曼人、萨尔马特人、色雷斯人，还可能有斯拉夫人的祖先在内。我们看到，那背景是一个筑有城郭的城市，城墙外有一个圆形剧场和一所房屋。这幅雕刻真正算得是那位雕饰该圆柱的巨匠的杰作。这一组像不仅就艺术而言非常优美，而且还在心理直观方面达到惊人的成就。两个世界，迎面相逢——一个是罗马人引以自豪的世界，他们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文明人，是 *togati*〈穿拖袈者〉（以皇帝、皇帝的幕僚和罗马兵士为代表），而另一个是陌生的世界，是日耳曼人、巴尔干各族人民和斯拉夫人的世界，这些蛮族一心想承受罗马帝国的遗产，并在古代城市的废墟上开始建立一种新式的生活。这些蛮族之向伟大的罗马人致敬，并不像奴隶或臣属那样，而是以平等者的姿态出现，他们的自豪心和自信心并不在罗马人之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决斗还刚开始，而塑造了这幅图像的天才艺术匠已经深深地领会这场决斗的深刻意义。毫无疑问，二世纪时那些伟大的皇帝们对于它的严重性也是充分理解到的。

3. 罗马城马尔库斯·奥雷留斯圆柱上的一块浅浮雕。罗马，圆柱广场。E. 佩特尔森，A. 冯·多玛斯策夫斯基，G. 卡尔德里尼：《罗马圆柱广场上的

马尔库斯记功柱》(德文)(1896 年),图 119A,§§ cx—cxi。

罗马军队在行军。皇帝 M. 奥雷留斯露着顶,手里没有拿武器,夹在两个穿着同样服装的将军和两面 *vexilla*〈军旗〉之间,像一个兵士一样地在步行。他的马匹由一个兵士牵着。他的身后有一群羊,那是从老百姓那里弄来充军粮的。他的前面有一些沉甸甸的大车装载着武器,由牛、马拉着,那是从敌人境内和附近的罗马行省里征调来的。单纯从技巧和艺术着眼来看,这幅雕刻远远赶不上图拉真圆柱上的雕刻。但是它却充满着活力,生动得很。皇帝的形象在众人之中特别突出,很鲜明地证实了 M. 奥雷留斯实践他那勤劳尽职的高尚理想的姿态。如果不是出自尽忠职守的责任感,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会使这位年老的哲学家时刻不断地在这几乎毫未开发的多瑙河沿岸的森林沼泽中行军呢?

numeri〈联队〉往往只占少数,而多数部队的番号都与埃及或阿非利加无关,而且其中的兵士纵使有几个出生于埃及或阿非利加,但为数极少。

对于常驻罗马城的部队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过去虽说他们必须由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中征调出来,但其结果已经是在人选上不太严格。而现在呢,我们更看到在卫戍罗马城的驻军中除了意大利人以外,还有若干外省人,那都是实行了都会化的地区的人,特别是高卢南部、西班牙、诺里库姆、马其顿等地人,也还有从阿尔卑斯山区、从卢西塔尼亚、从达尔马提亚和从潘诺尼亚来的人。

韦斯帕西安使军队中立化(从政治上着眼)的措施,在效果方面并不稍逊于许多年前奥古斯都为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在这方面,韦斯帕西安又是奥古斯都的好学生及其政策的忠实追随者。罗马军队重新恢复的军纪和作战力在多米戚安时期艰苦的战争里

以及在他被害以后随着而来的危急之秋受到了考验。除了禁卫军以外，整个军队在这段国家多事的时期中不曾积极参与过政治事变，而当元老院选出芮尔瓦以及当芮尔瓦指定图拉真为继承人的时候，他们都帖然承认这些既成的事实。迪约·克里索斯托姆在梅西亚的一个军团的营寨里的亲身体验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经历给这个时代的情况提供了一幅生动的描绘。我们很难相信他那篇动人的演说辞(那是用希腊语还是用拉丁语发表的呢?)果真平息了该处正在酝酿的暴动。看来倒像是这场骚乱纯粹属于表面性的事故。

韦斯帕西安和奥古斯都一样，他并不止是一个复原者。他坚决地继续推行了奥古斯都和克劳迪亚斯在帝国行政机构的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中所曾开展的工作——其一是在财政方面继续发展官僚体制，其二是鼓励各行省建立都会生活。我们不可能详细谈论这两个题目。关于前一个题目的主要之点，希尔施费尔德在他的重要著作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处毋庸赘述。只有一个细节需要着重指出一下，因为它对于二世纪的经济史关系甚巨，这就是韦斯帕西安对皇室土地和公有土地的关心。一方面由于芮罗采取的抄没私人家产这种影响深远的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四帝争立之年存在的混乱局面，当时许多富裕的元老院议员和自治市议员都被乱军及其所推戴的皇上杀害了，因此，这情况多少与奥古斯都收拾内战残局时的情况有些相似。韦斯帕西安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然而，他毕竟能如愿以偿地把属于皇帝的和属于国家的大量地产加以整顿，并且把这两个组织体系实际上合而为一，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的财政来源。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外省，国家仍然掌有大片可

耕地，矿场、采石场、渔场、森林等等自不必说；这些产业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当然就会要有一项很明确的开发政策。帝国中那些最大的地主们所不得不决定采用的经营管理制度，绝非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影响于整个罗马世界的经济生活者至深至巨。我们将在第六、第七章里讨论这个问题，并叙述弗拉维攸斯氏政策的主要路线及其对整个帝国经济生活今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提醒一句，韦斯帕西安开始着手在国有的和皇室的大地产上重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这种政策之施行，与其说是按照罗马民法的“自由”法则，不如说是按照申包埃尔所谓的“标准的”希腊化原则。希腊化东方在罗马统治时期仍然通行的那种情况，尤其是埃及的情况，可能当作了榜样。

韦斯帕西安在推行他的扶植各行省发展都会生活的政策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积极性。我们也留在第六、第七章里再对这个问题作更详细的叙述。显而易见，他的宗旨首先在于扩大皇帝权力最后凭借的基础。四帝争立之年的那些血腥的事件，表明了罗马公民、特别是居住在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所给予的支持是多么微弱，多么不可靠。仅仅依靠他们来支持的一种元首制度，必然会再度陷入内战时期那种混乱局面。我们已经知道，韦斯帕西安是充分了解这种形势的，而他的军事改革正是由于他对现实的估计而不得不执行的。但是，他也相当清楚地理解到，在当时情况下，要想抛弃奥古斯都所建立的政体原则是不可能的；理解到，主宰着帝国的是罗马公民，或者说是那些法律上属于意大利籍的人。不可能使帝国内所有的居民一律平等，也不可能把公民资格普赐给全体居民。另一方面，维持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有限度地赐予

罗马公民资格和拉丁公民资格的政策又是不安全的。我们就会看到，韦斯帕西安选择了中间路线。对于那些多多少少已经罗马化了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行省——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他就加速其都会化运动。在半开化的部落和氏族的地区内建立新的自治市时，他就鼓励它们形成一个罗马化的权贵阶级，其中大多数是退役军人，他们在服役期间就已经开始罗马化了，他把经济方面的和社会地位方面的权利和特权赐给这些罗马文明的核心分子，使他们统治其余的居民。因此，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伊利里库姆的都会化运动以及阿非利加、高卢和不列颠较小规模的都会化运动，意味着把某些分子集中在城市里，使政府便于控制这些分子，并通过他们来控制广大的行省居民。在罗马化程度较高的行省内，把罗马公民资格和拉丁公民资格赐予新建立的都市中心。在罗马化程度较低的行省中，正如在帝国的希腊化地区内一样，公民资格是不赐予的，至少暂时是不赐予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化运动都在迅速地推进，尽其实际可能的程度推进到极限。

就这样，为元首政制，特别是为弗拉维攸斯氏家族的权力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由于韦斯帕西安和他的儿子们以私恩赐给一些新人物，使他们社会地位提高，同时又由于这些人被征入选军，还有一部分被征入辅军，因此，弗拉维攸斯氏的元首制似乎有了巩固无虞的基础。新建立的屯市和城市所起的作用，当然与恺撒和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屯市在内战以后所起的作用一样。韦斯帕西安的政策是一个挑战，是对古老的意大利城市和对各行省中古老的都市生活中心的挑战，也是对罗马公民中那些自奥古斯都建立元首

制以来就不支持这种政体的旧家世族的挑战，同时，他的政策也是一种呼吁，对意大利怀有敌意而直接向外省发出的呼吁，为的是答谢外省在四帝争立之年对韦斯帕西安本人以及对这样一种元首制所给予的支持。自从实行改革以后，元首制仍然代表着罗马公民团体，不过这个团体不再以意大利为限了。

对于帝国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是韦斯帕西安和提土斯对待元老院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的组织体制方面，已经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屡加研究和说明，而且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关系甚微，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这里所要谈的是韦斯帕西安之重建元老院以及他以户籍官的资格撤免元老院某些议员并用些新人物弥补缺额的活动。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仔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探讨的结果表明，韦斯帕西安所组织的元老院与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时期的元老院大不相同。它不再代表共和时期罗马城的旧家世族，也不再代表奥古斯都赐以贵族头衔而引入元老院的家族（后者也像旧家世族一样大多是属于罗马本城的家族）。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的皇帝们的迫害和元老院议员家族的“种族自尽”使这些旧家世族消灭殆尽。取代他们的那些新人物出身各不相同，有些人出身暧昧不明。但这个政策的主线始终是倾向于用意大利和西方各行省的自治市权贵阶级中的人来代替旧家世族。这些人形成了骑士阶级中的大多数，他们在文武职役中的行径都表现出他们是元首制的忠实仆人和坚定的支持者。这个过程是由韦斯帕西安来完成的。在他的统治下，元老院的议员几乎完全取自自治市资产阶级的上层。这些来自外省的人大多是操拉丁语的。至于东方人，包括希腊人在内，一般是不被接受的。弗拉维攸斯氏的态

度，即使说不是偏袒于狭义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至少也和奥古斯都一样，肯定是偏袒于说拉丁语的人。他们使操拉丁语的人在帝国中势力加强和居于支配地位。

作为一个皇帝而言，新皇帝的处境却比奥古斯都的处境困难多了。这次内战仅仅延续了一年，东方并没有受到内战的影响，就是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等地也没有真正地被卷入这场动乱之中。实际受祸的是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富腴的地区，即北部和中部。因此，在帝国大多数居民的眼光中，韦斯帕西安并没有奥古斯都的灵光，没有他个人那种像神一般的魔力；韦斯帕西安并不是救世主。毫无疑问，即使是奥古斯都，也还曾遇到某些敌视他个人的元老院议员的反对而不得不时时与他们妥协。韦斯帕西安所遇到的情况更不在话下了。我们从塔西佗、苏韦托纽斯和迪约·卡休斯那里知道，他曾碰到元老院议员当中许多大胆和坚决的反对者，他出于万不得已而严厉地对付过这些人，并把其中少数人处以死刑。

我们对于韦斯帕西安统治时期所知者过于贫乏，以致难以判断那些元老院议员反对他的目的究竟何在。和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时期不同，这不再是反对个人的问题了。我们知道，早在芮罗时期就已经不是反对个人，而变成了一种哲学式的反对，特拉塞阿·佩土斯就是这种反对派的著名领袖之一。这种新的反对形式既然是以理论上的哲学推理为根据，当然就要比芮罗以前的皇帝们所遭遇的反对更为强烈，更为坚决。埃尔维迪斯·普里斯库斯所领导的反对韦斯帕西安的运动也属于这种类型。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可能使我们和现代一般历史学家产生同样的看法，那就是认

为，反对韦斯帕西安的元老院议员渴望重建共和国，他们“谈论着多少是坦率的共和主义”。但是，很难相信一个严重的反对运动是以这样一些空想作为根据。尤其难以设想罗马元老院通过四帝争立之年而没有受到一点教训，我们看一下这时元老院的社会组成，就可以看出它绝不会怀着古代共和时期元老院同样的愿望。就是元老院反对运动的哲学色彩也是不利于这种以“共和主义”为其主要政治理想的看法的。当时最流行的哲学流派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的思想基本上是非共和主义的。

这个时代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为我们所熟悉，甚至比塔西佗所描写的那些人物还要熟悉。这就是迪约，后来被称为克里索斯托姆，他是普鲁萨的公民，在韦斯帕西安在位时候来到罗马，当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但已经是一位知名的诡辩家了。他是该市的一个有钱人，是权贵阶级中的人，因此他有机缘和京都里许多头面人物、甚至和皇族中人结下交情。当他初住在罗马时，似乎并不反对韦斯帕西安。他好像还支持韦斯帕西安，甚至对韦斯帕西安所采取的对付哲学家的办法以及对他与哲学家反对派的首领之一、著名的穆索纽斯之间的冲突也表示支持。但迪约渐渐同元老院反对派议员有了接触。显然，他也渐渐地接受了他们的看法。我们对迪约的政治观点了解得很清楚。在他的著作中，丝毫没有露出同情共和主义之处。他在罗得的演说辞大概是在他被流放以前的作品，当时他正与反对弗拉维攸斯氏政权的元老院议员维持着最密切的关系，而这篇演说辞中却毫无颂扬共和主义民主政治之语。因此，不可能相信元老院议员的反对运动大谈其纯粹的共和主义和企图重新恢复元老院统治的黄金时代。很明显的，他们所谈论

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元老院议员反对运动在与韦斯帕西安进行斗争时并不是孤立无援的。韦斯帕西安统治时期的一个奇怪的特色就是他不得不把那些所谓哲学家放逐出京都。迪约·克里索斯托姆在一篇著名的演说辞(向亚历山大里亚人发表的演说,第 xxxii.)中把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根本不设帐授徒的哲学家;第二类,名副其实的教授,他们为固定的学生团体讲学;第三类,向公众演说的哲学家,他们到处旅行,作公开讲学;第四类是最有趣的一类,他对这一类哲学家作如下的描写:*"所谓犬儒学派者,在城市中为数甚多……这些人在十字路口、在小街僻巷、在神殿的殿门边把奴隶、水手之类的人集合拢来,向他们进行蛊惑,胡扯许多嬉笑怒骂、评头论足和难听的丑话。所以他们不做好事,专做最坏的事。"每一个研究罗马帝国的学者对于最后这类哲学家都是很熟悉的。他们是公元后一世纪、二世纪中罗马统治下的东方各城市里最引人注意的现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一定要到罗马城去,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罗马城他们能找到一群懂希腊语并对他们的教义感兴趣的人。关于这种教义,我们知道得极少,但可以肯定一般是本着犬儒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攻击生活俗套和颂扬返回自然。然而,如果他们的教义要旨仅仅如此而已,为什么他们会成为韦斯帕西安的眼中钉呢?为什么他们会同一般的哲学家即那些教导和鼓舞反对韦斯帕西安统治的元老院议员的哲学家一道被放逐出罗马城呢?我们除了作下面的解释以外,不可能再找出其

* 《演说集》,xxxii. 10。

他的解释，那就是：所有的哲学家，无论高级的或低级的，都同样在进行一种政治社会宣传，这种宣传显然对韦斯帕西安大为不利。

他们所特别颂扬的是什么呢？他们的教义中对社会的看法有这样大的蛊惑性，以至能唤起了无产者的敌对情绪。但是，这种对社会的看法本身还不足以解释韦斯帕西安的行动；何况，这只限于街头哲学家们。街头犬儒学者的宣传中必定还有些什么政治性的东西。专就政治问题而言，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教义的唯一共同的论点——这可能是真正对韦斯帕西安有危害性的一个论点——就是把僭主同国王对立起来的提法，犬儒学者和斯多葛派都时常讨论这个题目，后来迪约·克里索斯托姆在他的著名的论僭主政体和国王政体的演说辞中发展了这个说法。国王和僭主之间主要不同点之一就是，国王的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他是上帝所选拔的最贤明的人，因此这种权力不能世袭。如果这就是元老院议员的哲学式反对运动与犬儒学者街头说教二者之间联系所在，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元老院议员与街头哲学家共同遭受迫害的原因，也就能理解这样一点：韦斯帕西安当某些反对他的阴谋被揭发以后，在元老院里声明说，除了他的儿子以外，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继承他的事情。我们可以附带说一句，这个声明看来没有丝毫痕迹能假定元老院有共和主义的倾向。这只是对那些宣扬贤者应为国王之说——选立贤者为嗣之说——的人们的一个严厉答复。

舆论一致斥责韦斯帕西安的统治是一种僭主政治，因为他希望看到他的儿子们继承他的大位，在这种舆论的激流之外，另外还有一股潮流，其危险性虽较小，但对当时社会情况讲来却极有代表

性。我们从苏韦托纽斯那里知道*，某些希腊地区的行省和自由城市也和某些藩属王国一样在韦斯帕西安统治时期经常发生骚乱(*tumultuosius inter se agebant*)和遭到取消"自由"的处分。苏韦托纽斯指名的有阿凯亚、吕西亚、罗得、拜占庭和萨摩斯，全都是繁华地方，其中有些是很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里亚人也表示了对韦斯帕西安的反感。** 关于东方希腊人地区方面这类行动应当作何解释呢？应当指出，这种不满情绪并非弗拉维攸斯氏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这种情绪直到图拉真统治时期，甚至到阿德里安以后仍然保持未改，尤其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根据迪约·克里索斯托姆在图拉真时代在某些东方城市里所作的演说，以及根据普卢塔尔克大约在同一时期所著的《治邦论》，我们多少能知道一些希腊城市所发生的情况。除了这些城市永恒的敌对和竞争(这是从它们政治自由时期遗留下来的)以外，其内部生活中有两个突出的现象，使得城市当局和罗马政府都为之烦困不安——一个就是贫富之间不断的社会斗争，还有一个就是全体居民无论贫富都一致强烈地反对罗马总督的行政管理方法。由此，这些城市里的社会运动，特别是无产者中的社会运动，必然会带有反罗马的倾向，因为罗马人一般都支持那些公开压迫无产者的统治阶级。

我相信这两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因素是亚历山大里亚经常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些骚乱，我们从文学史料和一部名叫《异

---

* 《韦斯帕西安传》，viii. 2。

** 苏韦托纽斯，《韦斯帕西安传》，xix. 2；参看斯特腊博书，xvii. 796。

教殉道者行传》的政治小册子的某些残篇断简中得到相当全面的报导，所谓《异教殉道者行传》是一部珍贵的集子，它曾在埃及的希腊人和希腊化居民中大为流行过。这些骚乱采取“屠杀”犹太人的方式，但无疑是直接反抗罗马政府和几乎是纯政治性的。而且，毫无疑问，在亚历山大里亚也和在小亚细亚诸城市里一样，犬儒学派的街头哲学家对于居民中不逞之徒、特别是对于无产者具有强烈的影响。亚历山大里亚的所谓《异教殉道者行传》里反复出现的那些犬儒学派论题，如“国王与僭主”、“自由与奴役”等等，正表现了这种强烈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在亚历山大里亚，早在卡利古拉统治时期就开始发生骚乱了。但在东方其他地方，在弗拉维攸斯氏以前一直没有表现过不满的征兆。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我要向读者们再提醒一下前章已经说过的，自从内战结束以后在东方开始出现神奇的经济复兴。随着经济复兴之后又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兴，这是西方不足与之抗衡的。就连罗马人也再一次认为只有希腊文明才是文明，只有希腊艺术才是艺术，只有希腊文学才是文学。芮罗领头宣称 *urbi et orbi*〈都会与赛会〉[①]是新的福音，并且按照这条真理办事。希腊城市，特别是其中的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抬高了自己的身价，简直抬高得过分了。到了韦斯帕西安时代发生了一种反动。东方是最先拥戴韦斯帕西安的，因此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特权，希望降临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要有自由，

① 这两者都是希腊文明的象征，芮罗特别爱好希腊的赛会竞技活动，故云。——译者

要有罗马公民资格，要有元老院议席以及其他种种。幻想的破灭的确是件痛苦的事。如我们所见到的，韦斯帕西安远远不是在追随芮罗所曾走过的道路。他既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希腊人。他是出生于意大利的，有着意大利人的一切偏见而并不相信希腊人的优越性。而且，他更知道，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他是会坍台的，而东方即使反抗他，也不过只是一种 *Fronde*〈骚乱〉而已，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他执行他的政策也许太过分了一些，以致在罗马本城也给自己添了不少敌人。迪约在罗得的演说表示出他和他那一类的人（在罗马立足并且有声名的希腊人并不止他一个）都共同相信希腊世界的复兴，并且力主对此予以重视。像迪约之类的人的确从来不曾赞扬过反叛或发生骚乱，但是，他们所持的稳健态度却被街头哲学家的活动抵消了，那些人使尽了一切办法来争取民心——这也是韦斯帕西安必然使他们在罗马极尽苦恼之另一原因。然而，他们尽管被放逐出去，仍然能设法再进入罗马城而在公共场所进行其宣传活动，这正足以表示他们的顽强性。

提土斯的统治在皇帝与帝国居民之间的关系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他向元老院作出让步，他的政策宽厚容忍，然而这并没有遏止不满情绪的扩散，尤其是在东方。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在位时期（大概是在公元 80 年）小亚细亚出现了一个“伪”芮罗，并啸聚了不少的徒党。等到多米戚安继承提土斯的时候，危机终于来临了。关于多米戚安统治时期一些众所周知的史实，毋庸赘述。那些反对武力专政、反对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元首政体以天下为己私的人们，以及那些与现在似乎已经在罗马巩固建立起来的世袭君主政体为敌的人们，都把多米戚安的统治看成赤裸裸的专

制政体或看成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所说的独裁政体。多米戚安从来不掩饰他对帝权的理想。他十分坦率，十分诚实。他从来不想接受斯多葛派所谓理想“国王”之说。他希望众人服从他，希望掌握一切大权，就像一个主子和上帝一样。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改变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所创立的元首政制的外形。也许是由于反对现存制度者再度发动攻击，多米戚安才不得不露出他的本色。他对付反对者的手段之严厉残酷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又回到提贝里攸斯、卡利古拉和芮罗那种最黑暗的日子了。完全可以肯定，帝国各地的上层社会人士都一致谴责他的政策，并一致主张帝权与反对帝权者的要求二者之间取得妥协。尽管多米戚安施恩于军队，但军队似乎也并不完全站在皇帝一边。因此，使多米戚安送命的宫廷阴谋很可能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变，而是在外省和在军队中牵连甚广的一个阴谋。果真如此，那么，迪约·卡休斯所信以为真的那些神秘故事，如日耳曼尼亚一个什么名叫拉尔季努斯(?)·普罗克卢斯的人(大概是一个兵士)的预言，还有提亚纳人阿波洛纽斯在以弗所能远见千里以外等等，也就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了。

由此可见，在多米戚安统治之下，反对派又重新攻击帝权的各个方面以及攻击皇帝个人。斗争并不限于罗马一城。我们知道，迪约·克里索斯托姆被放逐出罗马城并禁止居留在其故乡比提尼亚，只好乔装改扮，大概还改名换姓，过着流浪生活，而他到处宣扬他这时开始信奉的新斯多葛—犬儒学派的福音。他差不多竭尽全力来传播他的新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宣传的内容实际上正是直接反对多米戚安和反对他的统治制度的。迪约不得居留在比提尼亚，因为他在他故乡的影响可能危及统治者：即此一端，可以窥

见当时东方一般情况如何。

他所宣传的东西带有什么性质呢？我们根据他的演说辞，以及根据一些有关罗马城哲学家的活动的证据，可以看出这种宣传首先是攻击暴君专制，而所谓暴君专制完全是指多米戚安的统治而言。这是它所否定的一面。那么，多米戚安的反对者们是否提出过另外某种内容，提出某种肯定的东西来反对暴君专制呢？这到了以后，在图拉真统治时期，迪约告诉皇帝，也就告诉了我们，他所考虑的罗马帝国的理想制度如何，以及一般的理想国家如何。他用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的王政（βασιλεία）来反对暴君专制，而他所描绘的王政似乎笼罩着由图拉真元首政制的实际情况得来的色彩，或至少部分地带有这种色彩。目前流行的看法，都认为迪约以及反对派在描绘这样一种王政的时候，乃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不得不接受君主政体，而只好把图拉真的君主政体和斯多葛派的王政等同起来，*faire bonne mine au mauvais jeu*〈聊以自慰〉；他们之放弃他们的共和政体的理想实出勉强。但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能承认这种看法。据我看来，反对派自始就接受元首政制，不过他们采取了安提斯特芮斯和后起的犬儒学者以及斯多葛派学者们的观点，主张元首政制应当符合于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所谓王政的型范，其中也许有个别例外的人主张不同（如果埃尔维迪斯·普里斯库斯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话）。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所谓王政的纲领，如迪约所引述的，* 已为大家所熟知，此处无须详叙。其主要之点如下：皇帝之立，出于神意，其所作为自

---

* Περὶ βασιλείας〈王政论〉，i 和 iii。

应协和天心；他在生之时本身并非一位神；他不应将自己的权力视为一种个人的特权，而应当视为一种职责；他的生活应当克勤克俭（πόνος），而不应当耽于逸乐（ἡδονή）；他应当是臣民的父亲和恩人（πατὴρ καὶ εὐεργέτης），而不是他们的主子（δεσπότης）；他的臣民是自由的人，不是奴隶；他的臣民必须爱戴他，而他必须既φιλοπολίτης〈爱民〉，又φιλοστρατιώτης〈爱兵〉；他必须πολεμικός〈英武〉，但从王者无敌于天下这个意义来说，他又必须εἰρηνικός〈慈和〉；最后一点，他必须有一些僚友来辅佐他（这是暗指元老院而言），他们应当分掌国家的庶政，他们应当是一些自由的（ἐλεύθεροι）和高贵的（γενναῖοι）人。在迪约逐款说明的纲领中，无疑地有许多点并非理论上的，而是符合于图拉真的品行的东西。但我们只要稍许看一下普利尼就任执政官时向图拉真致敬的演说辞，并拿来和迪约论王政的第一篇与第三篇演说辞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迪约的演说辞中有多少分量不是单单地记录现况，而是首要地在于阐明图拉真应当何去何从的永恒典范。

所以，我相信那些反对弗拉维攸斯氏统治的人大多数并不反对这样一种元首政制，他们对元首政制的态度颇近于塔西佗。他们接受这种制度；但他们希望它尽可能接近于斯多葛派所谓的王政，而尽可能不同于斯多葛派所谓的暴君专制，那种暴君专制就是指整个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朝的武力专政（尤其是芮罗的统治）以及指多米戚安的武力专政而言。当芮尔瓦和图拉真执政之时，帝国居民群众，其中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中的受过教育的人士，与帝权方面讲和了。迪约曾当面向图拉真陈述其论王政的演说辞，并且他大概承图拉真的旨意而在东方一些最重要的城市里反复讲

述这些演说辞;这些演说辞表述了元首政制所接受的斯多葛派学说的要点,以及表述了这个学说中一些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论点。

保持安定服从已近一百年左右的军队也接受这种和解的局面,这个事实说明军士们并不站在武力专政一方面,而是愿意接受帝国各地士大夫阶级的舆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公元二世纪的元首政制,安东尼努斯氏的开明君主制度,乃是士大夫阶级的一个胜利,正如奥古斯都的元首政制曾经是 *cives Romani*〈罗马公民〉的胜利一样。移植于一种武力专政制度上的东方式君主专制的魔影又一次被打倒,但是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个魔影受过这次打击以后就没有再受打击了。

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使我们看出士大夫阶级和皇帝之间达成妥协的条件。罗马帝国的宪法仍然是不成文法,这是自罗马有史以来一直如此的。情况的改变就是帝权对现存形势作了新的适应。罗马皇帝的权力并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大权独揽于一身,现在倒成为各阶级人民所公认的事实,并认为理所当然了。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罗马帝国就必然会趋于瓦解。皇帝所辖的官僚体系毫无阻碍地向前发展下去。但是,奥古斯都的元首政制的基本原则被重新强调了一番。皇帝不是一个东方式的君主;他是罗马帝国的最高长官,无论对罗马公民或对外省人都是如此。他不由任何选民团体选举,但其权柄也不是仅按血缘关系由父传子。皇帝从最贤明的人们中择其最贤者立为继嗣,而所谓最贤明的人们就是指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成员、皇帝的僚辈以及皇帝所栽培的后进等。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成员人人都献身于国,当然这个阶级便由此专为皇帝提供继嗣。皇帝的权力也不视为一种个人特权,而被

视为一种责任，一种由上帝和元老院授予掌权者的职务。由是言之，皇帝成了帝国的化身，因而他的权力和他的人身都是神圣的，他本人成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帝国的庄严就体现在他身上。他不是国家的主子，而是国家的第一名仆人；为国效劳是他的职守。当他在军队中时，他必须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承受军事上的一切艰难困苦。当他在京都里时，他必须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而专心于自己的职守，必须日日夜夜为帝国的安全繁荣而辛勤工作。因此他的生活必须是一个国家首脑的生活，不是一个一般凡民的生活，然而，还该尽量求其俭朴。他的私财与国家财产融合为一。皇帝的也就是公家的，公家的也就是皇帝的。我们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理解安东尼努斯·皮攸斯的话。当他被阿德里安立为继嗣以后，和他的妻子争论起来，他说：*“傻瓜，现在我们被转交给帝国了，连我们先前所有的东西都丧失了。”这句话可能是捏造出来的，但它却着重地表现了当时一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皇帝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必须割舍他对自己子女的恩爱；他必须在他的僚辈中选择最贤明的人，立为继嗣，使他登上帝座。

这就是二世纪中直到康莫杜斯为止的几代罗马皇帝们的政策。谁也难于相信这种相符的情况是出自偶然的，譬如说，谁也不会认为建立这样的帝位继承制度是仅仅由于 M. 奥雷留斯以前的皇帝们都没有儿子的缘故，也不会认为他们是由于各人个性而决定采用这一政策的，因为他们各人的个性相差悬殊。图拉真是一位伟大的军人和征服者；阿德里安是一位才智之士，一个有高尚艺

---

* 《历朝帝王传集，安东尼努斯·皮攸斯传》，c. 4。

术修养的人，他可算雅典伟大的公民中的最后一人，帝王中的风流名士；安东尼努斯·皮攸斯是元老院议员阶级中一位善良的意大利资产阶级人士，才智有限，然而通达事理，有幽默的天才；M. 奥雷留斯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生活在他的书本中，也为他的书本而生活，对他说来，沉思玄理才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以上这几位，尽管个性显然各不相同，但在其皇帝职权范围内却都遵循着同一道路。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上文所描写的情况既非引自迪约的演说辞，也不是引自 M. 奥雷留斯的论文，而是从那些皇帝们在位时期的生活中得来的。他们所遵循的行动轨范是民情舆论替他们制定的。多年的帝政统治，长久的深谋远虑，以及新元老院议员阶级中人竞天择的过程——这个新元老院议员阶级除了名称以外已经与奥古斯都及其继嗣们时代的旧元老院议员贵族阶级毫无共同之点，它是由一些阅历很深的文官、武将和外省总督等人组成的——这些因素形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而体现于皇帝们的公务生活中，这些皇帝就是属于新元老院议员阶级的。

这个时期，罗马人民领导阶级的口号是纪律严明、尽忠守职、为国效劳。如果皇帝们力求遵奉这几条原则，他们至少得要求统治阶级和军队忠诚地遵行上述的准则。对元老院，对骑士阶级，对国家文武官员，对军士们都一律要求遵守纪律和服从。最先在罗马军队中树立崇奉“军纪神”仪式的是阿德里安，这就不是偶然的；同时我们也可看到，并不只是皇帝们要求服从，甚至军队也承认服从是天职。在此以前，军队从来没有训练得这么好，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纪律，以前的军队也从来没有像开明君主制度时期这么刻苦和安心。图拉真的远征，或者 M. 奥雷留斯时期的艰苦战争，都

足以证明军队虽然遭受重大损失和经历严酷灾难但却能适应可能范围内最严格的要求。帝国的行政组织应当说也和军队情况相同，以前从来没有像在安东尼努斯氏励精图治时期这么公正，这么合乎人情，这么效率高。对于以上一切情况，我所能找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帝国国民心理状态起了变化，产生了一股反对一世纪时那种轻举妄动和唯物主义精神的潮流，这股潮流使古代世界在此后数十年中得以安享和平安定的岁月。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就是皇帝们对待外省的政策。二世纪中的皇帝大多数本身出生于外省。图拉真和阿德里安是西班牙来的罗马公民，安东尼努斯·皮攸斯和 M. 奥雷留斯是迁居高卢的罗马公民的后裔。他们都属于元老院议员阶级，他们维护这个阶级的特权，同时也维护帝国第二阶级、即骑士阶级的特权。他们不曾侵犯这两个阶级作为皇帝以下最高官吏的权利。但是，这两个阶级的结构现在已完全改变了。无论是其中哪一个阶级都不再局限于意大利一地。它们所有的成员都需要在意大利有自己的寓所和掌握一些产业，但很少是出生在意大利的。他们因为出身于外省自治市的权贵阶级，所以同他们在东方或西方的老家保持着联系。由此，罗马上层社会现在在人数上大大增加了，他们所代表的不是罗马城或意大利的权贵阶级而是帝国的权贵阶级，也就是整个罗马世界各地城市居民中最富裕和文化最高的阶层。这个现象也许能说明我们方才所谈到的世道人心的改变。这个新的贵族阶级是皇帝们为国家政务着眼而从整个帝国中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们里选拔出来的一个贵族阶级。罗马国家固然还是由一个权贵而兼富豪的阶级统治着，但是，对于这个阶级成员的选擢，着重

家世和财富已不如着重个人功绩、能力和才智之甚了。

这个新权贵阶级几乎完全是由外省人组成的，自然比较清楚地了解外省的需要，并且完全尊重外省的权利，那就是，不把外省看作罗马人民的地产而看作罗马国家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管理。这一改变早自弗拉维攸斯氏时即已开始。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中某些人、特别如提贝里攸斯和克劳迪亚斯，即已在这方面采取过某些措施。在安东尼努斯氏时期，这个改变达到了顶点。我们看到，紧接着奥古斯都的几位继承者中除了提贝里攸斯以外再没有一个人在即帝位以前曾经统治过一个外省；紧接着提贝里攸斯的几位继承者中没有一个人能根据亲身体验了解到外省人的一丝半点需要和抱负；卡利古拉和克劳迪亚斯的出外巡视只是纯粹为了军事上的目的。弗拉维攸斯氏以前所有的皇帝全都是罗马人，他们都住在罗马城，对他们说来，罗马城就是天下的中心，其中只有加尔巴、维特留斯和鄂托是例外，但他们三人的兴起只是外省对于现行惯例掀起的一阵反动浪潮而已。从弗拉维攸斯氏以下，情况完全改变了。韦斯帕西安大半生都付在统率军队和治理外省上面，提土斯也是一样。当然，多米戚安又一次表现为旧日蛰居京城的皇帝们那类人物。但是，从他以后，一直到康莫杜斯为止，每一代皇帝在即位以前都差不多完全在外省度日，还有些人，如阿德里安，甚至在即位以后也仍然在外省度日。

在这些情况下，旧日统治外省的理论和措施必然完全不再存在，而二世纪中的皇帝们必然感到他们自己不仅仅是罗马城的皇帝或罗马公民们的皇帝，而是整个帝国的皇帝，这都是极其自然的事。取得罗马公民资格的权利迅速地普及于整个帝国，越来越多

地把罗马自治市的权利、或者把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的权利赐给外省的城镇，这两件事都表明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而更为重要的是，各行省现在感到它们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个地方性的统一单位，是一个“邦”——只要我们在这里谨严地使用“邦”这个名词的涵义。此刻的罗马帝国就是由这样一些邦联合组成的。大家所熟悉的阿德里安的那套钱币即行省币，最显著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二世纪时的皇帝们改革后的财政、经济和社会政策也证明了同一事实，不过，关于这些，我们要留待以后再谈，让我们先从社会经济观点对二世纪的帝国作一番概述，然后再去研讨那些政策。

可以看到，就在罗马政府对待外省的态度发生改变的同时，整个外省越来越顺从于罗马的统治，其中尤以上层阶级为甚。关于西方各行省，我们所知道的非常有限。但是，西方各城市中为了歌颂二世纪时的皇帝们而建立的大量碑碣，就说明了这些地方的上层阶级对现况是何等的满意。就是在东方各行省中，居民的态度也开始逐渐改变了。迪约和普卢塔尔克的活动，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词，甚至连卢契安的詈讦，都说明了帝国内操希腊语的居民中的领导阶级逐渐默认现存状态，他们放弃了争取自由的幻想而致力于巩固罗马在东方的权力。亚历山大里亚人算是最顽固的了。他们坚持和罗马政府为敌，坚持不把皇帝权力的性质视为一种王政而称之为僭主政体。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关于这场斗争，我们是从一件文献资料里看到的，而这件资料却属于康莫杜斯时期，并且在这件资料里把康莫杜斯同他的父亲作了不同的对比。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二世纪时的皇帝们不曾迫害过哲学家，就连犬儒学派也没有遭过迫害。对犬儒学派等人进行

攻击和加以嘲笑的任务，由忠于皇家的哲学家和诡辩家们担承。在这场笔墨官司中，政府不曾干预过，但我们必须记住，政府奖励东方各城市中文化的推广不下于对待西方，并且政府还以公款奖助私人教师和修辞学家以及某些教育机构。

然而，我们也不能断言二世纪时罗马帝国内就没有不满分子。固然，即使在东方，上层阶级多多少少顺从了帝国。但下层阶级却并不如此。图拉真时代对于比提尼亚的惩戒和亚历山大里亚的骚乱，表明我们前面曾经谈过的那种社会对抗在小亚细亚或埃及等地并未平息过，而罗马政府和各城市的长官们很难对付城市居民中的下层阶级。我们将在下章再回过来谈这个题目。

关于安东尼努斯氏时期罗马军队的社会成分，可以再补充几句话。在本章中，我们曾一再陈述，罗马军队不仅对帝国的政治生活起决定作用，而且也对帝国的社会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人们不禁会问：M. 奥雷留斯和康莫杜斯时期的军队是否仍然同弗拉维攸斯氏和图拉真时期的军队一模一样呢？那就是说，它是否基本上仍然是一支由正式的罗马公民或准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而由出生于罗马城和意大利的罗马公民来担任统帅呢？如要透彻了解二世纪和三世纪中的种种事件，那么，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我们对这个问题能答复多少呢？很清楚的是，就成分而言，军队的结构未曾改变。在整个二世纪中，军官都由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中的人担任，军吏都是一些出生于意大利或西方各省已经罗马化了的地区并在该地受教育的罗马公民。禁卫军的兵士都是意大利人，或者是西班牙和诺里库姆两地的罗马化行省或马其顿行省的本地人。选军的兵士按规定完全是罗马公民。辅军的兵士按理

说应当是懂得拉丁语的人，他们在服役期满时得到罗马公民资格。然而，毫无疑问，虽有这种政治身份的规定，几乎所有的兵士都是外省人，意大利人只在禁卫军中服役，而禁卫军也成了其他部队的军吏的培养机构。自从阿德里安以后，每一个行省必须自己征足本省的军队。

这些情况已经过现代学者们的彻底研究而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从社会成分来看军队的组成，我们所知道的却少得多。兵士们究竟属于国民中哪一个阶级或哪些阶级呢？军队比较能充分代表的是帝国的哪一部分呢——是城市还是乡村？兵士中的大多数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呢？固然，当他们写下自己全部正式姓名时，差不多总是提到某一个城市作为他们的原籍，但是，这个情况并不能解决上面的问题。一个兵士可能属于某城市的辖区，但仍然可能是一个农民或者一个 *colonus*，即一个佃户。可以肯定的是，辅军大部分是从农民和牧民中征来的。但选军是怎样的呢？一般意见认为，即使是选军，其兵士现在也大多是农民了，城市居民不乐意服兵役，而军官们也不甚看重他们。据我看，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二世纪时的皇帝们当然想尽可能把更多的罗马化的青年人征到军队里来，而这种人大多数要到城市里去找。皇帝们同意并赞助外省组织青年社，这种组织在一旦需要时就成为一支地方民团。但事实上，即使是这些为罗马选军提供后备兵的青年社也逐渐丧失其城市色彩，这在沿边各省尤甚。探究一下弗拉维攸斯氏以后一段时期中来因河流域各省的青年社的发展情况是很有意思的。这些行省中的青年社并不局限在两个日耳曼尼亚省的少数正式城市里。我们发现，在那些同日耳曼人和克勒特人的部落或

氏族关系密切的地方单位如 *civitates*〈镇〉、*pagi*〈村〉和 *vici*〈庄〉等处也有青年社的组织。这些社的本身不像意大利各城市中的"社"。在沿克勒特—日耳曼边塞诸省中，这些意大利的组织被移植在当地土著半宗教性的组织之上，那种半宗教性的组织在整个印欧种人中是普遍的，先罗马时代的意大利也存在过。日耳曼尼亚的 *iuvenes*〈青年社社员〉可能原先只代表日耳曼诸省居民中的上层阶级，即地主和富裕农民阶级，不论他是侨寓者或是土著，但毫无疑问的是，后来逐渐把本地适合兵役的青年人全体网罗在内了。

因此，在二世纪中，罗马军队逐渐同城市断了联系而变成了罗马史上的古代时期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军队，即变成了一支由地主和农民组成的军队，由乡下人组成的军队，这些乡下人和乡村以及和农业生活仍然保持着联系。我们在第六、第七两章里就会知道，这种乡村居民在帝国国民中占了大多数。当然，只有城市生活发展迟慢而还没有普及到大部分乡村居民中去的那些地区才提供最优秀的兵士，例如希腊、意大利这类地方就不行，甚至像高卢都要稍逊一筹。

在整个二世纪中，军队表现得那么安定守法，若从军队的成分来理解这种气质，也是可能的。农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政治事件，而城市无产者比起农民来知识要开豁得多、对一般政治生活要熟悉得多，因此，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比一支由城市无产者组成的军队要容易遵守纪律和容易受控制些。二世纪，特别是二世纪下半期(M. 奥雷留斯和康莫杜斯统治时期)，军队主要是由帝国内的乡村居民组成的，这一假定更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实，那就

是，这时候的军队不再是招募来的了。当 M. 奥雷留斯之时，皇帝正在南北两面边塞上进行激烈的战争，日耳曼人险些就要人侵意大利，东方和意大利又大遭瘟疫之灾，在这种时候，要继续依靠募兵制是不可能的。大家知道，M. 奥雷留斯为局势所迫曾征调过奴隶、角斗士、城市警察甚至日耳曼人和达尔马提亚、达尔达尼亚等地以劫掠为生的部落民人伍。这可能是一次非常性的措施，但它却说明了，即使在不太危急的时刻，M. 奥雷留斯也不能免于用征调的方式来补充他的军队。我们必须记住，无论何时，服兵役一直是罗马公民和外省人的义务，征调方式一直是征集辅军的正规制度。既然帝国居民中乡下人占了大多数，既然城市居民——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躲避兵役，那么，显而易见，M. 奥雷留斯的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特别是由罗马帝国那些不太开化的行省中的农民组成的，那些行省提供了最精壮的兵士。

迪约·卡休斯在谈到塞普提米攸斯·塞韦鲁斯的改革时描述了外省军队的形象，使我们很具体地看出外省军队在成分上和禁卫军的对比，因为塞普提米攸斯·塞韦鲁斯遣散了旧的禁卫军，而代之以从外省军队里挑选来的兵士，其中大多数是多瑙河流域的兵士。迪约说道："这样一来，他就完全摧残了意大利的青年人，使他们不再服兵役而转去当强盗和职业角斗士，而京城里却充斥着一群杂牌军，他们的相貌蛮悍，说起话来令人害怕"——由此可见其中大多数不用拉丁语——"举止粗野。"* 那么，无疑地，二世纪

---

* ixxiv. 2。

末期的罗马军队虽说仍然由罗马人组成，但指的只是罗马帝国的居民而已，比起过去，却越来越野蛮，越来越不能代表有文化的居民了。除了军官和军吏之外，军队的精神已经不是都会居民各阶级的精神，而几乎完全是乡村各阶级的精神了。

第五章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期的罗马帝国

城市和工商业

公元154年，被称为“诡辩家”的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在罗马城发表了他的演说 *Eἰs Ῥώμην*〈罗马献辞〉，这篇演说词对二世纪的罗马帝国作了最好的全面描写，它是我们所见到的有关资料中最详细、最完备的一篇。它不仅是对罗马帝国的伟大表示衷心崇拜的一篇颂词，而且还是对政治具有深刻周到的分析的精心杰作。谈到阿里斯提德斯这篇“颂词”，人们往往认为它只是一篇辞章之文，并无独创的见解，而只堆砌着许多人尽皆知的老一套说法。这种看法的论据是从分析阿里斯提德斯演说词的资料来源而得到的。有人说，他所引证的史料主要得自伊索克腊特斯；他的主导思想大半受到普卢塔尔克、阿利卡尔纳苏斯的迪约尼休斯和波利比攸斯的启发；而演说词的结构则依据梅南德尔所写的词学手册里的理论原则。我们可以承认，这些论证全都是正确的。但请问，在现代大多数漂亮的政治演说中，又有几篇能经得起这样一种分析呢？对于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词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并不能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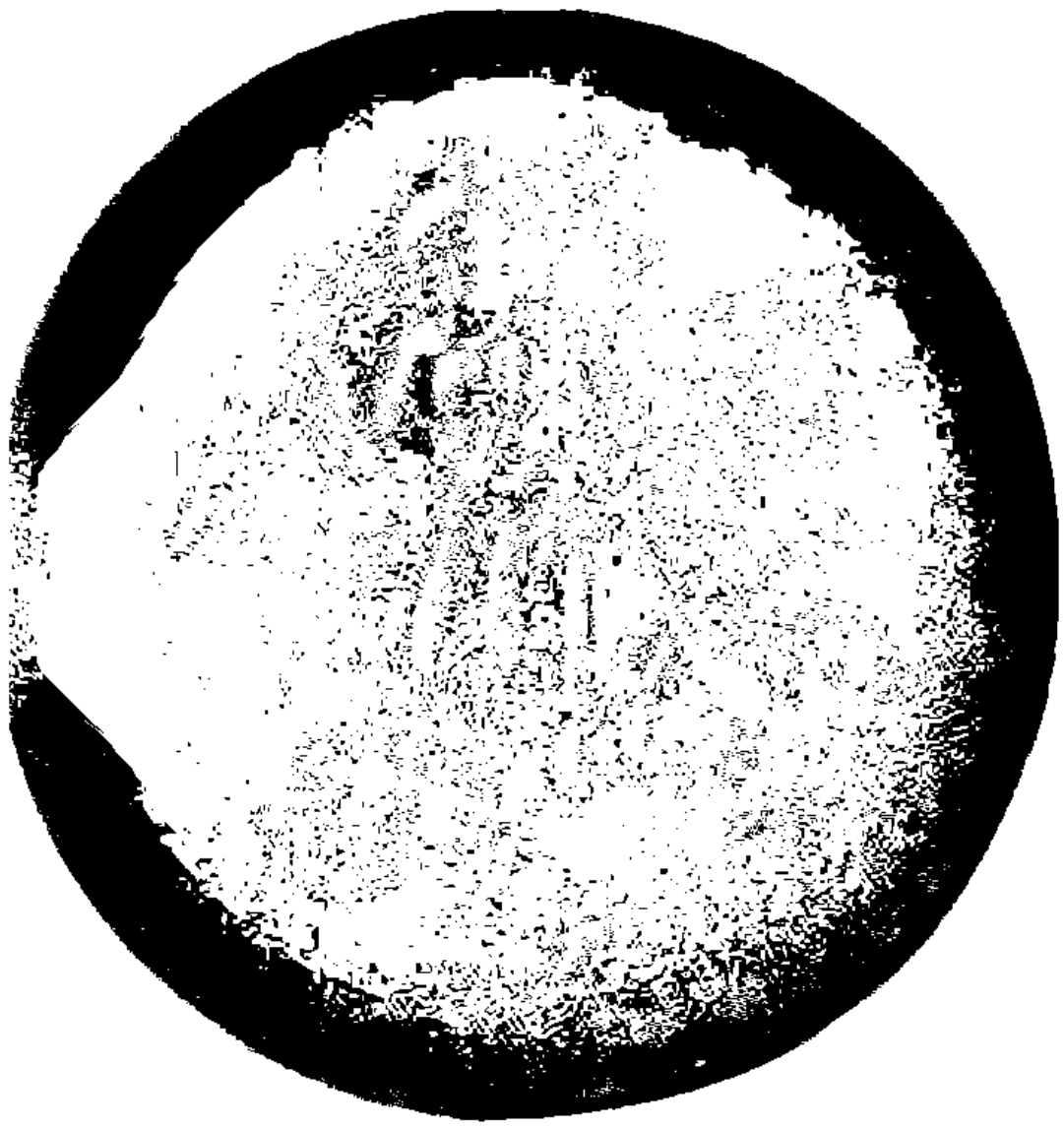
那个最根本的论点，即认为他的思想空泛，认为这篇演说词通篇都只充满着老生常谈。演说词中某些思想可能重复着当时流行的看法。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思想空泛。毫无疑问，老一套的说法是会遇到的。但是，人们会向这些批评家提出诘难，请他们在二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举出另外任何一篇，要能像阿里斯提德斯这篇作品一样，对罗马帝国的结构描绘得这么全面、这么清晰。他们能不能举出另外任何作品，其中对帝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有着这么多精彩生动的描绘呢？而且，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词中还有某些思想是在别的作品中找不到的，或即使找得到，也没有表达得像他这么清楚、完整。例如，他表达了二世纪时对于开明君主政体的性质、对于君主政体与帝国居民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流行看法；他点明帝国的性质是一种自由的自治城邦的联合团体；他精练地概述了军队在罗马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这也是该文相当重要的特色。我认为，不仅在了解当时人对罗马帝国整个结构的看法时，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词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而且，在研究安东尼努斯氏时代的精神面貌以及当时的政治思潮时，它也是一篇最重要的资料。谁也不想在一篇“颂词”里找到对帝国的批评。演说者的任务就是要抓住和指明正面的现象，而同时要不浮夸，不作过分的奉承。对于这个任务，阿里斯提德斯完成得相当出色。

我们必须把《罗马献辞》和迪约论王政的一些演说词对照来看。那些演说词解释了一个纲领，即皇帝们和罗马皇家集团中的才智之士所共同赞许的一种纲领。而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词表达了这一纲领是怎样施行的，以及表达了安东尼努斯氏时代、特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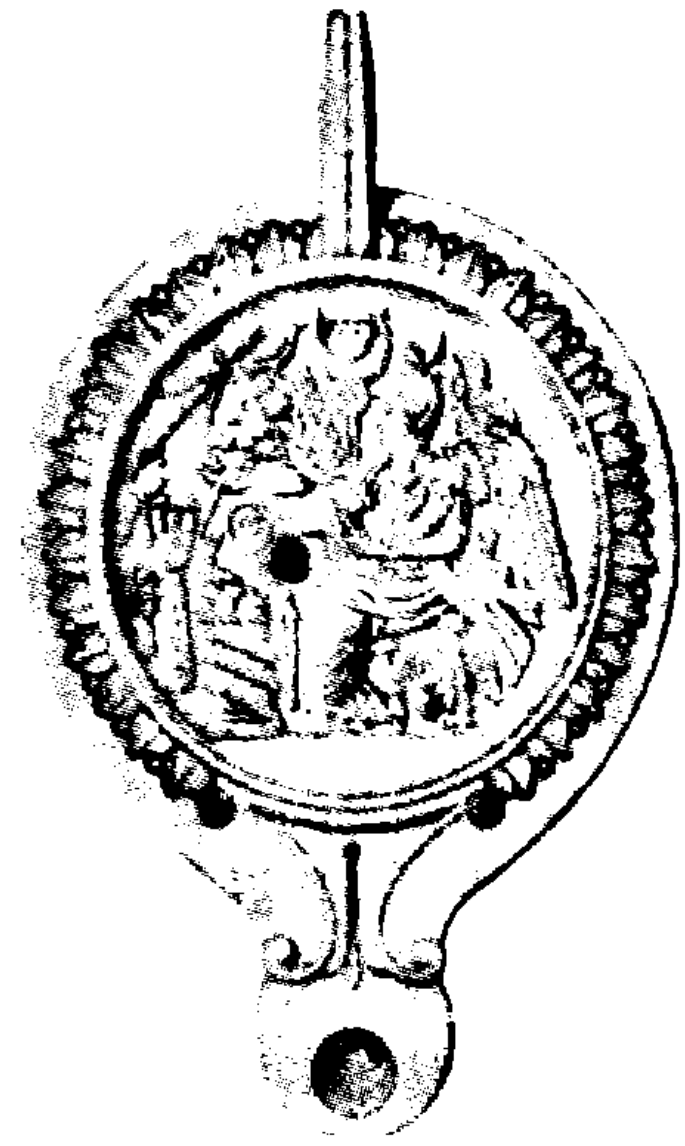
安东尼努斯·皮攸斯时代的实际情况究竟与帝国中的贤达们的理想适应到什么程度。无疑的是,阿里斯提德斯极其颂扬开明君主政体的成就,这是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与广大的都市居民、帝国各地的城市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证明这一点:在罗马各地曾建造了成千上万的碑柱来颂扬二世纪的皇帝们(尤其突出的是颂扬安东尼努斯·皮攸斯)和千秋万岁的罗马国家。

本章既要讨论帝国的城市,因此,自然一开始就得引述阿里斯提德斯的演说词中所表达的某些思想。阿里斯提德斯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而罗马城是世界的中心。阿里斯提德斯所谓的"世界"当然是指文明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而言,也就是指地中海地区而言。罗马帝国顺利地进行统一这个文明世界的工作,并终于成功,这是古代东方君主国和希腊城邦都未能完成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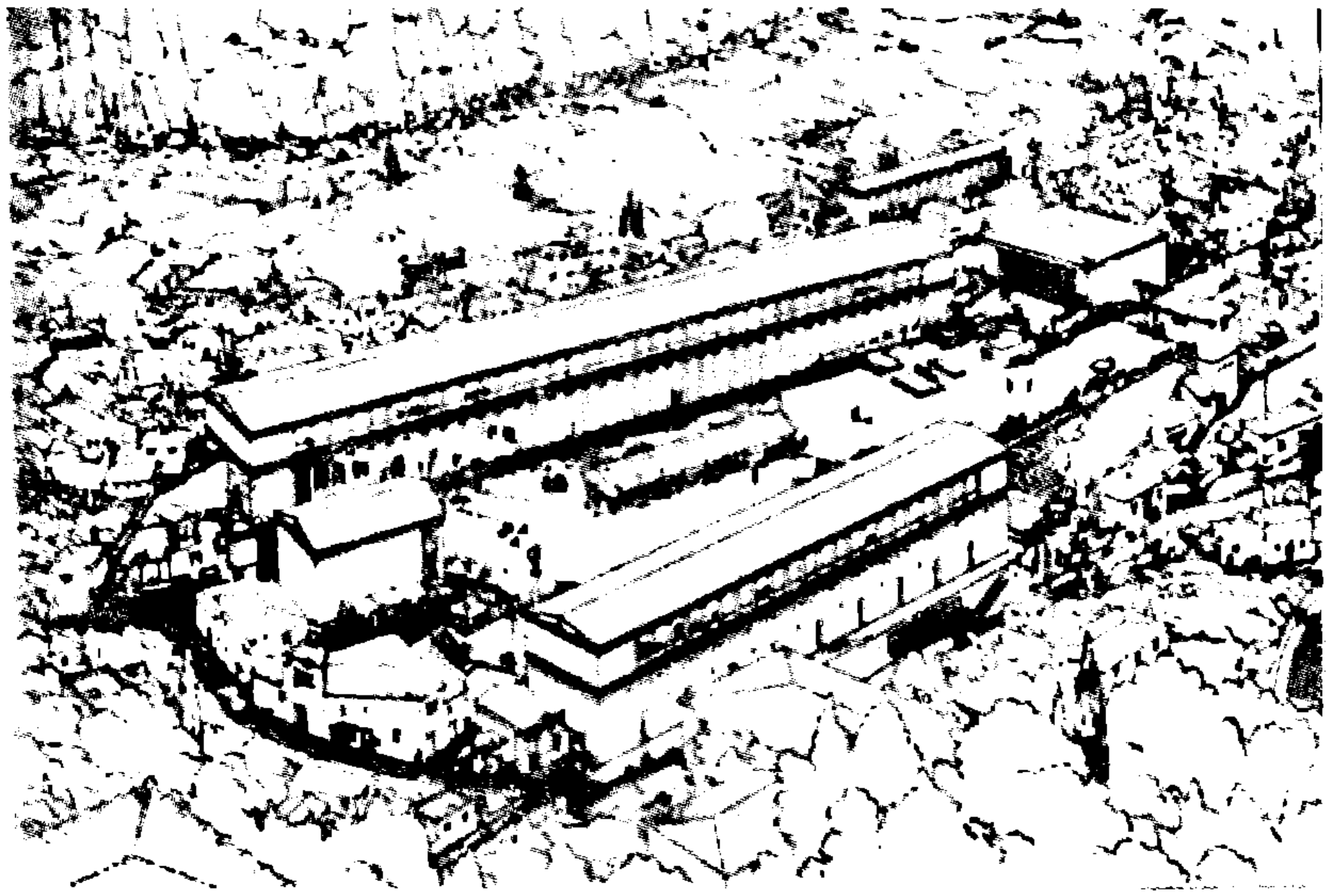
这种统一不是以奴役为基础的,而古代东方君主国、甚至连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的君主国都是靠奴役来达成统一的。这个大一统世界的首领不是一个主子(δεσπότης)而是一个统治者(ἄρχων)或领导者(ἡγεμών)。他统治着自由民,不是统治奴隶,而他之所以进行统治是因为他得到他的臣民的衷心拥戴。臣民们感到只有团结才能生存:于是世界变成了一个城邦(μία πόλις πᾶσα ἡ οἰκουμένη)。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什么希腊人同野蛮人之别,没有什么土著者和异邦人之别: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阿里斯提德斯并没有说),大家都是人。无论大人物或小人物,无论富人或穷人,在国家面前一律平等。但是,也存在着一种区别:有优秀的人,有一般的人。优秀的人是统治者,就是罗马公民;一般的人必须服从他们。不过,统治者倒不一定是罗马城或意大利本地人。他们是罗马帝国各个地



1. 印度



2.万神中之罗马女神



3. 阿索斯市场（复原图）

图 18　罗马帝国早期的繁荣

图 18 说 明

1. 银盘，部分镀金和镶金，部分嵌黑色合金或上釉。发现于兰普萨库斯。伊斯坦布尔博物馆。《考古学报》(法文)，3，图 XIX；H. 格雷文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15，1903 年，第 203 页，图 6；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174 页，1；E. H. 瓦明滕：《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英文)(1928 年)，第 143 页。格雷文把该盘归之于拜占庭时代早期之物。我觉得没有理由把它的时代推得那么晚。这是二世纪或三世纪的东西？希腊—印度混合式的或亚历山大里亚式的制品？

用人物形象代表的印度坐在一把式样特殊的印度椅子上，椅脚是用象牙做成的。她的右手向上举起，做祈祷状，左手执弓。身旁围绕着印度动物——一只鹦鹉，一只珍珠鸡和两只戴着项圈的驯猴。她的脚下是两个印度人领着一只驯虎和一只驯豹，准备斗兽，正做着敬礼的姿势。这个盘子很有价值地证实了罗马人对于印度具有丰富的知识，并深感兴趣。关于希腊罗马传说中所反映的印度动物，请看韦克所撰文，载《鲍利—维索瓦—克罗耳古典文物学实用百科全书》(德文)，ix，第 1301 栏起。

2. 男爵收藏品中之灯。发现于康帕尼亚。A. 埃隆·德·维厄福瑟撰文，载《皮奥氏文物图说》(法文)，5，1899 年，第 180 页起，图 44。

一位长着大翅膀的胜利神以象征繁荣的女神的形象代表着罗马：她手执 *cornucopiae*〈富饶角〉，并向一个被蛇缠住的祭坛或 *cista*〈圣物匣〉上奠酒(埃留西斯秘密祭中的 cista mystica〈圣物匣祭〉?)。所有象征繁荣和文明的诸神的标识都环集在她的周围：她的座位下是天神尤皮特尔的神鹫；座位后面是水神芮普土努斯的海豚；在她的两翼之间是鄂鲁斯神〈一位埃及的神，即埃及圣母伊西斯之子。——译者〉的神鹰；在左边有：埃尔库勒斯神的大头棒，埃及圣母伊西斯的 *sistrum*〈法器〉，文明神阿波洛的七弦琴，火神武耳卡努斯的火钳，财神梅尔库里攸斯的 *caduceus*〈和平标〉，酒神巴库斯的 *thyrsus*〈缠藤杖〉；在祭坛与女神之间有稷母神德梅特尔的火炬。但是，中央部分却为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些大神的标识所占据：谷穗，石榴，铜钹，小亚细亚王母神的大鸦，还有一个图徽由日神的圆脸和一轮蛾眉月紧连在一个球体上

构成——这是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些太阳神的标识。这盏灯是一个很美丽的徽识，它表现了强大的罗马帝国给东、西两方都带来了和平、繁荣和文明。

3. 小亚细亚阿索斯市场（*AGORA*）复原图。F. H. 贝肯：《阿索斯考查记》（英文）（美国考古研究所远征队）（1902—1921 年），第 27 页；参照第 21 页（阿索斯图）和第 33 页，图 4（阿索斯市场图）。

市场的一头是一座神庙（左边），右头是 *Bouleuterion*，即市议会会堂。在市议会会堂和神庙侧旁各有一座牌坊进口。市场长边的左面是一条很长的 Stoa（柱廊），类似罗马广场上的市政厅，右面是一个有趣的“劝业场”，其中有店铺、堆栈等等。商品陈列所侧旁是一所小小的 Herôon〈古英雄祠〉。在帝国时代，阿索斯是一个典型的小城市，一个朴素而安乐的市镇，从它那台城上美丽的古庙可以看出这个市镇有着光辉的历史。

区的优秀的人。由于他们是优秀的人，所以他们才成为罗马公民，也因之而成为统治者；他们统治帝国所有的组成部分，即所有的城市；而一般众人的职责就是服从。如果他们不服从，如果他们一旦作乱，如果他们企图突破现存的秩序，那么有力量迫使他们服从。

这个大一统世界的和平依靠两种力量作保证，其一是帝国的一套效率很高的行政机构——这是一套奇妙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另一种是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他们同时也是罗马公民。罗马军队同整个统治阶级一样，它所代表的是整个帝国，不是某一个部落或某一个民族，也不是某些部落和民族的联合组织；而且，也同统治阶级一样，军队的成员全都是国民中占统治地位的分子：他们都是罗马公民。多亏了官吏和军队的支持，使普天之下都享受和平与繁荣，这是史无前例的。普遍的和平促使城市繁荣发展，从而把帝国变成了一个由最繁华的城市组成的机体，其中尤以希腊、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的城市为著。

我们毫不掩饰地概述了阿里斯提德斯演说词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这虽是一个概述，但也足可看出他的思想与迪约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阿里斯提德斯在向罗马城的听众致词时，他自己完全知道他是代表开明君主政体的精神讲话的，他也知道他的话就是皇帝安东尼努斯本人也可能泰然说得出口的。同时，他的听众也迫不及待地插嘴打断他这些话。他们希望听到对于罗马的赞扬（真正的赞扬，而不是单单的奉承），希望听到对现况的赞扬，要能令人信服，要能消散那种衰乱将临的不祥预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很公开地谈到这种预感，像史学家安努斯·弗洛鲁斯就认为罗马帝国时期代表人类文明的风烛残年（*Senectus*）。

我们既已陈述了阿里斯提德斯所描绘的情况，现在再按照现代的观念来描绘一下罗马帝国的情况，我们唯一能胜过阿里斯提德斯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仅能就罗马帝国的历史来谈，而且还能就其日后的发展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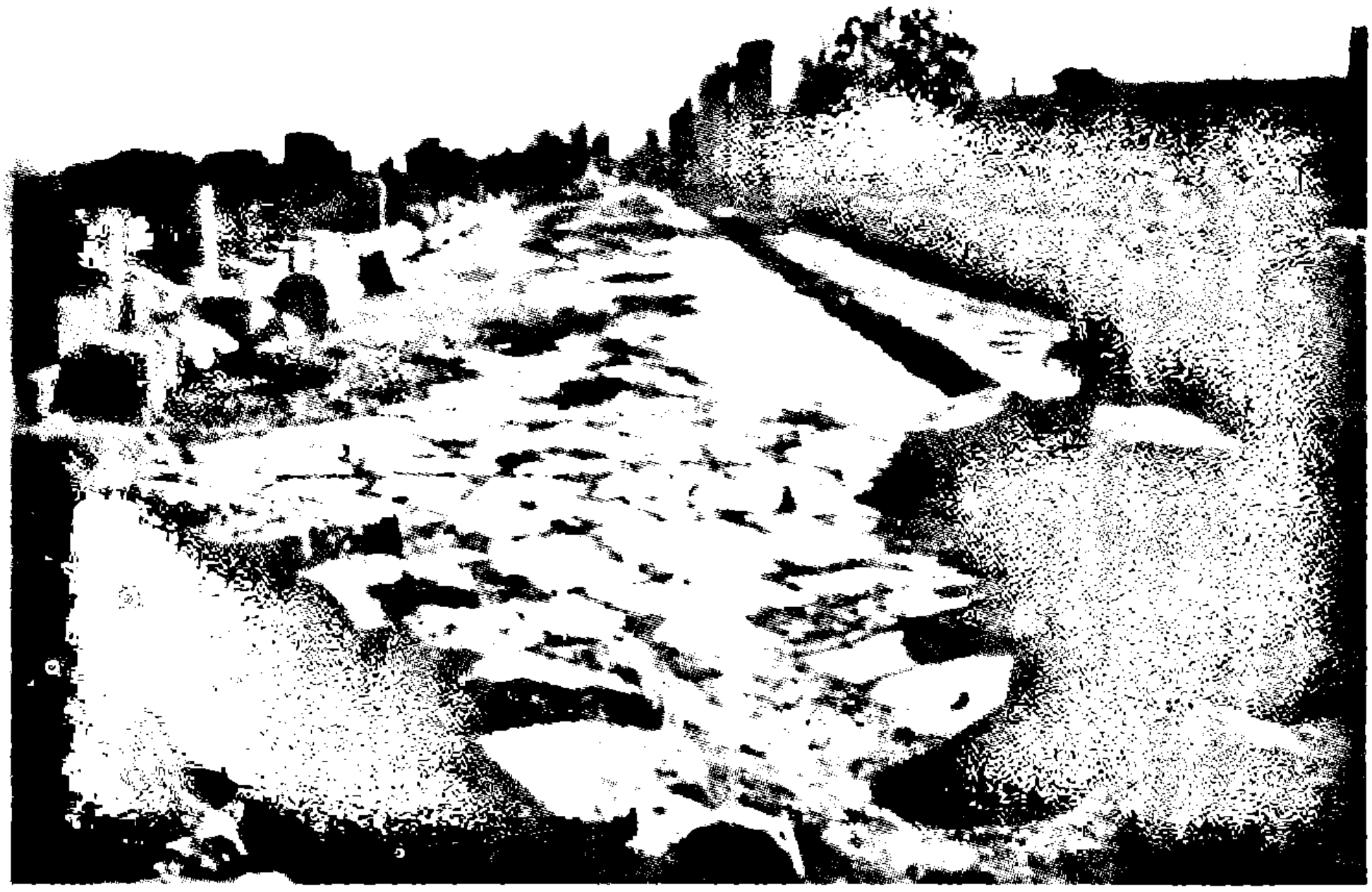
阿里斯提德斯着重指出罗马帝国是一个希腊城市、意大利城市和外省城市的结合体——外省城市里居住着本省中的一些多少希腊化和罗马化了的土著，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城市都规定辖领一块或大或小的地区，我们通常称之为“市辖区”。这个市辖区或者是一个古代希腊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领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罗马人而指定分配给某个新城市或旧城市的土地，这样的城市也许是罗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许是土著的市镇。我们已经谈过帝国城市生活逐渐发展的情况，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一贯促进这种发展，奥古斯都和克劳迪亚斯是其中致力之最积极者。到了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

期，这种发展并未停止。我们也曾提及，韦斯帕西安积极地在帝国各地，特别是在北意大利、西班牙和达尔马提亚等处建立新的城市，或者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安东尼努斯氏的新“王朝”推行同样的政策，图拉真和阿德里安推行尤力。自从那些希腊化君主国灭亡以后，以皇室人名为名的城镇，特别是东方这种城镇，其数目之多以这两位皇帝时为最。在东方的希腊化地区和半希腊化地区，除了原来以尤留堡和弗拉维攸堡为名的城镇以外，兴起了许多以图拉真堡、普洛提娜堡、马尔契亚堡和阿德里亚堡（或其他与阿德里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地名）为名的城镇。似乎图拉真和阿德里安有意在这方面超过条支王朝、阿塔卢斯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图拉真在达契亚、上梅西亚、下梅西亚和色雷斯一带所进行的积极活动尤其重要。他在这一片辽阔的地区上的土著居民中所造成的深刻印象，可以与亚历山大之为人在东方深人人心的程度相比，有一些文物遗迹、一些地名和一些传说故事（当这些传说故事产生的时代帝国本身也已经仅仅成了传说）都反映了这一点。图拉真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影响，并非单单因为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最先在现在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推行都会化运动并使这个地区接受希腊和罗马文明。恺撒和一世纪的皇帝们，包括弗拉维攸斯氏在内，在北意大利、在高卢、在来因河流域、在不列颠、在西班牙、在达尔马提亚等地所曾建树的成就，图拉真及其继承者们——特别是阿德里安——同样地建之于多瑙河流域的东部。图拉真在外约旦和阿拉伯推行都会化运动的工作比较次要，因为在那一带，大部分工作都已经由弗拉维攸斯氏完成了。在阿非利加，从奥古斯都以来，都会化运动一直在进行，未曾中断。阿德里安甚至还在埃及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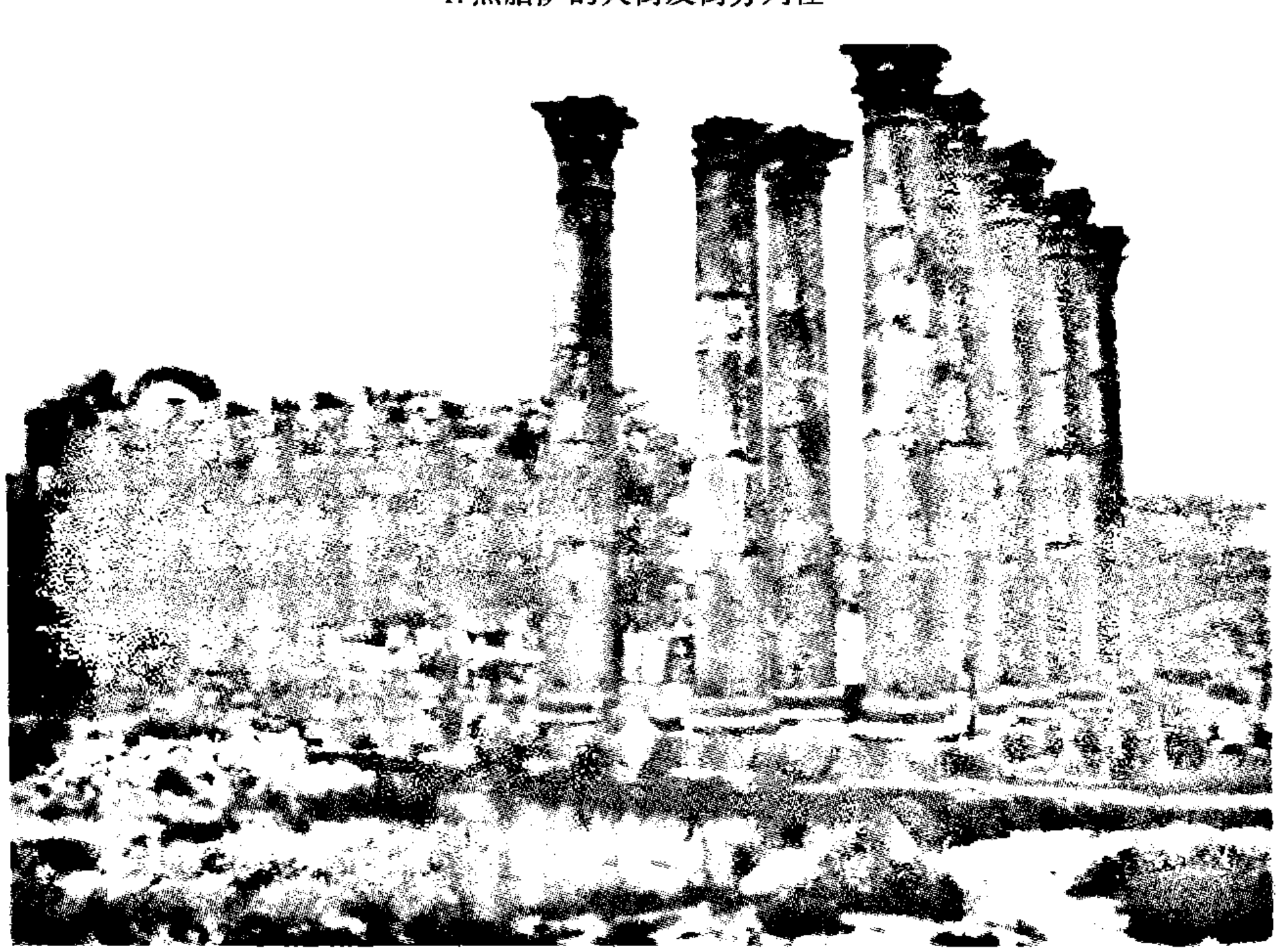
立了一个希腊式城市，名之为安提诺堡，这是托勒密王朝以后所建立的第一个希腊式城市，也是最后的一个。

以皇室人名或以当地土名为名的新城市，一部分原先是村庄或小市镇(其中居民大多是土著)，一部分则是罗马退役军人的屯市，这在阿非利加、来因和多瑙两河流域尤为多见。甚至把罗马皇帝们的一些较大的辖区外庄田(关于这点，将在下章中谈到)上的若干居民点也被认作城市，而把皇室庄田或其一部分田地划作这种城市的辖区。这些新城市中，没有一个是特意新建的。这完全是各行省转向都会生活的自然发展趋势。但是，如果不是皇帝们精心筹划出严整的制度并投付大量资金来支持这种运动的话，外省是不可能掀起这样一个迅速的都会化运动的。应当提到的是，并不是安东尼努斯氏时期的皇帝们自始至终都积极支持这个运动。自从阿德里安以后，虽然发展进程一直没有完全停顿过，但成立新城市的现象却是越来越少见了。

因此，二世纪时的帝国所呈现的状态，比以前更像是一个由城邦组成的大联盟了。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谓的“政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个中央政府的首脑就是皇帝，他是居于首位的统治者，是元首，是领导者。他的代理人，有文职的，也有武职的，都以他的名义行使职权。元老院仍然被视为皇帝权力的根源，这仅仅因为就理论而言皇帝的权力是由元老院授予的；而实际上元老院在国家生活中只占次要的地位，只算是帝国的高等法院和议会而已。从法律上说，中央政府仍然是元老



1. 杰腊萨的大街及街旁列柱



2. 杰腊萨的阿尔特米斯女神庙

图 19　外约旦沙漠商道上的城市杰腊萨

图 19 说 明

1—2. 外约旦杰腊萨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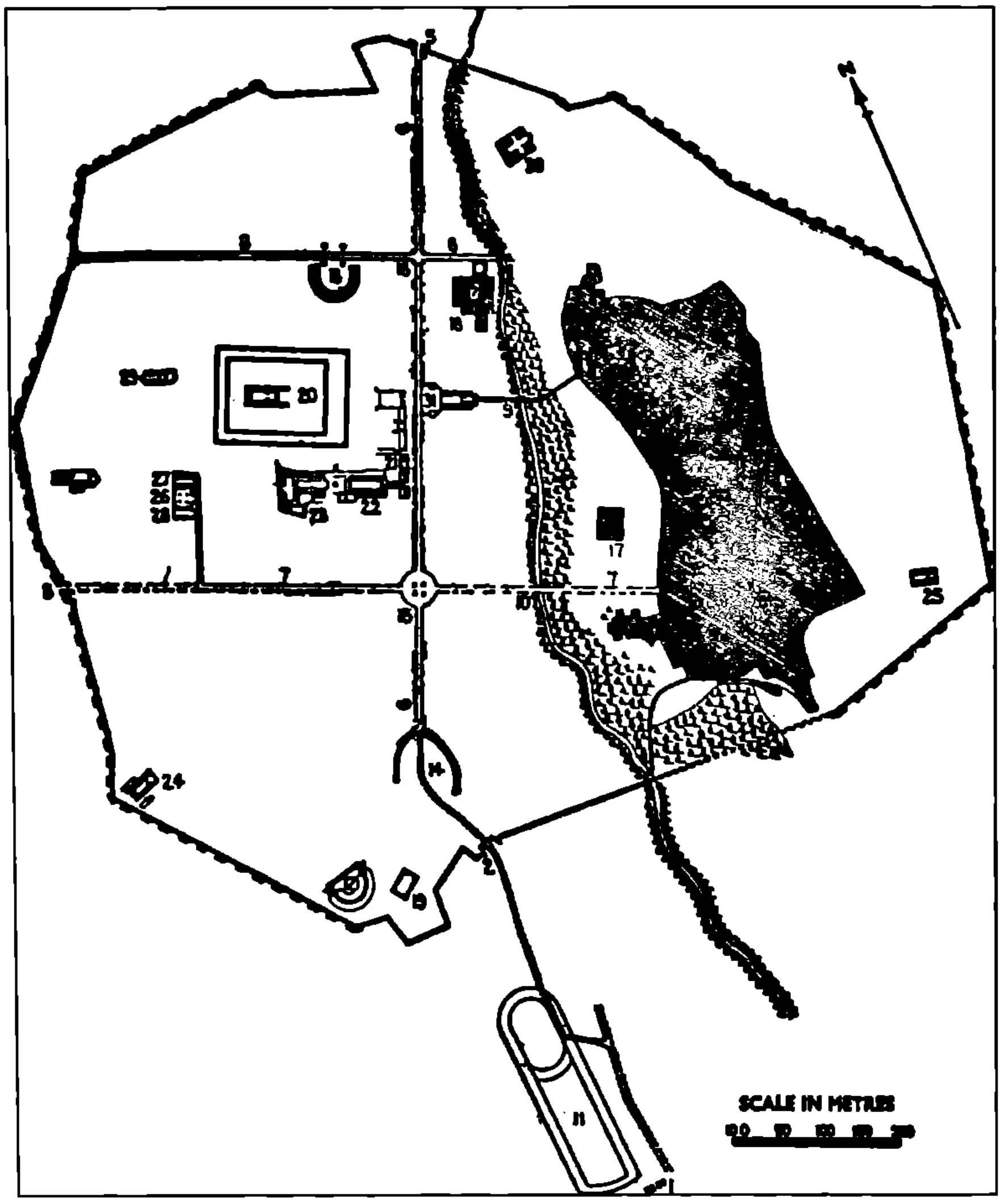
1. 大街及街旁列柱，从北门往南。最近由外约旦文物局局长 G. 贺斯菲尔德清理出来。右边高地上是该市一所大“阆宫”、即阿尔特米斯女神庙的壮丽遗址。

2. 阿尔特米斯女神庙。该庙尚未发掘完毕，其历史仍系悬案。

今根据拙著《沙漠商道上的城市》（英文），1932 年，第 54 页，复制杰腊萨城平面图如下。（见第 199 页图）

城门：1. 拱门，2. 费拉德尔非亚门，3. 佩拉门，4. 加达腊门，5. 大马士革门。街道等：6. 安托尼讷街，7. 佩拉街，8. 加达腊街，14. 广场，15. 南四牌楼，16. 北四牌楼，9. 阿尔特米斯桥，10. 佩拉桥。游艺场：11. 跑马场，12. 南剧场，13. 北剧场。市政建筑：17. 东浴池，18. 西浴池，21. 宁妃池〈Nymphaeum〉。神庙：19. 天神宙斯庙，20. 阿尔特米斯女神庙。教堂：22. 主教礼拜堂，23. 圣狄奥多教堂，24. 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25. 保罗主教教堂，26. 施洗者圣约翰教堂，27. 达米亚诺斯教堂，28. 圣乔治教堂，29. 犹太会堂所改之教堂，30. 先知、使徒和殉道者礼拜堂，31. 山门教堂，32. 创世教堂。

杰腊萨是一个典型的沙漠商道城市。沙漠商队的大道变成了一条两旁有着漂亮列柱的街道，大体上顺着河岸由北往南。南门外是一座美丽的“凯旋式”拱门的遗迹，这座拱门和一个很大的竞技场（一般称为“水战剧场〈Naumachia〉”）相连。该城南端是最古老的建筑：一个很美丽的剧场，大概是希腊化时代修建的，后来经过多次重修（最近由贺斯菲尔德发掘出来），其附近有一座神庙。南门近处有一个令人注意的椭圆形的 *piazza*〈广场〉，大概是沙漠商队的一个休息场所和市场（尚未发掘完毕）。那条大街上点缀着两座 *tetrapyla*〈四牌楼〉和一座 *nymphaeum*〈宁妃池〉，后者系由贺斯菲尔德发掘出来并加以部分复原。离宁妃池不远就是那宏伟的 *propylaea*〈山门〉，进了山门，上台阶一直通到中心神庙。这座山门现在已经由贺斯菲尔德发掘完毕，正在重修（请看 G. 贺斯菲尔德：《外约旦政府文物局公报》（英文），i，1926 年，图 I—IV（“宁妃池”和“山门”））。神庙旁是另一个剧场的遗址。最值得注意的一些基督教教堂的遗址已经由耶鲁大学和英国耶路撒冷学院（以



杰腊萨平面图

及美国耶路撒冷学院)联合组织的远征队发掘出来:请看 J. W. 克娄富特的初步报告,载《巴勒斯坦考古发掘基金委员会季度报告》(英文),以及美国耶路撒冷学院方面领导发掘工作者们的初步报告,载《美国东方学研究社公报》(英文)〔请看 C. H. 克雷林所编之《德卡波利斯地方的杰腊萨城》(英文)(1938 年)〕。所发现的碑铭文字已由 A. H. M. 琼斯发表于《罗马学杂志》(英文)18,1928 年,第 144 页起,和同一杂志 20,1930 年,第 43 页起〔C. B. 韦尔斯所撰文,载《德卡波利斯地方的杰腊萨城》(英文),第 355—494 页〕。

图 20　希尔姑兰城：城南地区，正在进行发掘中

图 21　希尔姑兰城：
一所房屋的内部

图 21 说 明

希尔姑兰城的新发掘。那不勒斯，国民博物馆。一所萨谟奈式的房屋的内部，这所房屋在罗马时代经过重修和装饰。在正厅和餐厅之间有一扇很大的木隔屏，开着三个门，有两个门保存无恙。参考 A. 马攸里：《希尔姑兰城》（意大利文），第 2 版（1937 年）。

院和罗马人民的政府，事实上，它却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政府，不过因为把某些特权赐予了罗马公民的上层阶级，同时因为各城市有自治之权，所以专制的程度有所限制。城市的自治权的确差不多是完整的。皇室的官僚机构很少干预城市的地方事务。它几乎只专管收税（大多由城市经手），管经营皇庄和国家的田庄，以及管一部分司法事务，其余就不过问了。

罗马帝国与现代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既不是由帝国中有政治权的国民选举出来的，也不受他们的控制。在罗马帝国里，是中央政府监督和指导城市的自治机构，而不是它受城市自治机构的监督和指导。这个中央政府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好像是从它还是一个城市的政府那个时代传下来的遗产，不过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霸主了。所以，二世纪的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的联盟和驾凌于这个联盟之上的一个近乎绝对专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体，而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

因此，无怪乎凡是有关罗马帝国的文字史料几乎全都涉及罗马城和涉及中央政府的活动。然而，我们也偶然知道一点帝国其

他城市的生活状况。关于意大利和帝国西半部的城市，只要提到斯塔丘斯、马尔恰耳、尤韦纳耳和小普利尼等作家的作品就够了，关于希腊和东方希腊化地区的城市，只要提到小普利尼、迪约·克里索斯托姆、卢契安、弗拉维攸斯·约塞富斯、菲洛、阿里斯提德斯等人的作品就够了。而且，这些城市本身是很饶舌的。它们有着成千上万的碑铭和苇纸卷，有希腊文的，也有拉丁文的，通过这些资料使我们知道许多有关城市生活的重要的和无关紧要的详情细节，其内容之丰富足使我们相当容易地恢复它们的基本面貌。此外，近代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工作自然首先以城市遗址为发掘对象。某些城市的遗址，特别是那些自从罗马政权崩溃后就荒废了的地区如小亚细亚、叙利亚、阿非利加等地的城市遗址，保存得很完美，令人分外感到兴趣。最后，还有着数以万计的钱币，这些钱币大多数仍然是由帝国各城市自行铸造的，它们对各城市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等方面的许多重要问题提供了最宝贵的报道。这些材料使我们不仅认清了许多古代城市的外貌，而且还认识到这些城市生活每一个方面的主要面貌——一方面可以辨认它们的城垣、城门、街道、公共场所和公私建筑，另一方面可以弄清它们的市政组织、收入开支、公私财富及其财富来源、宗教信仰、文娱生活和文化事业。

研究这些史料所获得的第一个印象是令人不胜惊异的。自有史以来，在欧洲、亚洲和非洲还从来未曾有过这么大一片地区其基本面貌呈现出如此文明、还可以说如此现代化的景象。那些城市之中，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富庶豪侈的，也有贫穷简朴的。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竭尽全力改善城市的生活，使之尽可能方便、舒适。

罗马，这个壮丽辉煌的世界首府，当然是帝国所有的城市中最令人叹赏、最令人颂扬的一个。它既完全值得我们今天赞赏，其值得当时人的赞赏更不待言：就是罗马城的遗址还那么美丽，它的公共建筑物的遗迹还那么动人——如神庙、皇帝们的宫殿及其城内的"苑囿"和城郊的离宫别墅、民用的大建筑（浴堂、市政厅、柱廊）、公共场所和公园等等。与罗马城比美的有那些最富足、最繁荣的行省的首府：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的安蒂奥克、小亚细亚的以弗所、阿非利加的迦太基、高卢的里昂。稍逊于此的有东西两方数以百计的美丽的大城市。我们可以略举几个以见一斑：意大利的蓬佩伊、普特约利、奥斯蒂亚、维罗纳和阿魁累亚；西西里的陶罗梅纽姆、锡腊库塞和帕诺尔木斯；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马西利亚、纳尔博、阿雷拉特、讷毛苏斯、阿劳西约、奥古斯塔—特雷韦罗鲁姆、阿格里皮嫩西斯屯市、崩纳、莫根恰库姆和阿尔展托腊特；英格兰的隆迪纽姆和埃布腊库姆；西班牙的塔腊科、科尔杜巴、伊斯帕利斯、意大利卡、埃梅里塔和阿斯土里卡；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阿德鲁梅土姆、契尔塔、伊波—雷纠斯和凯撒雷亚；昔兰尼加的昔兰尼；伊斯特利亚的特尔杰斯特和波拉；达尔马提亚的萨洛纳；潘诺尼亚的埃莫纳和佩托维约；马其顿的特萨洛尼卡；希腊的雅典、科林斯和罗得；亚细亚的斯米尔纳、佩尔加蒙、萨尔迪斯和米勒土斯；加拉戚亚的安契腊和安蒂奥基亚—皮西迪亚；弗里季亚的佩西努斯和埃札尼；契利契亚的塔尔苏斯；比提尼亚的尼策亚和尼科梅迪亚；马尔马拉海及其附近海峡岸边的契齐库斯和拜占庭；黑海上的锡诺普，黑海西岸的托米和伊斯特鲁斯；克里米亚的潘提卡佩乌姆（一个附庸城市）和克尔索讷苏斯；腓尼基的提尔、

西顿和阿腊杜斯;叙利亚的埃利约波利斯、帕耳米腊、大马士革、费拉德尔非亚(安曼)和杰腊萨;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上之塞琉契亚;阿拉伯的佩特腊和博斯特腊;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以上所举只不过是上千个城市中挑出来的少数几个,一半由于它们在我们所见到的文字史料中受到赞扬,一半由于它们以其遗址保存得完好而著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城市的名字。此外,考古发掘工作使我们发现了很多在文字史料中几乎绝未提到的城市,而它们却都是一些富丽繁荣的居住中心地。这类城市也可以举一些例子,如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土加、土布尔博—马攸斯、土布尔西库—努米达鲁姆、布拉—雷季亚、苏费土拉、阿耳提布罗斯、季格提斯、的黎波里斯(鄂亚、萨布腊塔、勒普契斯)、特韦斯特、兰贝西斯、塔木加迪、马道鲁斯、奎库耳和沃卢比利斯;多瑙河上的卡尔嫩土姆、阿昆库姆和伊斯特鲁斯附近之尼科堡;现在瑞士境内的文多尼萨和奥古斯塔—劳里卡;雷戚亚的卡斯特腊—雷季纳(勒根斯堡)和坎博杜努姆;诺里库姆的维鲁努姆;达尔马提亚的多克勒亚;英格兰的卡勒瓦—阿特雷巴土姆(锡耳彻斯特)、文塔—锡卢鲁姆(塞温特)和阿奎—苏利斯(巴思);小亚细亚的阿索斯;埃及一些大村庄和小城市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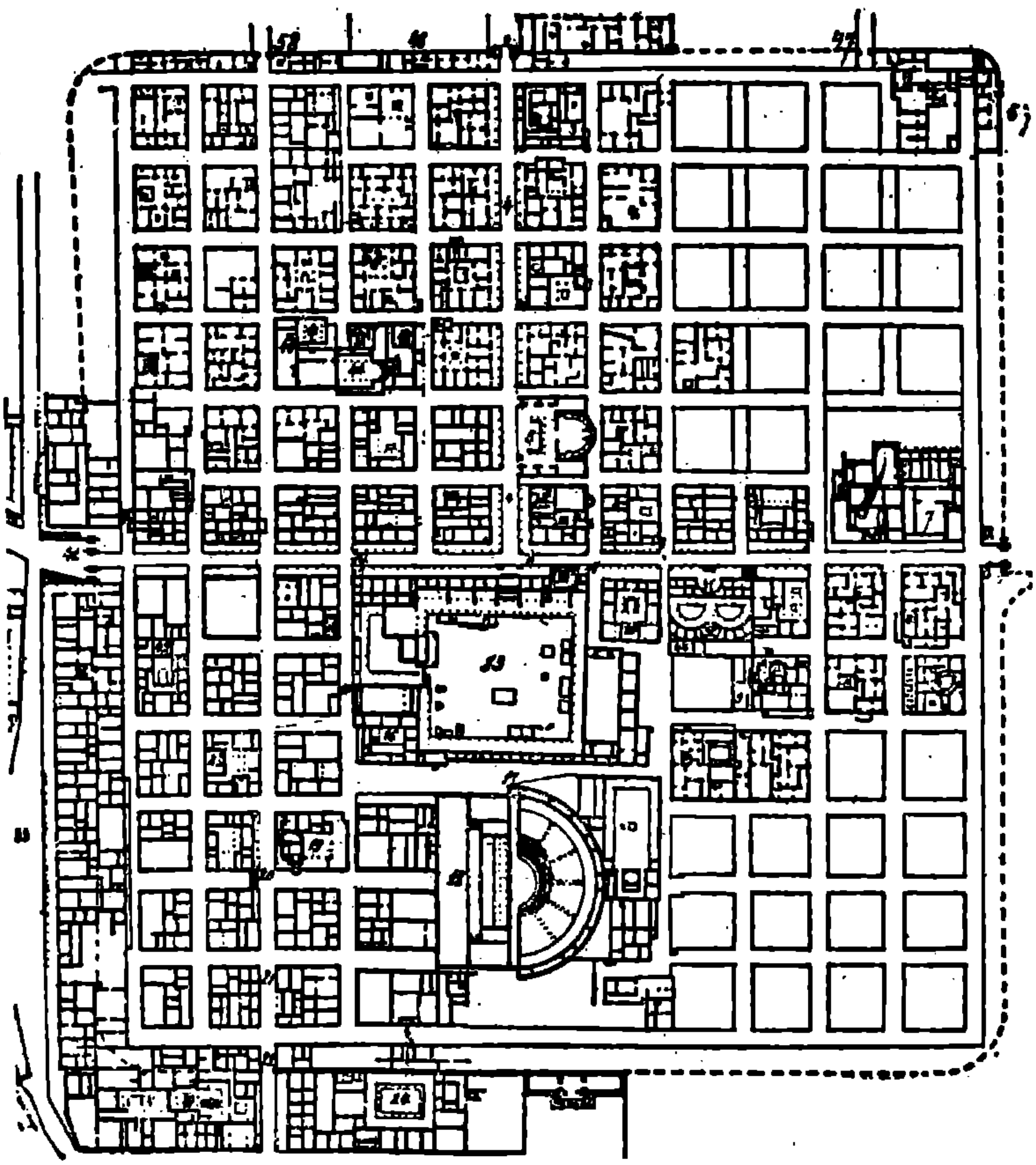
罗马帝国的城市当然不是完全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各因其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而有所不同。首先是一些大而富庶的工商业城镇,其中大多是大海或大河航道的中心,某些——如帕耳米腊、佩特腊和博斯特腊——则是沙漠地区往来频繁的商队的重要聚会中心。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帝国中最美丽的城市大多属于这一类。在这些领导文明生活的大城市之下,还有着许多建设得很好的大市镇——

图 22　一个罗马行省里的城市：提姆加德（塔木加迪）

图 22 说 明

努米底亚塔木加迪城(提姆加德)的部分遗址。P. 贝斯威瓦耳德,A. 巴卢和 R. 卡尼亚:《阿非利加的一个城市提姆加德》(法文)(1901—1905 年);A. 巴卢:《附插图的提姆加德(古塔木加迪)便览》(法文),第 2 版(1904 年)。

从剧场(平面图中第 18 号)外望的景象。靠近中央的方地是广场和广场上的建筑物(平面图中第 13 号)。照片上所见到的有两根圆柱的建筑是胜利



提姆加德城中央部分(旧屯市所在)平面图

神之庙;庙前有一个平台,是长官们用来向市民演讲和发布公告的讲坛。庙旁有大家所熟悉的公共厕所(*latrinae*,平面图中第 12 号)。广场四围都是柱廊。广场后面是一条大街,即 *decumanus maximus*(前门大道)(平面图中第 6 号)。在前门大道截断旧城城墙(该城本来是图拉真时代的一个军屯市)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华丽的拱门以纪念图拉真。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这拱门的遗迹巍然屹立(平面图中第 41 号)。其他遗址大多为私人住宅、公共浴场、市场和基督教教堂的废墟(如平面图中第 44 和第 46 号就是基督教教堂,第 45 和第 62 号就是私人住宅)。平面图中第 5 号是有名的提姆加德公共图书馆。

广阔肥沃的农业地区的中心,行省或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域的首府。它们大多位于重要商道的交叉点或位于一条可通航的河流之旁,同时也就是外省地方性商业的重要中心。由各个贫富不等的农业地区里的村庄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较小的城市实际上也属于上面这种类型,差不多上文所提到的所有的阿非利加城市以及不列颠、西班牙、高卢、日耳曼尼亚、阿尔卑斯山区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地的许多城市都属这类。在埃及,像这种城市虽然是幅员不小的富庶区域的行政中心,但在法律上还根本不算城市而只算村庄。它们由于自然发展而使得自己的外貌居然像一个标准的、设备齐全的希腊—东方式城镇了。

帝国所有的城市,尽管面积大小、人口多寡、财富、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但都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如前所述,它们全都尽其可能地致力于使它们的居民生活舒适;它们的外貌全都类似现代西方的某些城市,而不大像现代东方的城市和村庄。我确信,现代意大利的某些城市或大多数城市同它们在罗马时代的旧形相差极小。几乎帝国全部城市,特别是希腊化东方的城市,全都有一套非常科学的排水系统;有着建设精巧的水道,输水源源

不断，甚至在高楼之上也能用水方便；有铺砌得很讲究的街道和广场，沿着街道两旁盖着柱廊替行人遮蔽阳光和挡雨；有洁净宽敞的市场——特别是鱼肉市场供水便利；城内到处都有漂亮的大浴堂，使每个市民能天天洗澡而所费无几；有规模宏大、设备精良的游艺运动场所——竞技所和角斗演习所。在宗教方面修建了巍峨辉煌的神庙和祭坛，城门之外，大路两旁还有神林和一长排美观的墓碑。所有的城市里都见得着高大的公用建筑：有 *curiae*（本地议政会的会场），有长官们的衙署，有供官方 *collegia*〈社团〉以及公众选举时投票人聚会的大厅，有审理案件的市政厅，还有监狱等等。此外则是一些供公众娱乐和教育事业用的建筑：如剧场、竞技场、竞走场、圆形剧场、公共图书馆、供辩论和公众演讲用的 *auditoria*〈讲堂〉和图片陈列馆。至于私人住宅则大多大小适宜，设备之舒适与现代一般无二，例如大多备有私用浴室和自来水，登楼则有砌得考究的石级之类。

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可以说，就舒适、美观和卫生方面而言，罗马帝国的城市不愧为希腊化时代前身的继承者，而比之于现代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城镇也毫无逊色。无怪这些城市的居民中竟有那么多的人那样深切、衷心地热爱它们。我们从阿里斯提德斯对斯米尔纳的描写——他原籍并不是该城人而只是后来才被接纳为该城市民的——或从迪约对罗得的描写——他和罗得毫无关系，或从许多有关雅典的描写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热爱城市的感情的具体例子。它们表明罗马帝国的人民对于自己建立城市和都会文明这件伟绩是引以自豪的。城市的辉煌壮丽几乎要完全归功于居民中上层富裕阶级的慷慨捐输。至于它的经常费用当然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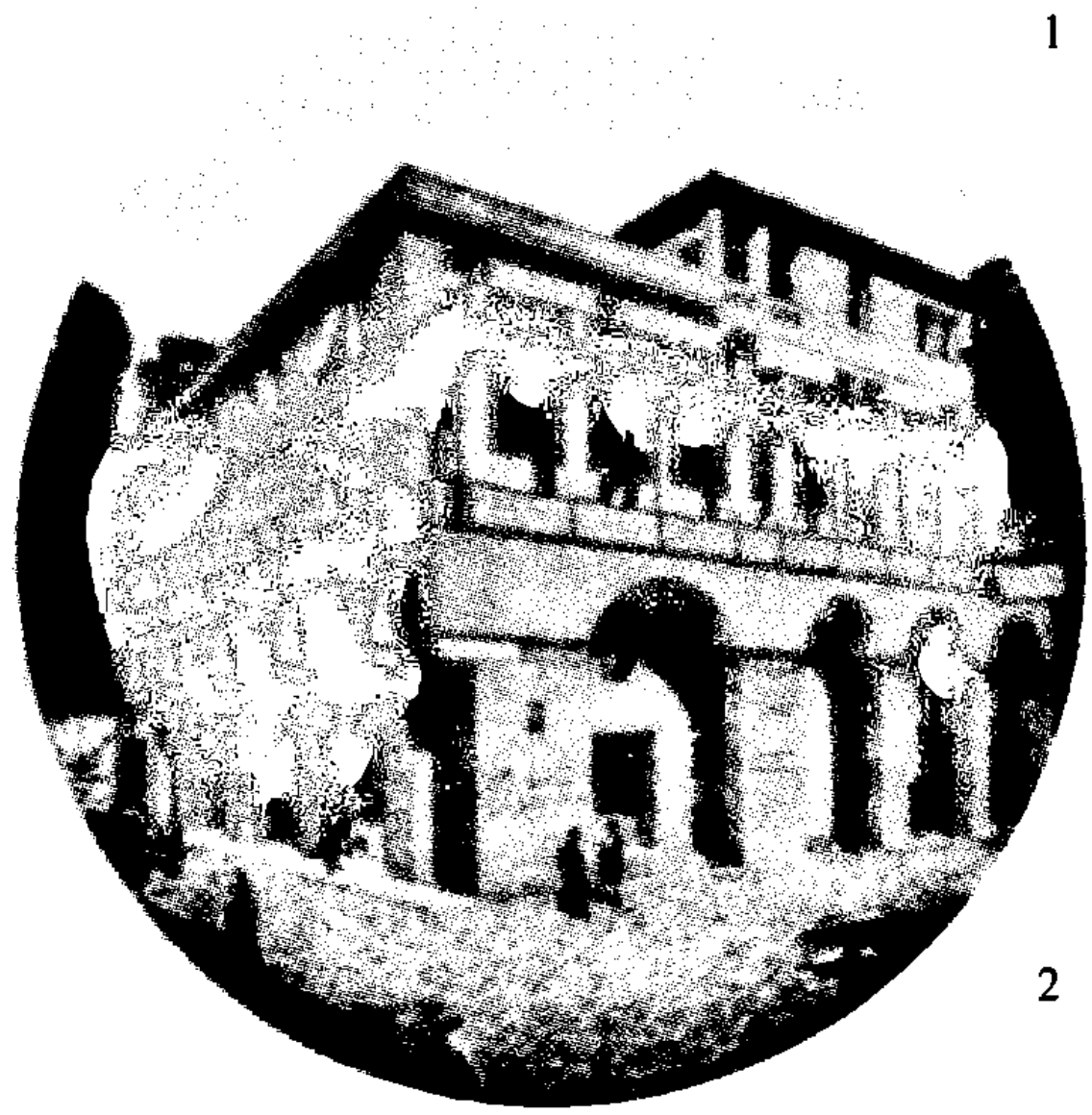
靠正规收人，那就是从居民中征收来的各种赋税，纳税人包括本市市民和侨寓者或近郊居民（在东方希腊化地区为 πάτοικοι〈侨民〉，πάροικοι〈郊民〉等；在西方为客户，*inquilini*〈侨民〉，*populi attributi*〈郊民〉）。税收制度是根据数世纪的经验而精心制订出来的，特别是取自希腊化时代的经验。举凡城市辖区内的土地、城中的不动产、货物的进出（市关税）、商业的经营、契约的订立和买卖的成交、市场的使用（租用公家铺面的租金）和其他公家不动产的使用等等项目都要纳税。

因此，城市的收人，特别是富庶的大城市的收人，有时是非常可观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城市的经常开支也是非常大的，不论从哪方面看的确都比现代一个城市的开支更大。当然，城市并不支付长官们的薪俸。民政官或宗教官之为城市出力服务，或认为这是一种荣耀，或认为是一种负担；不管是荣耀也好，负担也好，意思就是说担任这些官职是没有报酬的。但城市的下级吏员需由城市支付其俸禄，他们有些人是公众的奴隶（δημόσιοι，*servi publici*），所以必须供给他们住处和衣食，有些人则是自由的雇员。这些吏员的俸禄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而修缮和赡给各种公用建设的费用较此更大。

城市和城市长官们最麻烦的任务之一就是能保证公众消费的食品“充裕”（*abundantia*），尤其要保证口粮（*annona*，εὐθηνία）[①] 充裕。在罗马城，由皇帝负责。在其他城市里，这是城市议政会和城

① annona 一词意义很多，在本书中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译为“粮食”、“口粮”、“公粮”和“公粮税”等。——译者

21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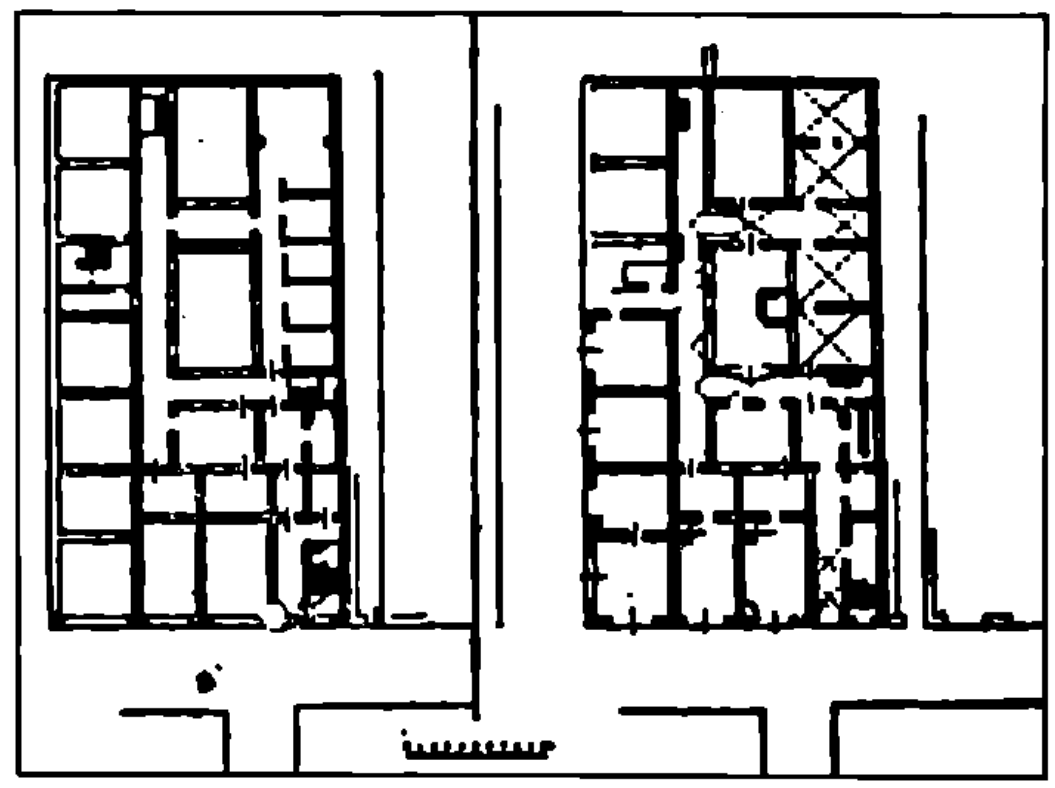
3

图 23　奥斯蒂亚地方的房屋

图 23 说 明

1．奥斯蒂亚地方迪亚娜的房屋的遗址。G. 卡尔扎：《从拉丁住宅建筑看现代住宅形式的起源》，载《建筑术与装饰艺术》（意大利文），3，1923 年，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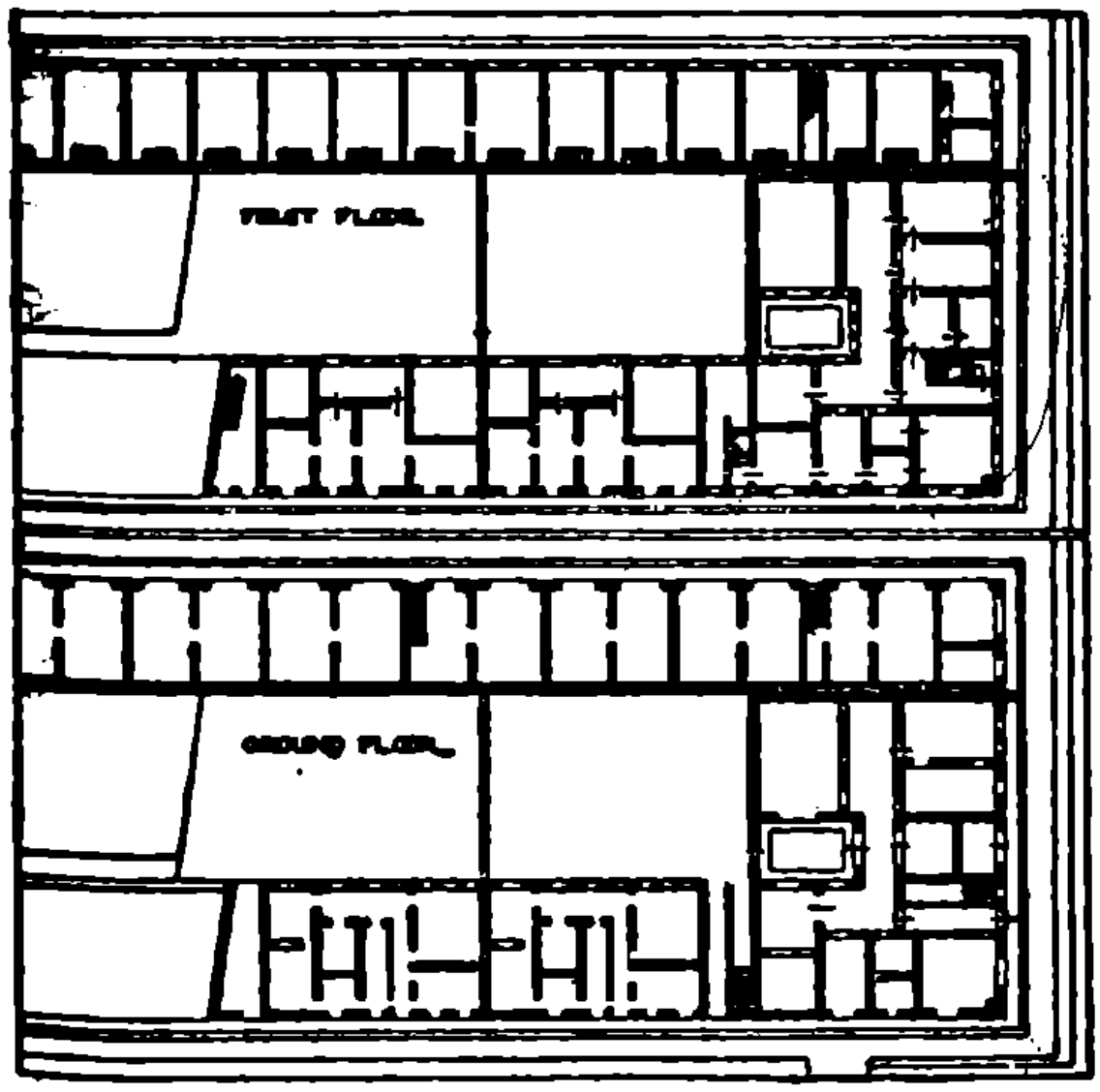
一处典型的大房屋遗址，该屋分成若干单元，系公元二世纪时所建。从右附平面图可以看出中间天井周围上下两层房间的分配情况。



迪亚娜的房屋平面图

2. 时运街街角房屋的复原图（建筑师 I. 季斯蒙迪复原）。G. 卡尔扎，前引文，图 22。

一所四层楼的公寓。一楼开着店铺（其中一家是酒馆，*thermopolium*），上面几层是住房，有些房间面积很大（租给有钱人的）。请注意那漂亮的游廊



FIRST FLOOR:
一楼

GROUND FLOOR:
底层

劳伦斯所复原的“迪平提氏住宅”平面图

和吊楼。

3. 奥斯蒂亚地方"迪平提氏住宅"内院正面复原图(建筑师 I. 季斯蒙迪复原)。G. 卡尔扎,前引文,图 28。

我们看到的是这所大住宅的内院,其中有着花木池沼等。上附的平面图是建筑师劳伦斯复原的,从该图可以看出底层和一楼的房间的分配情况。

市长官们的主要责职之一。为保证粮食供应充足所必需的条件是并不有利的。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辖区面积的大小不足以供应足够的粮食。何况,收成的变化无常乃是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的显著特征,就是像埃及这样的地方也不例外。所以,所有的城市都多少免不了依靠经常性的或偶然性的粮食进口。没有一个城市能长保自给自足。因此,组织粮食市场,特别是组织大批粮食的运输工作,成为帝国各个城市的一个首要问题。中央政府并不负责解决调整市场的问题。相反地,在有关生活必需品的贸易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反而设下了许多严重的障碍。对于皇帝及其所属官吏们说来,国家和国家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说,尤关紧要的是如何保全他的权力。因此,他们为本身利益而垄断了大量的谷物,用以供应罗马城和军队:只有得到皇帝特许状者才可以从埃及运出粮食。皇帝们的大庄田遍于帝国各地,所产谷物为量甚巨,也都用于此目的。这些皇庄上所产的谷物很少出现在公开的市场上。而且,我们在下文就会看到,运输工具到处都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而船舶和驮兽的业主并不能自己做主用其全部力量来解决满足国民需要的问题。首先必须满足国家和皇帝的需要。尤其重要和麻烦的是运输问题。虽然海上此刻平安无事,海盗已经销声匿迹,虽然皇帝们在陆上修筑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交通

网，然而，问题之严重和困难仍然与以往一样。每一个行省里都兴起了无数的新城市，其中有些离海很远，离水运干线很远，甚至离主要道路都很远。这些城市尽力修筑区间道路，使它的辖区同主要道路、同河流、同海洋联系起来。但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修筑和修补道路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这些区间道路的修建费和养路费完全由城市自己负担。而且，即使修建了很好的道路也并没有解决问题。陆上运输比起海运和河运要花费大得多。因此，要从陆上运输大量粮食不是那些较小较穷的城市所负担得起的。

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帝国所有的城市差不多全都经常遇到缺粮和粮价高涨的灾季，就是那些最肥沃的地区的城市也在所不免，而意大利和外省山区里的城市则尤为甚焉。真正闹饥荒的年成确属屡见不鲜。一遇到饥年通常社会上就准会发生严重的骚乱，大家指责长官们和议政会考虑不周，指责大地主和粮商贪图暴利。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发生暴动和示威。要预防这种灾难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在正常的年份，也要城市花掉大量的钱。因此，σιτώνης（购粮官）的职位是一个市政长官宦途中最艰险的历程之一。相当于西方 *aediles*〈市政官〉的 *agoranomoi*〈市易官〉，其任务之艰巨也不会比购粮官差多少。他们要负责保证粮价低廉，并控制其他物价，使不超过适当的标准。有某些谈话谈到了市政官及其活动情况，这些话很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些为振兴市政和爱护乡土之情而做了可怜的牺牲品的人物的生活；例如，特里马尔基约在宴会上对鱼价问题所发表的看法是大家所知道的，还有卢秋斯那位同样有名的朋友——阿普勒攸斯使他名垂不朽——对于塞萨利的一个市镇上的鱼市所发表的意见等等。因此，无怪乎当一个城市能够

保持谷价低廉的时候，就要把这件功绩刻在该城官长题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侧旁，像以弗所的某些市易官就曾这样做过。在东方，购粮官这个官职比起西方相应的官职 *curator annonae*〈督粮官〉等类的名称要常见得多。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希腊城市所产粮食向来不够自给，就连小亚细亚部分地区也是这样，而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由于气候炎热、雨水不足和不调的缘故，其收成的变化无常更甚于欧洲中部地方，乃至更甚于意大利、西班牙和阿非利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章里还要详述。

城市预算中另一项浩大的开支就是在公共教育和青年老年的体育锻炼方面的费用，这在东方那些彻底希腊化的城市里开销尤其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不同于一个粗人之处，最显著的差别在于他受过竞技所和角斗演习所的课程训练。例如，在埃及，凡是在竞技所受过教育的人形成居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他们能享受某些权利和特权（οἱ ἀπό τοῦ γυμνασίου〈竞技所毕业生〉）：因此，皇帝克劳迪亚斯认为亚历山大里亚自由民中的青年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才能获得亚历山大里亚公民资格这一重要的特权。从许多碑铭文中可以看出，东方希腊人地区的城市不曾忘记它们过去的光荣传统，并且还和以前一样热心地——也许更热心些——按希腊方式使城市青年受到良好教育，至少，仅仅因为他们属于特权阶级也不得不这样做。但这笔开支是很大的。支付教练员的薪俸，筹办和不断修缮学校与体育场，以及把橄榄油配给那些无力购油的人，这都得花费大笔的钱。要保证城市得到够用的橄榄油供应，差不多和保证粮食充裕、粮价公平同样的重要。在希腊城市里，专管购买橄榄油的官（ἐλαῶναι）几乎和购粮官同样地普遍。这个职务

是既重要而又艰巨的。

除了公共教育以外，宗教方面也需要关怀和开销。每一个城市都有许多神庙，神庙必须修缮得很完美。有些神庙有自己的基金，而许多神庙却没有。把祭司职位出租，就可以收到某些实物补贴，从这里得到一些收入。但比起维持组织完善的宗教生活所费的开支来说，这笔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因为那些开支项目包括献祭给神和献祭给古英雄的牺牲、仪仗、宗教节典、为庆祝各种神而举行的竞赛(ἀγῶνες)和游戏等等。无怪有一些城市有一个专门的财政部门来应付公众的宗教仪式，有专门的司库员和专门的金库。与崇奉神祇有密切关系的是各种竞技游戏，这些竞技游戏在城市生活中逐渐变得和粮食供应同样重要了。大部分竞技游戏都是由官长们或由富裕的市民自己花钱举办的。但有些时候，为了预防大群无产者发生反感，甚至怕他们会发生暴动，城市也不得不举办这类活动。

情况既然如此，所以城市希望它的富裕市民协助负担部分费用，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的义务。凡是一个人当选为城市的一个官长，为了显示这份荣耀，必须捐出一笔定额的金款(*summa honoraria*〈荣耀金〉)。许多荣耀的职位，如竞技所所长之类，都各有其应出的定额钱。想必有些祭司要为祭祀本神或为城市一般祭典所必需的开支负担一部分费用。在某些情况下，宗教社团的赞护人和主持人料必要出钱来供奉该社团的保护神。遇到困难的时节，城市就募一次债，虽然说是由市民自愿借款，但是实际上每一个富裕的市民都不得不认捐一定数额的钱，否则他就难免受到公众的丑诋，甚至难免成为敌意示威的攻击对象。

如有必要时，城市还援引古代派差之法，即强迫富裕市民摊款来支援某些重要的公共事业。

但是，必须指出，在一世纪时，无论在补足行政官长、祭司、竞技所所长及其他职位方面，或者在获得有力的支援来美化城市、创建或维持社会宗教组织，甚至弥补经常费用等方面，都很少需要采取强迫手段，而到了二世纪上半期就更少需要强迫了。富裕市民对于城市所需要的一切都乐于援助，慷慨解囊：我们可以说，东方城市和西方城市中大多数美丽的公共建筑物都是他们所捐献的。遇到饥荒的时节，也就是靠这些人博施普济来赈救饥民。在平常年代里，他们付出大笔金钱使市行政方面所举办的竞技游戏增光显耀，或者自己出资举办游艺竞赛。他们也时常布施，或施金钱，或施酒食，无论贫富都能受到施舍。为大群市民举行公宴是自治市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捐献之中，有些采取基金形式，或者是用于投资的大笔金钱，或者是用于出租的土地及其他不动产，这些基金用来创办和维持城市某个宗教组织或社会团体。

富裕市民所捐献的财物之多是惊人的，东方希腊人地区尤甚。我们知道，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全境之内这类的施主就数以百计，而我们必定会想象得到，有着非常多的富人在舆论和自己爱护乡土之情的推动下为他们原籍所在的城市慷慨捐输。慷慨捐输的风气产生于希腊的自由城市，而后在希腊化时代、特别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和二世纪时曾盛行一时，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这种风气重新抬头而得以持续，在公元后一、二世纪中最为显著。它随着希腊城市自治生活其他一些特色从东方传播到意大利，再从意大利传播到西方各省。奥地利的一些探勘者在吕西亚的一个小城市里发现一块

墓碑，墓主名叫鄂普腊莫阿斯，是罗迪亚波利斯人，他为了本城和吕西亚其他一些城市以及吕西亚城市的省议政院（κοινόν）的需要而花费过几百万的钱；当时发现这块墓碑对学者们说来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启示。也并非只有这一个吕西亚人有这种行径。在东方希腊人地区到处都出现这类人物；其中最著名者有斯巴达的尤留斯·欧里克勒斯和他的子孙，还有雅典的埃罗德斯·阿提库斯，这些人都是在文献中和铭文资料中得到称誉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诸如波勒蒙、达米亚努斯和埃罗德斯·阿提库斯之类的家道富裕的“诡辩家”。罗马城的新权贵阶级，意大利和外省的元老院议员和骑士（小普利尼曾在他的书札中提到他所捐赠的财物和基金，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外省新城市的权贵阶级，以及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和其他行省的城市里的富商、地主和工业界的老板们，统统表现出这种慷慨精神。在整个公元后一世纪中，尤其是在二世纪上半期，这类捐赠的礼物和基金无论在数额上或在范围上都不断扩大，形成一个普遍的潮流，其中大多数都是自愿捐赠的而不是被迫缴纳的，同时，无数有钱的人都乐于就任为行政长官、祭司、各种社团的主持人和保护人、省议政院（κοινά）中的官员和祭司等，从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不仅城市自治精神在二世纪上半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无论在东方或在西方，集中在城市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都在不断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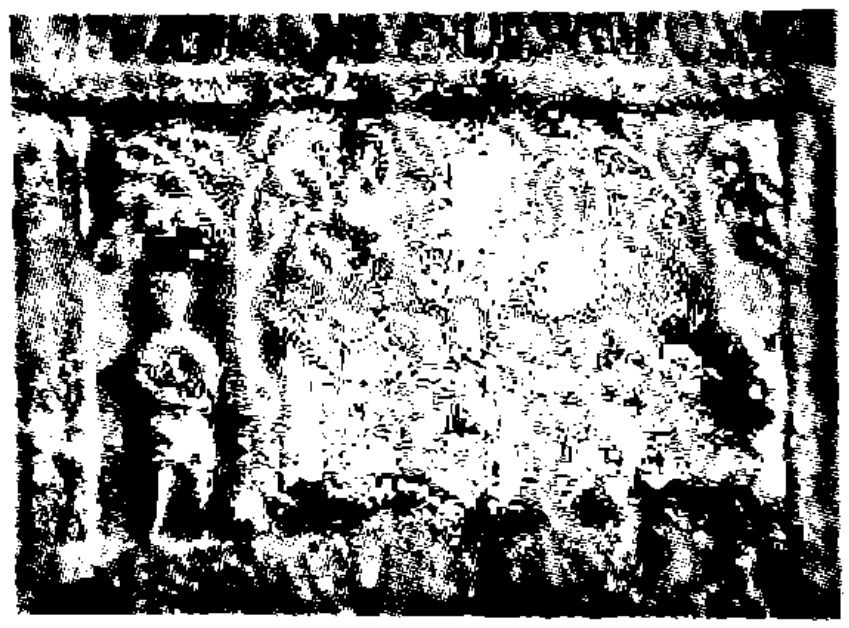
这些城市资产阶级，人数多到成千累万，他们分居在帝国的各处，为自己添置大片的田地，积蓄大宗的钱财，在城里有的是房产和铺面，在水陆两路有的是船舶和兽力，可是，他们这滚滚而来的

钱财究竟从何而来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着重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帝国全境之内，富人的人数不断在增多。现在与雅典共和国或罗马元老院的统治时代不同，财富已经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集中在少数地区了。情况正与希腊化时代一样，我们见到的是财富分散化，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说法的话。某些罗马元老院议员仍然很富，但他们不再同于公元前一世纪时的“富豪”，也不再同于尤留斯氏和克劳迪亚斯氏时代的百万富翁了。在公元二世纪的元老院议员（主要是意大利人或外省城市中人）当中，有钱的人并不少见，但一般说来，他们都是像小普利尼一类的人物，虽有钱而不太阔，大多是地主。可以注意到，在二世纪时，没有提到过一位元老院议员其财富可以与帝国早期那些宠幸人物——如梅策纳斯、阿格里帕、塞芮卡、阿克苔（芮罗的情妇）、纳尔契苏斯、帕拉斯等人——相比。宠幸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固然，尤韦纳耳还是说起百万富翁在城市权贵阶级中居领导地位这种老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句老话而已。对于他的说法，我们举不出什么人名来加以证实，但对于前此一个时期来说却能举出几十个人名来。

现在，在罗马城可以见到一部分非常有钱的人（大多不是元老院议员而是免奴之辈），而大多数非常有钱的人都在外省，不在意大利：不再有特里马尔基约之流的人了，即使有，现在也不住在康帕尼亚而住在外省的一个什么地方。外省城市里个别市民手中积累起来的财富有时为数甚巨。我们已经列举过吕西亚的鄂普腊莫阿斯、斯巴达的欧里克勒斯、雅典的埃罗德斯·阿提库斯等例子。埃罗德斯的父亲在雅典他家的住宅中所发现的宝藏（我们可以顺便提一句）并不是一宗宝藏，大概就是埃罗德斯的祖父伊帕尔库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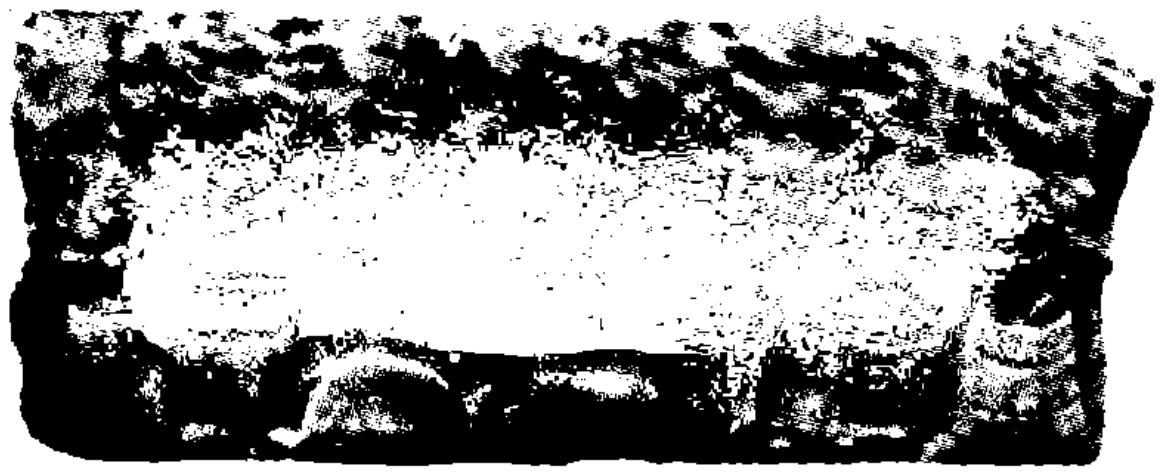
在多米戚安肆行虐政的乱世埋藏起来的金钱(伊帕尔库斯本人为多米戚安害死)。由于缺乏统计材料,我们无法估量鄂普腊莫阿斯以及他这一类的其他人的财产究竟多到什么程度,也无法拿他们的财产来和公元一世纪时的富人的财产或者和现代的大宗财产作一比较。更加重要的是,现在在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到处都能见到富人,例如在吕西亚的罗迪亚波利斯,或在阿非利加、高卢、西班牙,甚至色雷斯的某一个小城市里都能见得到。如果需要证据的话,那么,在证据方面,我们不仅有二世纪时所捐赠的财物和基金——这些材料需要比较审慎的收集和区分,而且还有那些奢华的墓葬遗址为证。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个时期最华丽的墓葬遗址并不在罗马城或在意大利而在外省,这难道不是当时情况的一个特征吗?这些遗址可以举例如下:中型城市阿索斯附近的墓葬遗址——这是美国发掘工作队发掘出来并加以复原的;小亚细亚全境那些美丽的墓祠和庞大的石棺,特别是在吕西亚所见到的;鄂耳比亚和潘提卡佩乌姆附近的巨冢以及潘提卡佩乌姆的彩绘岩墓;阿非利加和叙利亚的"灵庙",那是专祭死者的享堂;在叙利亚,则有帕耳米腊地区所特有的塔式墓以及阿勒颇和安蒂奥克之间现已荒废的山区中的五个遗址;高卢全境的雕像墓,特别是在特雷韦附近、在卢森堡和在阿尔隆附近所见者。甚至就是在新开发的多瑙河地区也遇到一些规模宏大、花费繁浩的坟墓;例如维米纳秋姆附近一个有钱的地主的坟墓涂着彩绘,装饰着雕像。凡是花得起钱来修造这些茔墓庙宇,而身后还有足够的遗财来保护茔地和墓园的人,都是积蓄了大宗资财的人。

因此,首先要着重指出,二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



1. 牧人

2. 筛谷



3. 制葡萄酒或苹果酒的用具

4.银行业

5. 衣服买卖

图 24　西方各行省中的实业

图 24 说 明

1. “M. 特兰丘斯的免奴牧羊人尤昆杜斯”墓碑座石上的嵌版。美因兹，中央博物馆。《拉丁文碑铭集录》xiii. 7070；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i，第 5824 号；《罗马境内之日耳曼尼亚，一本插画地图》(德文)，图 XXXIX-6。

图中是某个 M. 特兰丘斯的免奴尤昆杜斯领着一群羊在一个树林里牧放。他的 *patronus*〈靠主〉立了一块碑以纪念他，碑上所刻的铭辞说到，尤昆杜斯在三十岁的时候被一个奴隶害死，这个奴隶随即自沉于美因河。特兰丘斯无疑是一个富有的地主，而尤昆杜斯是他的牧人头目，头目之下管领着许多奴隶作为帮手。

2. 莫根恰库姆(美因兹)一个富商的墓碑上的一块浅浮雕。发现于美因兹城墙中。美因兹，中央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i，第 5833 号；《罗马境内之日耳曼尼亚》(德文)，图 XLII-6；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 71，5。

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筛谷，另一个人把一筐已经筛好的谷子搬走。

3. 阿杰丁库姆(桑市)地方一座墓碑的一段雕花腰线的残片。桑市，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桑市高卢罗马文物陈列馆》(法文)，第 97 页和图 VII；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2852，2853 号。

制葡萄酒或苹果酒用的各种器具：四个空的筐子，两个盛满果子的筐子，一个木箱，四个擂钵(其中两个带着杵)，一把叉子，还有三堆东西，朱利约认为那是 *le marc de raisin*〈榨干了的葡萄渣〉。

4. 努马展(特雷韦)地方的一块浅浮雕，一座墓碑的一部分。特雷韦博物馆。赫特芮尔：《邦立特里尔博物馆便览(附插图)》(德文)(1903 年)，第 16 页，13；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第 5148 号；《罗马境内之日耳曼尼亚》(德文)，图 XLI-3 ；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 91，3。

一个银行家或地主和他的两个助手，都把髭须剃净，穿着罗马服装，正在收四个农民的付款，那四个农民都留着胡须，穿着标准的乡下人那种半克勒

特式的衣服。

5. 伊杰耳(在特雷韦附近)地方塞昆迪纽斯氏的墓碑上的一块浅浮雕。德腊根多尔夫和克吕格尔:《伊杰耳出土墓碑》(德文)(1924 年),图 X-1 和摹图 47,第 77 页;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第 5268 号,第 443 页;德雷克塞尔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35,1920 年,第 83—142 页。

衣服买卖。两个人正在看一段衣料。另外四个人和这两个看货的人站在一起。其中一人在他的簿子上记上这段料子。第七个人正走进屋来。

这套图片可用来说明西方各省各行各业都很兴旺。

里,富人或者家道康裕的人遍于帝国全境之内,他们并不是像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早期意大利的城市资产阶级那样的朴实的地主,他们是一些阔绰的人物,是一些豪华的资本家,他们总是在本城的社会生活中称雄做主,不仅本城人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在一个地区之内,甚至在整个行省之内,提起他们的名字也是无人不知的。

他们的财富究竟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财主是不可能由皇帝们随心所欲造成的。皇帝们的政策自然是使这些人在城市事务中掌握最大可能的势力。遗憾的是,我们还见不到一部涉及这个问题的学术著作。没有一位学者致力于收集有关二世纪中的富翁、其收人来源以及经济活动的性质等方面的资料。细心地钻研这个题目准会得到很好的成果。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就我所收集的材料来看,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大宗财产的主要来源仍和以往一样是来自经营商业。经营商业所获的钱财再通过放债而增多(放债大多采用抵押的方式),同时也投资于土地。在商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业之外,工业也是一种生财之道;不过,虽然某些财富无疑是由于经营工业而挣来的,

工业总还是占次要地位。二世纪的商业和运输业的发展状况非常有趣。在前几章中我们谈到了以往的某些旧现象，对于那些现象我们已经有所认识，但现在我们发现在那些旧现象之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是一世纪时差不多未曾见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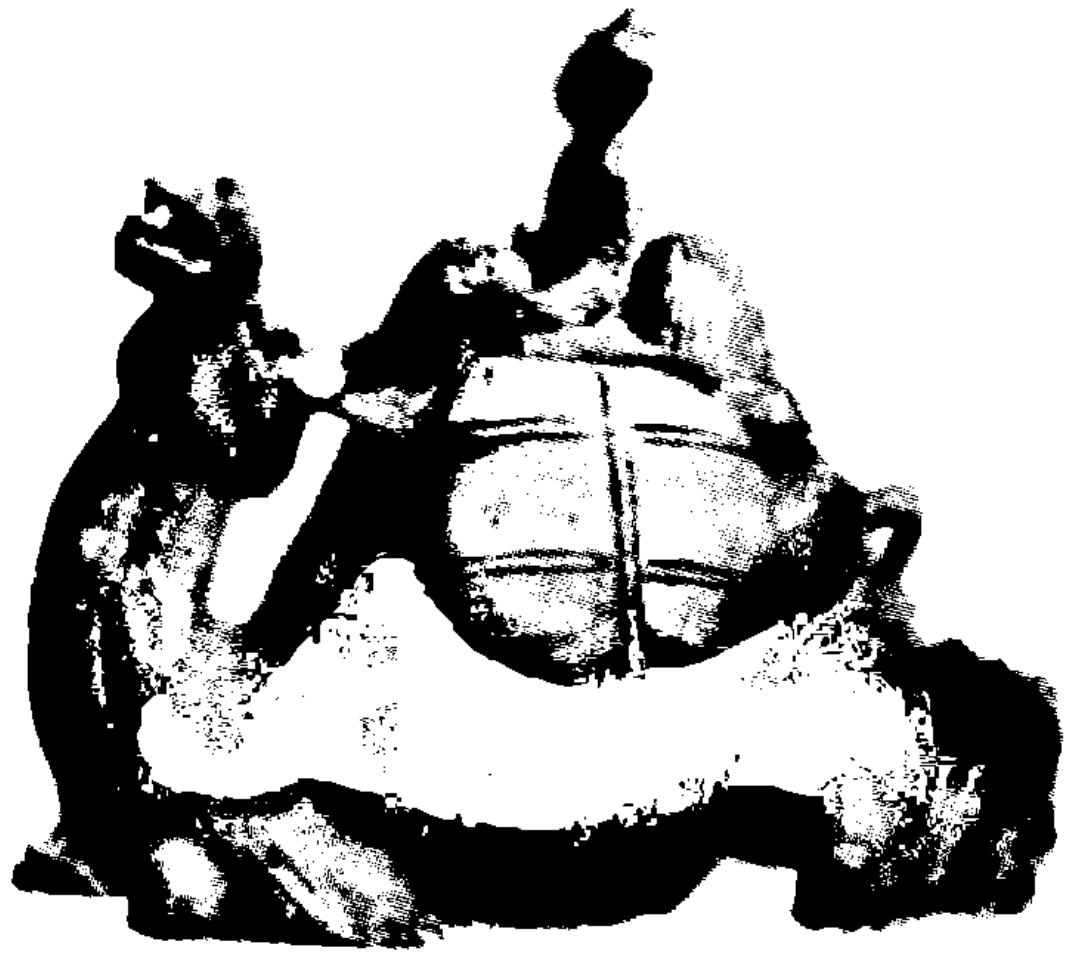
二世纪的商业仍和以往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商业，而范围较前更大。罗马帝国同它所有的邻邦以及一些居地并不接壤的民族统统发生了商业关系。高卢、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等地彼此之间商业往来很活跃。罗马工业制造品甚至远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其数量相当多。罗马的商业从多瑙河畔伸展到了第聂伯河流域，根据罗马钱币的出土，以及根据在这个流域的古墓中经常发现公元一、二世纪时的罗马陶器和玻璃器的情况，可以看出罗马商业在这里曾经占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整个二世纪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特别是鄂耳比亚、克尔索讷苏斯、潘提卡佩乌姆和塔奈斯，在整个二世纪中又再度繁荣起来了。鄂耳比亚和潘提卡佩乌姆同黑海南岸与西岸都有联系。博斯普鲁斯王国仍然出口大量谷物和其他原料(尤以皮革、鱼和大麻为多)。这些出口货物一部分直接输往那些希腊城市，而大部分则通过黑海南岸与西岸的城市而输给多瑙河上和卡帕多细亚地区罗马军队的常驻营地。每当皇帝们必须把大批军队从东方调往西方或从西方调往东方的时候，这种输出货物的数量自然增多起来，如韦斯帕西安、多米戚安、图拉真和 M. 奥雷留斯时代都有过这样的情况。罗马军队保卫鄂耳比亚以及克里米亚的许多城市，特别是其中已经成为俄罗斯南部罗马势力主要中心的自由城市克尔索讷苏斯，以防御草原上居民的入侵，由这件事可以看出俄

罗斯南部对于罗马帝国关系甚重。我们不知道博斯普鲁斯商人和鄂耳比亚商人在把俄罗斯中部的商品(毛皮和蜡)与亚洲的商品运往罗马帝国方面究竟起过多大作用。但是,这种贸易肯定存在过,并且它曾使当时称霸于南俄罗斯草原与高加索一带的萨尔马特部落发财致富,也曾把俄罗斯南部同中国的大丝路联系起来。俄罗斯南部的商业一部分集中在博斯普鲁斯国王以及博斯普鲁斯和鄂耳比亚的商人们手中,一部分集中在锡诺普、阿米索斯、托米和伊斯特鲁斯商人们的手中。

至于说到南方和东南方的商业,那么阿非利加方面同撒哈拉各部落的贸易实际上并不重要。输入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等省的有一些奴隶,大概还有一些象牙;此外则有大批的野兽,准备送去陈列给民众观看和运往当时各地都设有的斗兽场里去送死。非洲杉木也是有名的制桌案的材料。较重要的是南方埃及同梅雷王国、同阿比西尼亚(阿克苏姆)之间的贸易以及通过这些半开化国家同非洲中部地区进行的贸易。从梅雷发现的遗物可以看出罗马帝国是用埃及工业制造品来偿付非洲中部所输出的商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里亚同阿拉伯的贸易,以及———部分通过阿拉伯,一部分直接地——同印度和通过印度同中国之间的贸易。前一章中已经谈到过这个题目,但此处还需补充几句,罗马帝国的商业这时候不仅抵达印度河流域,而且还抵达印度支那和苏门答腊,罗马帝国同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也不断发展,并变成了十分正规的贸易。而且,这不再只是奢侈品的贸易了。虽然进口货中无疑还有一些是奢侈品,但大部分则是棉花和调味品之类的商品。从罗马帝国出口到东方去的商品性

质也与以前不同了。其中一部分是原料和食物(如铁和谷物等)，而主要的一部分则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工业制造品。在罗马帝国同印度和中国之间积极从事货物交流的经手人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如果没有他们，同印度的商业也许就不会存在。

近年来发现的材料使我们认识到，早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即已同索马里兰沿海一带、同阿拉伯、同印度进行频繁的贸易，而这些贸易到了罗马人时代组织得比以前更好。我们在科普托斯发现一张公元 90 年制订的关税表，载着沿途得到保镖时所应缴纳的税额，这张表证实了在科普托斯与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通道上商业往来很频繁。旅客之中大多数是航海船长、保镖部队的军官、技术熟练的工匠、海船上的木匠和水手等，这些人都是红海商船队上的人(那些航海船长被称为“红海船长”)。帆桅和帆桁也在运输品之列。有的地方提到了兵士们的妻子，可以证明部队驻扎在贝雷尼切。这些兵士大概一部分属于保护这种商业的舰队的人员编制。在科普托斯与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中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并设置屯戍驿站：所有这些事务都由 *Arabarches*〈埃及税务官〉和贝雷尼切山区行政长官负责主管。每一队沙漠商队都由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在这种部队中很倚重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自幼熟习沙漠。对于西面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警察部队予以监护。这一整套制度直到公元五世纪时仍然残存着。此外还发现一些材料使我们对于东方与非洲的贸易经纪人的情况略见一斑；从梅达木特



1. 赶骆驼者和骆驼

3. 中国的闪米特行贩

2. 中国的波斯行贩或乐人

4. 中国的外国商贩

图 25　沙漠商队在远东经商

图 25 说 明

1. 中国的陶俑。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B. 劳弗尔于 1908 年得于西安府；发现于陕西省省会西安府附近的一座墓中。未曾发表过。属于唐代，7—8 世纪。承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馆长惠许在此发表。承 B. 劳弗尔博士对该俑加以说明。

驮着东西的骆驼正跪在地上。一个中亚人，大概是一个突厥人，穿着羊毛衣和外氅，跨坐在两个驼峰之间，把那畜牲赶起来。那骆驼驮着两个沉重的包捆，挣扎着爬起来，正喘着气。筋肉的紧张姿态刻画得很逼真。

2. 中国的陶俑。宾夕法尼亚博物馆。未曾发表过。属于唐代。本图及图 4 的照片均承宾夕法尼亚博物馆东方艺术部主任霍勒斯·H. F. 杰恩惠赠，并承加以说明。

一个小贩，左腋下夹着一包货样，右手里大概有一只喇叭，用以招揽生意；小贩们还靠吹这种喇叭以宣告他们来到某处。人头的形状以及浓密的髭须表明他是西亚人；大概是一个波斯人。他戴着一顶尖顶高帽，穿一件短袖衫，领口开成 V 形，系着一条软料长带，绑长筒护腿，着软靴。这类型的人像是最常见的。例如，参考《欧莫佛泡洛斯氏藏品中之陶瓷》(英文)，i，第 195 号，图 28；第 297 号，图 44；第 298 号，图 44。C. 亨兹把那些人像认作乐人，他们正在吹奏左腋下所挟的喇叭(C. 亨兹：《中国墓俑》(英文)，1928 年)。

3. 中国的赤土陶俑。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乔治·欧莫佛泡洛斯藏品。H. L. 贺布森和 A. L. 赫瑟林顿：《中国陶器艺术》(英文)(1923 年)，图 17；《欧莫佛泡洛斯氏藏品中之陶瓷》(英文)i，第 196 号，图 35。参考 C. 亨兹，前引书，图 17B。属于唐代。

一个小贩或一个奴隶，肩上紧背着一个包袱，左手拿着一把壶。他戴着一顶西域式的帽子，帽顶上覆着一块头巾，衣领开成 V 形，边缘有皱褶，系带，绑护腿；他的面貌像一个闪米特人，蓄须。以上引自贺布森在欧莫佛泡洛斯氏藏品图目中所作说明，略加修改。

4. 中国的赤土陶俑。宾夕法尼亚博物馆。未曾发表过。属于唐代。

与图 2 相似。服装相同。头面有异：其形态与欧莫佛泡洛斯氏藏品中著

名的赤陶人像(属于六朝时代者)非常近似,有些人认为在那些人像中可能找得到一个印度人。请看《欧莫佛泡洛斯氏藏品中之陶瓷》(英文),i,第 171 号,图 25;参考塞利曼撰文,载《人》(英文),1924 年,8 月。但我们的这个人像可能是一个突厥人。一个与此相似的人像见 C. 亨兹:《中国墓俑》(英文)(1928 年),图 74B。

上述这些赤土陶俑都是陪葬品。它们用以供给死者在阴间所需要的一切男女牲畜;或者它们都是供祭的牺牲。C. 亨兹在他的名著《中国墓俑》(英文)(1928 年,原版为法文)中有力地支持了后一种看法。其所以用骆驼陪葬,是因为它们可以替死者供应那些由沙漠商队运进中国的商品。其所以会有那些小贩(如果他们是小贩的话),大概也可以用同样理由来解释。那些乐人、舞人、伎人、仆人以及各种妇人更无需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差不多所有的陪葬者都是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中亚、印度和西亚等地人。参考 C. 亨兹,前引书,第 51 页起。虽然这些中国陶俑在时间上距罗马帝国早期已相当晚,但我在此处复制这些图的目的在于说明中亚的商业概况。就是这些骆驼和赶骆驼者,无疑地也就是这些行商游贩,他们同样地游历过亚洲西海岸,南至安息,北至南俄罗斯。可能,在汉代和唐代,这些沙漠商队曾把商品从西方运到中国,如织物就是大宗;参考科兹洛夫上校在蒙古所发现的一世纪初的新物件(请看拙著:《汉代的嵌花青铜器》(英文)(1927 年),第 54 页起;拙著:《南俄罗斯和中国的动物姿态》(英文),图 XXIV 和 XXIVa,第 110 页;参考《1929 年 1 月 12 日至 4 月 2 日中国工艺展览会上的中国工艺品》(德文),第 438 页起,第 1216—1272 号)。

的一篇碑铭可以看出托勒密时代船主和商人们的行帮组织一直到公元三世纪时仍然存在。这篇碑铭以及另外一些久已熟知的碑铭都证实了在公元三世纪时有一支舰队驻在红海;不过,这支舰队建立于何时尚不能确定。普利尼(《博物志》,vi. 101,105)似乎还不知道有这回事:他只谈过开往印度的船队上派有弓箭手作为保镖一事。

亚历山大里亚对外贸易的发展并未扼杀阿拉伯与叙利亚的沙漠商队的贸易。从阿拉伯的佩特腊遗址可以看出,该城并入罗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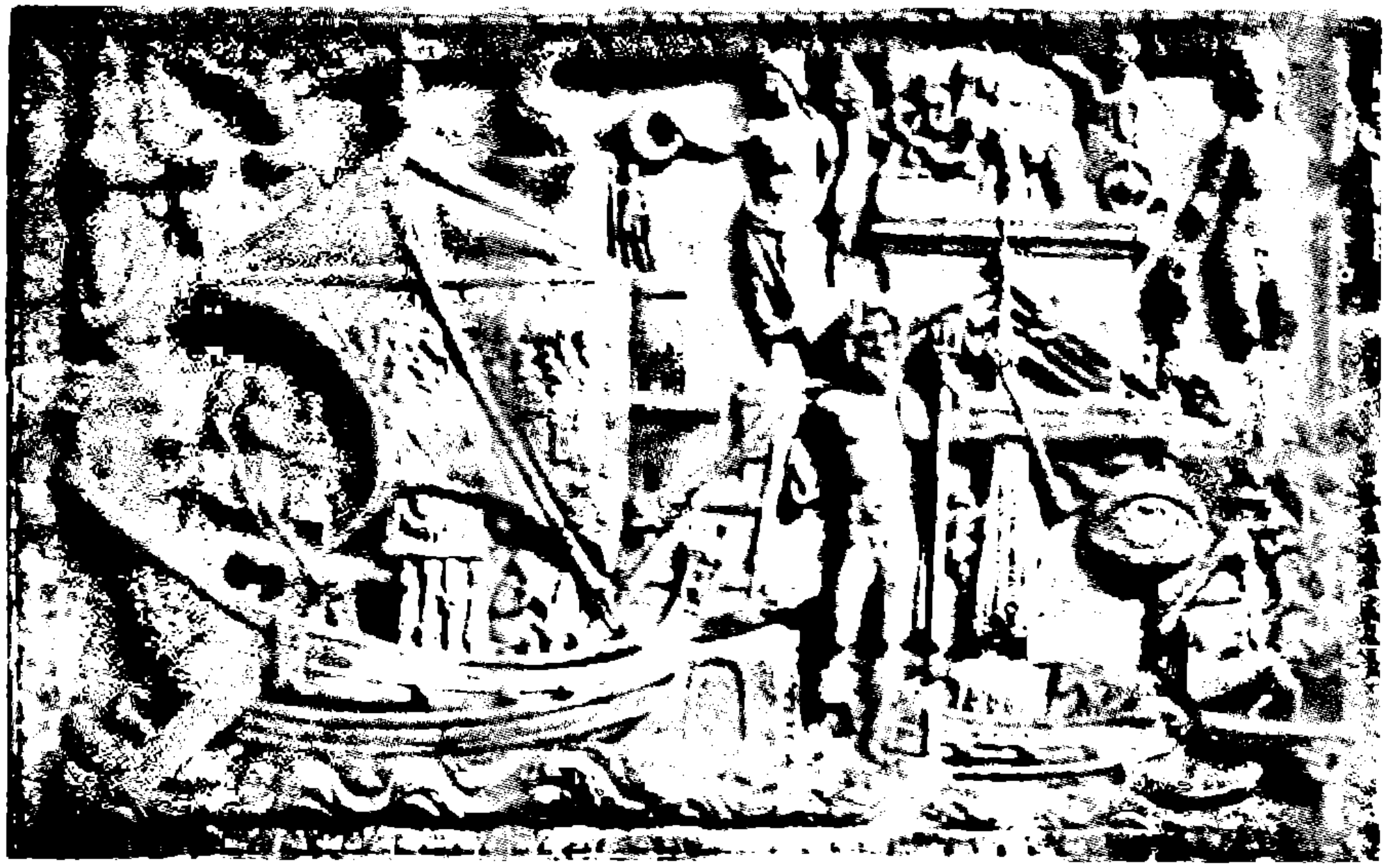
帝国(公元 106 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绝不是它走下坡路的时期。大家都知道,图拉真从叙利亚修了一条康庄大道通到红海之滨。叙利亚的帕耳米腊也是以二世纪为其最繁荣的时期;安息的京城底格里斯河上的忒息丰的发展辉煌可观,这又提供了另一个证据。最精彩的帕耳米腊的雕刻、最美丽的建筑物、最豪华的墓葬以及大多数的碑铭——包括那著名的关税表在内——都证明商业曾十分繁盛,远及阿德里安和安东尼努斯·皮攸斯统治时期以后很久,这种繁盛现象犹能保持不衰。这是不足奇怪的,因为图拉真远征安息人既已取得胜利,而阿德里安和安东尼努斯的和平政策又长期保障了帕耳米腊方面的贸易得到安定的发展。帕耳米腊和佩特腊两地的贸易完全掌握在本地商人的手中,这些商人积累了大笔财富。正同经营上述贸易的博斯特腊、费拉德尔非亚(安曼)、杰腊萨和杜腊等地一样,这两个城市也有着奢侈的墓葬保留下来的美丽遗址,从而使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城市的商人们是何等的豪华阔绰。财富通过这些商人流向安蒂奥克,流向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等处沿海各城市。

但是,不论对外贸易对罗马帝国是多么重要,各行省的财富却并非由于对外贸易得来的。哪怕就是在埃及和叙利亚这种地方,各省之间的货物交易,作为一种收入来源来说,其重要性至少也不在对外贸易之下。就埃及而言,谷物、亚麻布、纸张、玻璃以及亚历山大里亚那些部分用外地进口原料制造的工业品(象牙和乌木器具、香水、珠宝)等等方面的商业,与转运印度和中国进口商品的商业是同等重要的。就叙利亚而言,有它的玻璃器、亚麻布以及用地道的提尔紫染色的呢绒,其情况与埃及也是一样。帝国各地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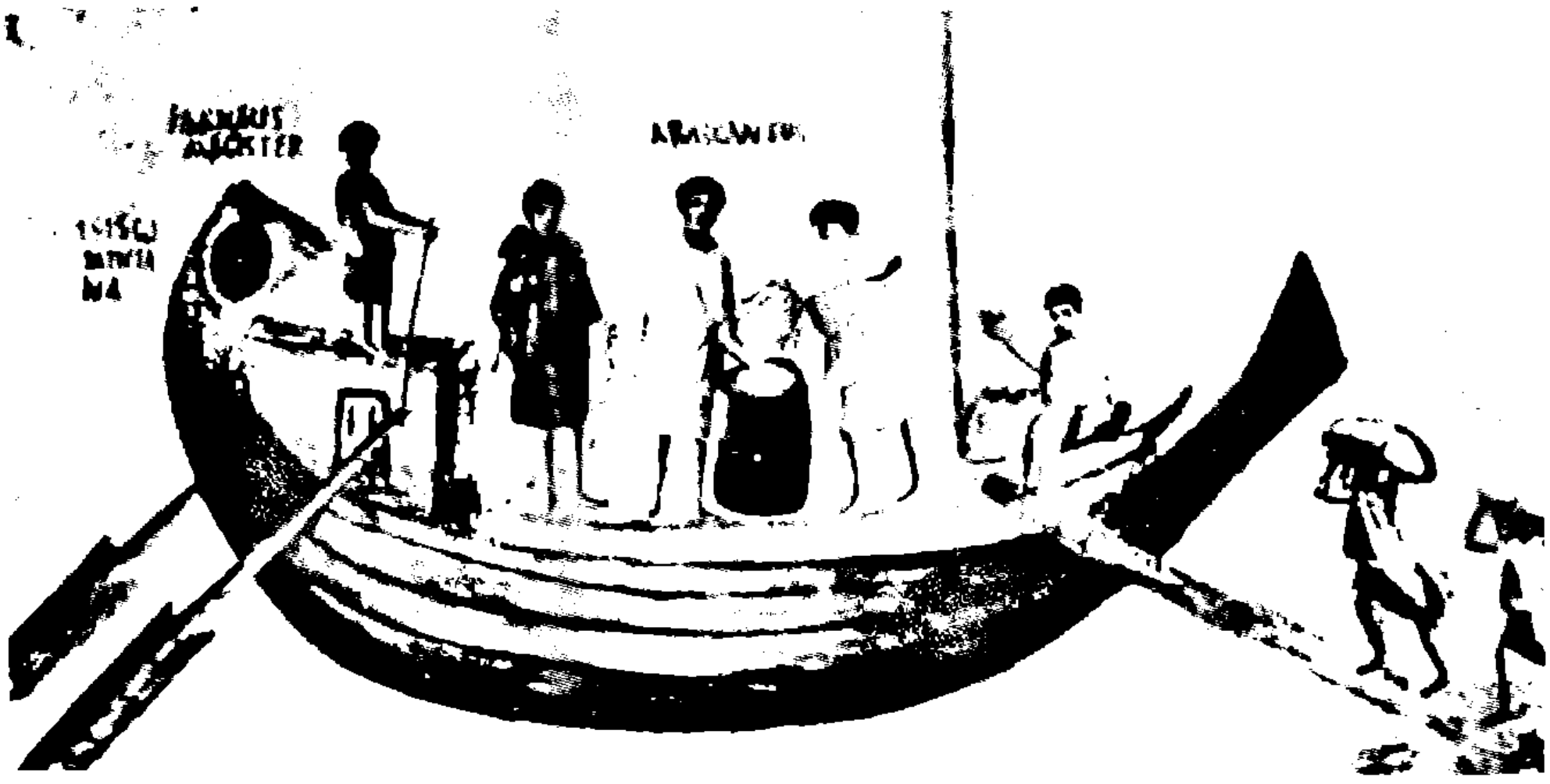
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财之道就在于进行省际的贸易，而这种商业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我们见到二世纪以来的碑铭涉及当时人们职业者数以百计。其中有许多碑铭告诉我们一些商人的称谓（如粮商、*negotiatores*〈钱庄经理〉），甚至告诉我们这些商人从事何种专门的行业。如果我们从这一大堆称谓中抛掉那些有关各城市零售商贩的名称不管，而仅仅只算计一下那些批发商人——进口商和出口商——那么，我们就会看出其中大多数人经营的是食品，特别是谷物、葡萄酒和油，以及五金、木材、布匹、陶器等商业。许多行省都输出谷物，尤以埃及、阿非利加、撒丁、西西里为著，高卢和西班牙输出量也很大。希腊的粮食是由小亚细亚和南俄罗斯供应的。这时候质量最好的橄榄油以西班牙产量最大，运销高卢、不列颠、意大利及其他各地。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在质量上虽比不上西班牙的产品，但其价格无疑地较为低廉，因而用于点灯和化妆等方面。这时候最上等的葡萄酒则产于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和高卢。把各省输出的和输入的商品一一列举出来并不困难，不过从这样一个统计中得出的主要现象将会是：奢侈品在大宗批发贸易中几乎毫无地位，大宗批发贸易差不多专门经营生活必需品。

所有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是些什么人呢？这么多的谷物、肉类、油和葡萄酒从这儿运到那儿究竟是为了谁呢？毋庸多说，只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费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粮，而大多数商人——他们往往同时又是船主和堆栈主人——都在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也就是说，都在为罗马城的居民和军队而忙碌。我们得到这样一种印象，首先是由于研究了那些谈到商人和船主——海上的 *navicularii*〈船主〉和湖泊河流上的 *nautae*〈船

家〉——的 *collegia*〈帮会〉的碑铭。这些帮会大多数得到国家的承认，甚至得到国家的照顾，因为它们对于国家是有利的，或者说多少是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同一行业的人自然会产生结社、集会和促进本行业利益的愿望；但同样无疑的是，如果这些组织无益于国家，那么帝国政府就不会予以承认，更谈不上予以保护了。不仅首先得到承认而且还首先获得保护和特权的帮会就是商人和船主的帮会，这件事是值得注意的。早在希腊化时代，至少在埃及一地，像这类的组织已经在为国家效力了。罗马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继承了这种关系。很自然的，他们要把这种关系推广到罗马、奥斯蒂亚、普特约利、阿魁累亚等地已存的组织中去，和推广到高卢、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等地正在发展的组织中去。同一个有组织的、人员熟习的团体打交道，比起同一群漫无组织的陌生者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而帝国行政当局如果没有这种组织的帮助就根本无法解决运输大量笨重物资这一极端棘手的问题。克劳迪亚斯曾把某些特权许赐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个别成员，由此可见早在这位皇帝时代，组织商人和船主的工作即已推行甚力。并且，奥斯蒂亚剧场后面的大廊道被指定为与 *annona urbis*〈城市口粮〉有关的同业公会的办事处，这件事很可能也是在克劳迪亚斯在位时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大廊道已经是塞普提米攸斯·塞韦鲁斯时代的规模了。皇帝们为了照顾城市口粮和军队，自不免时时强迫征调粮谷，大概也同时对商人和船主的团体施加强大的压力。不过，据小普利尼所说（*Paneg*〈颂词〉29），在开明君主政体下，一般并不强征谷物而是用收购的办法，利用那些组织团体服役的时候也只采取开明的方式。



1. 意大利的港口



2. 伊西斯-杰米尼亚娜号

图 26　罗马帝国早期的贸易

图 26 说 明

1. 罗马托尔洛尼亚藏品中的浅浮雕。罗马，托尔洛尼亚博物馆。C. L. 维斯孔提：《托尔洛尼亚博物馆的文物》（意大利文），第 430 号，登录 110；Th. 施赖贝尔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年报》（德文）11，1896 年，第 99 页，图 6；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i，第 344 页，4。关于摹写意大利和外省各地的港口的图画和浅浮雕，请看 K. 累曼—哈尔特累本：《地中海的古代港湾建筑》（德文），载《克莉约》（德文），增刊 14，1923 年，第 233 页和第 235 页起。关于希腊罗马时代的商船，请看 A. 克斯特尔：《古代的海上事务》（德文）（1923 年），第 151 页起，尤着重第 175 页，图 42。

这幅浅浮雕所描绘的是一艘大商船进港的情形，港内有一艘较小的、大概属于同一船主的商船正在卸下它所装载的酒瓮。两船之间站着水神芮普土努斯。在岸上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的灯塔，灯塔的第四层顶上立着一座皇帝雕像，扮作古英雄姿态，还可以看到一座高大的凯旋拱门，门顶上装饰着一辆四象车，车中载着一位皇帝，他的手中拿着棕榈枝。大船舱顶上，船主及其妻子，还有船长（?），正在供祭牺牲，感谢神灵。在那些建筑物之间可以看到某些神像——一个港埠的城隍娘娘头上顶着一座灯塔（亚历山大里亚?），站在一个花圈上的罗马神鹫，罗马城元神（?），还有酒神利贝尔（即巴库斯）。我们看到那小船帆篷下面有一只大眼睛（驱邪的神眼，参考图 46-1）。这幅浮雕并没有准定地描绘意大利的某一个港口。它所画的是一般港口的通貌。但是，图中的细节却暗示它指的是奥斯蒂亚港或图拉真港。因为那罗马神鹫，那大船帆篷上的母狼和一对双生子的图，那船尾上的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以及爱神的像，还有酒神利贝尔下面那河神宁妃的像等等可作标识。这块浮雕是一个葡萄酒商的献神之物，或是他的招牌。请注意酒神利贝尔的像，大船船头上也有他的像，小船船头上也有他的半身像，大船帆篷上还有 *V*（*otum*）*L*（*ibero*）〈向酒神利贝尔许愿〉两个字母。关于这幅浅浮雕和两只船的详细说明，见上面所引书籍和论文。最近在奥斯蒂亚发现了一块类似的浅浮雕（G. 卡尔扎：《萨克腊岛上罗马港的墓地》（意大利文）（1940 年），第 203 号，图 7）：那幅浅浮雕也描画一只船进港，船主和船长平安抵岸以后落在一个旅店里。

2. 奥斯蒂亚一座墓碑上的水彩画。罗马，梵蒂冈。复原图。画的左段遗失。该画发现后即发表于《罗马考古情报研究所年报》（意大利文），1866 年，图 1；B. 诺加腊：《阿尔多布拉齐尼的婚姻等》（意大利文），米兰（1907 年），图 XLVI；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273 页，1。

画的左段画着一个很大的财神梅尔库里攸斯的像以及他的随身法物。我们从这剩余部分看到一艘小商船正在装载一袋一袋的谷物。船尾附近写着船名，*Isis Geminiana*〈伊西斯-杰米尼亚娜号〉。船尾上站着船长，并记着他的名字，*Farnaces magister*〈船长法尔纳策斯〉。一个脚伕当着两个人的面把一个小袋（上写 *res*）里的谷子倒入一个大袋，那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的头顶上写着他的名字，*Abascantus*〈阿巴斯坎土斯〉。另一个脚伕在船头上等着，举起他的右手，口里说 *Feci*，同时还有另外两个脚伕从岸上把袋子搬上船。这船大概是专门装运 *annona*〈公粮〉的。阿巴斯坎土斯（那位 *navicularius*〈船主〉）大概既是这船的主人，又是墓中的死者。他身旁是一个公吏，即 *mensor frumentarius*〈粮吏〉。

情况诚如上述，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分偏重问题中的这一方面。皇帝征收公粮固然是省际贸易的主要动力，收购和运输大量谷物、油、葡萄酒、肉类、鱼类、木材、皮革、五金和布匹固然是为了满足来因、多瑙和幼发拉底河上驻军的需要，运购其中某些商品也固然是为了满足首都的需要；但是，需要富商大贾和有钱的运输商帮忙的并非仅仅只有公粮一项。许多大城市，尤其是东方的城市，如果得不到外地运来的粮食，都会要发生饥荒；同时也不可能每个城市都生产许多工业制造品。希腊各城市经常提到购粮官，这就表明粮商们不仅仅供应公粮而已，他们还有另外一些同等重要的顾主。

各省间的商业当然在一世纪时即已存在，但到二世纪时规模却大得多。这时候，几乎在帝国每一个行省里都有正在发展中的

图 27　帝国时代前期的商业：罗马的石棺

图 27 说 明

1. 一具刻合婚图的罗马石棺上的浅浮雕。罗马,温泉博物馆。R. 帕里贝尼撰文,载《艺术公报》(意大利文),1909 年,第 291 页起;同作者:《迪约克勒戚安温泉和罗马国民博物馆》(意大利文),第 142 页,第 287 号;《拉丁文碑铭集录》vi. 29809。属于公元三世纪。

图中正在举行婚礼。中央部分包括丈夫、妻子、合婚神天后尤诺,和一个蓄须的人带着一个卷子。丈夫的脚边有一束卷子(他的账簿)。在这中央部分两旁的是象征性的人像。站在左端的是罗马大港的化身,Portus(在这像的顶上刻着 *Portus*);她的右手端着那著名的灯塔。她身旁是另一个化身,那是一个戴着王冠的妇人,面朝右方,拿着一块小牌子给她的同伴看;她的左手拿着一件相当长大的东西,其形如桨。我想她应当是 *Liberalitas*〈君子之风的化身〉或 *Frumentatio*〈粮秣的化身〉,尽管在帝国钱币上所见到的传统的 *Liberalitas* 像(钱币上从未见过 *Frumentatio* 的像)并没有本图中所见的这些法物。这两件法物也许就是 *tessera frumentaria*〈粮符〉和 *mensores frumentarii*〈粮吏〉用来在 *modii*〈量器〉上推平谷物的小棒(*rutellum*〈刮斗板〉)。罗马时代的碑阙上经常见到量器和刮斗板的图形,墓碑上尤其多见。最好的例子发现于波洛尼亚;布里齐约撰文,载《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898 年,第 477 页,第 14 号;G. 达洛利奥:《波洛尼亚附近雷诺河床中罗马露圹碑文》(意大利文)(1922 年),第 118 页,第 58 号,图 26,一个 *mercator frumentarius*〈粮商〉的墓碑。布里齐约和达洛利奥已将所有见到量器和刮斗板的碑铭搜集在一起;参考奥斯蒂亚地方的 *porticus annonaria*〈谷仓〉上的镶嵌细工(帕斯凯托:《奥斯蒂亚》(意大利文),第 332 页;G. 卡尔扎撰文,载《罗马市考古委员会公报》(意大利文)43,1915 年,第 187 页,第 5 号,和卡尼亚所撰文,载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iii. 2,第 1727 页)。中央部分右边的象征性人物像是拿着 *cornucopiae*〈富饶角〉和桨的 *Annona*〈收成的化身〉,她的围裙里兜着水果和谷穗,身旁有一个满盛谷穗的量器,还有一个人物像是 Africa〈阿非利加的化身〉(如铭文所示),右手拿着谷穗,她的头上,像通常所画的那样,是一个大象的头皮;紧靠着她身旁的是

另一个盛着谷穗的量器。这类人物像在帝国钱币上经常见到。这个男主人大概是一个 *mercator frumentarius Afrarius*〈名叫阿弗腊里攸斯的粮商〉(《拉丁文碑铭集录》vi. 1620),或者是一个帮着收粮谷的伙计。

内部贸易,它们差不多全是新兴的。当然,也不能说全部都是新兴的。如埃及、希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水陆交通一向就很方便;这些地区(如今已成为罗马的行省)境内货畅其流已有数百年之久了。又如高卢,由于当地水道纵横,又有保持得很好的天然道路网与之配合,所以也早已有内部的贸易。但是,对于西方绝大部分地方——包括阿非利加在内——来说,以及对于东方许多地区来说,只有在帝国统一之下才有可能产生内部商业。水陆航运几乎完全保证安全无恙,高额关税业已取消,尤其是罗马大道纵横连属蔚为壮观,这一切都促使各省的商业达到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这一发展的本身又反过来有力地刺激了各城市内部商业的兴起,外省大多数城镇中那些提及零售商和店东的碑铭为数之多以及他们的店铺遗迹都正好表明了这一现象。

省际贸易和各省内部商业的增长正是商业倾向分散化的一种征兆。这个趋势极为显著。意大利曾经从希腊人的东方那里继承了商业活动中的统治地位,并且卓有成效地保持这种地位将近二百年之久,在这段时期内意大利在发展商业的同时,一并发展了它的农业和工业,而现在呢,它正在逐渐丧失这种统治地位。固然,意大利商人仍然掌握着多瑙河流域的市场,他们仍然输出若干意大利的产品,他们仍然在罗马城组成一个庞大富裕的阶级,但是,他们不能防止外省商业和外省商业阶级的成长,甚至不能防止后者之征服意大利。普特约利是共和国时期最大的港口,尤其是意

大利对东方进行贸易的最大港口，它在商业和工业两方面都曾是提洛斯的继承者，又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竞争者，如今普特约利却逐渐衰落下来，这就非常显著地表明了意大利商业的凋敝，特别是南意大利商业的凋敝。通常认为普特约利的衰落是由于皇帝克劳迪亚斯在奥斯蒂亚开筑一个人工港的缘故，这个人工港曾被芮罗扩建过，又被图拉真重修过。但单独这一件事不足以说明该城市的衰落。正如 G. 卡尔扎所指出的，奥斯蒂亚在帝国早期就不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地方。它是国家把粮食(公粮)从外地——主要是西方各省——运入意大利和罗马城的一个最大的意大利港口。来自西班牙、高卢、撒丁和阿非利加的船只在奥斯蒂亚港内得到设备周全的供应，帝国早期在该处的“同业公会会馆”和大规模的堆栈正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城市在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后一世纪中不断发展，这就证实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公元后一世纪时，奥斯蒂亚还是不能和普特约利匹敌，它不能把东方或西方来的私商吸引到它的港口里来，甚至不能把亚历山大里亚的供应船队招引到它的港口里来。原因在于，普特约利的港口虽不见得胜过奥斯蒂亚，但对于商人和船主们说来，其地理位置却要比奥斯蒂亚好。它的位置之所以见优，是因为就商人们看来康帕尼亚的市场比罗马城的市场更为有利可图，因为在普特约利容易找到回头货运，但奥斯蒂亚则因罗马城始终不是一个重要工业中心而无此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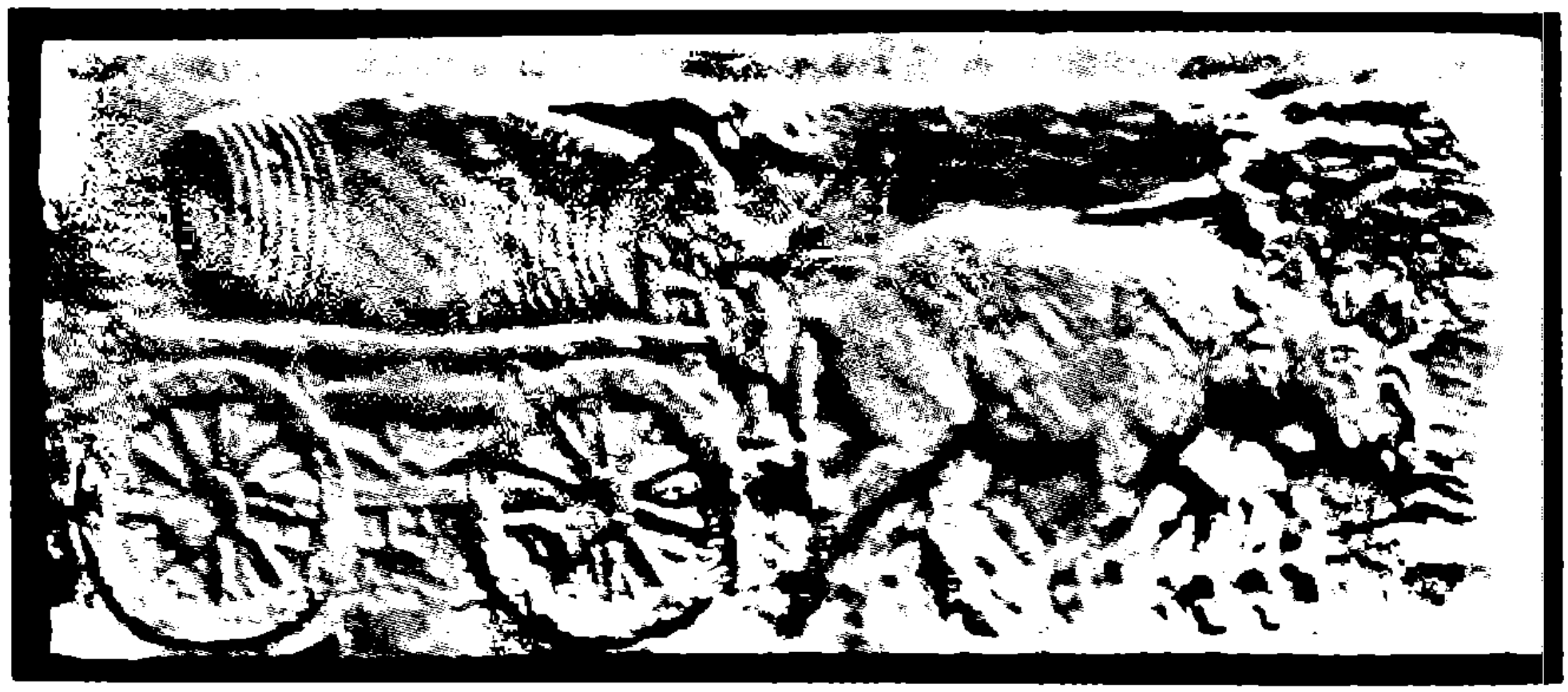
普特约利之衰落与奥斯蒂亚之藉此而兴起，这件事说明原来的情况有所改变。最足以证实这个康帕尼亚港口衰落的材料，见于该城中一件提到提尔庄号〈*statio*〉的碑铭，这碑铭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一度兴旺的庄号现在却承认它早先设在奥斯蒂亚和罗马

城的分庄有至高无上之权，而卑躬屈节向那里求款。毫无疑问，商业的主流已经离开了普特约利而到了奥斯蒂亚。这个变化的唯一理由就是普特约利已经丧失了它早先胜过奥斯蒂亚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有供应回头货运的能力了。康帕尼亚的货物——葡萄酒、油和工业制造品——显然不再足以招引大批商人到这个港口来了，其所以如此，只可能是由于在消费者附近的地区已经生产康帕尼亚的特产品，而且其质量更优，价格更廉——并非由于罗马城和奥斯蒂亚开始生产这些货物，这样设想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奥斯蒂亚仍然和它以往一样，是输入罗马城所需要的供应粮食及其他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

当奥斯蒂亚藉打击普特约利而兴起的时候，外省的商业也同时藉打击意大利各处的商业——乃至包括奥斯蒂亚在内——而发展起来。皇帝的公粮供应部门规定由高卢的商人和运输商供应海陆军所需要的谷物、葡萄酒、油、木材、皮革、麻绳、五金、衣服、靴鞋、武器等物资，比之依靠意大利商人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熟悉当地市场情况，并且在手头掌握了大量的河海船舶以及其他运输工具。兵士们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在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区都是就地现成的（如木材、沥青、五金、皮革），同时，像在高卢这样一个天然资源如此丰富的地方，很容易发展一些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如种植葡萄，养蜂，制造衣料、靴鞋、肥皂之类。我们经常谈到高卢的水道纵横成网，而且，它的南、西、北三面沿海都有良好的海港，因此，高卢商人很便于——比意大利商人方便得多——聚集各地物产，不仅是高卢本地的物产，并且还有邻近各省的物产，有些来自里昂和特雷韦一带，有些来自来因河下游各城市

1. 酒肉零卖业

2. 一个零售商人



3. 运酒

4. 一个鞋匠

5. 一个制药坊或肥皂店

图 28　高卢的工商业

图 28 说 明

1. 一座大墓碑上的残片。发现于第戎附近之提耳—夏特耳。第戎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3608 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221 页,3。

两个零售店。左边的一家(保存完整者)是酒店。店主坐在他的柜台后面,柜台上放着三个盛酒器,酒就从器里通过管子传送给顾客。一个顾客正在买酒,店主把酒注入一个盛酒器内,顾客用他自己带来的瓶子接酒。店主身后的墙上挂着各种容量不同的量酒器。酒大概是从柜台后面的瓮里舀出来的。第二个店是一家 *charcuterie*〈猪肉铺〉。一个男孩坐在柜台后面,那后面挂着三捆腊肠,三个猪头和三副火腿。柜台外面立着一个大木桶(盛着猪油?)。请注意,第戎是勃艮第的首府,迄今这儿还是一个著名的产酒区和一个酒业大集散地。

2. 一个商人的墓碑上的一块浅浮雕。利尔邦(尤利约博纳,卡勒提)。卢昂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3097 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303 页,4。

这座碑两面都有雕刻图形。其一面是夫妻二人的像。另一面的左半部画的是那丈夫在他店里的柜台后面。他经营百货(香粉等化妆品)生意,货物盛在大大小小的匣子和各种各样的瓶子里。右半部画的是他的妻子,臂中抱着一条小弄犬。

3. 一块五角形大石碑的一面上的浅浮雕。朗格勒(林哥讷斯)。朗格勒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3232 号;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iv,第 1561 页。

一对骡子拉着一辆沉重的四轮大车,车子造得很精巧,车上载着一个大瓮。赶车人穿着一件很沉的高卢式大氅,戴着标准的头巾,坐在赶车的座上,手里拿住缰绳和一根长鞭子。在这块石碑的另一面画着一个人拿着一条链子(链头上有一个钩子),套住这两匹骡子正往马房里赶。这位死者显然是一对骡子的主人,这对骡子使他在营业中得力不小,他为此而感到心满意足。参看 C. 朱利安:《高卢史》(法文),v,第 154 页起。

4. 一块墓碑上的浅浮雕。兰斯(杜罗科尔托鲁姆,雷米)。兰斯的医院。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第 3685 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302 页,3。

一个鞋匠在他的店里,跨坐在一条板凳上,正在制一只(木料的?)鞋子(板鞋)。他的工具一半挂在墙上,一半放在板凳下面的一只篮子里。

5. 还愿碑。格兰德。厄比纳耳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第 4892 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222 页,1。

一个妇人(女神?)拿着一个 *patera*〈盘子〉和小木板,坐在一个壁龛里。她的右边是一个炉子,炉子上一口锅,锅上放着一个木盆,盆下垫着一块平板。盆里伸出一把勺子。壁架上放着两个球状物。女神的左边有四个木盆,一个叠着一个。右角里有一个女孩正在搅拌一个木桶里的东西,木桶钉住在墙上。这或许是一个制高卢皂(*sapo*)的作坊,还有那保护制皂业的女神天后尤诺?请看 C. 朱利安撰文,载《古史学评论》(法文)19,1917 年,第 199 页起;《高卢史》(法文),v,第 263 页,注 1,并参考《鲍利—维索瓦—克罗耳古典文物学实用百科全书》(德文),ii A,第 1112 栏起。也许是一个制药坊?高卢皂主要是用来染发的。J. 皮若安教授在一封信里提出,说这幅图画的是一个干酪坊(属于制"caciocavalla〈一种干酪饼〉"作坊一类的)。

(那里又是不列颠产品的集中地),同时他们也很便于把这些产品散销给来因河上的屯戍地。我们还要记住,瑞士与多瑙河流域之间有联系而且有康斯坦茨湖(即 *Brigantinus*〈布里甘提努斯湖〉),加之诺里库姆居民具有极深的克勒特人性格,这都使得高卢商人容易进入多瑙河流域,并且使他们能与意大利商人、与阿魁累亚的港口和达尔马提亚诸城市竞争,至少能在较轻便的商品方面进行竞争。

因此,在二世纪时,高卢的商业同它的农业和工业一起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状态。只要阅览一下《拉丁文碑铭集录》第十二卷和第十三卷中那些碑铭,以及研究一下埃斯佩朗迪厄刊印高卢所

发现之雕塑和浅浮雕的那部洋洋大观的图集，就足以了解高卢工商业发展之辉煌了。例如，里昂的一些碑铭，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或是刻在各种日常用具（“*instrumenta domestica*〈家具〉”）上的，都反映出这个城市在高卢和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那些涉及各种不同商业行会的碑铭尤能看出这一点。里昂不仅是谷物、葡萄酒、油和木材等方面交易的一个大的票据兑换所；而且它还是帝国中制造并分销高卢、日耳曼尼亚、不列颠诸地大多数消费品的最大中心地之一。

与里昂同等重要的是摩泽尔河上的美丽城市特雷韦。特雷韦主要是一个商业城市，其次才算一个工业中心。这儿的商人也和里昂、阿雷拉特（阿耳）的商人一样，大多是皇帝政府的经纪人；他们在高卢收购各种货物，用船沿摩泽尔河运往来因河上诸城市和边塞上的堡寨。他们主要的专业是贩运衣装和葡萄酒。摩泽尔河沿岸一个突出的景色就是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墓碑，这些墓碑的形式是由柱形演变来的，它们叙述了特雷韦这个城市在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经济生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这些碑大多都刻满了雕像，其中一部分刻的是神话情节，而大多数则是详尽地刻画建碑者的事业和私生活，这些建碑者的主要职业显见是批发商业而非工业。公元三世纪初在伊杰耳地方塞昆迪纽斯家墓地上建立的那座有名的碑极其琐细地描绘了衣装批发生意的情况以及这项买卖所使用的运输工具。一格连一格的雕图使我们看到塞昆迪纽斯家商号里的大账房和账房里的货样、铺面、货物包装、货物在陆上用大型二轮运货马车运输而在河里靠纤夫拉船运输等等情景。塞昆迪纽斯家是衣装行的大商人，但我们在努马展发现一些奢丽的墓碑

的碎片，这些墓碑的主人却是葡萄酒商人。在这些碑上也和伊杰耳的碑上一样刻着次序相同的一套连环图画，不过那货物却是大木桶装的葡萄酒。从特雷韦富商们的墓碑上所刻的各种景象看来，这些富商也像一世纪时的特里马尔基约及其他富翁们一样把自己的一部分金钱投资于土地，一部分投资于钱庄业或放款上。我们在下章里还要回过来谈这个主题。

高卢的另外两个大商业城市是阿雷拉特和纳尔博。但是，它们不像里昂和特雷韦那样着重于供应来因河上的军队，而是着重于把高卢的产品，特别是葡萄酒，输往罗马城及意大利其他城市，甚至输往东方各省。我们知道这两个城市里有许多市民都是靠兼营批发生意和运输业而发大财的。

高卢的企业活动一旦开始，势必要继续发展。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兴盛使高卢致富以后，这个地区变成了本地货物和外地货物的一个重要的需购者，这些货物从这里很容易转送到不列颠的一些最遥远的角落。高卢商人也毫无必要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罗马行省边境以内。他们重新恢复了同日耳曼尼亚之间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早在远古时期即已存在过。高卢的工业产品虽不十分精美，但价廉而经久耐用，因此在帝国各地都受欢迎；高卢就靠这些产品以及它的葡萄酒和谷物来偿付它从意大利和东方输入的货物。

西班牙、阿非利加和不列颠的商业若同高卢相比则发展水平是较低的。这些地方产品的市场不太大，而它们的贸易除了向罗马城和意大利输出部分外，主要是本地区内部的贸易，交易的都是本地土产。高卢在帝国西部的唯一的商业竞争者是亚德里亚海沿岸诸港，尤其是阿魁累亚。意大利北部既很肥沃，而阿魁累亚的位

置又很适宜，从这里有一些天然道路通往多瑙河流域各条主要河道之旁，这两点对于这个城市以及整个该地区是很有利的，从而使高卢不能独霸多瑙河流域的市场。由此我们就明了为什么当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趋向衰敝的时候意大利北部和达尔马提亚反而兴旺繁荣起来。阿魁累亚是多瑙河驻军的一个票据兑换所，正等于里昂和特雷韦是来因河驻军的票据兑换所一样。多瑙河口上的那些城市简直不可能同它竞争，因为它们没有发达的工业或科学的农业。

东方也同样正在逐步摆脱意大利，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恢复罗马统治前已存状况的过程。对于帝国东方各行省恢复经济活力的运动，也是靠国家大力支助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和中游的驻军就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居民的好顾客。东方的另一个重要市场是罗马城本身，它吸收大量东方所产的货品或从中亚、中国和印度运到东方来的货物。埃及的情况与此相同。固然，在这样一个富饶之邦的贸易平衡中，埃及驻军规模之大还不足以使其消费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项目；但是，罗马城却还是替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埃及向它供应谷物、亚麻布、苇纸、玻璃、大麻以及在亚历山大里亚用印度和中国进口原料制造成的货物。尽管如此，国家、军队和罗马城并非东方货物的最大顾客。帝国各城市日益繁荣，这就增加了对高级货品的需要，所谓高级货品并非专指奢侈品，大多数是一些供文明人享受舒服的必需品，例如上等牌子的染色羊毛织物和亚麻布、上等牌子的皮革制品、多少有些艺术性的家具、精致的银餐具、香水和颜料、艺术性的化妆品、调味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物品日益成为帝国各地城市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无怪乎它们从少数产地向东方和西方各城市输入的数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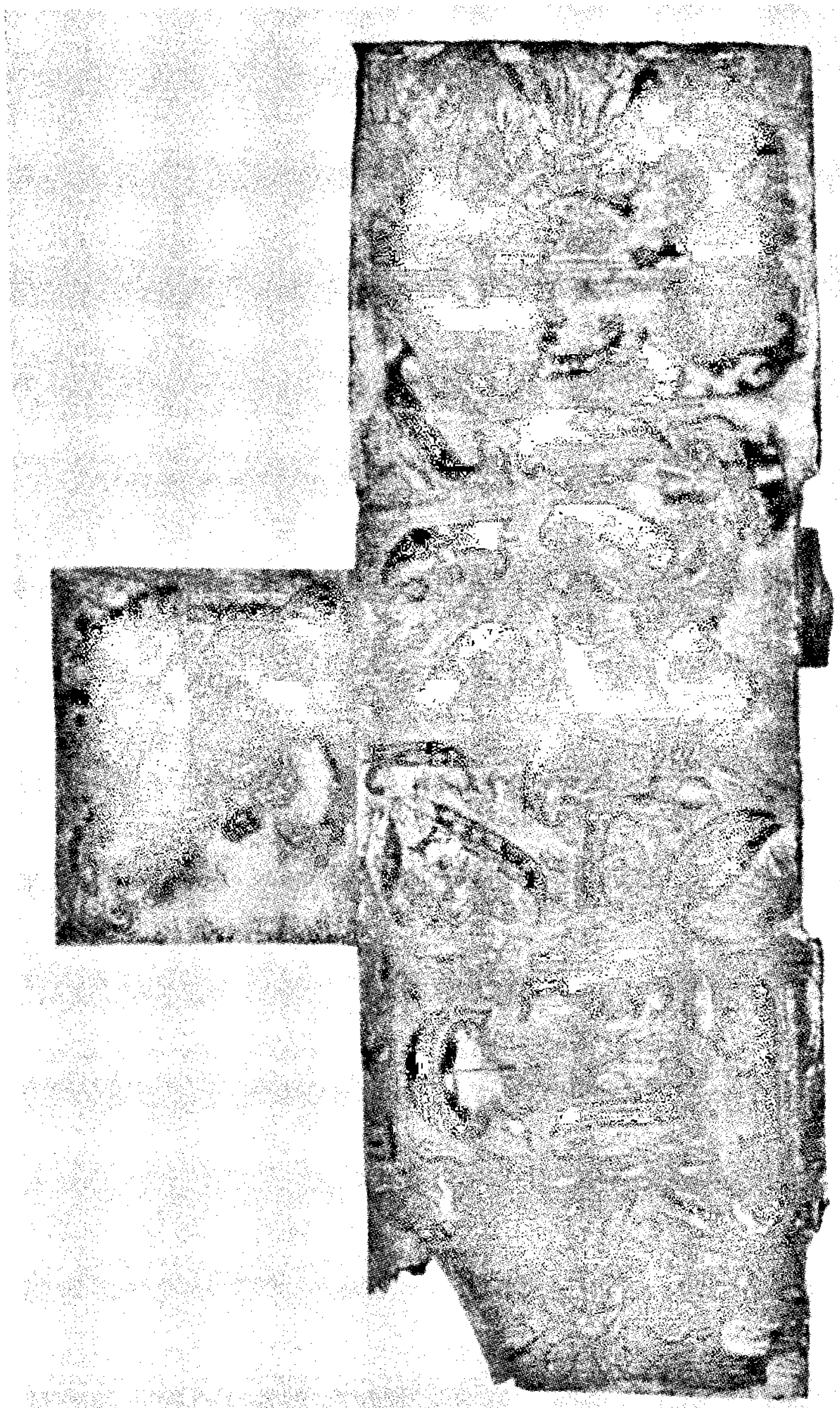


图 29　罗马帝国的商业

内河船只和海舶(阿耳提布罗斯的镶嵌细工)

图 29 说 明

阿非利加院辖省梅丹纳(阿耳提布罗斯)地方的一块镶嵌细工。突尼斯，阿拉乌伊博物馆。《高卢与阿非利加镶嵌细工图谱》(法文)，ii(1910 年)，第 576 贡；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274 页，3。关于铭文，请看《拉丁文碑铭集录》viii. 27790。

这块镶嵌细工嵌在阿耳提布罗斯地方一个富人家中浴室的 *frigidarium*〈凉爽间〉的地板上。花图两端是：(1)大洋化身的头部，周围环绕着鱼、其他海兽，还有精灵库皮德们坐在海豚上，(2)一位河神的像，环绕着芦苇，他的左手拿着一根树枝。在这两端之间的地方全画着水，水面上浮着各种各样的海船和内河船只。大多数船只都标明了它们的专称，有些名称旁边还附上拉丁诗人们的诗句。有些名称是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的。其中文字保存得最清晰的有下面一些。(1) *Σχεδία*〈平底船〉，*ratis sive ratiaria*〈筏或浮桥船〉。(2) *Celetes*，*κέλητες*〈急行船〉："hypereticosque celetas"(卢契留斯?)。(3) *Celoces*〈快艇〉："labitur uncta carina per aequora cana celocis〈那涂着油的快艇船底将在灰色的海面上起伏颠簸〉"(恩纽斯)。(4) *Corbita*〈驳船〉："quam malus navi e corbita maximus ulla'st〈在名为驳船的船上，什么东西都尽可能地和大樯一样高大〉"(卢契留斯)；(5) *Hippago*，*ἱππαγωγός*〈运马船〉(船上载着三匹马——Ferox，Icarus 和 Cupido)。(6) *Catascopiscus*〈侦察船〉。(7) *Actuaria*〈轻便船〉(船长正用一把 *portisculus*〈指挥桨手之木棒〉，在指示桨手应该多久划一下)。(8) *Tesserariae*〈信号船〉。(9) *Paro*〈轻装船〉："〔tunc se fluctigero tradit mand〕atq〔ue〕paroni〈正当这个时候，轻装船委身于波涛之中〉"，(西塞罗)。(10) *Myoparo*〈轻装海盗船〉。(11) *Musculus*，*μύδιον*〈海贝船〉。其他名称见上引著述。

从这幅镶嵌细工可以看出古代世界的船只名目繁多，各有专用。直到近代发明汽船使河海生涯中这种孤帆独舶、景物如画的环境大受破坏以前，一直保留着诸如此类的繁杂的船只名目和形式。关于这幅镶嵌细工的铭文所提到的种种不同的船只形式及其所作的描写，请看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中所刊有关论文。

断增多。例如，我们在南俄罗斯那些半希腊式的城市里所发现的亚历山大里亚制品数量惊人，而这些城市并非特殊的例子。东方同帝国各城市的贸易正是东方各省和埃及发财致富的主要来源。

这种东方的贸易不再集中在罗马商人和意大利商人手中了。在公元一世纪之中，意大利商人逐渐不在东方出现了。其原因前文已经交代过。一则由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东方到处情况恶劣造成阻碍，再则因为西方新兴市场具有吸引力，所以意大利人逐渐从东方转到了西方。当和平局面来临和东方开始复兴以后，那些意大利人仍然落后，而无法同精明的东方人竞争，东方人一直没有把东方贸易的门户要地、即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腓尼基沿海诸港放弃给西方的侨民。在公元前二世纪和前一世纪时，叙利亚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从这里派出他们的经纪人到提洛斯岛去，后来又派到普特约利去，而在整个内战期间那种多难之秋，他们仍然保住了他们的商栈（*stationes*，相当于后来的“庄〈fonduks〉”）。待恢复和平以后，这些庄号很自然地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介。东方不再吸引意大利人了，因为意大利人在那儿已经没有战胜自己对手的希望。其结果是，意大利人不再出现于这些地区如同他们也不再出现于西方一样，而东方人却不仅垄断了东方的贸易，并且还逐渐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意大利和西方各省的港口。

关于罗马帝国商业活动的组织状况，我们知道得很少。中央政府对于商业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无论在一世纪或在二世纪，政府的政策总是自由贸易政策。如前文所指出的，皇帝们保存了所有行省边界上所征收的有限度的关税；对于国家所需要的商人和船主则赐以特权从而允许他们发展自己的行业和行帮组织，以

资鼓励。因此，在对外贸易方面和国内贸易——无论是省际贸易或省内贸易——方面，政府的政策都是保持自由放任的政策。

在托勒密王朝时代的埃及，商业曾经或多或少有点国有化，但罗马皇帝们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制度，更谈不上发展它了。赐予特许营业权的办法虽未完全放弃，但已不轻易施行，而希腊化时代的国家经纪人则有一部分变成了自由的零售商，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归结为缴纳定额税金。

批发商和零售商，船主和运输商，都有联合组织，其名目之繁多似乎可以表明一世纪和二世纪时的商业开始改变其原来的个体经营的性质而逐渐采取了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方式，即以规模庞大、资金雄厚的贸易公司为基础。然而，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中，商业活动始终完全是个体经营的。唯一的例外是包税人的公司及其半现代化的组织，但它们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它们是在一个既不愿意又无能力处理复杂的税收问题的国家的赞助保护下产生的；而一旦国家取消保护并且较严格地限制它们的活动，它们就立刻趋于瓦解。在罗马帝国有关贸易公司和贸易团体的法律中，实际上找不出这种包税公司留下的痕迹。帝国时期的贸易联合组织绝不是由税收公司演变出来的。它们是作为行业公会而发展的，国家之所以承认它们，只是因为国家同团体交涉比同个人交涉要简单容易些，这一点前文已谈过。我并非断言它们仅仅是一些俱乐部和宗教性的团体；但是我深信，如果说它们具有一点经济重要性，那么，这种经济重要性也仅限于调整它们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已，而这些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性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性和司法性的关系。在正

常的时候，国家同一个公会中的个别会员打交道。只有当国家把一种特权赐给其全体会员或者把一项负担加在全体会员身上的时候才同整个团体打交道。对于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社会团体来说，正常的发展道路就是从独立自主直接转向受国家统制和国有化。帝国时期商业活动的个体性可以从罗马法律中关于团体组织(*societates*)的专款看出来。罗马的法律从来没有提到过现代非常熟悉的那种公司，显然是因为根本不存在那种公司。罗马的 *societates*〈团体组织〉仅仅是个人的团体，虽然组成了这种团体，但个人活动所受限制很小。

对于这个一般规律而言，唯一值得提到的例外就是帕耳米腊的商人团体。他们有自己的 ἀρχέμποροι，即领班，这种领班肯定不能同 συνοδιάρχαι 混为一谈，后者即沙漠商队的领队。沙漠商队大概每出外经商一次就要选一次领班和领队；但是，领队是商队的向导，而领班则是组成商队的一些商人帮伙的首领。由于我们对于帕耳米腊商人的材料见到的很少，所以无从对他们的组织作出肯定确切的判断。不过，看来与这种团体相近似的组织在罗马帝国是找不出来的，只有到巴比伦尼亚的传统习惯中和巴比伦尼亚的贸易团体里去找寻。

我们综观公元后头两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商业的演变，从而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商业，特别是对外的和省际的海上商业，乃是罗马帝国主要的财源。大多数暴发户都是靠这种商业发财的。经营商业所得的钱财投之于工业、土地和放贷，这些投资方式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帝国最富裕的城市(我要不嫌重复地强调这一点)，也就是罗马世界中最大的财主们所居住的城市，都是那些商业最

发达的城市，它们或位于距海不远的重要商道上，或是内河航运四通八达的中心地。

另一项致富之源是工业。帝国各地广泛地散布着地方工业所制造的物品，尤其像那些其他地方所不能复制和仿造的工业品。东方，特别是小亚细亚和腓尼基，仍然以制造色彩华丽的衣装和毛毯著称。小亚细亚是制羊毛衣的主要中心，叙利亚和埃及是制亚麻布的主要中心。上等皮革制品也是近东的一项特产——产于叙利亚、巴比伦尼亚、小亚细亚和埃及。埃及的苇纸除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羊皮纸而外别无其他竞争者。叙利亚和埃及的玻璃在整个罗马世界中仍然享誉甚高。精美的首饰珍宝也大多产于东方。有一件事是很显著的：工业永远同希腊本土无缘。我们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重要物品只有一两样在希腊本土也生产。

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迅速分散化。东方在工业活动中仍占重要地位，但却不是独霸无敌。西方的工业也开始蒸蒸日上。关于意大利的情况，我们已经说过了。意大利工业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希腊本土工业的命运。随着文明和城市生活之推广到西方各省，意大利不再据有西方工业活动中心这种领导地位了。南意大利、特别是塔兰土姆的羊毛织品和北意大利的羊毛织物仍然享有盛誉，能够行销。但是，意大利在生产玻璃、陶器、灯盏、乃至金属器皿等方面所曾占有的垄断地位却一去不复返了。意大利尽管仍然生产这些物品，但差不多全部产品都只可能供销于本地市场。意大利的劲敌是高卢。高卢盛产金属和最适宜制陶器的粘土，又有大片的森林和牧场，水道异常稠密，因此当地精明强干的企业家很容易击败意大利，差不多将它完全排挤出西北市

场。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红釉陶器原来是摹仿意大利的产品，现在却彻底打垮了它；来因河流域所产的玻璃比康帕尼亚的玻璃价廉物美；日常穿着的羊毛外衣为高卢的一种特产品，后来不列颠也制造这种外衣，它不仅行销于意大利，而且还行销于东方；高卢作坊里制出的青铜瓶以及 *champlevé*〈镂成铜胎〉再涂珐琅的青铜安全栓畅销于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日耳曼尼亚，甚至远达南俄罗斯草原。总而言之，高卢现在取得了意大利在公元前一世纪时所占有的地位，成为西方最大的工业区。多瑙河流域诸行省、西班牙和阿非利加都不能与高卢的作坊竞争。

但是，工业的分散化并不仅限于高卢的工业化。帝国每一个行省和行省里每一个分区都尽可能用廉价的本地仿造品来代替进口货以与之竞争。大家知道，意大利北部的福尔斯工厂（或作坊）起初几乎垄断了陶灯的制造业，但到二世纪时丧失了它那无远勿届的市场，在各个行省内都有本地制造的形状相同的灯盏代替它的产品，有时那些仿制品甚至还仿造福尔斯家的商标。特别可以说明问题的是阿非利加的灯盏制造业发展史。起初，迦太基所制的灯代替了意大利所制的灯而独占阿非利加本地市场。但是，迦太基的陶制品在某些市场上又逐渐被当地所制的灯盏排挤出来。另外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埃耳—奥亚附近某个名叫纳维纠斯的人所开的陶瓶工厂，这个工厂制造带有嵌镶图像的陶瓶。这些陶瓶是根据原先从东方传到意大利来的那些陶瓶式样仿造的，而它们很顺利地占有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参看图 60）。

中央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帝国时期的法律中没有类似于现代有关专利权的法律。任何人可以自由地

仿造竞逐者的产品，甚至伪造赝品。这究竟是由于没有立案权还是由于政府方面执行这样一种固定的政策呢？不管怎样，这总是表明这班工业家们毫无政治力量。大地主们可以提议要政府保障意大利的葡萄酒业（下一章将说明这件事），富商们终能获得商业上的重要特权，唯独在工业方面显然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感到兴趣。由此可以想见，工业始终掌握在一些较小的作坊主手中，从来不曾有过投资甚巨的大规模工业组织形式。如果同我们所见到的公元一世纪时意大利——特别是蓬佩伊——生活的逐渐工业化比较起来，这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衰退现象；甚至就是同希腊化国家中可能发展起来的那种工业组织比较起来，这也是一个显著的衰退现象。工业分散化运动使意大利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停顿下来了，而且现在它正在阻碍各行省中大规模工业组织的成长。我们诚然不能否认由意大利开端的工业化运动扩展到大多数行省中去了，在外省许多小市镇上我们也能看出蓬佩伊所曾经历过的那种变化过程。外省中大多数城市原先本是农业生活的中心，本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农业区域的行政首府，而现在都发展起重要的地方工业来了。每一个较大的地区，乃至每一个行省，都有它自己的工商业中心，这些中心地所生产的货物不仅只供应当地的市场，甚至不仅只供应本省市场而已。读者会回想起前文所谈过的高卢工业生产日益增长的情况、里昂在高卢工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东方大工商业中心的情况。我们曾见到在东方和意大利都有过资本主义方式的大规模生产，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城市中我们不能不假定也有倾向于这种资本主义方式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趋势。然而，就是在这些较大的中心城市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也

一直未曾发展得比希腊化时期的规模更大，组织也未见更为完善。地方上小工匠的作坊在许多方面居然能同较大的资本主义组织对抗。大工业字号并没有扫灭小工匠，这与十九、二十世纪时欧洲和美洲大工业字号扫灭小工匠的情况不同。地方作坊甚至连玻璃和陶器这类货品也能顺利地进行制造，而这些地方产品的竞逐竟使得大企业不能漫无止境地发展。地方作坊仍保持着工匠店铺的旧形式，一面制作，一面出售，产品则各店自有专行，如提姆加德的地方作坊就是一个例子。

外省经济生活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某些经营农业的大庄田上发展起来的大工业机构同城市里的作坊和工厂进行竞争。有一些属于大财主的大庄田在二世纪时开始组织作坊生产货品，其产品并非为庄田上的消费而是为了出售。在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的一个庄子里发现了一所很大的羊毛织造厂，在不列颠的一个庄子里发现了另外一所毛织厂。在比利时的一个庄子里曾发现陶窑，同时大家都知道，比利时著名的昂特厄庄中有一部分庄屋就是一所制上釉青铜器的工厂。这样一些企业组织显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它们的发展也意味着工业的进一步分散化。

就在工业活动开始分散化的同时，无论是大工厂或小作坊制造的产品都逐渐简单化和定型化了。在希腊化时代，工业制品以美观为首要，这种风气在公元一世纪时仍然流行，但到了二世纪时就逐渐消失殆尽了。这个时代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形式，没有采用任何新的装饰标准。在技术界触目皆是呆板无味的老一套。从一世纪以后，除了玻璃工业中还有一些新的花样外，在其他工业技术中，我们简直看不出有任何一点新发明。如果把早期阿雷丘姆的

1. 卖带子和枕头

2. 陈阅 ·段布料样品

3. 造船

4. ··个铁匠

图 30　意大利的工业

图 30 说 明

1. 浅浮雕。佛罗伦萨,乌菲齐展览馆。W. 阿梅隆:《佛罗伦萨古物介绍》(德文),第 168 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i,第 44 页,3。

一个店铺的内部。墙上挂着枕头(或毛毯?)、腰带和一大段衣料(或一条毛毯?)。两个伙计当着店主(?)面打开一个盒子,盒内盛着一个枕头。看货的两个顾客,一男一女,坐在板凳上,后面站着两个奴隶。

2. 同图 1。W. 阿梅隆,同前引,第 167 号;S. 赖纳赫,同前引,第 44 页,2。

两个顾客(或是该作坊的主人)带着两个随从奴隶看一大段布料,布料由另外两个人拿着,在他们面前。

J. 西夫金在《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德文)13,1910 年,第 97 页和图 56、57 中将上面这两幅浮雕归之于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A. 斯特朗夫人在《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期间的罗马雕刻》(意大利文)第一章中采用了这个说法。但它们的风格,如阿梅隆所指出的,近似于奥古斯都式(即所谓希腊化的)浅浮雕的风格;其构图令人回味起蓬佩伊的商店招牌和壁画(见图 14—16)。我觉得还是把这两幅浮雕归之于公元后一世纪较为妥当。

3. 一座墓碑的一部分。腊万纳。收藏在博物馆。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i,第 128 页,3。

这碑的上部包括一个壁龛中的两座半身像。壁龛的上面和下面写着如下的铭文:"P. Longidienus P. f. Cam. faber navalis, se vivo constituit et Longidienae P. l. Stactini. P. Longidienus P. l. Rufio, P. Longidienus P. l. Piladespotus impensam patrono dederunt(普布留斯之子船匠普布留斯·隆季迭努斯·卡米努斯及其妻普布留斯之免婢隆季迭娜·斯塔克提妮之像。普布留斯之免奴普布留斯·隆季迭努斯·鲁菲约与普布留斯之免奴普布留斯·隆季迭努斯·皮拉德斯波土斯合资为其靠主立碑造像)"(《拉丁文碑铭集录》xi,139=戴索:《拉丁文碑铭选录》,7725)。碑的下部画着隆季迭努斯正在辛勤地制造一只船;船旁一块小匾,上题"P. Longidienus P. f. ad onus properat"("隆季迭努斯努力做他的工作")。

4. 一座墓碑的残片。阿魁累亚。收藏在博物馆。E. 马约尼卡:《阿魁累

亚国立罗马碑铭博物馆介绍》(意大利文)(1911 年),第 56 页,第 36 号;G. 布鲁辛:《阿魁累亚的历史与艺术简介》(意大利文)(1929 年),第 118 页,第 18 号,图 71。

一个铁匠坐在一把椅子上,正用钳子夹住一块铁放在砧上锤打着。他的背后有一个男孩或奴隶在拉风箱扇炉子里的火,风箱钉有一块挡板,免得火花飞到人身上来。右边陈列着一些铁打的东西——钳、锤、枪头和锁。铭文只剩下了末尾,"etl(ibertis)l(ibertabus)que";参看图 32-1。

陶器拿来同早期意大利和高卢的 *sigillata*〈印纹陶器〉对比一下,再把后者拿来同公元二世纪时的产品对比,就看得很清楚了。阿雷丘姆那些美丽的碗和壶非常悦目动人,一世纪时的 *terra sigillata*〈印纹陶器〉在技巧上精致异常,而且也还美观可爱,但是,二世纪时同样的陶器尽管在实用方面仍不失其为坚固适用的器皿,却显得单调呆板,艺术风格的主题和主题的组合互相承袭,毫无变化。在珠宝首饰、金属雕刻艺术品、雕玉、家具、家用器皿、兵器和军械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同样的现象。

我们如何解释工业的分散化运动同艺术风格、精巧技术的衰退二者同时发生的原因呢?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此处略举数因就够了。工业产品迅速地传遍整个文明世界,即使在帝国最边远的角落它也终于排斥了家庭制造品,这是显然的事实。例如,在埃及村庄里所得的发掘物的统计数字就可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村庄里几乎没有发现一件东西是家庭制造的:件件东西都是从村店里或从市场上买来的。在帝国各地,无论城乡,所有贫民的坟墓中所发现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一般的需要并不要求高级工业产品。需要高级品的人仅限于城镇里富裕的资产阶级圈子。而居民群众则要求廉价品,越便宜

越好。我们从下文便会知道乡村居民和城市下层居民的购买力是极低的。然而，他们的人数却是很多的。既然存在这种情况，自然就兴起了大量生产和工厂事业。不能不考虑到的另一个因素是运输状况。海港得到充裕的廉价品的供应，因为海运是比较便宜的。但海运的危险性总是较大的。因此，即使在濒海的城市里，一件本地制造的商品也比一件从远地运来的商品便宜得多。这种情况产生了工业分散化的第一步。在埃及和高卢，河流很便利地把货物运往境内最遥远的地方：因此无论亚历山大里亚或高卢的大城市都发展成为工业的重心。但在西班牙的某些地区、在阿非利加、在多瑙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在小亚细亚、在叙利亚，情形就与此不同了。希腊—罗马文明越深人远离海洋的地区、越丧失其显著的地中海性质，那么各种工业产品也就越难以运人那些远离海洋和河流的地方。这说明了工业分散化的第二步。每一个内地城市都希望达到自给自足，就地生产居民所需要的物品，同时采用进步的技术方法和模仿流行的式样。

由于需要廉价的物品，也就是说需要标准化的物品，因此小城市里的工匠与远古时期希腊城市里的工匠不同，他们不生产新颖的产品，因为新颖的产品同进口货竞争会嫌太贵。他们简单地用他们从大工厂学来的方法复制标准化产品。由于不知道使用机械，也没有任何防止伪造的措施，小城市里的工匠们生意兴隆，差不多在各项工业中他们都能同大企业竞争。这样一来，那些大作坊也就不得不降低它们的成品的质量：它们使成品价格更廉，自然也就使成品更趋于标准化和平板单调。

无论在小作坊里或是在工厂类型的大企业组织里，所使用的

劳动力虽不纯粹是奴隶劳动，但主要是奴隶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不存在劳动力的问题和为什么毫无组织劳动力的企图。同行业人的团体大概多数是大商人和船主、作坊主、工匠们的团体。但是，只要某一行业同帝国行政当局有直接联系，政府就不仅保护商人和船主的团体而且也保护工人们的团体，其理由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了和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打交道而免得和一群漫无组织的个人打交道。至于工业界的奴隶和自由的雇工，国家毫不关心，他们可以加入所谓 *collegia tenuiorum*〈贫民社〉，这种组织的宗旨是不在经济方面的。

上面所述的是一般的常规，我们见到一个例外情形，那就是东方——特别是小亚细亚——的工业社。我们在小亚细亚所有的大工业城市中遇到许多有势力的团体，参加者都是从事某一项工业的人，其中大多数属于纺织工业的若干部门。这些团体的成员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作坊主还是工人，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我想，他们大概只包括作坊主。这是一种行会或社团组织，其中的成员世代相承经营某项专门的行业，他们也许是某些祭司家族的后代，那些祭司懂得工业中某一行的营业秘密。小亚细亚的劳动力的情况似乎是特殊的。迪约曾谈到塔尔苏斯的亚麻业工人（λινουργοί），据他所谈的看来，似乎这种工人形成该城市居民的低贱阶层，而并未享受完整的城市公民权。这些亚麻业工人很可能是那些原先隶属于神庙工厂的工奴的子孙。埃及的一般情况与此类似。在埃及，托勒密主朝最早几代也是把神庙垄断工业的制度摧毁了。接着是一个几乎全面国有化的时期，工人们都分属于为国家利益而进行生产的某一工业专行。最后，到了罗马时期，国家

垄断的束缚松弛了;作坊主开始为自己牟利(至少是部分地为自己),使用自己家内成员、学徒工、雇工或奴隶的劳动力。至于国有化还残存了多少,以及工人们实际上受国家奴役到什么程度,目前还不可能断言。

小亚细亚的工人已经不再是工奴而又还未成为城市的公民。在这里,一般情况的特点就是罢工,它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发生罢工的地方。这里发生的是真正的行业性的罢工,与埃及那种逃往薮泽和沙漠中去或逃往神庙里去求神庇护之类的亡命行动(ἀναχώρησεις)有所不同。我们也是在小亚细亚才经常听到城市暴动的事,这些暴动显然是由作坊和工厂所雇用的工人们组织起来的,而且真正企图进行社会革命。迪约经常谈到比提尼亚各市中发生骚动,他又曾提到塔尔苏斯的亚麻业工人发生暴乱,此外在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和巴勒斯坦等地其他希腊城市里也不时发生闹事,这些情况就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

除开商业、工业和农业(下一章就会把农业同矿业、采石业等等合起来谈)之外,实业活动中另一个重要部门就是银行家和私人贷款者这一行。在帝国各城市中,信贷和信贷业务十分发达。由于工商业的兴旺,由于寄寓城市的地主人数不断增多,因此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现金以充发展和改进种种企业之用。另一方面,许多资本家手中正积累了大量现金。无怪乎不论是正式的银行家或是不专以放贷为业的富翁,贷款总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在帝国全境之内,到处都发展起名副其实的银行,有些是私人开办的,有些是市政当局开办的。

埃及的许多银行(τραπεζαι)经营业务性质之复杂使我们了解

到很多的情况。在托勒密王朝时期，银行同工商业一样也是由国家垄断的，未曾发展过什么很重要的业务活动。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业以自由，于是在埃及各城市中兴办了许多私人银行。我们所了解的材料的确只限于某些地方性的小市镇，因而对于亚历山大里亚这类大工商业中心城市里的银行家的业务活动不可能具有什么概念。但是，即使是地方性的银行也能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题材。无疑，这些银行都办理存款，并对某些存款付以利息。还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也办理由甲账户划拨给乙账户的支付业务。甚至把款子从一个城市拨到另一个城市也偶尔通过地方性的银行作为中介来办理。银行业的另一个重要事项就是买卖外币和检验钱币的真伪或是否掺混杂质。埃及各银行经营信贷业究竟有多大范围，我们无从知道。它们所存集的金钱并不闲置起来，这是无疑的；但就我们所得的全部材料看来，它们的主要业务在于协助它们的账户经办企业和纳税等等。

据我们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罗马城、意大利和各行省的银行经营业务范围与此相同。银行制度是从希腊以及东方的希腊人地区传到西方来的，意大利和西方各省的银行大多数由原籍希腊的人经营。银行业之所以兴旺自有一些主要的缘故，其中之一是由于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通货，虽到帝国时期仍然如此，另一个缘故是缺少铸币，因为缺少铸币，所以无论是兑换通货或实物都非常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信贷—划拨制度，甚而可以说这套制度是势在必建的。关于银行所办理的信贷业务，我们当然很想多知道一些，但我们所确知的情况表明它们的活动可以说同私人放贷者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必须记住，银行同企业中所有其他行业一样，都是个人

经营的事业，固然有一些银行由合伙经营，但在古代世界中没有任何大规模集股办的金融公司。

我们已经说过，银行业的发展多少归因于铸币流通方面的普遍情况。在这里不可能讨论这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只说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在罗马统治东方之前，希腊城市和希腊化君主国内，到处都是币制紊乱的现象，自从施行以罗马国币为主币以来，紊乱现象才大为减少。地方钱币逐渐减少，并慢慢绝迹了。在公元后头两个世纪内，除了藩属博斯普鲁斯王国自己发行货币而外，金币和银币统统由罗马国家铸造；不过在东方某些城市如提尔等地也曾暂时造过银币。国家在亚历山大里亚和短期内在安蒂奥克这两个东方商业首府维持过地方银币，而铜币则由罗马元老院和许多城市铸造，东方城市中造铜币者尤多。城市造币的原因在于罗马的造币厂不能适应帝国对于零钱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自然就要把造币权分给地方而允许某些东方城市保持它们自己的通货，允许它们铸造为发展地方贸易所不可少的铜币。存在多种多样货币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由于制定了固定的兑换比率而得以减少。另一方面，铸造金币和银币之权除了上述例外情况而外完全归国家垄断。虽说采用了这么些金属，通货的数量仍然不够，不过银行的活动使情况稍见好转。银行作为城市的代理人或接受特许权者，也积极参预发行和分配地方通货事宜，由此时常造成投机和发横财，引起尖锐的危机。我们知道两个事件（发生在佩尔加蒙和米拉萨），都是由于市场上见不到零钱而引起骚乱，甚至引起暴动。

由于缺乏零钱铸币而产生的一些有趣的后果，证明经济生活已有蓬勃发展，而国家对于这种经济生活的要求却反应迟钝和不

全面。当克劳迪亚斯和芮罗统治时期，在取缔高卢和西班牙地方造币权以后，西方各省包括来因河地区和不列颠等处出现了无数伪铜币，都是仿罗马城所铸的铜币而伪造的，而政府对于这些伪币视若无睹。此外，差不多在帝国所有的大城市里，甚至在某些小城市里，零售商、酒店掌柜、旅店老板、渡口和渡船主人等等都发行他们自己的钱币，或用代币形式，或用筹码形式。在罗马城的台伯河畔曾发现大量的这种 *tesserae*〈代币筹〉，大多是铅制的，在阿魁累亚、奥斯蒂亚、斯米尔纳及其他地方也发现过一些。在某些地区，甚至在一些城市里，可能定期地发行这种代币，像埃及的一些中心城市肯定这样做过。

掌握铸币最多的大财主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国库。他们无疑地也像私人放贷者和私人银行一样地把钱借贷出去收息。他们的金融业务活动当然非常之多，而国库大概也就是帝国中最大的银行家。我们听说过，在某些危机期间，皇帝们曾撤销私人所欠皇家财库的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皇帝们能够同现代国家银行一样采取措施。皇帝提贝里攸斯为照顾意大利地主的利益所采取的财政措施就是一个例子。奥古斯都为了支付退役军人恩俸而寄存在 *aerarium militare*〈军用库〉里的基金绝不可能闲置在这个专用财库的保险柜中。芮尔瓦和图拉真为补助本土自由民子女而创设了一大笔基金（*alimenta*〈贫儿补助金〉），到他们的继承者时候又扩大了它；这笔基金需要精明的经营，而这一项金融业务加以必要的改变就可以同现代国家银行以地产作保证的贷款活动相比。关于皇帝们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我们知道得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帝们在经营这些业务时从来没有什么定规，也从来

没有采用过任何制度可与现代大规模的国家银行所行的制度相比拟。

对于公元后头两个世纪中帝国经济生活高度发展的情况，在这段期间的罗马民法中有一种最清楚的说明。这些民法既体现于皇帝们和罗马长官们的法令(也有一些是元老院的法令)内，同时也体现于记载当时种种商业活动的文案内。还有一个材料来源就是有关法律的论文，有些保存得完整无缺，有些只剩下断简残篇。只有专家才有资格全面讨论这个题目。遗憾的是，一位正好有资格从法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同时来阐明罗马民法发展情况的学者L. 米太斯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经典著作就去世了，他这部书只刊行了一卷。他根据研究罗马法律史料和埃及的希腊文苇纸卷的结果，发现除了调整罗马公民实业活动的纯罗马民法以外，在外省还存在着另外调整外省人的法制，最主要的是由希腊城市和希腊化君主国制定的希腊—希腊化法制，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使我们深受其惠。在埃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早先存在过的埃及法、赫梯法和巴比伦尼亚法对于这种希腊—希腊化法制究竟产生多么深的影响，我们无从知道。对于法律的比较研究现仍处在幼稚阶段，我们需要全面地研究埃及律例和巴比伦尼亚、亚述、赫梯等法典所反映的东方法制。但米太斯及其学生们的刻苦钻研已经使我们肯定曾经有过一套相当通行的希腊化民法，这是从小亚细亚的碑铭、从叙利亚的羊皮纸卷子和叙利亚文律典、特别是从托勒密时期埃及的希腊文苇纸卷得知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帝国其他的行省里早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前也曾存在过一些不大严密、不大完备的法律作为这些地方的实业活动的依据。我们必须记住，高卢、西班牙、迦太

基以及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的地区在受罗马人支配以前已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文明生活。所有这些地方性的法制，尤其是希腊化法制，并未被罗马民法消灭掉或被所谓 *ius gentium*〈国法〉取而代之。在整个帝国时期，它们一直存在于各个行省中并成为该处司法的根据。它们的逐步发展对于罗马法的成长起了多大的影响，以及受到罗马法多大的影响，这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至于拜占庭时代的一些大部头法典如《狄奥多西法典》、《尤斯提年法典》和《律令大全》等所体现的晚期罗马和拜占庭民法体制的来源，也是一个同样有争论的问题。

根据数以千计的埃及苇纸卷以及在意大利和西方各省发现的若干文献来仔细地研究这些汇编的历史根源，就会看出罗马民法与地方法制两者随时代而演变的情况；而这样一种有关帝国内曾经通行的各种不同法制的演变历史就会成为我们对处于这些法制之下的经济情况进行研究的根据。在尚未完成这种研究之前，我们如果要使用拜占庭的这些汇编来重整罗马帝国任何一段时期或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都必须十分审慎。然而，某几类文献和罗马皇帝们的若干法令，只要使用得谨慎，对于我们研究帝国社会经济情况可能有所裨益。从这一点着眼，本书各章中使用了这类材料。但综合起来看，它们仍证明无论东方或西方的实业都有惊人的发展。特别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埃及的希腊文苇纸卷。只要稍为涉猎一下米太斯和维尔肯所编的《苇纸卷辑要》，或者涉猎一下P.迈耶尔所精选的有关律法的苇纸卷集子，就足可看出在埃及的罗马行省中实业活动是何等的复杂、经营起来是何等的费心。各种不同形式的契约，各种记录契约和保证其便于执行的手段，尤其

是埃及公证人和亚历山大里亚备案局的活动，以及 βιβλιοθήκη ἐγκτήσεων〈不动产存档处〉这个令人惊异的机构——这是一个土地注册所和一个保存埃及一切住户财产调查数字的档案局的联合机构——所有这些给予我们的印象就是：经济生活高度发展，其组织形式十分成熟。近年来在安息帝国境内搜集到的有关司法情况的报导材料也表明了与此相同的现象。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安息城市里所发现的羊皮纸卷子和苇纸卷上的法律史料，虽然为数尚少，但也证明了当时国家所组织的司法制度有着高度的发展，其形式与埃及的制度相同。

研究一下罗马民法的发展，以及研究一下描写这一发展的史料——如碑铭、蓬佩伊和达契亚的蜡版、皇帝们的谕旨、诏令和御札，也就是布龙斯—格腊登维茨和吉腊尔所收集的所有资料——所得印象与上述相同。值得提到的是，帝国法政有某些方面承受了希腊化时代独创的成就：例如，它接受所谓罗得海上公法并用以管理海上商业。

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谈过帝国国民由于内战所造成的社会政治身份的划分，而奥古斯都曾经使这种划分成为定制。帝国的社会结构在公元一世纪下半期和二世纪中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元老院议员阶级仍然是与皇帝同辈的贵族，这些人有在皇帝领导下治理国家的世袭权利。同一世纪时不同，它已不再是一个讲出身的贵族阶级，而变成一个服官职的贵族阶级了。其成员资格之一仍然是相当数量的财富。但是，供职于帝国行政机构中各种部门都很容易获得这样一笔财富，或者皇帝赏识某些人称职也可以赐予这样一笔财富。组成这个贵族阶级的人非但是皇帝的臣仆，而

且还是忠心的臣仆。它的成员实际上是由皇帝选录的。皇帝们之所以很容易进行选择人员的工作，不仅仅因为他们通常可以摈斥他们所厌恶的人，而且也因为元老院议员的家庭总是在很短期间就绝了后代，就连新议员的家庭也是这样。从奥古斯都起就开始抨击上层社会人士不愿意养育子女的风气，但他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克制住这种嫌弃子女的心情。像这样一个阶级竟然未完全绝灭，那是因为它不断地从帝国官僚的行列中、即从骑士阶层中递补新成员的缘故。

帝国贵族阶级第二级人数之多远过于元老院议员阶级。它也是一个服官职的贵族阶级，其人选完全取决于皇帝。它的成员虽然也要具备一定的家产，但标准并不高。它只需要 40 万塞斯透银币[①]，而帝国高级文官每年的薪俸是 20 万塞斯透银币，我们只要想一想这种情况，就能很容易明了，骑士贵族阶级并不是一个世袭财阀阶级，而几乎纯粹是一个官僚贵族阶级。这个官僚集团的成员是由城市富裕居民阶层中那些曾在军队里充任过军官的人递补的。因此他们像元老院议员阶级一样代表知识分子，是帝国中受过教育的阶级。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也像元老院议员一样，并不出生于罗马城或意大利，而属于西方和东方城市居民的上层。

因此，就社会观点来看，帝国这两个贵族阶级都属于意大利和外省人数众多的都市贵族阶级。对于这个庞大而有势力的集团，还没有人从社会经济观点来进行细致的研究。如果学者们对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城市一个一个地研究其有关记载，将会得到良好的

① Sesterce〈塞斯透银币〉是罗马一种小银币，每币折合二阿斯半。——译者

收获。现在我写下一些印象，这是由我个人和我的几个学生对某些城市进行详细研究而得出的。城市的政府掌握在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之手，他们之中有些人属于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而其余的人至少都是罗马公民。他们几乎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财阀团体：自治市的行政机构只可能由有钱的人担任职务，因为职位是由选举产生的（或由民众选举授职如西方所最常见的那样；或由地方议政会选举授职，这似乎是东方的惯例），而又是没有薪俸的。在职者有义务捐助城市以礼物，同时还得向中央政府担负财政上十分广泛的责任。这个富裕阶级的起源在帝国各个地区内是各不相同的。在意大利，自治市贵族阶级有一部分出自世家旧族，那都是意大利诸城市尚未并入罗马公民团体以前即已存在的世家旧族。在内战期间，有一部分这样的世家旧族为退役军人所替换。他们大多是小康的地主。在工商业城市中，除了这样一个地主贵族阶级以外，同时还有一个新兴阶级逐渐兴起并在市政活动中起领导作用，这就是富裕的商人和作坊主的阶级，其中有些人是自由民出身，而大多数是免奴或免奴的后代。在西方克勒特人居住的各省中，也有一群古老的土著贵族世家，差不多都是富有的地主。除了他们以外，出现了从意大利迁来的客户，人数不断增多。这些侨迁户最初的核心是由该地被征服时期和被征服后不久期间从意大利来的商人和放贷者以及那些定居于罗马屯市的退役军人组成的。工商业的发展使新侨迁户的人数和土著中的商人与作坊主（一部分是免奴和免奴的后代）的人数日益增多。西班牙、阿非利加以及多瑙河流域诸行省的城市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东方，一个希腊化型的资产阶级依然残存于古老的希腊城

市中。这个阶级包括一部分希腊人和一部分希腊化的土著居民，又吸收了共和国时期从意大利迁来的侨民。到了帝国时期，从西方新迁来的侨民相形见少了。小亚细亚的少数罗马退役军人的屯市暂时成了希腊化大海里的意大利岛屿，但这些屯市逐渐接受了希腊的影响而变成希腊化的城市了。因此，富裕的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分仍然是土著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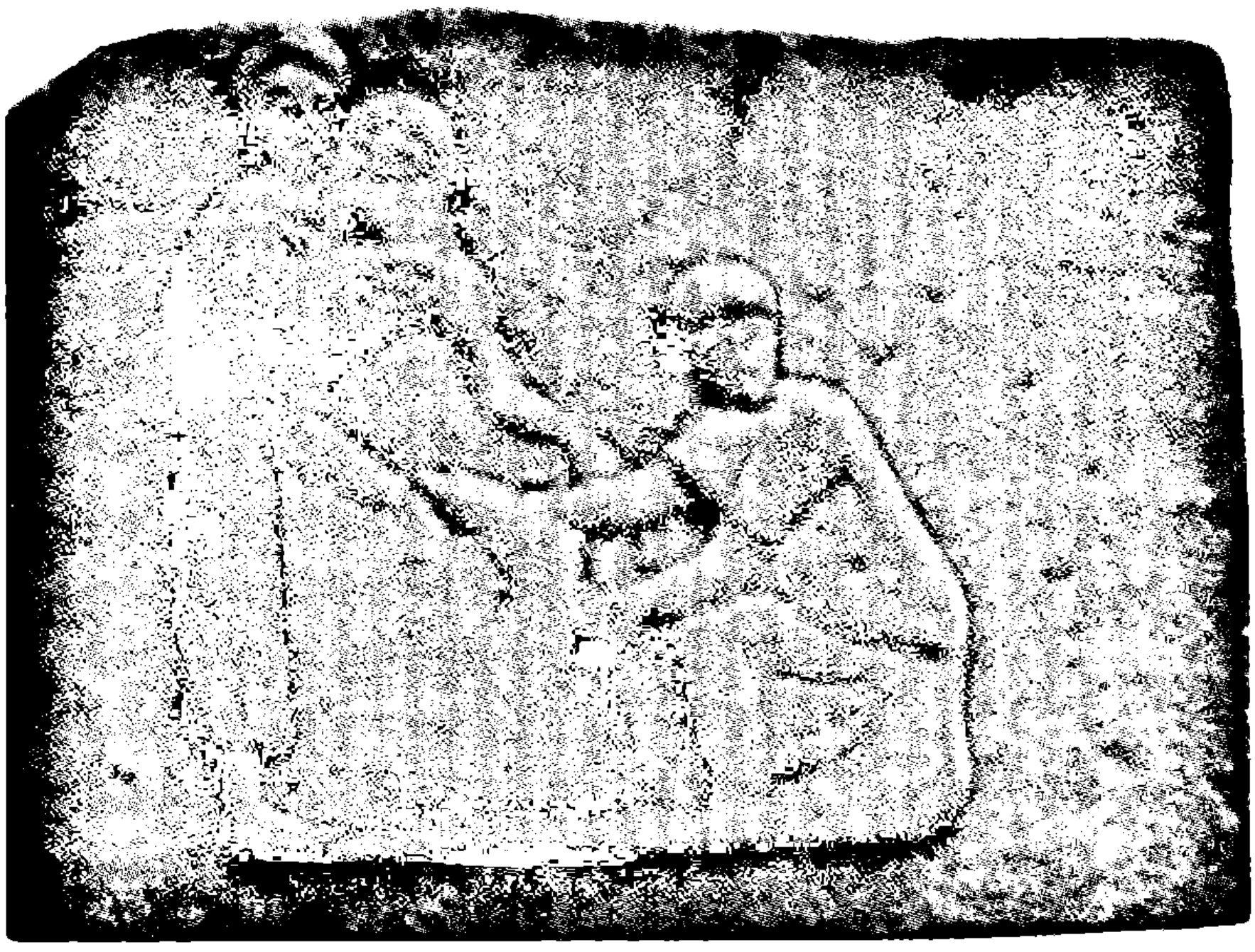
这种城市里的贵族阶级成分稳定程度如何，以及其人数有多少，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在帝国全境之内，新城市不断地成长，以资产阶级的财富为基础的城市生活蓬勃发展，表明在公元后头两个世纪中，资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地增长。但是，正如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的情形一样，他们人数的增多似乎并非完全由于旧家族的繁衍，而同时也由于加入了新成员，特别是新兴的土著和免奴。各城市的上层社会人士在许多情况下也像罗马元老院议员阶级一样乏嗣无后。城市贵族家庭通常过了一两代就绝了后，或者靠过继子女来继承，也有的家庭释免奴隶来补充家庭成员。我们只有从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城市资产阶级在罗马化和希腊化方面纯粹停留在表面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城市资产阶级中一切阶层、包括最上层在内的共同特征：我们只要想一想土著的风俗习惯在二世纪和三世纪期间在外省、特别是在东方各省的文化生活中重新活跃的事实就够了。例如，我们看到在外省的墓碑以及在一些宗教性纪念物上所刻画的服装式样带有地方色彩；同时，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地方性宗教仪式的复活，那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另外一件同样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塞普提米攸斯·塞韦鲁斯的拉丁语说得不好，而他的姊妹根本不会说拉丁语。文化情况

如此，我们用不着感到惊讶，因为罗马化和希腊化的过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些新兴的土著家庭和那些替代旧家庭成员的免奴们身上重新开始进行。

对城市资产阶级上层的重要性绝非夸大其词。正是这个阶层，它给帝国带来了灿烂光辉的面貌；正是这个阶层，它实际上统治着这个帝国。从罗马皇帝的眼光来看，这个阶层也同元老院议员阶级和骑士阶级一样，是一个服官职的贵族阶级，皇帝们就是通过他们来治理城市和市辖区的。社会地位较他们低一级的有小资产阶级，那就是一些店主、零售商、兑换钱币者、工匠以及自由职业的代表者如教师、医生等等。关于他们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少。他们在人数上同自治市贵族阶级和城市无产者两方面比较起来究竟孰多孰少，我们难以断言。意大利和外省一些古代城市的遗址以及遗留下来的千百家大小店铺，还有提到这个阶层的个别人物和提到他们的社团组织的千百件碑铭，使我们相信，他们是自治市生活中的骨干。但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断定究竟有多少店铺归这种小资产阶级所有，有多少店铺是由奴隶和免奴（*institorers*〈经理〉）替自治市贵族阶级中人来经营的。而且，我们无法在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下层之间划一道鸿沟，因为下层中人肯定常补升到上层中去。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还有一些领工薪的政府吏员和自治市的低级官员，这是一个人数很多而且有势力的阶层，其中大多数人是皇帝的——即国家的——奴隶和免奴以及城市的奴隶和免奴（*servi publici*〈公众的奴隶〉）。至于他们所得薪金的高低，以及小资产阶级收入的多寡，史料没有向我们作任何的报道。

处在社会底层的是城市无产者、自由雇工以及店铺和家庭中所

1. 一个外科医生在进行工作



2. 接生婆助产

图 31　奥斯蒂亚地方的生活和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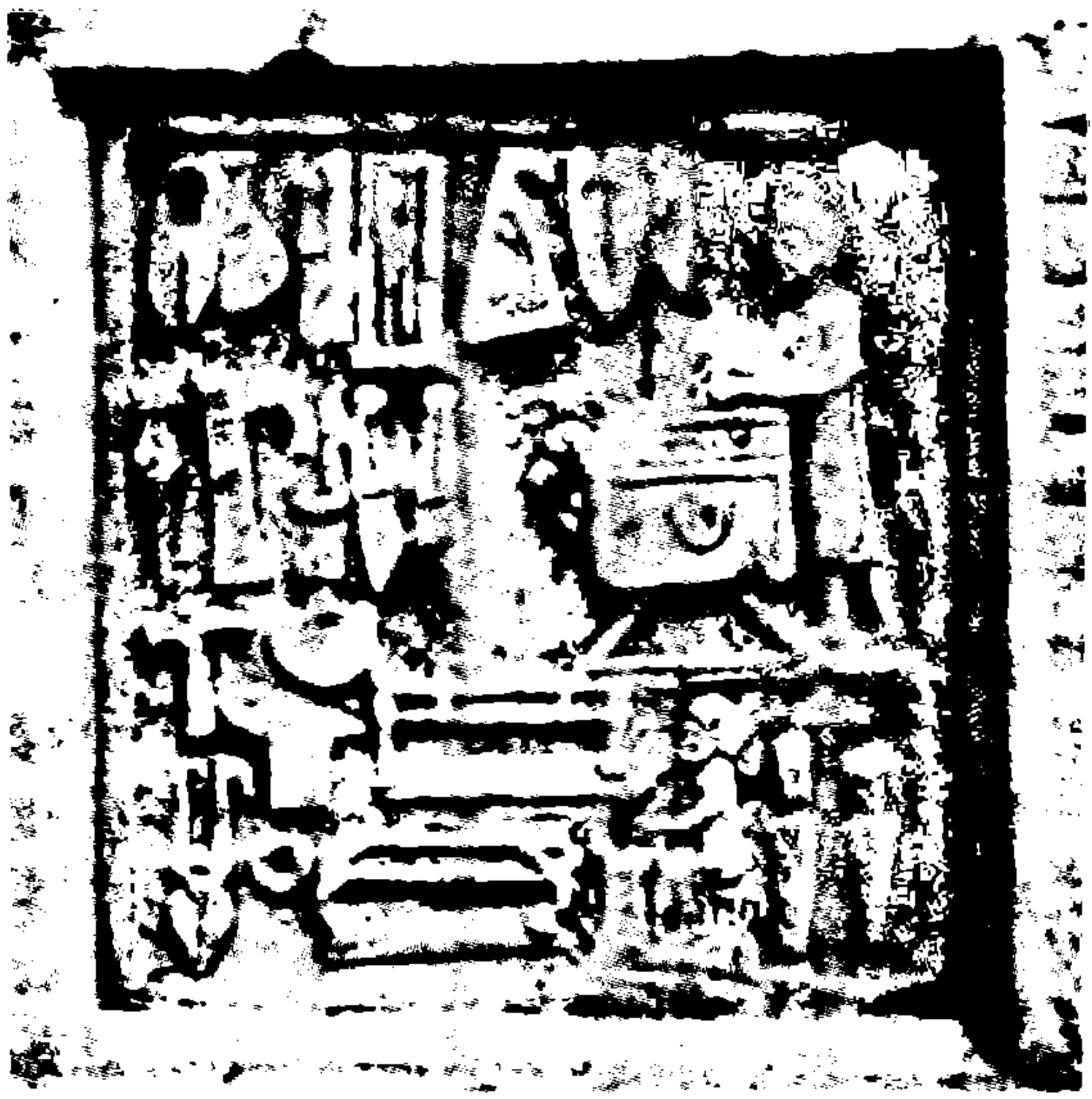
图 31 说 明

1. 这幅雕刻的右边有一个袋子，盛着外科医疗器械，左边有一个医生坐在一个小板凳上，给一个病人的腿放血。我们看到，那医生正在绑扎坐在他面前的那个男人的小腿，那个男人把这条小腿伸放在一个盆子里。（G. 卡尔扎：《萨克腊岛上罗马港的墓地》（意大利文）（1940 年），第 250 页，第 39 号和图 149。）

2. 这幅雕刻式样独特，它表现的是一个婴儿出生的情形。那产妇坐在一把产科椅子上，由一个护士伸两臂扶住，同时那接生婆坐在前面，好像在用力按捺产妇的小腹，催助婴儿出生。（G. 卡尔扎，前引书，第 248 页，第 38 号和图 148。）

使唤的奴隶。我们无从确定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我们见到的史料很少谈到他们，而发掘出来的城市遗址也没有给我们以统计资料。不过，既然有奴隶劳动，当然就使得自由工人的工资总是非常低，几乎仅足餬口而已，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但其中有些人还能有钱捐给他们的组织，即所谓贫民社，这个组织保证使他们和他们家中人死后埋葬得还勉强像样。

城市居民中层和下层罗马化和希腊化的深度如何，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看来，在西方，他们之中大多数人说拉丁语，某些人甚至还能写拉丁文；而在东方，则大多数人说希腊语，某些人能写希腊文。城市的公共活动非常活跃，剧场和圆剧场上的赛会和表演，大街和市场上的日常接触，这些都成了推广古代世界这两种官话的得力助手。我们准想知道，那些公共浴堂、竞技场、角斗演习所、剧场和圆剧场究竟是为谁建造的，为谁开放的。很难设想它们



1. 铁匠的工场

2. 卖水人

图 32　奥斯蒂亚地方的生活和行业

图 32 说 明

1. 图为一个铁匠工场。铁匠在他的作坊里,作坊内挂满着多种多样的器具,如外科医疗器械、锯、锤、砧、手斧、小刀等。两个人正在专心制造工具或修整工具。(G.卡尔扎:《萨克腊岛上罗马港的墓地》(意大利文)(1940年),第 251 页,第 40 号和图 150。)

2. 铭文指出这是 *Lucifer Aquatari*(*us*)〈清水池〉,碑刻本身表明画的是一个卖水店。一个妇人来买水,水贮在一个大缸里。在顶上一层板格子中陈列着各种大小的水瓶。(G.卡尔扎,前引书,第 255 页,第 45 号、46 号和图 157。)

不是为人人开放的。但希腊—罗马式的上等教育则无疑仅仅是上层社会人士的特权,二世纪时的皇帝们决定由国库开支公共学校教师的薪水,其目的并非为了使无产者受到教育,而是为了帮助城市资产阶级,使他们如愿以偿能让新生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

以上就是罗马帝国城市的情况。它们的社会景况不如它们外貌之动人。从我们的史料中所得的印象是这样:城市的繁华是由城市居民中相当少的人创造出来的,也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就是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筑在相当薄弱的基础之上;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群众则或者收入极为菲薄,或者生活贫苦不堪。总而言之,我们千万不要夸大城市的繁华富丽:它们的外貌是迷眩人的。

第六章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期的罗马帝国

意大利和欧洲罗马西部诸行省中的城市与乡村

我们没有统计材料来说明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的比例。但是，由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片很宽的“市辖区”，那就是说，有一大片土地同城市本身共同构成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单位，同时，由于在这些市辖区以外还有着辽阔的地区毫无城市生活可言，因此，我们不妨笼统地说，无论在意大利或在外省，城市人口若与乡村人口比较起来毕竟要少得多。文明生活当然集中在城市里；凡是对文化知识稍感兴趣从而同他的伙伴们有所讨论的人，全都住在城市里，他不可能设想自己能在城市以外生活：从这种人的眼光看来，γεωργός〈庄稼人〉或村夫就是半开化或未开化的贱民。无怪乎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世界的生活多少就等于古代城市的生活。城市把它们的事迹告诉了我们，而乡村则总是保持缄默。我们所了解的乡村的情况大多是从城里人那里得来的；城里人眼中的乡下农民，有时是取笑的对象，像希腊和罗马的市民喜剧中所反映的那样；有

时是反衬城市邪恶生活的对照品，像某些理学家、讽刺作家和田园诗人的作品中所反映的那样。城里人因为乡村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有时也谈到与本身有关的一些乡村实况，这种情形虽不常见，但偶尔有之，如小普利尼的书信和迪约·克里索斯托姆的演说辞中某几段就谈到过乡村实况。乡村居民自己的意见是很少听到的。自从埃西奥德写下他的诗篇以后，几百年来，乡村一直保持缄默，这种缄默只是不时被一些怨言所打破，怨言所申诉的是乡村生活的艰苦以及城市与政府（它们认为政府是代表城市的）对它们的苛待。某些文献中保存了这类怨言，其中大多数是埃及的苇纸卷，也有一些刻在古代世界其他地方的石碑上。我们通过公私文件档案——法律、皇帝和皇家官吏的敕令和诰谕、自治市行政当局的命令和自治市议政会的公告、乡村居民自己的代表团体的条例、诉讼案的判词，以及各种商务报告书等——间接地知道乡村居民及其经济状况。这些报导材料实在太少，而且很难利用。因此，难怪近代大多数有关罗马帝国的著作根本不提乡村和乡村居民，或者只偶尔在谈到国家生活和城市生活中某些事件时附带提到它们。然而，乡村生活状况的问题，与有关国家和城市的问题同等重要，同样地不容忽视。如果对这个问题缺乏仔细的研究，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古代世界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

把乡村居民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来谈是极其不妥的，而在我们这个历史研究领域内，如果这样谈论，尤其不妥。在古代世界中，各个地区的一般社会经济状况各有不同，其乡村生活亦因之而异；就是当这些不同地区丧失其政治独立性而被并入罗马帝国的时候，乡村生活也仍然和过去一样各不相同。罗马行省里的上层

社会和一般城市居民多多少少罗马化和希腊化了；整个帝国的城市生活具有了共同的形式；文化活动和实业生活在各个不同行省中也多少趋于一致了；但是，乡村生活，村庄和农庄里的生活，却几乎完全不曾受到这个统一化过程的影响。罗马化和希腊化运动在城市里顺利完成了，而在乡村里甚至连帝国这两种官话还接受得非常迟缓。乡村在同城市以及行政方面办交涉的时候才使用官话。但农民们彼此之间，在他们的家里和村子里，仍然说他们的土语方言。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实，用不着证明。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族农民和加拉戚亚族农民在圣保罗时代和以后仍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阿非利加的柏柏尔人、不列颠和高卢的克勒特人、西班牙的伊伯利安人和克勒特—伊伯利安混种人、来因河上的日耳曼人、巴尔干半岛上的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埃及的 *fellahîn*〈土著农民〉，以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那些数以百计的闪米特种部落和非闪米特种部落——属于前者有阿拉米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加勒底人等，属于后者有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卡里亚人、帕弗拉哥尼亚人、卡帕多契亚人、亚美尼亚人、吕西亚人等，也都各个使用自己的方言。他们并且还非常小心地保持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男神和女神可以借用希腊—罗马式的形象和名号。神的形象和名号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物，所以必然是希腊—罗马式的，因为那些刻碑匠、雕塑家和画家都是从希腊—罗马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除了希腊—罗马式的东西以外，他们也没有掌握任何其他成文的语言和任何其他通俗的形式。但是，他们所崇奉的神虽加上了这些官方的名号和不伦不类的形象，却仍然是农民们自古相传的土神，与几百年前被农民想象出来的时候一模一

样。还有一点也相当重要，即乡村居民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也保持他们的传统形式，这些风俗习惯力量之强有时甚至超过皇家的法律。

在这部简述帝国社会经济演变的书里，我们至多只能对这个问题目前所呈现的现象作一般的概括。就是作这样一种概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内容包括整个农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地租形式二者的演变等问题，而对于帝国的每一个地区必须分别对待。

我们从意大利谈起，我们对于意大利所知道的情况比对帝国其他地区清楚一些。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指出，意大利仍然是帝国中耕种得最好的地区之一，无论如何在公元一世纪以及二世纪上半期肯定是这样。从外省和国外运进意大利的货物至少大部分是用高级葡萄酒抵偿的，这个半岛仍然到处都大量生产这种酒，尤以康帕尼亚和北部所产最多。葡萄酒的生产是以资本主义方式、按科学方法组织起来的，主要是为了销售和输出。当然，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就是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一场大灾难。尽管政府采取了措施，但被埋葬的城市未能恢复，而且在这个区域内没有再兴起一个新城市，因为这要等过了几十年以后才有可能——以上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康帕尼亚经济力量的衰退。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公元 79 年的灾难严重地影响了这个地区的一般生产事业。不过，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见到的，意大利的葡萄种植业和以输出葡萄酒为基础的经济却受到另外一种发展的沉重打击，这种发展就是外省的经济解放，它对意大利的威胁肯定远远超过维苏威火山喷发之类的偶然灾难。意大利工商业的凋敝意味着

城市资产阶级逐渐趋于贫困，而如前所述，这个阶级正是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主要支持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下述现象，即地产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的过程在公元二世纪时并未停止，甚至比以前规模更大，其所侵害的对象不仅是农民，而且也包括城市资产阶级在内。就是在韦累亚和贝芮文土姆等市辖区那么穷的地方也可以看出这个土地集中的过程。如我们从有关贫儿补助金的文献材料中所见到的，* 这些市辖区的历史主要就是当地的份地慢慢集中于极少数地主手中的历史，而这些地主大多不是韦累亚和贝芮文土姆本地人，其中有些人显然是有钱的免奴。我们所见到的二世纪时的文字史料（例如尤韦纳耳的作品）仍然采用一世纪诗人和理学家们所常用的主题，即小地主被贪婪的大资本家所迫而离开了自己祖传的份地这个主题；而身为大地主的小普利尼也毫不隐讳地谈到他对土地的投资和他的大地产日益增多。

不难猜想这些投入意大利土地的资本是从何而来的。我们知道，罗马城的古老贵族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贵族阶级在外省所占有的土地大部分变成了皇帝们的财产。至于意大利的皇家地产，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它们所以很少被人提到，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只可能是由于皇帝们不想亲自经营意大利地产的缘故：可能他们把这些地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转让出去，特别是让给那些服官职的新兴贵族。小普利尼就是这个新兴贵族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大概是大地主家庭，属于科木姆自治市贵族阶级。他以及他家中其他成员都由于在国家行政

---

* 见第八章。

1. 意大利的一个村庄

2. 一个酒窖

3. 途中

图 33　意大利的生活和行业

图 33 说 明

1. 芒佐尼路早期基督教坟墓正室中的一个弧形面上的图画。罗马，芒佐尼路。G. 本迪芮利所撰文，载《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20 年，图 IV，以及《王家山猫学院珍藏古物集刊》(意大利文)28，1922 年，图 XIII。

本图上半部所画的是一个大城堡附近的两所庄屋或农民住宅。两所房屋之间有一大群牲畜(驴、牛、绵羊、山羊)在吃草。关于这个弧形面下半部所画的图形的意义，请看我所写的论文：《路夫勒博物馆所藏的一块色雷斯—米特里亚的匾牌》(法文)，载《各家学者向碑铭与文艺学学院提出论文集》(法文)13，1923 年，第 394 页起。

2. 一个石棺(?)上的浅浮雕。英格兰，英斯—布朗德耳府。H. 布吕姆讷尔所撰文，载《考古学报》(德文)1877 年，第 128 页起，图 I；拙撰，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26，1911 年，第 281 页，图 3；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454 页，1；B. 阿什莫尔：《英斯—布朗德耳府所藏古代大理石目录》(英文)(1929 年)，第 108 页，第 298 号，图 46。

浮雕的左边雕着一对夫妇握手的形状。这两个人像大概构成石棺的一条长边的中央部分。在他们的右边刻画着一个大 *cell vinaria*〈葡萄酒窖〉，它同时又是一个葡萄园。一些奴隶正忙着把 *dolia*(“diffusio〈瓮〉”)中的酒灌到双耳酒坛里去并把它们运走；其中有些人正在歇息。右角上，屋棚下有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人，手执簿册，正在同一个顾客谈生意。柜台上放着一些木简。他的左面坐着一个助手，从助手的身后可以看到一个格子，格子里面放着文卷(?)，还可以看到一幅画，画着一条蛇。这一部分的右端有一个少年，大概是那对夫妇的儿子。毫无疑问，这幅图刻画的是一个大酒窖，在这里正进行一项葡萄酒的大批发交易。我认为这幅浮雕是一个石棺上的一部分，我的看法有一个旁证，那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安纽斯·屋大维·瓦勒里亚努斯的石棺可以与此类比，后者在拉特朗地方(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i，第 282 页，2)，其图形如下所绘。这里画的是：(1)耕地和耨草，(2)收获谷物，(3)搬运谷物，(4)磨面和烤面包。〔关于这个石棺的另一块残片参看图 34。〕

3. 一个大石棺的前面。本图说明见图 34，在那幅图中印制了该石棺同一面的另一块残片的图形。

安纽斯·屋大维·瓦勒里亚努斯的石棺。罗马，拉特朗

机构中身居要职而增殖了他们的祖传产业：其初如老普利尼等以皇家财务使起家，而最后如小普利尼等则先加人元老院，接着充任国家和皇帝的官职，就任外省总督以及皇家行政机构中各种部门的主管人，特别是在罗马城中。虽说在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代，搜括外省之风并不少见，但小普利尼以及他这一类型的人却不靠这种劫掠手段来发财致富。即使是最老实的总督，除了高薪厚禄以外，也有各种机会能够不违法禁而使宦囊充裕。那些土生土长于意大利的皇家官吏（普利尼即一例）自然要找寻一种安全的投资之道。一方面出于恋乡之情，一方面考虑到便于管理，他们也就自然愿意投资于意大利的土地或典押意大利的土地。投资于土地、次则典押土地，虽然利润不算太大，却是最安全的靠本生息之道，而这些沐皇恩的世家大族的理想仍和以往一样，正是要享有一笔安全的收人，这是法国人所谓坐食年金者的理想。对于皇家官僚中意大利本地人的人数，我们也绝不可低估：他们依然占皇家官僚的大多数。

但是，这个官僚集团以及元老院贵族阶级中有许多人是外省

人。他们都属于富裕的自治市贵族阶级，在西方多为西班牙、高卢和阿非利加人，在东方多为小亚细亚人，后来也有叙利亚人。他们的经济兴趣自然集中于外省；即使他们不完全是有钱的外省地主，至少其中大多数都是这种人。然而，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就任皇家官职时开始与罗马城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也许比他们与原籍城市的联系更要密切。他们寄寓在京城，并至少把一部分金钱投资于意大利的土地。固然，他们的本心还是想返归外省原籍，在故乡终其余年，受到乡里的敬重。这种愿望可能持续数代不衰，但也可能很快就消失无遗，因为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过分迷恋京城的生活，而不大想到一个小小的外省 *trou*〈巢穴〉去度那悠闲的日子。何况，如前所述，皇帝们都希望元老院议员的家族能长期安居在意大利，极力主张他们把一部分金钱投资于意大利的土地。

除了皇家官僚而外，在罗马城，以及在那些依然富庶繁华的城市如阿魁累亚和整个北意大利的城市等地，还有着一大批阔绰的批发商人和船主、善于经营的皇家免奴和奴隶、有钱的银行家和零售商人。我们必须记住，罗马城是日盛一日的，它在意大利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即使不说它在全帝国生活中的地位，有如今日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罗马城的富翁有许多人都出生在意大利，他们大多数都住家在罗马城，在这里度日。无怪他们在找寻安全的投资方式时首先就想到意大利的土地，这是近在手边的，比外省土地易于经管。

在大资本家的压力下，举凡农民所有的小块田产（大多在意大利的丘陵地区和山区）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的中等规模的地产，都不得不同归于尽，不得不被皇家官僚和意大利富豪们的大地产所吞

并。老普利尼曾谈到大地产对于意大利经济生活所造成的恶果，他所说的完全属实。普利尼认为大地产 *perdidere Italiam*〈毁了意大利〉，他的意思当然不仅指农民个体经营方式的消灭而言，并且还指那种以科学方法经营的农庄也趋于消灭。这些农庄是被大地产所吞并的，而大地产却是按照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则来经营的，我们在下文就会谈到这一点。普利尼所说的情形不止是他当时习见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他以后好多代仍很普遍。对于他如此明确地概括的现象，皇帝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曾试用各种方法来挽救意大利。克劳迪亚斯、芮罗和弗拉维攸斯氏一来为了这个目的，同时也为了国库的利益，曾极力把私有主非法占有的公地收归国家，再把这些公地分成小块卖给无土地的农民。芮罗和韦斯帕西安曾遣送相当多的陆军和海军兵士到南意大利那些日渐衰落的城市里去安家立业。关于多米戚安的措施，下文即将谈到。芮尔瓦曾收购大片土地，分给无土地的无产者。图拉真曾设法援助城市里的地主，大概也为了援助农民，他的办法是给他们以低息贷款，使他们改良土地，帮助他们教养他们的儿子，或不如说是抚育他们的儿子，并且也多少照顾他们的女儿。他还在意大利建立一些屯市，并禁止意大利向外省移民。关于阿德里安、安东尼努斯和 M. 奥雷留斯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将在下章里谈到。

所有这些措施均无成效。经济演变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努力。主要的原因在于外省的解放，而这个原因是不可能消除的，甚至就是要想减轻它对意大利经济繁荣的危害亦不可能。意大利经济之逐渐衰落，主要是由于本地工商业的凋敝，同时又因农业的危机而更加剧，那就是一世纪末乡村里的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所

图 34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时代意大利的生活情景

图 34 说 明

一个大石棺的前面。罗马,萨拉里亚门,温泉博物馆。帕里贝尼撰文,载《古物发掘简报》(意大利文),1926 年,图 VIII。

发现时已断成两块。准备刻铭文的地方留着空白未刻。本图所印制的一块残片上刻画的是一所农民的茅舍(类似一所阿非利加的 *mapale*〈村屋〉);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农民把一筐水果献供给一位长着胡子的乡下神。再过来是吃草的羊和一个牧羊人,接着又见到前面的那位神。最后是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孩子坐在农民的茅舍附近。图 33-3 印制了另一块残片的图形,那幅图上所雕的是一条道路。路上见到一块里程碑,碑上的数字是 V;一个旅客坐在马背上,带着一条狗,他的前面是一个向导;旅客的后面有一辆大车,由两匹牛拉着,车上装着一个庞大的盛酒革囊;而大车的背后有一座房屋开着三个窗棂。请参看原先收藏在博尔季亚博物馆的一件浮雕品,见 P. 托马塞提:《罗马的康帕尼亚》(意大利文),i,第 52 页,图 30,还可参看菲利佩维厄的石棺,见 S. 格塞尔:《菲利佩维厄博物馆》(法文),图 II-1。

遭受的危机,它是由于葡萄酒生产过剩、缺乏顾主而造成的。在第三章中曾经提到过这个危机的来临。西班牙、高卢和阿非利加以往都是南意大利的主要顾主,而现在随着自然发展的趋势,这些地方多半就地生产葡萄酒了。在东方,意大利的葡萄酒难以同希腊群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葡萄酒竞争,甚至难以同埃及的葡萄酒竞争。只有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还是意大利葡萄酒的市场。但这两处又主要是北意大利的市场,因为要从意大利西海岸的港口用船把葡萄酒运往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沿海的港口是很困难的。橄榄油的生产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前文已经指出过,西班牙成为名牌橄榄油的主要产地,而阿非利加成

为廉价橄榄油的主要产地。在东方，小亚细亚的橄榄油和叙利亚沿海的优质产品已经取代了意大利的橄榄油。

上面所简述的发展情况威胁着意大利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威胁着意大利中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但其危害尚不止此。这种发展使全国处于紧张状态。古代世界从来不曾遭受过食物（尤其是谷物）生产过剩的危害。前文已经屡屡提到，希腊、意大利，甚至小亚细亚都依靠那些大量生产谷物之邦来供应粮食；希腊和小亚细亚由南俄罗斯供应，意大利则由西西里、撒丁、西班牙、阿非利加和埃及供应。东西两方之推广葡萄树和橄榄树的种植，不仅意味着意大利的经济遭受损害，而且也会引起整个帝国的谷物荒。当然，罗马城还是安保无虞的。有来自埃及的谷物，还有来自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皇家田地与公共田地上的谷物，高卢和西班牙也要送来一些，这都是佃户缴纳的地租，这些租谷使京城里的无产者和宫廷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此外，皇帝们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来保证罗马城一切居民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其措施是使罗马城的居民对一些产谷行省的产品有优先取得之权，换言之，就是规定埃及出口的谷物除特殊情况外不得输往罗马城以外任何地区。但是，帝国各城市依靠外来谷物为生者甚多，罗马城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我们已经提到过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城市。这两处不能依靠南俄罗斯进口粮食为生，因为南俄罗斯的粮食产量日见低落，而且该地所产的谷物绝大部分要供应帝国驻在东方的军队。因此，东西两方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过剩意味着东方有长久之忧。饥馑之魔现在不断地在希腊城市前面飞翔：读者们会联想起圣约翰启示录中的生动描写，在皮西迪亚的安蒂奥克发现一件公元 93 年的拉丁文

碑文，证明启示录所描写的是小亚细亚的一次广泛的饥荒。* 罗马政府不能坐视东方各省陷于饥馑而不顾。普鲁萨的迪约曾描写过韦斯帕西安时期普鲁萨地方的无产者的暴动，这类暴动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皇帝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奖励谷物生产和限制葡萄酒与橄榄油的生产。关于这些措施，我们知道得太少。从一件偶然的告示中可以看出韦斯帕西安曾力图间接鼓励亚细亚的谷物生产。契比腊地方有一块公元 73 年的碑，碑文中说的是一个有钱的施主指定把他赠给该城的钱投之于“殖谷之地”，同时指示应将此事禀报皇帝和元老院。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篇碑文证实了元老院和皇帝方面至少是鼓励小亚细亚诸城市最好把它们所得的指赠基金投之于殖谷之地，否则似乎无法解释这篇碑文。此外，皇帝们还用强力干涉来禁止饥荒期间的投机倒把行为。在上文刚提到的那件安蒂奥克的碑文中，说到多米戚安手下的一位总督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甚至可说是强硬的措施（使我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所采取的类似的办法）来禁止诸如此类的行为，并保证该城得到比较价廉的谷物供应。

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多米戚安曾颁布了一项普遍施行的敕令来鼓励外省种植谷物和援助意大利的葡萄酒生产者。按照这项敕令，无论意大利或外省都不得再开辟任何新葡萄园。而且，现有的葡萄园有半数要毁掉。我们知道，这个措施没有完全贯彻执行。小亚细亚为此事派了一个专使团，由著名的演说家斯科佩利亚努

---

* R. 卡尼亚与 M. 贝涅：《一年来的碑铭学》（法文），载《考古学杂志》（法文），1925 年，126。

斯率领。这个使团保全了本省的葡萄园，也许还救了整个东方的葡萄园。还有，至少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南部（纳尔博嫩西斯省与贝提卡省）的葡萄园大概终于保全下来了。我们知道上面这些地区的葡萄酒向外输出未受阻碍。但是，如果说多米戚安的措施完全流产则亦言之过甚。这项措施在阿非利加是肯定雷厉风行过的，在多瑙河流域诸行省、高卢中部和北部、西班牙部分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厉行过。后来普罗布斯废止了这项敕令（大约在二百年后），才准许多瑙河地区、高卢和西班牙种植葡萄，甚至准许从未种过葡萄的不列颠也可以种植葡萄，这一点可以证明上述情况是事实。此外，在阿非利加，有名的 *lex Manciana*〈曼契亚法〉（多米戚安时或图拉真时）规定只许在废掉旧葡萄园时才能开辟新葡萄园以代替旧园；而另外一项阿德里安时代的法令谈到利用生荒地和熟荒地来栽种各种作物，却毫未提到葡萄。

对于意大利的橄榄油生产，未曾采取任何类似的保护措施。相反地，对于达尔马提亚沿海、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等地却予以扩大橄榄油生产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些地方都渐渐变成了帝国中这一行业的主要中心。阿德里安在阿非利加颁布了专为该地区施行的利用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法令，从这些法令可以看出橄榄油生产在阿非利加的重要性，并可以看出皇帝们极力想把该邦变成橄榄林之乡；而考古发掘又证明阿非利加的西南部在二、三世纪时无论沿海或内地都是连绵若干里不断的大橄榄林，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上面所谈的情况。

多米戚安的保护措施挽救了意大利的葡萄种植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挽救作用。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整个意大利的先

进农业和推行先进农业的中产阶级地主。在一世纪末的危机中，中产阶级是最先受难者。工商业没有得到皇帝们的保护，日见凋敝，从而加速了这个阶级的破产。此外，科学农业所依仗的劳动力，特别是奴隶劳动力，愈来愈昂贵了。无怪乎意大利的城市资产阶级不能够同罗马城的大资本家互竞高下。大资本家的出现事实上就意味着科学农业的彻底毁灭。

这一点无需多加解释。像小普利尼这类的地主可能是很好的企业家，可能善于经营他们的一般业务，如买卖土地、放债等等。但是，农业的繁荣绝不能依靠他们这类人。他们从来不住在自己的田庄上，因为他们在城市里事务忙碌，同时他们从来不完全依靠某一个田庄上得来的收入，而以往城市资产阶级中多数人却都是如此。我们已经说过，他们这类人所持的是坐食年金者的态度。他们只希望麻烦越少越好，哪怕收入少些也不在乎。要从土地上得到一笔相当可观而不太苛求的收入，最妥善的办法是把土地出租，而不是依靠奴隶用科学方法来从事耕种，因为后一种方式本人必须亲自精心管理。租佃土地之制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已曾为大地主采用过。在奥古斯都时期，包括革命军退役军人在内的城市资产阶级曾经取代过公元一世纪时的显贵，至少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是如此，而当这个阶级崩溃以后，租佃制又重新复活起来。这种制度当然意味着放弃科学经营方式。佃户，尤其是长期佃户，难得是好庄稼人，特别难得是酿造葡萄酒的好手。此外，意大利的谷物现在愈来愈少，所以种谷之利至少可与生产葡萄酒相等，而其危险性则较后者为小，其所需于地主和佃户双方的亲身照料也较少。

主要的困难是找寻佃户。从普利尼的经验和马尔恰耳的某些

零星札记可以看出这些地主居然找足了他们所需要的那么多的佃户，近代学者对于这个事实总感到困惑不解。如果农民在格拉古兄弟时代即已破落殆尽，如果农民在公元前一世纪时已经绝迹而为大群奴隶所代替，那么，普利尼的佃户又从何而来呢？读者只要按照上面这个逻辑推论，就会看出我们不接受时下认为意大利农民业已绝迹的观点。在意大利南部，自从“社会”战争以后，农民的人数无疑是减少了，尤其是在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布鲁丘姆，在康帕尼亚和萨姆纽姆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是，在意大利中部和波河河谷地带，农民仍在居民中占大多数。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不再是自己那份田地的业主了，但他们仍住在原来的庄子或村子里，有的成了佃户，有的成了长工，在城市资产阶级的农庄上找活儿干。在葡萄园里固然是用奴隶来代替了他们，但意大利绝大部分地方并不是葡萄园而是大田，而大田都是由农民耕种的。除旧农户外，可能地主们又迁来了一些奴隶和免奴作为他们庄田上的佃户，因此农民人数也许还有所增多。尽管如此，要为大地产所有者的庄田找寻合适的和足够的劳动力仍然是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意大利固然有农民愿意承佃大庄田的土地，但为数似乎不足以适应日益增加的需求，而且他们都是相当懒惰而效率不高的劳动者。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地主还是宁愿要佃户干活而不愿意要奴隶干活。例如，普利尼只有在迫切需要人手之时才使用奴隶。他的庄田上的主要劳动力是佃户劳动力。赫特兰当然不会同意上面的陈述。他认为，佃户大多是一种监督奴隶劳动的监工，而奴隶劳动力则由地主供应。但是，我们所有的史料中似乎没有任何地方说过，公元二世纪时的普遍现象是把土地分段佃给佃

户而附上一张包括若干奴隶在内的财产清单。毫无疑问，普利尼并不把他的佃户当作中间人，而是当作直接耕种土地者，因为他们就是租佃给他们的那段土地上的主要劳动力。我们并不否认一个手头宽裕的佃户可能买一两个奴隶来帮助自己干活，也不否认某些地段出租时附有一张包括房屋、牲口、农具和奴隶在内的财产清单。近代的 *mercante di campagna*〈土掌柜〉这类人在古代世界早已习见。但是，近代意大利有这种身份的人并不等于说近代意大利就没有农民了。

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公元二世纪时意大利存在着一个人数很多的农民阶级，其中大部分是佃农。他们构成与城市相对而言的村子和庄子里的居民，他们就是与 *intramurani*〈城里人〉相反的 *vicani*〈庄汉〉和村夫。从斯塔丘斯和马尔恰耳的描写，从普利尼的品评，都可以看出这种意大利乡村居民形成一个低贱阶级，而这个阶级在公元二世纪时的地位同佃户在稍后一段时期中的地位、以及同农奴在整个欧洲中世纪时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不同。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用马尔恰耳的笔记来说明公元三世纪时特雷韦附近的伊杰耳碑上相应的图像，还可以用来说明四世纪时阿非利加的某些镶嵌细工上的图像。我毫不怀疑，这种地位并非较晚才有的。我深信，至少庞培的佃户在他们的靠主面前的身份同马尔恰耳那位当律师的朋友的佃户的身份是相同的。

从经济观点来看，二世纪时意大利最有意思的现象倒并不是存在农民阶层：意大利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不存在农民阶层的时期。令人注意的事实是：农民不再像他们过去那样是自耕农，而成为大地主的佃户了。因此他们在意大利的农业生活中占据了重

要地位，甚至可以说居于首要地位。这个时候流行的农业经营方式既不是按科学方法经营的中型农庄，也不是由数以千计的套着锁链的奴隶来耕种的大田庄，而又重新是资本主义尚未发展以前曾经流行于意大利的那种农民分地段耕种的方式了。那个时代和公元二世纪时所不同者在于：现在的农民地段变成了城里地主的产业，而耕地者变成了城里地主的佃户。中型农庄和由奴隶耕种的大田庄并未完全绝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两种经营方式越来越过时了，它们只不过是残余现象，而不足以代表意大利农业的一般情况；要知道，在瓦罗时代、甚至在科卢梅拉时代，它们曾代表过农业一般情况，而在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时，代表农业一般情况的则是自耕农制度。

由此可见，意大利的乡村居民为数甚巨。他们在社会上和经济上自成一个阶级，低于那些经常住在罗马城或意大利其他城市中的地主所形成的阶级。在政治上当然并没有区别：意大利所有的居民统统是罗马公民，每一个人都属于与某个城市相关联的某个罗马公民团体。在政治上没有把意大利的公民划分级别，只有意大利北部情况特殊，那儿有许多阿尔卑斯山区的部落，按照罗马人的习惯说法，那些部落是“附属”于意大利城市（布里克西亚、贝尔哥木姆、科木姆、特里登土姆、特尔杰斯特、阿魁累亚）的，意思是说它们并未分享其所属城市的公民权。但如前所述，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自从帝国初建之日起，就有一个趋势逐渐减少上面提到的这种附属民，而把他们并入城市的辖区之内，赐以罗马公民资格或拉丁公民资格。然而，实际上，那些庄子和村子里的居民，像都市里的无产者一样，被视为比住在城里的地主低贱得多的人。因此，

有一个"村夫"后来成为佩利尼的一个城市苏尔莫纳的 *decurio*〈市议员〉,这件事竟被认作值得一提的例外情形。* 就社会地位而言,意大利北部"附属"部落的村夫和庄汉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同一阶层并无多大差异。

让我们转而考察外省。我们看到,有关外省社会组织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土地租佃方式和使用方式的材料,分配极为不均。我们对于某些行省(埃及、阿非利加和亚细亚)知之甚详,而对于另外一些行省则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必须从社会经济观点对所有较重要的罗马行省作一番综述。虽然已经屡次谈到罗马行省发展中的政治一面,即谈过它们的逐步都会化(部落和氏族、村子和庄子转变为以一个都市作中心的行政区域,由住在城市里的长官管理其行政),但是,却还一直未曾试图从社会经济观点对整个罗马帝国作一番综述,也很少对个别行省作过综述。

我们先从西西里、撒丁和科西嘉谈起。在前几章中已经说明西西里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仍然一直是向罗马城输出大量谷物的粮仓之一,只有内战最后阶段暂时中断了一下。斯特腊博的记载和稍后一些时期的零星记录对这一点提供了铁证。现在我们必须探究的是,与共和国时代相比,在帝国早期该岛的社会经济组织有何主要的特征。很难相信,西西里会像希腊和意大利那样把全境都划分成各个市辖区。显然,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统治期间,该岛的腓尼基人地区以及内地大片地方并不是按照这种形式组织的。罗马人一直没有促使西西里全面都会化。他们不曾建立过一

---

* 《拉丁文碑铭集》,ix. 3088=戴索,《拉丁碑铭文选录》,6531。

个新城市，也丝毫不曾打算恢复已废的希腊城市。他们在腓尼基人地区还维持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乃至保留埃里克斯地方那种亚细亚式的维纳斯神庙，这种神庙拥有大群侍奉神的奴隶和占有大片的地面。从西塞罗对该岛的描写可以看出，罗马根据该岛的希腊城市对自己的不同态度将这些城市分成若干级别，并且，不论在腓尼基人地区或希腊人地区，罗马谨慎地掌握着那些不属于任何城市辖区的公地，以便将这种公地作为 *ager publicus populi Romani*〈罗马民族的公地〉，由罗马户籍官租给罗马公民和外省人。

属于城市辖区的土地要向罗马国库缴纳十分之一的农产品（极少数豁免土地税者除外）。征收这种什一税是由耶罗二世的一项法令规定下来的，新统治者未加改变。这些城市辖区内的土地掌握在城市资产阶级手中，西塞罗称他们为 *possessores*〈业主〉或 *aratores*〈庄稼人〉（γεωργοί）。地主的人数，即使包括那些从罗马国家租到耕地的人在内，也是相当少的（12 000 至 13 000）。城市辖区以外的大片土地则掌握在财主手中，他们在这些土地上饲养大群牲畜。这些大片土地并不作为罗马富翁们的私产。他们大概是从国家方面租借到这种土地的。耕种土地和牧羊所用的劳动力是：在田地里大概兼用奴隶和自由劳动力（由贫苦佃户充任），而在牧场里则几乎全用奴隶。

西西里被奴隶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城市资产阶级似乎并未受这些战争的影响：在西塞罗的时候，这个阶级依然既庶且富，并有势力。内战期间，这种情况起了变化。在这次持续若干年的战争中发生了一段最突出的插曲，那就是塞克斯土斯·庞培和屋大维之间的斗争，而西西里正是这段插曲的舞台。

庞培主要是依仗奴隶支持，我们当然会推想他牺牲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赐惠于奴隶。但不管是否如此，总之，屋大维得胜以后不可能也不愿意继续把罗马公民资格许赐给全体西西里人（这是恺撒所筹划的，并为安东尼所推行过），这是个铁定的事实。所谓“全体西西里人”当然指的是希腊城市里的市民，即地主（*aratores*）阶级。奥古斯都着手重新组织西西里时，把许赐公民资格的事搁置不谈，这也许是由于这种做法已无多大意义，因为希腊籍的城市资产阶级已经大受内战的摧残而所余无几了。也正由于他们大受摧残，所以奥古斯都才送罗马侨民去充实一些比较重要的西西里城市（大多是那些输出谷物、羊毛和硫磺的重要港埠），并且，他才把罗马自治市或拉丁屯市的权利赐给少数城市，那些城市大概包括若干大规模的意大利侨民新村。但是，无论奥古斯都或紧接着他的几代皇帝，谁都不打算恢复西西里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资产阶级，这与他们对待西班牙、高卢、多瑙河地区和阿非利加的政策有所不同。大多数的镇和 *oppida*〈邑〉都得缴纳一种 *stipendium*〈贡税〉，缴一种土地税，也许还缴一种丁税，因此它们在各级城市中地位最低。在西西里建置 *civitates stipendiariae*〈纳贡市镇〉这种等级，这就等于废除了什一税（*decumae*）制，因为贡税是用金钱缴纳的。而所以建置这种等级，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什一税制已不再行，这种税制以存在一个富裕的地主阶级为基础，而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处于凋敝衰落状态了。其二是因为在镇的辖区内，居领导地位的现在大概都是土著而不是希腊人，而这些土著中有许多人是不适应于城市生活的。遗憾的是，我们所见有关纳贡市镇与邑的史料太少：镇并不一定指一个都会性的组织，它可能是一些

村落的合称，或指一个部落的领地。

尽管城市资产阶级破落了，西西里仍然是一个富庶之邦。某些城市（如梅萨纳和陶罗梅纽姆）的葡萄种植业已经兴旺起来了，但如前所述，就全境而言仍然是以谷田和牧场为主。看来这种情况似乎是皇帝们有意保持着的。他们可以允许某些城市种植葡萄和果树，但他们希望西西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谷田，至于山区，那自然依旧是牧人之家。所以，他们不肯在西西里推行都会化运动的政策而使其土著保持原始状态。他们需要该岛作为意大利的粮仓，而并不十分希望该岛在各方面都很发达。由于同一理由，所以大片土地仍掌握在国家手中。当多米戚安和图拉真之时，在西西里，和在贝提卡一样，有一种专管公田的行政机构，名为“公粮”（*frumentum mancipale*）司，所谓公粮即指公田佃户所交的谷物而言。该岛上大田庄之发展和皇庄之相应增多也归因于同一理由。我们曾经谈过阿格里帕在西西里所占有的大片田地。一些游记中所记载的许多古地名都是由罗马氏姓变来的，由此可见，在本省占有大片土地的业主并不止阿格里帕一人。在加列努斯时代发生过一次暴动，大概是农民暴动（像这类叛乱在整个三世纪中是常见的现象）；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大田庄的发展在公元后最先两个世纪中并未中断过。

总而言之，在最先两个世纪中，西西里境内有少数繁华的城市，其中居民大多是罗马侨民，另外有许多镇，其中有些还保持着城市生活的外貌，而有些则仅系若干土著所居的村落合在一起的名称。无论是哪种镇都肯定具有纯乡村性的一面：它们都包括成群的农民和牧人在内。罗马人民和皇帝们的田庄的经营方式大概与其他行

省里的大田庄相同。他们把田庄发租给包租人(承包人),而耕种者则为佃户。在某些富豪地主的大田庄上,大概以畜牧为主要收入来源,而畜群由大批奴隶看管,情形与公元前二世纪时相似。因此,罗马皇帝们终于使西西里保持为罗马人民的一个粮仓,这里到处是田地和牧场,其间零星地散布几个较进步的经济生活点。

撒丁行省的景况与西西里相同。撒丁曾经是迦太基的粮仓(这个统治城市蓄意设法保持这种状况),此后则一直是罗马城和意大利的粮仓。在罗马人的治理下,无论是共和国时期或帝国时期,都会生活都有所发展,但很迟缓。该岛的主要城市为卡腊利斯和土里斯;这两个城市都是大出口港,出口的是本岛所产的谷物和开采的金属矿物,前一个城市是自治市,后者是罗马侨民的屯市。即使在帝国时期,内地还是盛行部落组织,而各部落并未向城市生活发展。有些部落可能已经形成了行政组织单位(镇),有些部落则显然住在公家、皇家或私人的大田庄的领地上。他们作为佃户耕种这些庄田,处于一种半农奴地位,此外还替他们的主人看管畜群。我们曾经提过芮罗的情妇阿克苔的大田庄:那种大田庄似乎是本地典型的经济结构。由于少数城市迁来了罗马侨民,同时由于土著的臣服,这个岛于是也像西西里一样多少有些罗马化了——在城市里是彻底的,在乡村里则极轻微。

关于科西嘉,我们仅仅略知一二。但是,我们从一块碑文可以看出该岛主要居住着一些土著部落,奥古斯都用一种固定形式把它们组织起来。大部分土地都属于皇帝——大概尤以森林为多;另一部分土地划给了一个马里攸斯所建的屯市。余下的土地则属于土著居民。有一个土著部落,即瓦纳契尼部,其财力之雄厚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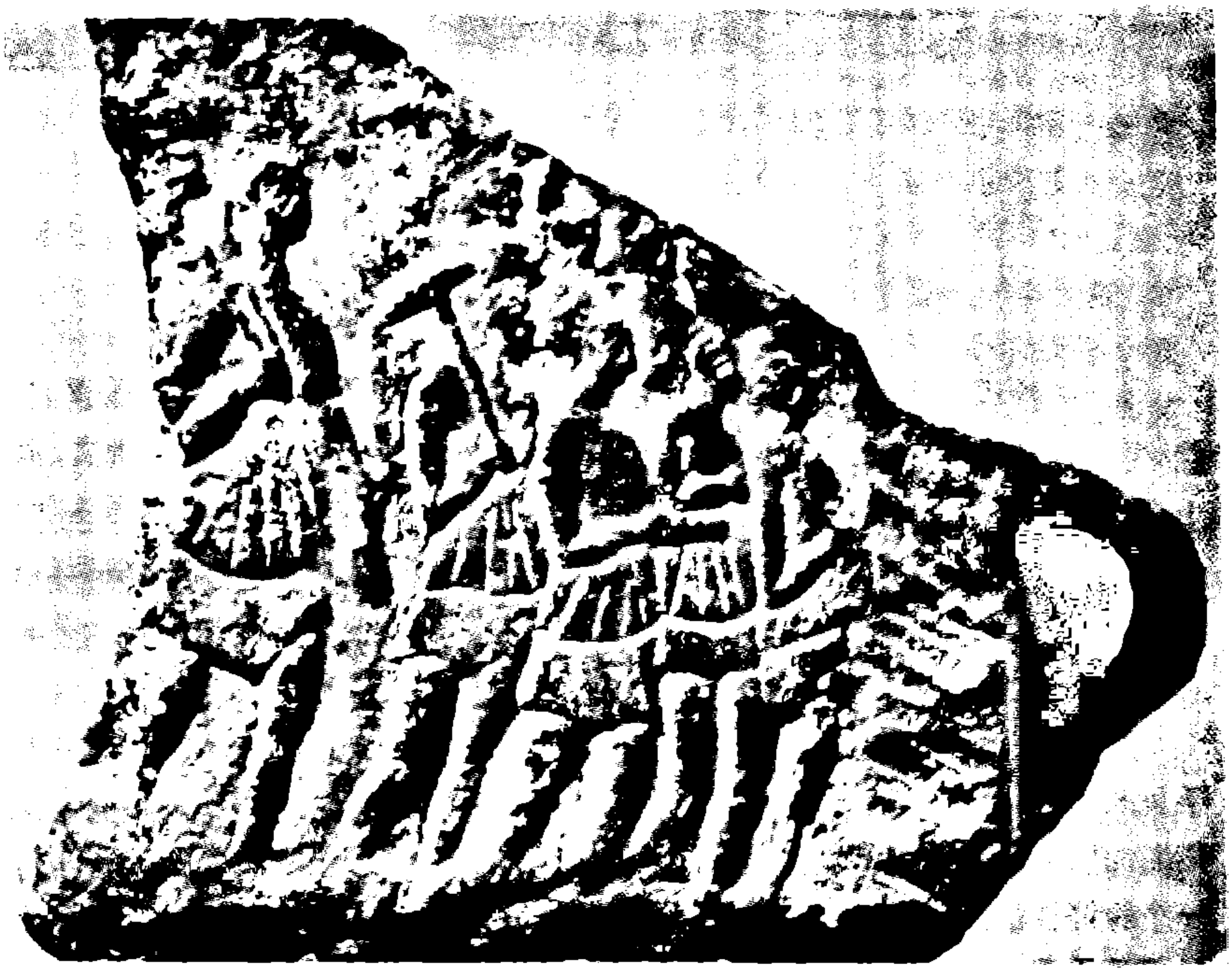
向韦斯帕西安购买土地并建立一个半都会式的市集，市集上还建有奥古斯都庙(可与西方各省中那些外省人崇祀皇帝的市集相比较)。

西班牙通常被视为罗马文明的堡垒，视为西方各省中罗马化最彻底的一省。对于这个国度依然用罗马语系的语言这一点姑置不论(当然，西班牙语不如罗马尼亚语接近拉丁语，但罗马尼亚却是帝国建省最晚、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省)，赞同上述观点的人还指出：西班牙是(继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之后)最古老的罗马行省，西班牙被罗马人完全都会化了，所有的西班牙部落和城镇都从韦斯帕西安手中接受了拉丁权利。毫无疑问，西班牙的一部分地区已彻底罗马化和都会化。贝提卡就是西班牙境内的小意大利，正如纳尔博嫩西斯是高卢境内的小意大利一样。塔腊科嫩西斯沿海和卢西塔尼亚低地的情形也肯定(多少)与贝提卡相同。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奇，因为西班牙的这一带早在罗马人统治以前已经有过一段长时期的文化发展史。我们知道，伊伯利安人的文明是何等古老，这种文明早在米诺斯时期即与南地中海的其他文明有何等密切的联系。我们也知道，希腊人(福凯亚人)和腓尼基人(其侨民先来自提尔，后来自迦太基)都曾迁居于西班牙南部，并把希腊—东方式的城市生活带到了这里。罗马人是最后来到的。他们保持当地的原状，起初并没有大量增添他们自己的文明因素。但是，西班牙却逐渐地变成了意大利移民运动的乐土，贝提卡尤其有吸引力。虽然从远古时期起，罗马人就曾侨迁到那儿去，但移民运动基本上是恺撒和他的嗣子所进行的工作。大概就在这个时期，即在内战期间，有许多意大利人迁居到西班牙的大商业城市中来，不论希腊城市或腓尼基城市都有。在这些城市中，最大、最繁荣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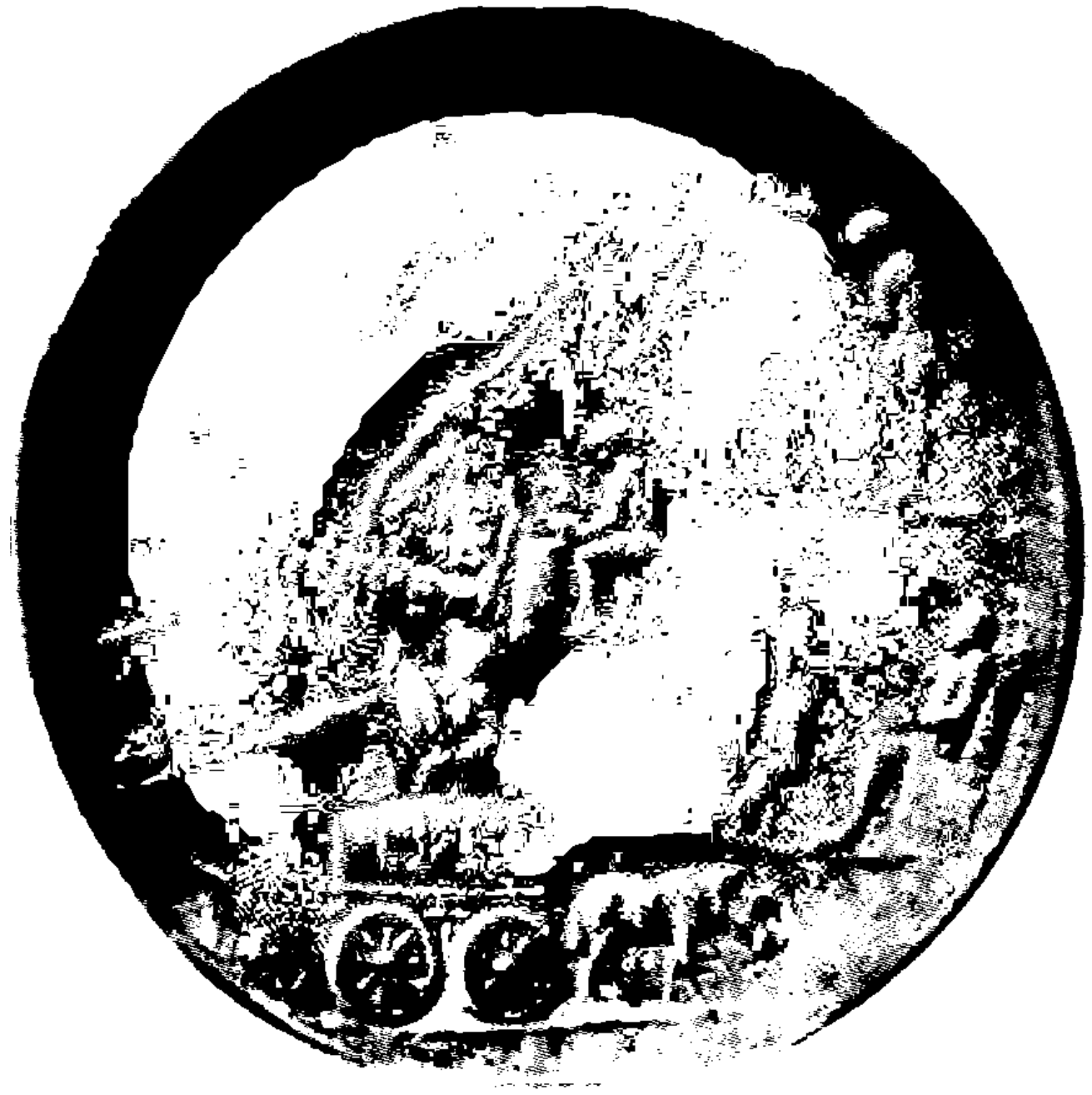
罗马化程度较深的是加德斯，其次是恩坡里乌姆。西班牙那些开化的、经济繁荣的地区就这样地渐渐罗马化了，而城市和乡村里的旧统治阶级也就被罗马人和说拉丁语的意大利人取而代之。城市中其余的居民（原来的希腊人、腓尼基人和伊伯利安人）为新来者所吸收，而逐渐采用了统治阶级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西班牙南部和西部的繁荣的基础是开发当地的天然富源。农业，特别是种植橄榄和亚麻，以及矿业（银、铜、铁、锡、铅）自古以来就是西班牙人最主要的生财之源。由于有了这些天然富源，所以工业随之欣欣向荣，而炼钢业和亚麻织造业尤盛。罗马人发展了这种经济事业，尤其是发展了矿业，因为西班牙是正在成长的帝国中矿产最丰、开采最早的地区。罗马人对于该处优质的橄榄油也极其关怀，这里的橄榄油比意大利所产者价廉而物美。

西班牙南部因其富足繁荣，长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的移民区。许多罗马资本家，无论是元老院议员阶级的或骑士阶级的；都投资于西班牙土地。这些新来者，同早期侨民的子孙以及罗马人未来到以前的上层阶级中某些代表人物一道构成了城市资产阶级。在他们之中可以见到意大利资本家的经理人和皇帝的代办，其中有些人定居在具有吸引力的行省里。这些人的人数和财产都不断增多。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我们知道，在贝提卡和卢西塔尼亚两地，罗马侨民通常能领到一大笔产业。这就是他们的财富的原始来源，他们的财富稳步增殖，而在公元二世纪时达到最高峰。贝提卡、卢西塔尼亚以及塔腊科嫩西斯部分地区的那些美丽的城市遗址——其中以意大利卡、塔腊科、埃梅里塔和克卢尼亚最为有名——证明这一带曾经空前繁盛。可以料到，这种财富的基础在



1. 西班牙的矿工



2. 西班牙的一个疗养地

图 35　西班牙的生活和行业

图 35 说 明

1. 一件浅浮雕的残片。发现于西班牙之利纳雷斯。A. 多布勒厄撰文，载《考古学评论》(法文)43，1882 年，第 193 页起，图 V；H. 桑达尔斯撰文，同上杂志，第 4 辑，1，1903 年，第 201 页起，图 IV；同前作者撰文，载《考古学》(法文)59，1905 年，第 311 页起和图 LXIX；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192 页，4；T. A. 里卡德：《罗马人在西班牙的矿业》，载《罗马学杂志》(英文)18，1928 年，第 139 页起。

九个矿工排成两行沿着一条坑道向下走往矿井去。第一行的最末一人手里拿着矿工用的尖嘴锄或锤子，倒数第二人拿着一盏灯。他们后面那个身躯高大的人是一个工头，他拿着一把大双孔钳和一盏提灯(?)；也有人认为是一个铃铛，或是一个给提灯灌油的油罐子。所有的人的服装都一样：上身和腿都裸露着；腰际围着一条短 *tunica*〈围腰〉(或裤子)和系着一条带子或皮条。利纳雷斯(即古之卡斯土洛)是西班牙重要矿区之一；该矿区的银矿与铅矿都极丰富(波利比攸斯书 10.38；11.20；斯特腊博书 3.2.10；147C)；卡斯土洛与著名的矿区昔萨波之间有一条铺石的道路相通。请看《拉丁文碑铭集录》ii，第 440 页起和第 949 页起。在卡斯土洛所发现的许多拉丁文碑铭以及大量钱币显示出这个市镇相当富足繁荣(从公元前一世纪起到公元后四世纪)。其他发现物备载于上面所引的里卡德的文章，第 141 页起。

2. 刻着浅浮雕的银杯。发现于西班牙北部之卡斯特罗—乌尔迪亚勒斯(弗拉维约布里加)。收藏在卡斯特罗—乌尔迪亚勒斯地方的昂托尼奥·德·奥塔涅斯家中。E. 许布讷尔撰文，载《考古学报》(德文)1873 年，第 115 页，图 XI；《考古学报》(法文)1884 年，第 261 页起和第 270 页；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图 6089；《拉丁文碑铭集录》ii. 2917；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195 页，3。本图根据马德里复制艺术品博物馆的金属模型复制。

杯子内层刻着浅浮雕图，图的四周环以嵌金字母的铭文，其文为 *Salus Umeritana*〈乌梅里的安乐女神〉。图的顶部为水的化身，亦即乌梅里的 *Salus*〈安乐女神〉，她斜躺着，半裸体，右手执一芦苇，左手扶在一个瓮上，一股水

从瓮中流出，流入一个粗糙的大石槽。她的两旁都是古树。乌梅里（地址失考）大约因为有能治病的矿泉而成为西班牙的一个出名的疗养场所。（关于西班牙的疗养地，请看普利尼的《博物志》，31.2，参看 23；关于奥古斯都曾在比利牛斯山中某个疗养地逗留的掌故，请看克里纳哥腊斯的文章，载 *Anth. Pal.*（《人类学与古物学》?）9.419。）泉水的旁边有一个家童取水灌入一个大瓶。离泉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老的病人，坐在一把柳条椅上，从一个家童手中取过一杯水。图的左边，就是这个老人穿着一件拖袈（他是一个病人，现已恢复健康了），向一个祭坛供献牺牲。图的右边有一个本地的游客或牧羊人向另一个祭坛上供。图的下部，第三个童子把一瓶水倒入一个桶中，桶装在大车上，大车由两匹骡子拉着。显然，乌梅里是一个著名的疗养地，在比利牛斯山中和罗马帝国其他各地有着许多疗养地，乌梅里是其中之一；而该地名声之大乃至把此处的水运往远地去。参看 E. 许布讷尔的《罗马人在欧洲西部的统治》（德文）（1890 年），第 288 页起，和第 262 页。关于所有疗养地的概况，见《鲍利-维索瓦-克罗耳古典文物学实用百科全书》（德文）ii，第 294 栏起；L. 弗里德兰德—G. 维索瓦：《罗马风俗史》（德文），第 9 版 i，第 387 页；iii，第 178 页。

于开发土地。皇帝图拉真和阿德里安的家族就是大地主的好例子。这类田庄和矿场上的劳动力大概是由土著居民充任的，他们仍和过去一样，是种地者和矿工。

然而，西班牙南部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不在私人业主手中。从这儿初被征服时起，大庄田和多数矿场就属于罗马人民所有。尤留斯—克劳迪亚斯氏朝的皇帝们在这里也同在阿非利加、在亚细亚一样，他们的私产之多可以与罗马人民相匹敌，他们这些私产是靠抄没和继承而不断增多的。最大的几次抄没是芮罗所进行的，而到了二世纪时，这些皇产形成了许多面积辽阔的祖传地产。多数矿场所遭受的命运与此相同。关于这些祖传田地和公共田地的经营方式，我们无从知悉，但我们不妨设想其方式同我们在阿非

利加和亚细亚所见者无异。田地大概发租给大小不等的佃耕者，即 *conductores*〈承佃人〉和佃户。前一种人是大规模经营农业的人，他们都住在市镇上；而后一种人住在田庄上，亲手耕种。西班牙也同高卢一样曾经一度存在过农奴制度，这种农奴制度最后变成了什么形式，我们却不知道了。很难相信罗马人在任何地方都像公元前 189 年在阿斯塔那样废除农奴制度。* 至于矿场的开发情形，我们知道得较多：有两篇碑文非常详细地说明了维帕斯卡的一个矿场的组织状况，碑文内容见于下章。

卢西塔尼亚和塔腊科嫩西斯两省的高地，尤其是克勒特—伊伯利安人、阿斯图里亚人和卡累契亚人的地区，罗马化的程度差得很。这些地区不吸引意大利的移民，因而保持其原有的民族风格和社会经济制度特色。罗马化和都会化都很表面，氏族和部落(gentes)的分划依然残存。虽然韦斯帕西安把拉丁权利赐给了西班牙中部、北部和西部所有的部落，但这件事并不等于说这些部落在受赐以前就都已彻底罗马化了。这只是说，在罗马统治以前的西班牙社会制度并非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同时说明，部落地区的一部分居民通过服军职而开始稍微有些罗马化，并可以仿照罗马自治市的形式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领着本部落其余的人和其他部落。韦斯帕西安的改革既是为了打破民族和部落式的联系，也是为了使罗马选军能保证补足优良的士兵(罗马选军已经不再在意大利征集)，而这些士兵都是退役辅军军人的子孙和都会权贵阶级的成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罗马化，并由于社会地位较高而

* 戴索：《拉丁碑铭文选录》，15。

与他们的亲戚朋友分开。于是，一批人变成了城市组织的成员，而其余的人则保持以往的原状，仍过着他们所习惯的部落生活，并送子弟到罗马辅军部队中去当兵。大概正是由于韦斯帕西安把这些居民如此划分，所以他受到一些人的批评，那些人指责他把帝国的军队"蛮族化"了。

我们对于高地的社会经济生活所掌握的资料很少，从这点贫乏的资料来看，即使在韦斯帕西安实施改革以后，高地仍然处于贫困和原始的状态，同早先波利比攸斯和斯特腊博时代的情况完全一样。自从一开始有罗马式的城市生活时候起，就不容易找到足数的候补人员来充任市政长官，这件事实证明在该处形成一个城市资产阶级的过程相当缓慢，同时证明内地的居民仍然大多是农民和牧人，即使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也大多是这类人。在这一带地方，正如舒耳滕在努曼戚亚的考古发掘所显示的，城市的繁荣程度始终比不上沿海和低地所习见的那种繁荣景象。这里的城市多少还保持原状，仍然是一些村镇。其中有些城市固然已经从山上迁到平地，但是从萨博伦塞斯的诉词可以看出这种现象并不一定就是繁荣的标识。当然，那些大行政区的首府比其他城市发展得要快些。关于居住在新城市辖区里或在某些情况下居住在自己领地上的部落和氏族的组织情形，我们没有材料。在城市辖区内，经常提到所谓客户和 *contributi*〈增并户〉，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是城里人，那就是说，他们是住在城内的；由此可以看出那些享有拉丁权利并且多少有点罗马化的人在西班牙居民中只占极少数，而其余的人的身份地位依然同西班牙"全面都会化"以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关于高卢的社会经济生活，我们知道得较详细。C. 朱利安、

F.曲蒙和F.施泰林所作的精辟的描写只是一种极其简要的叙述。我们在这里作概述时仍然必须十分审慎。高卢—纳尔博嫩西斯像贝提卡一样,其罗马化的程度比之于阿魁塔尼亚和高卢—卢古杜嫩西斯(包括贝尔吉卡)要深得多。这个靠南的行省同意大利北部一样地彻底罗马化了。正与贝提卡的情况相同,在此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罗马屯市,对每个屯市都分给了大片田地。其中有些屯市(如阿雷拉特和纳尔博)变成了富足的工商业城市,而另一些屯市(如阿劳西约、维也纳[①]等)则为广阔和开发得很好的农业地区的中心。在该省最重要的两个部落沃孔提部和阿洛布罗杰部的领地内,罗马化运动是遵循一种特殊途径进行的,情形与在高卢—科马塔[②]的赫尔维蒂部中相似。这些部落领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没有什么城市的农业地区。生活的主要发展出现在村子和庄子里,后者在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在一定程度内发展成为正式的城市。不过,它们的行政组织虽然已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但还不是都会型的组织。

这里同贝提卡一样,也许比贝提卡犹有过之,地产都集中在少数所有主手中。我们不知道皇家产业所占的比重有多大,但是,靠近图卢兹的那座华丽的基腊甘庄可能就是一所皇庄,同时,在特斯塔乔山上发现了来自本省的大量碎陶片,这也可能说明皇庄兼并了相当大面积的公地。此外,在纳尔博嫩西斯还有一些谈到皇家*patrimonium*〈祖产〉经管人的碑铭;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共和国

① 此维也纳在法国里昂之南,非今奥地利首都。——译者

② 除了高卢—纳尔博嫩西斯省以外的高卢地方统称之为高卢—科马塔。——译者

第一行
春(2)，□，夏(3)，夏(2)。

第二行
春(1)，春神，夏神，夏(1)。

第三行
冬(1)，冬神，秋神，秋(1)。

第四行
冬(2)，冬(3)，秋(3)，秋(2)。

第五行
冬(4)，冬(5)，秋(4)，秋(5)。

第六行
冬(6)，冬(7)，秋(6)，秋(7)。

第七行
装饰图

一幅绘图农历（维也纳的镶嵌细工）〈图右注号系译者所加〉

图 36　高卢南部的农业

图 36 说 明

· 镶嵌细工。1890 年发现于法国南部之圣罗曼-昂-加耳(古代的尤莉雅—维也纳屯市)。巴黎,路夫勒博物馆。G. 拉法耶撰文,载《考古学评论》(法文),第 3 辑,19,1892 年,第 322 页起,附摹图;《高卢与阿非利加镶嵌细工图谱》(法文),i(1909 年),第 246 号和三幅摄影图;卡尼亚—夏波:《……手册》(法文),ii,第 173 页;R. 比利阿尔:《古代的葡萄园》(法文)(1913 年),第 425 页及其他各处;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第 223 页起。

这幅镶嵌细工是维也纳〈此维也纳在法国里昂之南,非奥地利首都。——译者〉一所私人住宅中的一间大房间的地板。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一部分。共有四十个方格子,外面装有花边(本图未将花边制人)。此处见到的就是保存下来的二十八个方格,而其中有三格为火所伤甚剧。镶嵌细工上端四方格和下端四方格都是纯粹为了装饰用的;余下的三十二格则嵌满了与农村生活有关的图画。全部图画是作为一幅绘画农历用的。中央部分的四个方格画的是四位 *genii*〈元神〉骑在四种兽——公猪、雄豹、牡牛、雄狮——身上的像。这四位元神肯定是代表四季的:骑在公猪身上的代表冬,骑在牡牛身上的代表春,骑在雄狮身上的代表夏,骑在雄豹身上的代表秋。四季的象征图在古代碑铭上是极为常见的,见于镶嵌细工中者尤多;例如,见本书图 58 和 79。以元神代表四季则颇为少见,但可与维也纳的另外一幅镶嵌细工对比(《高卢与阿非利加镶嵌细工图谱》(法文),第 207 号)。每七方格为一组,分画四季之图;其中冬、秋两组图全存;夏季图今只存三格,春季图只存二格。这些图画与流传至今的两部农历(*Menologium, rusticum Colotianum*〈《科洛威安的农村月令》〉和 *Vallense*〈《瓦伦斯的农村月令》〉,《拉丁文碑铭集录》i,第二版,第 280 页起(vi. 2305,参看第 3318 页)=戴索:《拉丁文碑铭选录》8745)以及文字史料(*Scriptores rei rusticae*〈《农村记事》〉和维吉尔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农作情况非常符合。这些图画的数目不能与一年十二个月紧密配合(那些用文字写的农历是按十二个月依次排列的)。似乎这幅绘图农历的作者的意思是把每季的九十一天按十三天分为一段。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这些图画,只能按天然合理顺序由上而下依次作一简单说明。〈因作

者在此对说明所对应的图次交代得不明白，而图次系统又不十分合规律，颇难一一对照，故译者在图上按说明次序分别注号。如有舛误不符之处，由译者负责。——译者）I. 冬季。(1)二人在室内围炉而坐。(2)一男子把一束芦苇或柳条递与一妇人，妇人正在编织筐篮（历书正月下注：*salix*，*harundo caeditur*〈伐柳、苇〉）。(3)二人忙于播种何种作物，所播者或系豆类（历书十二月下注：*faba seritur*〈种豆〉）。(4)一男子偕一童子（家奴?）在户前向一可携带之祭坛上奠酒（历书正月下注：*sacrificant dis penatibus*〈杀牲祭家神〉）。(5)碾谷（维吉尔，*Georg.*〈咏农诗〉i. 267）。(6)在一炉灶上烤制面包（?）。(7)运肥往葡萄园（历书十二月下注：*vineae stercorantur*〈葡萄施肥〉）。II. 秋季。(1)该图受损极大。或系历书九月下所注之 *arborum obloqueatio*〈为树木嵌护板〉？(2)收获葡萄（历书十月下注：*vindemiae*〈收葡萄〉）。(3)榨 *marc du raisin*〈葡萄渣〉。(4)自树上收摘苹果或其他水果（历书九月下注：*poma leguntur*〈收摘水果〉）。(5)以足踩葡萄取汁。(6)为瓶瓮涂沥青（历书九月下注：*dolia picantur*〈以黑油涂瓮〉）。(7)耕地播种（历书十一月下注：*sementes triticariae et hordiariae*〈播种小麦与大麦〉）。III. 夏季。(1)该图受损极大。图为收获大麦（历书七月下注：*messes hordiar* [*iae*] *et fabar*[*iae*]〈收刈大麦与豆〉）；此时收获小麦尚嫌过早，小麦非至八月不熟。(2)恐系乡宴赛会图（投掷标枪：维吉尔，*Georg.*〈咏农诗〉ii. 529）。(3)杀牲祭稷母神策蕾斯。IV. 春季。(1)鹳始来宾。(2)为树木接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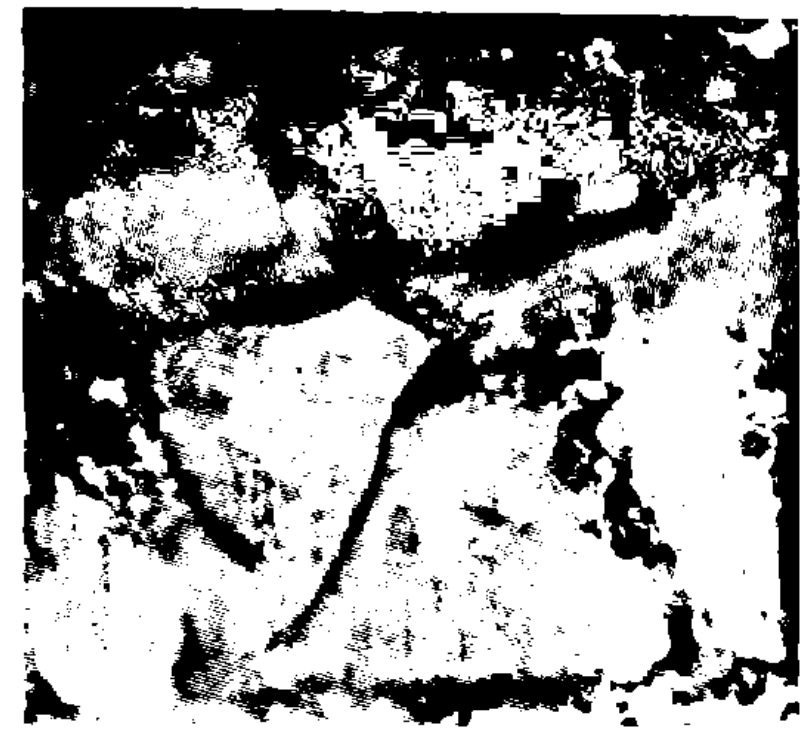
值得提醒的是，这幅绘图农历（其图形设计无疑是取自手画的底本）差不多完全只涉及葡萄种植业和园艺。我们要记住，维也纳是一个农业生活的重要中心地，它以产名葡萄酒而著称。请参照维也纳所发现的大量有关葡萄酒和葡萄种植业的镶嵌细工（《高卢与阿非利加镶嵌细工图谱》（法文），第 169、174、187、207、220、236、243 等号）。

时期一些有钱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毫无疑问在这里占有大片产业。最阔绰的地主当然都住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其中一部分是意大利人，一部分是本地人。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些城市资产阶级成员所经营的重要商业，我们可以肯定，那些顺利发家的商人们

1. 高卢阔绰的资产者

2. 一个高卢实业家

3. 卖芜菁或梨；耨草和锄地



4. 刈谷

5. 一个商人和一个向他买货的农民

图 37　高卢的实业

图 37 说 明

1. 墓碑。发现于桑市(阿杰丁库姆)。桑市博物馆。G. 朱利约:《桑市高卢罗马文物陈列馆》(法文)(1869—1898 年),第 73 页,图 XIII;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2803 号。

一对夫妇。丈夫(在图右者)穿着常见的高卢—罗马式服装,左手拿着一个装满钱币的大钱袋。妻子的服装与丈夫相似,她两手捧住一个小瓶,瓶里装着香水(?)。

2. 装饰一座墓碑的浅浮雕的残块。发现于桑市(阿杰丁库姆)。桑市博物馆。G. 朱利约:《桑市高卢罗马文物陈列馆》(法文),第 79 页,图 XI;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2806 号。

立在龛子里的人像。保存得最好的一个人像穿着常见的高卢—罗马式服装。他正在忙着记账,账本是一个很厚的簿册。

3. 一块墓地 *CIPPUS*〈界碑〉上的两幅浅浮雕。发现于阿尔隆(鄂罗劳努姆村)。阿尔隆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第 4044 号(附资料目录)。

这块界碑的正面(本图未制人)是墓中死者的人像,丈夫拿着钱袋,妻子拿着一个匣子,两人都站在一个龛子里(与本图 1 相似)。碑的一侧(本图未制人)刻着一个男子驾着一辆双轮大车(*cisium*),还有一个妇人把水果卖给一个行路人。碑的另一侧就是本图所复制部分。上面一格画的是一个店铺,铺里柜台上摆着水果或蔬菜(芜菁?)出卖,一个男子和一个妇人正在把货卖给一个顾客。柜台下面有三个筐子,天花板上挂着几捆洋葱。下面一格画着两个人在田间操作:一人薅草,一人锄地。这块 *cippus*〈界碑〉上所雕绘的一对夫妇大概是地主,他们把自己的庄田(或菜园)里的产品放在自己的店铺中以及庄田附近的大路上出售。

4. 一块墓碑的一幅浅浮雕的残片。发现于阿尔隆(鄂罗劳努姆村)。阿尔隆博物馆。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第 4036 号。

谷田里有一个人和两匹牲畜(牛?)。图中的农作大概是用机械在收获,机械由一架双轭牛拉挽着。

5. 一块墓碑(?)的片段。发现于阿尔隆。阿尔隆博物馆。E.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第4037号。

一个人坐在自己账房里的柜台面前一把椅子上,把一个钱袋里的钱往柜台上倒。另外一个留着胡子的人站在柜台外边,右手举起,左手拿着一根杖。也许是一个农民到银行里来付款或贷款?

都把大笔金钱投资于土地。法国南部城市中那些辉煌的建筑物,以及都会权贵阶级那些壮丽的坟墓,足以证明他们财力雄厚并具有高度的公益心。在这些基腊甘庄式的大田庄之外,那些中型和小型的田产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简直无法臆测。虽然我们知道阿奎—塞克斯切有所谓业主,但这是否就能证明在这个城市的辖区内存在一群小地主,那还大有可疑。看来业主一词更像是指房主而不是指地主。

关于高卢其他省份的生活状况,可以作出更肯定的描述。毫无疑问,这些地方的城市发展迟缓,城市的居民大多是经营工商业者和官吏。我们对其中某些城市可以得到一个相当明确的观念。这些城市是当时尚未分支的那些部落的前哨站,它们的特殊名字(如卢特戚亚)后来逐渐为它们的部落名字所代替了,例如,一方有阿瓦里库姆(布尔日)、奥古斯托杜努姆(奥顿)、阿杰丁库姆(桑市)和罗托马古斯(卢昂),另一方有纳姆芮特斯(南特)、梅迪约拉努姆—散托努姆(散特)和巴黎昔邑。但是,这些城市的遗址无论如何不能与高卢南部的城市遗址相比。而财富的主要来源现在却不再是城市的工商业而是土地。在罗马统治以前和以后,高卢人在农业方面实行了许多革新,我们阅读一下有关这些革新的记载是很有趣的。高卢土地的垦殖是有条不紊的。这种农业经营方式的

代表者是大土地所有主、在罗马征服前和征服后占有土地的部落贵族，还有靠商业、工业和银行业发财致富的外来移民。本地某些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发了财以后也投资于土地，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不仅波利比攸斯、斯特腊博、恺撒等人关于高卢的记载可以证明这些事实，而且在高卢各处地面上还留下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庄院的遗址。这种庄院遍布于高卢全境，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无待于强调。近年来在法国和比利时境内以及在来因河两岸（特别是在左岸）所进行的细心发掘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些田产不同的类型：一方面是富豪地主的大庄院，有耕种者零星分布的农庄，还有依附于这种大庄院的长工（不是法律上的依附而是经济上的依附）所居住的大庄子；另一方面是规模较小的庄院，与蓬佩伊的那些庄院类似。值得提及的是，这一带许多城市村庄现代的名称都来自当时那些庄院主人的姓名。* 这种地名确实数以千计。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高卢中部、北部和西部许多当地土神的庙宇都与城市无关，而只作为住在土著克勒特人村落里的乡下人的宗教信仰中心。我们已经发掘出一些土著村落，可以看出它们同罗马统治以前的克勒特人村落并无多大不同。另一个有趣的事是，高卢到处都有许多剧场，剧场多半与方才提到的乡村神庙有关。无疑，这些剧场原先主要是用于同土著信神有关的宗教仪式的。

我们现在来谈日耳曼尼亚。我们都知道，来因河上的两个罗

---

* 地产（*fuandi*〈份地〉）都是把所有主的姓氏变字尾为*-acus* 或*-anus* 改成形容词而命名的。

1

2

3—5

6

7

图 38　高卢的工业生活

图 38 说 明

1 和 7. 墓碑。桑市(阿杰丁库姆,塞诺芮斯)。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桑市高卢罗马文物陈列馆》(法文),第 85 页和图 IX;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iv,第 2768 号。

一个浆洗者的墓碑。下部(图 7)画的是这个浆洗者在盆里踩布匹,上部(图 1)画的是这个浆洗者用一把大剪刀剪断一段布料。

2. 一块墓碑的残片。桑市。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前引书;E. 埃斯佩朗迪厄,前引书,第 2783 号。

一个制木鞋(sabots)者在他的店里。他的右手拿着一把锤子,左手拿着一块木料(?)。墙上可以看到他的工具。

3. 一块墓碑的残片。桑市。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前引书;E. 埃斯佩朗迪厄,前引书,第 2780 号。

五金店。一个顾客正瞧着挂在墙上的两个大鏊盘,同时店主递给他一个小鏊盘。

4. 一块残碑。桑市。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前引书,第 93 页和图 IX;E. 埃斯佩朗迪厄,前引书,第 2778 号。

柜台旁站着一个人,柜台前面放着一个筐子和一个提包。

5. 一块残碑。桑市。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前引书,第 87 页和图 IX;E. 埃斯佩朗迪厄,前引书,第 2784 号。

一个实业家或商人在他的柜台后面,右手拿着一支 *stilus*〈刀笔〉,左手拿着简版。图的左边墙上挂着一件带盖头的外套。

6. 一块残碑。桑市。收藏在博物馆。G. 朱利约,前引书,第 86 页和图 IX、LII;E. 埃斯佩朗迪厄,前引书,第 2781 号。

一个裁缝的墓碑。这个裁缝(仅仅保存他的手部)正在用一把大剪刀剪裁一块布料。墙上挂着两个兜囊。碑的反面有墓志铭文的残段(《拉丁文碑铭集录》xiii. 2953)。

本图将这几块残碑组合在一起,因为它们统统出自一地,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大重要的高卢城市;此外再参看 E. 埃斯佩朗迪厄,前引书,第 2767 号

(壁画家),第 2770 号(赶车者,*cisiarius*〈赶双轮大车者〉);第 2775 号(卖鸟者);第 2778 号(石匠?);第 2782 号(商人?),以及许多画着死者形象的墓碑,那些图画都与死者生前职业有关,其目的就在于着重说明他是一个生意人;还可参看图 24-3,以及图 37-1-2,所有这些都得自桑市一地。这一套图片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中等大小的高卢城市的实业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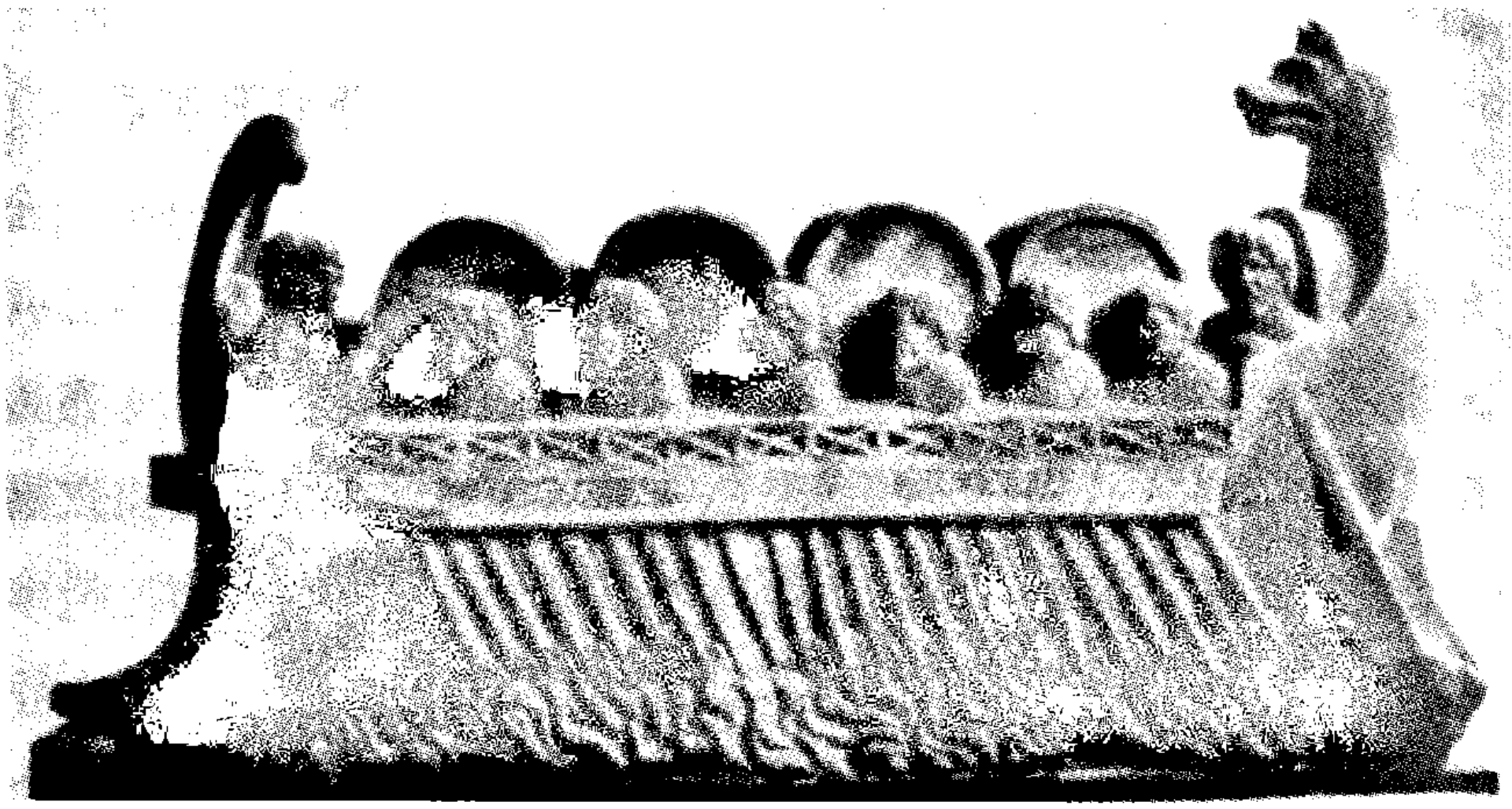
马行省,下日耳曼尼亚和上日耳曼尼亚(*Germania inferior* 和 *superior*),建省时间是比较晚的(公元 82—90 年),而来因河长期以来是高卢各省的军事边防线。我们不能在这里再来细述罗马人以武力占领来因河地区的历史。我们只需要指出一点:自从奥古斯都想建成日耳曼尼亚行省并将边防线推进到易北河的计划失败以后,六十年中,来因河一直是帝国的边境。韦斯帕西安和他的儿子们一方面由于军事上的考虑,一方面由于高卢人口过多,再加上需要为退役军人找寻好的耕地,因此不得不重新从事征服日耳曼尼亚的工作,同时他们还抱着一个同样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用更短和更方便的道路把来因河地区的军队和多瑙河地区的军队联系起来。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吞并来因河和多瑙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即来因河中上游右岸的沃土地带,一面止于美因河,一面止于内卡河),必须以一连串不断的营堡环绕陶努斯山和施瓦尔茨瓦耳德山(即黑森林)。在韦斯帕西安、提土斯、多米戚安和图拉真的努力下,这个任务逐步完成了。从而修筑了一系列的营堡,并连以一条连贯的土筑长城和(深入南方的一段)石筑长城,用以保卫新占领的土地和保卫联系来因、多瑙二河的优等道路网。

虽然文献资料很少谈到皇帝们在这方面的成就,但充分的考古调查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军事占领的一切详情。不仅如此,考古

调查也使我们能够追溯来因河地区经济发展的轮廓，以及追溯在来因河中上游两岸逐渐成长起来的晚期罗马文明的显著特征。我们对罗马境内的日耳曼尼亚具有详尽的知识，这是考古学界最著称的收获之一。如果没有德国学者们所进行的精心发掘，我们对于帝国早期的来因河地区的历史和整个日耳曼尼亚的早期历史几乎会一无所知。

当来因河中上游东岸之地既已并入帝国以后，罗马政府不再把整个来因河地区作为高卢的军事边防区，而作为两个独立的行省：来因河下游一省和上游一省。下游一省限于该河左岸之地；上游一省则包括两岸大片土地，一直伸到美因河和摩泽尔河。对这两个行省的社会经济生活需要作一简短的叙述。

从这个观点来看，把来因河地区划分成一个下日耳曼尼亚和一个上日耳曼尼亚纯粹是人为的。事实上，该河的左岸自成一个单位，而右岸另成一单位。前者，特别是南部，与高卢其他地方并无多大不同，这一带原先本属高卢。的确，左岸的大城市除了奥古斯塔—特雷韦罗鲁姆以外统统是随着军事而兴起的。阿格里皮嫩西斯屯市、卡斯特腊—韦特腊（即乌耳皮亚—图拉真纳屯市）、诺韦休姆、莫根恰库姆、崩纳等等全都是从那些环绕大军营而兴建的住宅区发展起来的；那种住宅区即所谓营市，逐渐形成一个或许多个庄子。但这些半军事性和全罗马式的城市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与它们周围的乡村截然不同。其中有些城市，如屯市等，发展蓬勃惊人，因为它们在本省内部贸易以及与外省——例如不列颠——的贸易中都占重要地位，并且还在那沿着北部海岸同日耳曼尼亚之间发展的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它们逐渐地——虽然是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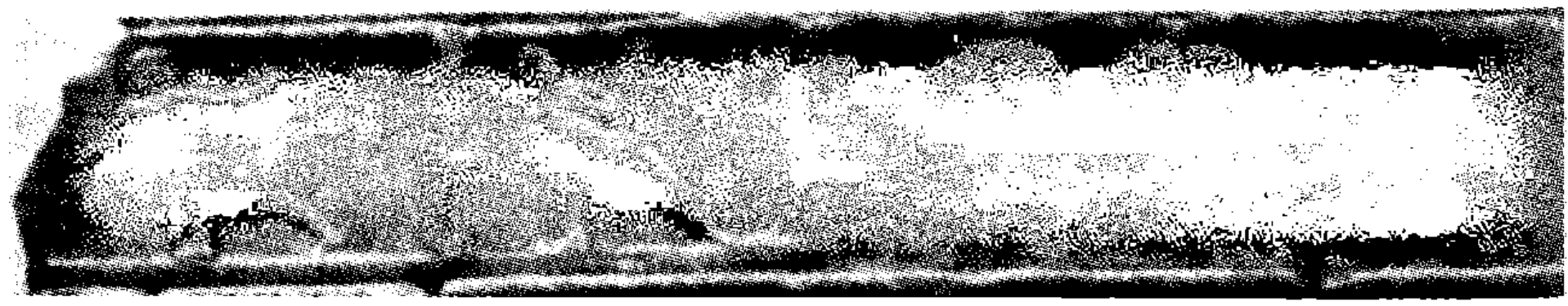


1. 内河运酒

2. 装运酒桶

3. 一只船在卸货

4. 爬越一个山坡



5. 沿着河岸替一只驳船背纤

图 39　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商业

图 39 说 明

1. 努马展地方一座墓碑上的一件雕刻(复原品)。发现于努马展。特雷韦博物馆。赫特芮尔:《……便览》(德文),第 14 页; E. 弗耳策尔:《新复原的一具努马展的船》,载《来因区古物同好者协会年报》(德文)120,1911 年,第 236 页;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第 5193 号;《罗马境内之日耳曼尼亚》(德文)(地图),图 XLII,2;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90 页,5,和 iii,第 528 页,7。

一只驳船正荡桨行驶中。船上装载四个大酒桶,坐着六个桨手和两个舵手,其中一个舵手用拍手掌的方式来打拍子。经过复原以后,恢复了这只驳船的船头和船尾,一头装饰成牡羊头状,一头装饰成狼头状。

2—3. 莫根恰库姆地方一个富商的墓碑上的浅浮雕残片。发现于美因兹。美因兹中央博物馆。《美因兹期刊》(德文)I,1906 年,第 31 页;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i,第 5833 号; 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71 页,3,4;《罗马境内之日耳曼尼亚》(德文)(地图),图 XLII-8、5。图 24-2 之浅浮雕也是这座碑上的。

三个工人把木桶滚上一块跳板,跳板的一头显然搭在船上。那一边,四个人正在卸下一只船上的货:其中一人连同他背的一包东西一道跌倒在地上;有两人在岸上;另外一人正从跳板上跑下来。这些船装载的是葡萄酒和谷物吗?而该墓主就是贩卖这些产品的大买卖人吗?

4. 伊杰耳地方圆柱上的一段浅浮雕。特雷韦附近之伊杰耳。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第 5268 号,第 454 页;F. 德雷克塞尔所撰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35,1920 年,第 92 页;H. 德腊根多尔夫—E. 克吕格尔:《伊杰耳出土墓碑》(德文),图 IX。

马背上驮着大包,运过丘陵地带。两匹马正爬过一个山坡。路的两端各有一所大建筑物。

5. 同图 4。E. 埃斯佩朗迪厄:《罗马高卢浅浮雕图录》(法文)vi,第 455 页;F. 德雷克塞尔,引文同上,第 91 页,图 3;《罗马境内之日耳曼尼亚》(德文)(地图),图 XLII-7;H. 德腊根多尔夫—E. 克吕格尔,同前书,图 XVI。

两个人或更多的人(雕图已残破)正在为一艘沉重的大船背纤,船上装着两个大包。一个舵手坐在船尾。请对比卡布里厄雷—德盖(渥克卢塞)的浅浮雕,那块浮雕刻画的景物与此相同,但有一些新颖而极为有趣的细节,见F.德雷克塞尔,前引文,第109页,图10(埃斯佩朗迪厄书中所无)。

这五块有代表性的碑是从埃斯佩朗迪厄的《图录》中很容易查阅的几十幅图中挑选出来的,它们很好地描写了来因河及其支流等处活跃的商业活动。

地——采取了罗马城市的正规组织;而乡村却与高卢其他地方一样分划为大的部落领地(镇),后者实际上与某一个日耳曼部落或克勒特部落居住区相符,而大多数情况下则与日耳曼人和克勒特人混合居住区相符。例如以科隆为首府的乌比伊部和以特雷韦为首府的特雷韦里部都属于这种情形。

当罗马人占领来因河左岸之时,该处并不是一个渺无人烟之境。这儿是克勒特人国家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市镇、村庄、神庙等等;也有它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活,这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但是,在恺撒以后居民重新分布了,又迁入了许多日耳曼部落,再加上与军事边防线直接接触,这种种都成为整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新因素。从经济观点来看,这里是资本家的天堂,摩泽尔河和默兹河地区尤其如此。由于物产丰饶,土壤肥沃,它必然成为来因河驻军的粮仓和向他们供应酒、衣料、靴鞋、木材、五金、陶器等等物资的主要产地。自始以来,这里就吸引大批外来的移民,他们的职业主要是供应军队以最需要的物资。这些人并不是随军卖酒食的小贩,而是做大生意的商人和经营运输业者。他们的主要集中地,除了里昂以外(里昂是从高卢南部、中部以及从意大利来的进口货的卸货栈),还有摩泽尔河上的特雷韦、来因河中下游的科隆

和努马展(即诺维约马古斯)。其中最重要的是特雷韦,它是摩泽尔河上最古老的罗马城市。特雷韦不仅是一个大商业中心,而且它逐渐成为附近整个地区的经济中心,这是势所必然的。这个城市的商人靠卖货给来因河驻军而大发其财,可想而知,他们当然把自己的金钱投入近处有利可图的事业中去,而科隆和来因河上其他商业城市中的商人亦步他们的后尘。他们很自然地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想在本地生产谷物、牲畜和葡萄酒而不再从外地输入这些物资,想在邻近地方制造毛织品、五金,皮货及其他货物以免用船只从远地运来这些货品。要实现这一点,第一步就是鼓励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畜牧业和葡萄种植业,并使之遵循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来因河左岸,沿着摩泽尔、默兹两河河谷一带,逐渐变成了以农业为主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大中心地。用曲蒙的话来说,这儿变成了一片"non de villes, mais de villas〈不见城镇,只见乡村〉"的地方了。在现代的比利时、卢森堡,特别是特雷韦附近地方,当年的富商地主们为自己修建的壮丽的墓碑遍于一乡,在这些墓碑上刻绘着当地的经济状况。我们在谈到高卢和来因河上批发生意的发展情况时,已经提到过这些柱形墓碑上所装饰的浅浮雕。现在用它们作为农业发展迅速的显著证明,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在这里,各地都见到大庄院的辉煌遗址,这更进一步证实了整个地区那时都很繁荣兴旺。这些庄院大多数是城市商人奢华的寓所,或者是经营农业和工业的大企业机构,那是由一所奢华的避暑住宅和一套纯营业性的建筑物组合在一起的。

墓碑和庄院遗址同时又使我们了解该地的社会状况。大工业企业的劳动力是由土著居民如乌比伊部人、特雷韦里部人等供应

的，他们住在大庄院附近的村落里和茅屋里。从特雷韦附近的伊杰耳墓碑上的浅浮雕，以及从比利时某些庄院附近的村落遗址，可以看出这些土著居民渐渐变成了城里富商们的靠客，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他们的佃户。努马展的浅浮雕所描述的是农民们向一个城里人缴钱（这城里人有一个或几个伙计），这浮雕虽然不一定是描述一个大地主的佃户缴纳田租的情景，但是，伊杰耳墓碑上那幅农民向他们的主人送上实物的图景，却使我们立刻就联想起前文所提到的斯塔丘斯和马尔恰耳的记载，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浅浮雕上的农民不只是墓碑主人的靠客和债户，而且，无论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他的佃户。

在来因河地区，城市资本家怎样变成了最肥沃的田地和最好的牧场的主人，这个问题难于答复。他们肯定不属于本地部落贵族阶级。在移居于来因河左岸的新日耳曼部落或克勒特—日耳曼混合部落乌比伊部和特雷韦里部中，简直不存在这种贵族阶级。上面所说的那套浅浮雕可能替我们阐释这个问题。来因地区的富人除了经营商业和农业以外，还经营大规模的放债业。他们是在新经济情况影响下出现的新社会中的银行家。我倾向于把所谓缴纳田租的图景解释为描写银行业的活动。那些庄院不仅是经营农业和工业的大企业机构，而且也是地方银行。很容易理解这些狡狯的商人如何借贷款给邻近的村民和农夫而变成债户的靠主，不久又变成他们的主子，并逐渐使原先的自耕农和地主变成佃户。罗马的新税制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而在来因河左岸日渐发展资本主义生活的新情况也促成了这个后果。

近来在特雷韦和波恩所获得的极有趣的考古发现不仅对于社

会史很有裨益，而且对宗教史也很有裨益。我所指的是 1924 年以来 S. 洛埃施克教授以相当大的努力和天才在特雷韦发掘出来的克勒特—日耳曼神庙建筑群，以及 1928 和 1929 年 H. 累内尔教授在波恩修道院的教堂下面所得到的发现物。我们可以称之为特雷韦地方克勒特—日耳曼的奥林匹亚或德尔斐的建筑特别有意义。这个地区大概从史前时期以来就是宗教信仰的中心地。公元一世纪时，特雷韦的居民在这里盖满了建筑物，这些居民本身既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罗马化的克勒特人或罗马化的日耳曼人，但他们得到罗马技术和罗马艺术的帮助，因此这座神城四周环绕着围墙。很难说这些神殿的建造者属于什么阶级。我们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这个人是来因舰队中的一个士兵，可能同时又是一个贩卖啤酒或染料的零售商（或可能他的家世属于染匠团体）。其他的人没有表明他们自己是什么人；但从他们的姓名和他们没有任何头衔看来，他们都是罗马化的土著，因为其中大多身份低贱：鞋匠、木匠、佣工等。在这个神城里，建筑活动接连不断地进行着：虽然经过两次大火，但神庙又重修起来。到了公元三世纪时，境内所包括的神庙不下六十座，有大的也有小的。有一座较大的神庙附有一个敬神的剧场；从其他的克勒特神殿可以证明这是一种习见的情况。神座上刻着该座神主的名字，与杜腊地方的阿塔尔加提斯神庙一样。在这些神庙中，某些神像和供物是罗马式的，某些名字是拉丁神名，而铭文往往是拉丁文：其余一切都是克勒特式的，也有部分是日耳曼式的。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的神米特腊斯也被放在克勒特和日耳曼诸神一起；不过这是较晚才出现的事。最先只是在私宅中祀奉米特腊斯神。公元 337 年，这座神城被基

督教徒彻底摧毁。城中没有一座神庙变成基督教教堂。这里的遭遇和罗马城市里的遭遇大不相同,令人惊异。可见,基督教的真正敌人正是这座神城里的众神。

波恩地方的发现同样重要。在这里,是否也在营市中有过一座克勒特人的城市,而公元四世纪波恩最古老的教堂就是用这座城市的石头修建的呢?不管怎样,在安东尼努斯·皮攸斯和 M. 奥雷留斯时代,这座神城以及营市的一些个别的克勒特神殿都受到隆重的顶礼膜拜,甚至受到军营和城市里的罗马籍人的崇拜。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军营、营市和首府屯市三方面的"头面人物",由最高负责人亲自领头,向马特雷斯·奥法涅、梅尔库里攸斯·格里纽斯(?)及其他诸神献祭过。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时本地的神祇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个人中受到普遍的崇奉、土著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坚奉不渝,这些事实不仅对研究罗马帝国的宗教史极其重要,而且对研究它的社会史也极其重要。

来因河右岸的一般情况与左岸不同。罗马人所兼并的土地富饶肥沃,但居民非常稀少。这里多年来是日耳曼人和罗马人之间的一个战场。环境太不安定,以致不能吸引大批移民来此长期定居。罗马人最先把和平带到这里。他们建立了堡寨,修筑了道路开辟了河道运输线。为数很多的堡寨设于河道险厄和咽喉要冲之地。堡寨的四周出现了村庄。土著居民开始比较精耕细作了。从高卢移入这块新地方的人成群结队而来。退役军人在堡寨附近领到一块土地。堡寨近处的地面即为堡寨的辖区,这些土地由军事当局经营:当局把它分租给军士,军士们当然再转租给本地的或外来的老百姓。但是,拨归堡寨的辖区面积从来不大。当堡寨向前

推进的时候，平民留在原地形成了一个庄子（*vicus*）。这整片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其大部分由皇家行政机构管理，作为皇庄（*saltus*〈苑囿〉）。这些皇庄有一部分交给土著，一部分交给退役军士，还有一部分卖给了外来移民或有钱的兵士和军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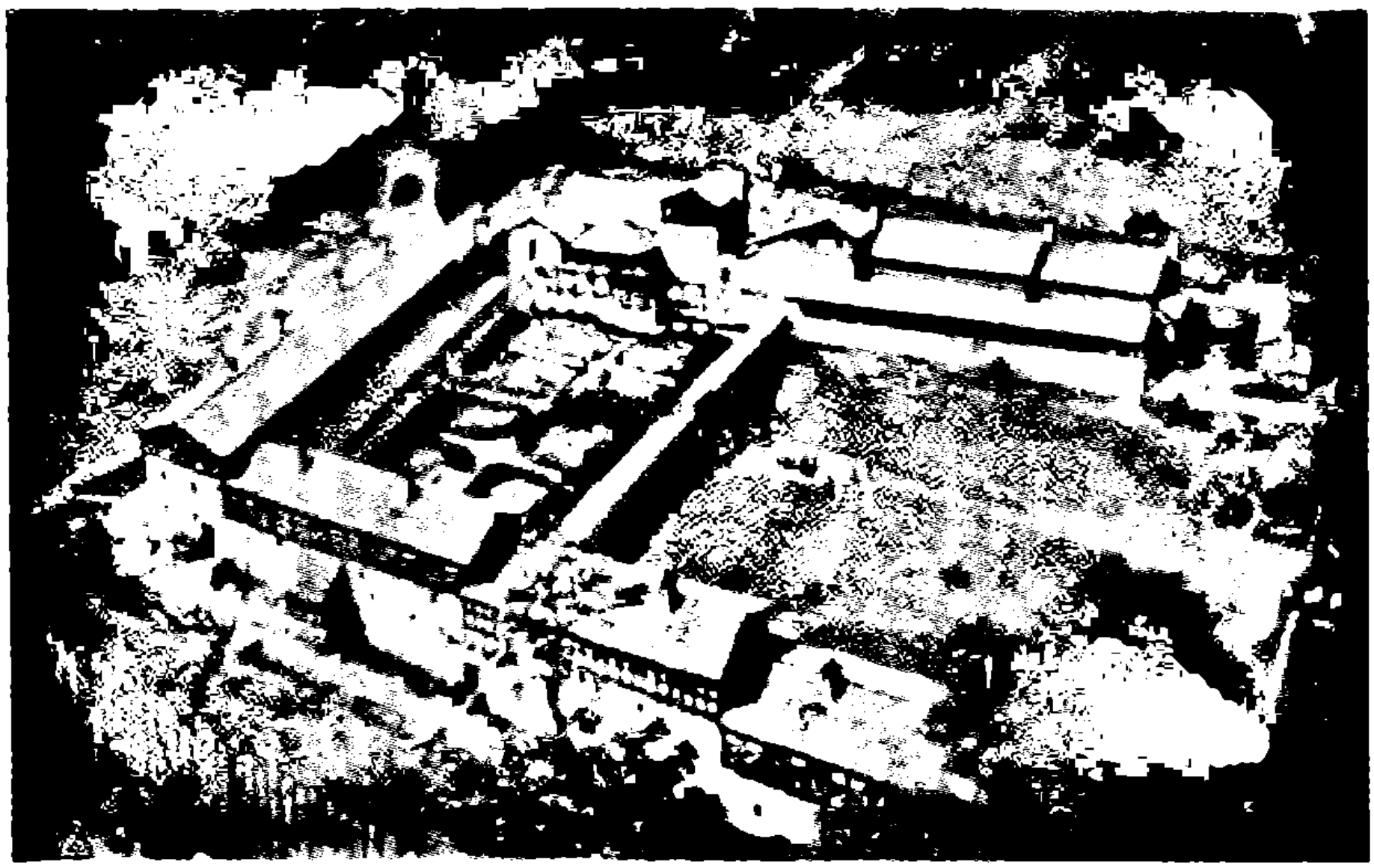
情况愈安定，这块新地方就愈吸引外来的人。新的农庄建立起来了，新的村落发展起来了，其中有些略具正规城市的面貌。政府认识到这个现象。这块地方也仿照高卢一样被分划为若干镇，每一镇内最繁华的村庄成为该镇的首府，并在适当时候采取城市组织形式。然而，全境仍保持其乡村面貌。根据有系统的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情况来看，这里突出的特征不是村落而是各自成为一个单元的农庄。某些位于 *limes*〈边塞〉附近的农庄被分给了在役军人，变成新兵的培养地，这种情况在三世纪时尤为多见；但是，大多数农庄都是规模比较大的资本主义农业行庄，其形式不同于摩泽尔河旁的田庄，而颇类似蓬佩伊的庄院。典型的庄院都有一所房宅，虽不甚奢丽，却宽敞舒适，像今天美国乡下的大农庄一样。其主人虽不是远住在城市里的阔绰地主，但肯定是家道丰裕的人。根据地理条件，有些农庄生产谷物，有些经营畜牧，这里的畜牧业是大规模经营的。在各地区的首府中，在温泉疗养场所，在大村落里，商业和工业也都在发展着。

适应着这种经济趋势，土著居民自然地大多数变成了外来农庄主人的佃户和牧人。我们有时听说过这里有大批佃户，他们可能属于某一个较大的田庄。由此可见，在来因河右岸，也和左岸一样，居民之中分成了一个上层富裕农庄主人阶级和一个下层农民、佃户阶级。

不列颠实际上是高卢的附庸。一方面由于对西部高地实行军事占领，另一方面由于修筑了可与日耳曼边塞相比的罗马边塞以防御苏格兰，因此保障了平原地带的安全；而这一地带的归顺事实上等于高卢和日耳曼尼亚诸省向北扩张，并使军事边防线尽量缩短。罗马境内的不列颠，就其社会经济发展看来，与来因河地区极为相似，尤似于该河右岸之地。F. 哈佛菲耳德对不列颠省的罗马化曾作过精彩的概述，因此我只要略事评述就够了。

军事边防线上的生活当然几乎同来因河上的生活完全一样。虽说这里自有其特殊之处而值得作缜密的研究，但那对于我们这个主题说来却无关宏旨。平原地带城市生活的发展与该岛之被征服和实行军事占领密切有关。不列颠的四个屯市（卡木洛杜努姆、格勒武姆、埃布腊库姆和林杜姆）全都是因军事而兴起的，因此它们可与日耳曼尼亚的阿格里皮嫩西斯屯市、卡斯特腊—韦特腊（或乌耳皮亚—图拉真纳屯市）、诺韦休姆、崩纳、莫根恰库姆等城市相比。最富足的商业城市是隆迪纽姆，这个城市在不列颠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特雷韦和里昂在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作用。巴思疗养地可与来因河地区的许多温泉相比。不列颠的其他罗马城市，也像高卢中部、北部和上日耳曼尼亚的大多数城市一样，都是克勒特人居住的市镇，它们成为庄稼人进行交易的市场、部落乡区的*chefs-lieux*〈首镇〉，成为他们从事政治、宗教、工商业活动的中心。这种城市有两所已被完全发掘出来了，那就是卡勒瓦—阿特雷巴土姆和文塔—锡卢鲁姆，它们都具有大村庄形式，村庄里有一些公共建筑物。

与高卢北部和日耳曼尼亚相似，不列颠不是一个以城市为主



1. 切德沃思地方的一所庄院（A.福雷斯契厄复原）

2. 不列颠的一个犁耕者

3. 不列颠的旅行者和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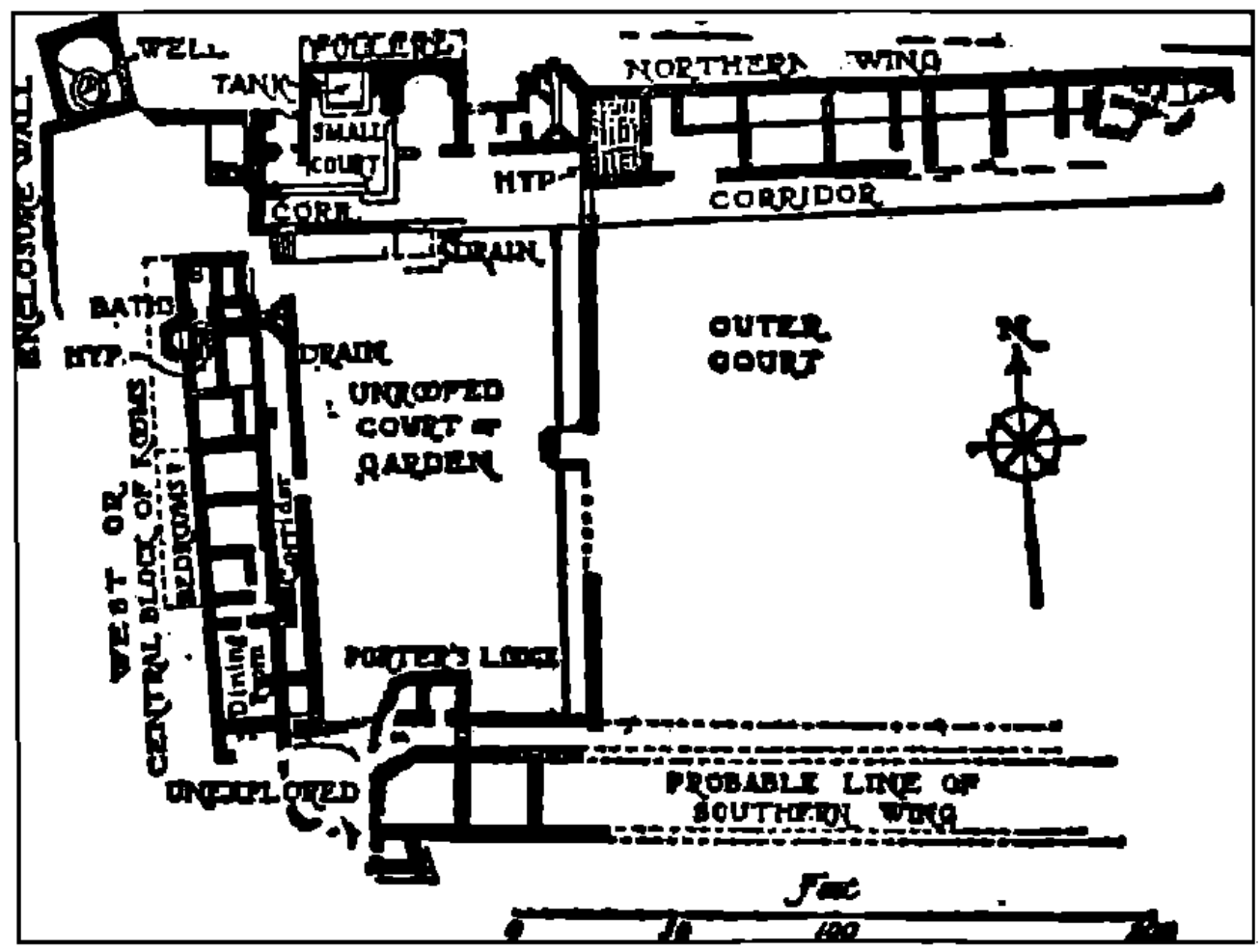
4. 不列颠的 一个铁匠

图 40　不列颠的生活和行业

图 40 说 明

1. 切德沃思地方的罗马庄院，格洛斯。由 A. 福雷斯契厄复原(《伦敦画报》(英文)，1924 年，7 月 12 日，第 75 页)。关于发掘情况，请看 G. E. 福克斯所撰文，载《考古学杂志》(英文)44，1887 年，第 322 页起和图，又另文，载《考古学》(法文)，59，1905 年，第 210 页起，图 LVII；J. 布克曼和 R. W. 霍尔：《格洛斯特郡切德沃思罗马庄院简记》(英文)，赛伦塞斯特(1919 年)。

这个庄院(见下附平面图)包括有(1)一个大院子，院内有谷仓、库房，两厢是工人们的住房，前面有一个大门，和(2)一个小院子和花园，三面环绕着



切德沃思庄院平面图

WELL：井；*TANK* 水槽；*FULLERY* 浆洗坊；*HYP*：地窖；*CORRIDOR*：廊道；*BATHS*：浴室；*NORTHERN WING*：北厢房；*DRAIN*：水沟；*BEDROOMS*：卧室；*ENCLOSURE WALL*：围墙；*WEST OR CENTRAL BLOCK OF ROOMS*：西屋或正屋；*SMALL COURT*：小院；*DINING ROOM*：餐室；*PORTER'S LODGE*：门房；*UNRO-OFED COURT OR GARDEN*：露天院子或花园；*OUTER COURT*：外院；*PROBABLE OF SOUTHERN WING*：南厢房略址；*UNEXPLORED*：未查勘部分。(比例尺单位：英尺)

房屋，其中一边（南厢）住仆役（?），而另一边前面有廊道的是庄主的住屋。庄主住屋这排房子中，楼下有一间很大的餐室和浴室，楼上是起居间。餐室里装饰着一幅精美的镶嵌细工，画着四季的图景（参照本书图 58）。第三排房子，也就是北厢，为一个铁工场和一个大浆洗坊（*fullonica*）若仅供家用则规模用不着这么大。庄院附近的神庙比庄院本身时代早，关于神庙的发现情况见 R. G. 科林伍德和 M. V. 泰勒所撰文，载《罗马学杂志》（英文）14，1924 年，第 231 页。

2. 一个犁耕者的铜像。发现于达勒姆郡之皮尔斯桥。不列颠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罗马不列颠古物介绍》（英文）（1922 年），第 90 页；E. 伍勒：《皮尔斯桥的罗马军垒》（英文）（伦敦，1917 年），第 148 页前。

犁由一架双轭牛拉着。耕者穿着克勒特式的服装——一件带盖头的外套。在萨锡克斯的一个墓里发现过一把犁和一些农具的模型；见《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罗马不列颠古物介绍》（英文），第 42 页，图 39。

3. 一个银盘的把手。1747 年发现于诺森伯兰郡之凯普希滕。不列颠博物馆。参考资料目录见我所撰的论文，载《罗马学杂志》（英文）13，1923 年，第 99 页，注 5。

把手顶端装饰着一个皇后的半身像，其左侧为一个旅客背着他的行囊，扶着一根手杖，其右侧为一个牧人带着他的羊；下面（本图未制人）是一个神庙，庙中有梅尔库里攸斯以及巴库斯和阿丽雅德芮的神像，角上是一条河流和一个海港的化身像。我在上引的论文中企图说明这个 *patera*〈盘〉很可能是在不列颠制造的。这个把手全面地描绘了罗马开明政府统治下境内的太平景象，在这里，旅途平安，牲畜蕃息，河海交通甚为畅便。

4. 一座 *AEDICULA*〈神龛〉式的墓碑。发现于约克（埃布腊库姆）。约克博物馆。哥尔东·贺姆：《罗马时代的约克》（英文）（1924 年），第 24 页前。

一个铁匠用一把火钳夹住一块铁放在砧上锤打。

的地区，而是一个以农庄和经营农业的庄园为主的地区，它是一个属于庄院和缙绅的地区，而不是一个属于农民和小所有主的地区。这些地主，一部分是罗马移民和退役军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另一部分是当地克勒特贵族阶级中的头面人物。分布甚广的庄院遗址证

明平原地带具有这种特征。不列颠的发展规模较小，这些庄院中没有一座比得上特雷韦的庄院那么宽敞奢华，虽然如此，但从庭院的形式可以看出它们也是由大地主的住宅和一所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庄组合成的。无论从建筑观点或从社会观点来看，这些庄院的廊道和谷仓都可与来因河右岸的上日耳曼尼亚的农庄相比。

我们自然会推想不列颠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近似于高卢，而尤其近似于上日耳曼尼亚和下日耳曼尼亚。这里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占领所造成的，只要确实存在军事占领以及它的保障仍具实效，则此种生活方式自将保持不变。平原地带是军队的腹地，它是在罗马保障和平的局面下开始发展其经济生活的。该地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军队。当地的乡村后来也提供了一个市场，但始终未在该岛的经济生活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北面和西面都有一个保证生产者销售其产品的永久性市场，所以，精耕土地变得有利可图。不列颠居民很快就理解到他们的有利的机会，并加以利用。持有田产的克勒特地主们按照高卢同族人所熟悉的方式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但是，和摩泽尔河谷的情形一样，这里大庄田的业主大多还是那些在军事占领初期由大陆运货供应军队的富商，他们都是隆迪纽姆的企业主。大厅大院的庄院就是属于他们的。除此以外，有领取或买得片段田地的退役军人，有采用新式精耕细作方法的勤俭的克勒特人，还有新自大陆迁来的侨民。这些人就是那些有廊道和谷仓的农庄的主人。

所有这些地主，没有一个人亲自耕种土地，也没有一个人派他们的子女到草地上和树林中去牧放牛羊猪群。劳动力有一部分由

奴隶供应，而大部分由住在村落里的土著供应，他们所居住的村落形式有如皮特—里佛兹将军在索尔兹贝里附近所发掘出来的以及D. 阿特金斯恩先生在娄贝里山（在伯克郡）上所发掘出来的那样。在平原地带的较贫瘠地区，这些村民可能自己拥有土地和牧场，但在较肥沃的地区，他们肯定是变成了大小地主的牧人和佃户。他们学会了使用罗马的壶罐和安全栓。那些住在城市中的人则学会了拉丁语。我们在碑铭中所见到的那些引自维吉尔诗句的附带题词也许就是他们留下来的。但就整体而言，他们依然和埃及的土著农民一样对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实质（城市生活及一切与此有关的事物）是陌生的。他们的人数与军人、城市居民、乡间缙绅的人数比较起来多少如何，我们不能断定。

罗马的阿尔卑斯山区诸省中，以雷戚亚和诺里库姆为最大和最重要，我们对于这些行省不可能言之甚详。意大利方向与此毗连的地区有一些大城市，如奥古斯塔—陶里诺鲁姆和塞古西约、奥古斯塔—普雷托里亚和埃波雷迪亚、科木姆、贝尔哥木姆、布里克西亚、维罗纳、维策戚亚、孔科尔迪亚和阿魁累亚等。所有这些城市原先都是罗马的军屯市，后来变成了大的农业中心，有着广阔的辖区，并有许多克勒特部落和雷戚亚部落附属于这些城市。如果从社会经济观点来看，则阿尔卑斯山地的某些地方的特征和上述意大利地区差不多一样。阿尔卑斯地区的其他地方实际上则属于高卢南部山区。雷戚亚在阿尔卑斯地区中面积之大居第二位，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同上日耳曼尼亚的边塞内与此毗连的一部分地方没有多大的差异。至少，从发掘出来的雷戚亚城市看来，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与上日耳曼尼亚城市显然大不相同的特征。雷戚亚的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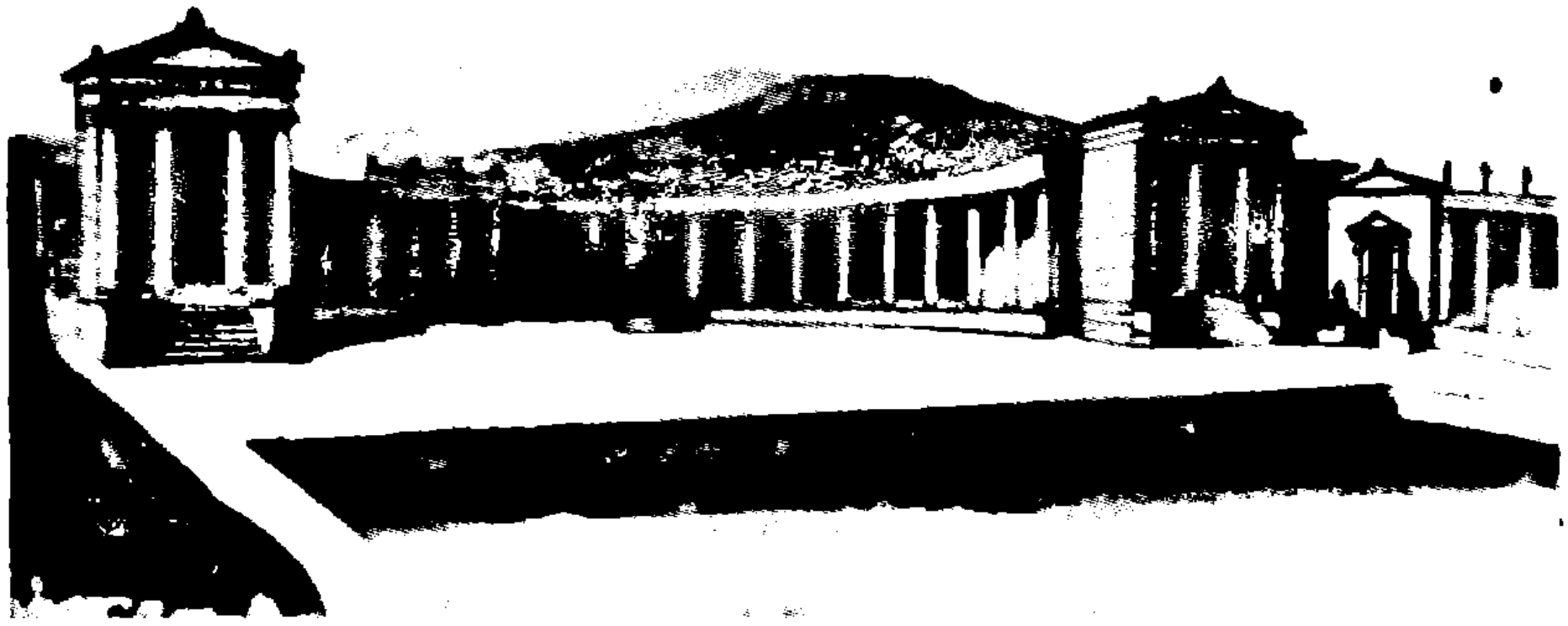
市，最知名和最重要者为奥古斯塔—文德利科鲁姆（奥格斯堡，奥古斯塔），这个城市同多瑙河上游及其边塞的关系大概相当于特雷韦和莫根恰库姆同来因河边塞的关系。例如，由商人们——尤其是衣料商和陶器商——在该城市生活中显露头角的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另一件有趣的事是，雷戚亚最大的军事堡寨卡斯特腊—雷季纳（勒根斯堡，腊提斯崩）占有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地面上逐渐兴起了这个堡寨的营市。公元后 178 年的一篇碑文中称这个军事辖区为 *territorium contributum*〈并入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些营市的最高长官的官衔是市政官。我们可以认为，在这片地区尚未划归堡寨管辖以前并非没有居民；可能在罗马人来之先占据此处的居民组成了雷戚亚许多 *gentes*〈部落〉中的一个；自从这里为罗马人占领以后，他们就成为堡寨的佃户继续耕种这块土地。埃斯戚约芮斯族的城市坎博杜努姆（今之肯普滕）是高卢—罗马式的市镇成为都会生活中心的克勒特 *pagus*〈村落〉的重要例子。这个城市在公元一世纪时甚为繁华，当时它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二世纪时它的发展停顿下来，三世纪时就开始衰落。它的遗址已经细心地发掘出来了，它极其清楚地描绘出一个县级城市的兴起和形成。这种城市的都会生活的发展不依赖于该城市在军事上或行政上的重要性。

阿尔卑斯山区诸省中最大的一省为诺里库姆，原先是诺里库姆王国，居民为克勒特人。它包括了意大利东北部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且长期以来处在阿魁累亚的影响下。这个地区一向以一个土著国王为中心，过着统一和平的生活，因而使意大利的各种因素轻而易举地渗入它的各个城市和溪谷。几乎没有通过斗争，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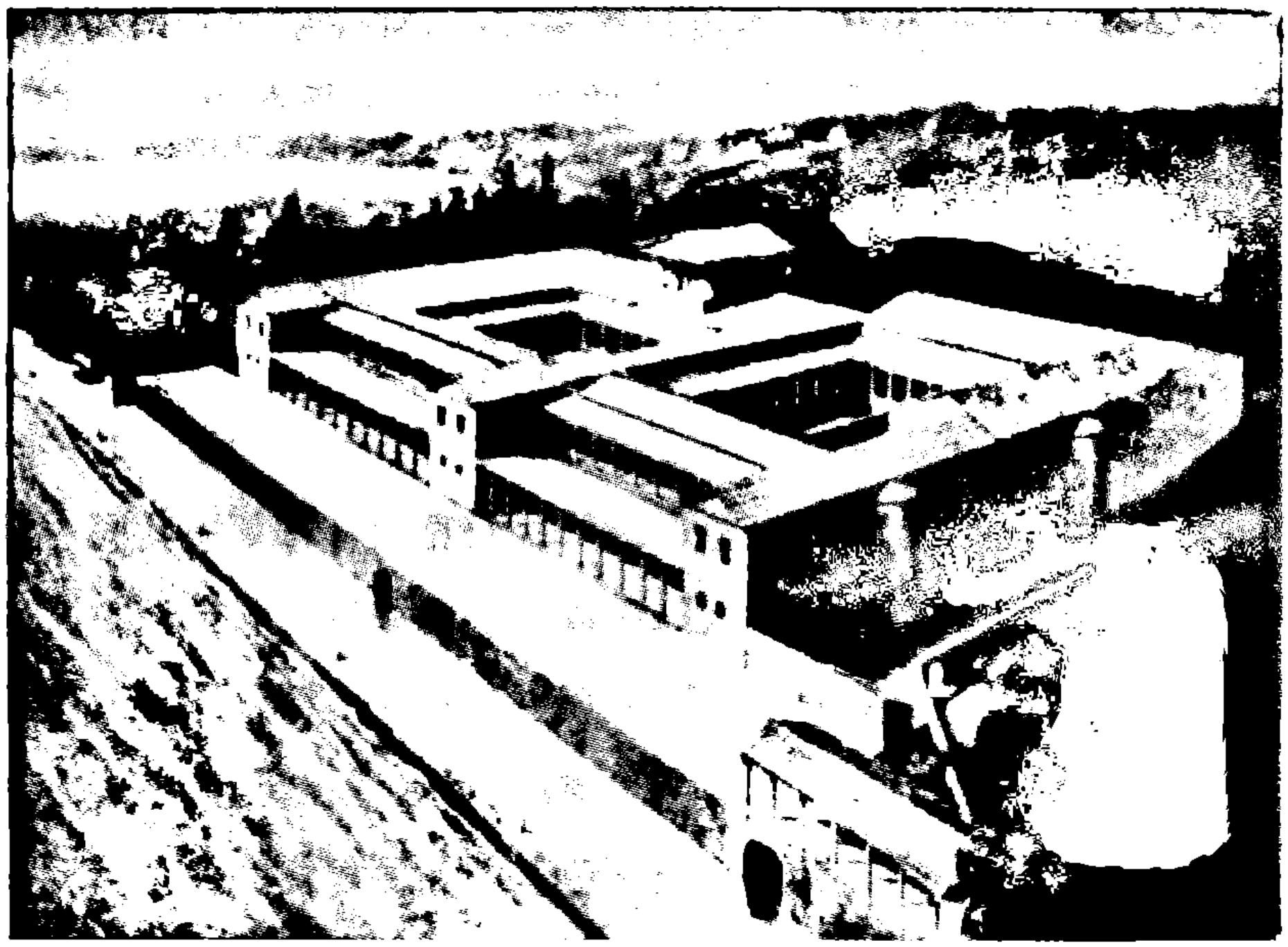
古斯都就把这个王国变成了一个帝辖行省。自从并入意大利以后，这里的溪谷地带很快就达到了相当高度的繁荣。因为没有受战争和叛乱的纷扰，所以在各个克勒特部落的许多古老的中心市镇中都发展起都会生活来了，这些市镇中最大的为维鲁努姆（首府）、策累亚、透尔尼亚和尤瓦鲁姆。它们全都有很大的市辖区，居民兼有土著和意大利人。皇帝克劳迪亚斯按照意大利自治市的形式把这些克勒特—罗马式的市镇组织起来，并正式把自治市的法权制度赐给那些较重要的都会生活中心。城市居民中除了罗马公民以外的人都接受了拉丁公民资格，至于乡村里的农民和牧人则依然是 *peregrini*〈裔民〉，他们一直保持着乡土的风俗习惯，在该省较偏僻的角落里尤其如此，如尤文纳以及拉万谷地的情形就是这样。

诺里库姆的主要经济资源是丰富的铁矿和铅矿、森林、饶美的牧地和一些良田。它们大多在富裕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手中。矿场主要为国家所有，并和达尔马提亚与西班牙一样，通过有相当资产的“承包商”（*conductores*）来进行开采的。森林、牧地和田畴则归城市公民所有。境内不大吸引人的地方也许留在当地的裔民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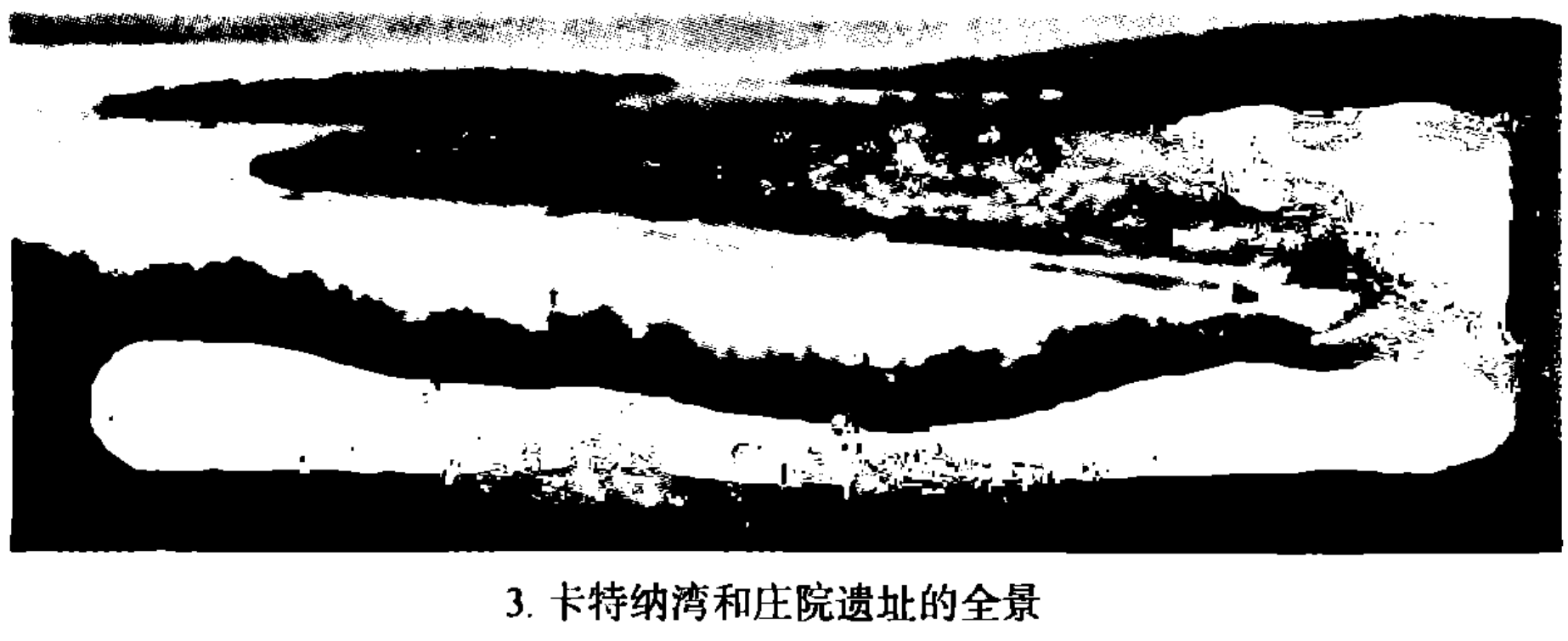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来谈谈多瑙河流域两大种族——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的居住地区。混有大量克勒特人血统的一部分伊利里亚人所居住的地区就是伊斯特利亚，这块地方早就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其余的伊利里亚人与色雷斯部落及克勒特部落所共同占据的另一个地区在并入罗马帝国以后成为伊利里亚行省，后来又再分为以伊利里亚人为主的达尔马提亚省和两个潘诺尼亚省，以及以色雷斯人为主的上梅西亚省和下梅西亚省，前者为色雷斯人和



1. 大布利俄尼岛上一所庄院内的三座神庙（A.格尼尔斯复原）



2. 这所庄院的主要建筑（A.格尼尔斯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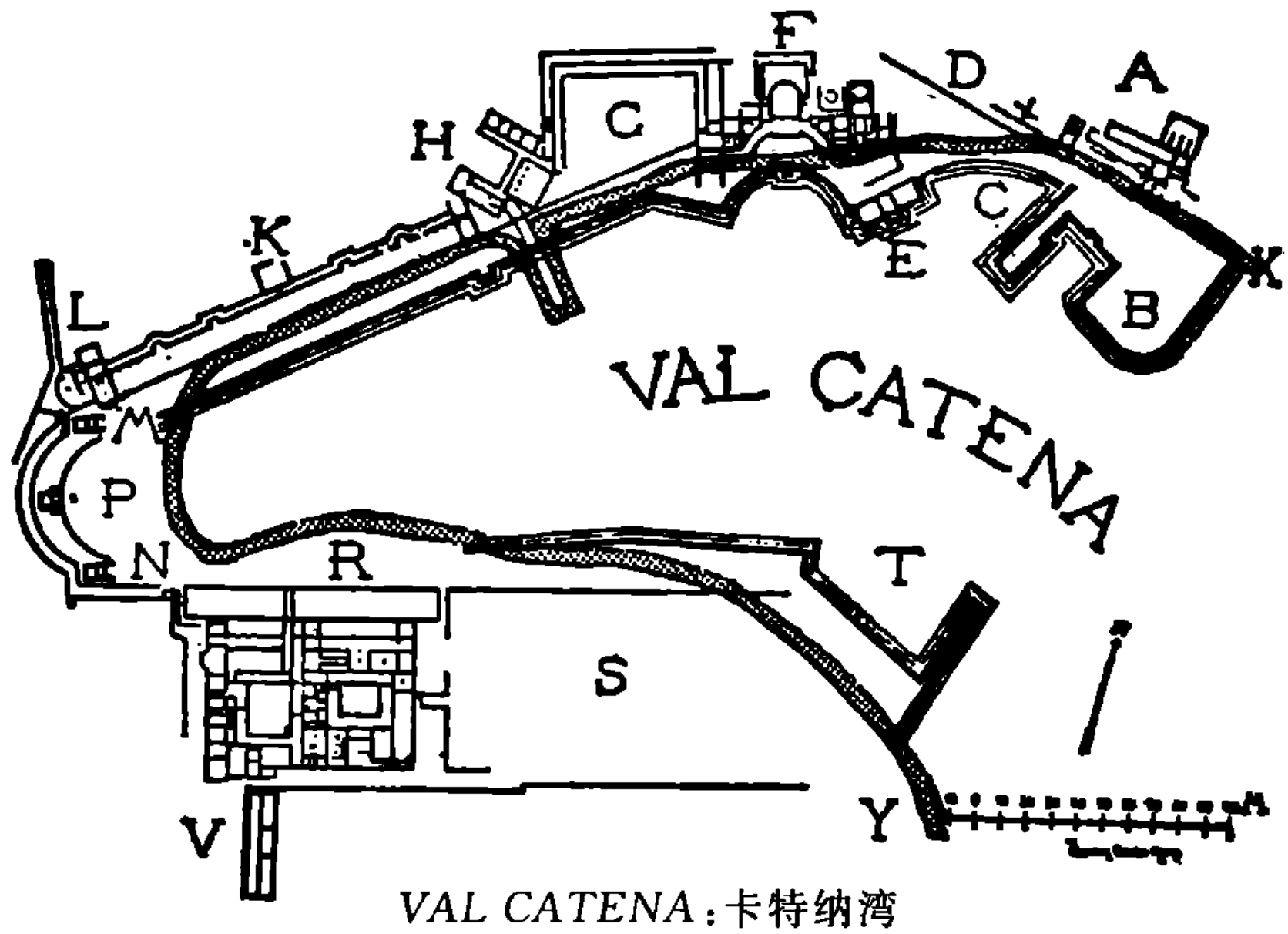
3. 卡特纳湾和庄院遗址的全景

图 41　伊斯特利亚的一所庄院

图 41 说 明

1—3. 波拉附近的大布利俄尼岛上的大庄院。

这所庄院是由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来的。领导发掘工作的 A. 格尼尔斯在进行工作时极度细心，从而获得辉煌的成果。图 3(《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德文)10，1907 年，附录，第 43—44 页，图 1)所示为卡特纳湾的全景，该庄院的建筑物就环立在这个景色宜人的海湾周围。



VAL CATENA：卡特纳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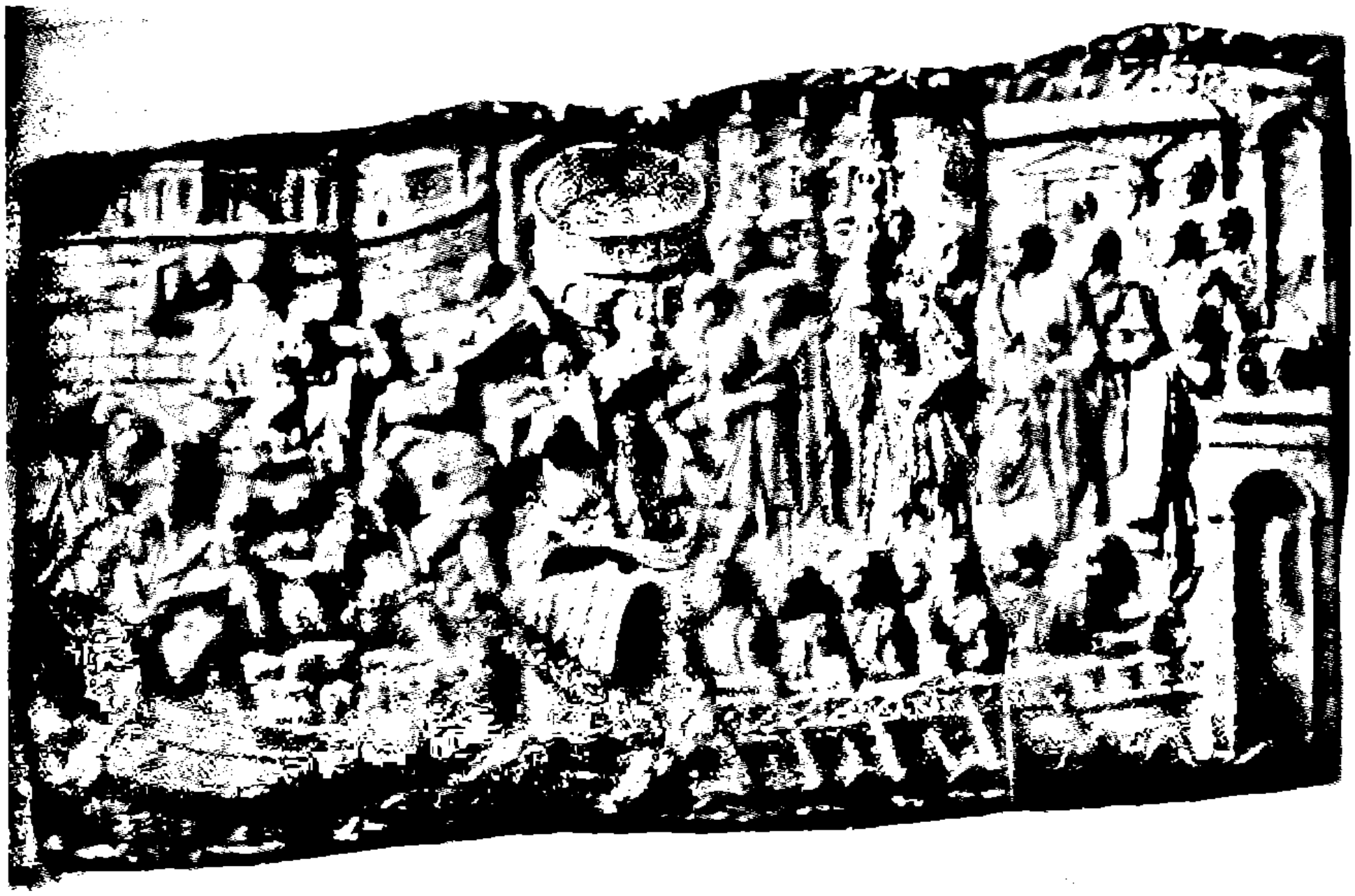
大布利俄尼岛上的庄院平面概观图

在海湾的狭端(见上平面图，该图摹自《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德文)18，1915 年，附录，第 133—134 页，图 54)有一个漂亮的码头，码头上有三座神庙由一条半圆弧形的廊道连成一气(图 1 摹自《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德文)7，1904 年，附录，第 139—140 页，图 23)。其中一座神庙(平面图中之 N)可能是供奉水神芮普土努斯的。图 2(《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德文)18，1915 年，附录，第 127—128 页，图 52)为该庄院主要建筑复原图，这部分即所谓“台地建筑”。这所庄院修筑在高出于码头之上的一个大 *podium*(台基)上。它的前面是一条长廊；左(东)厢房屋环绕着一个宽敞的院子，被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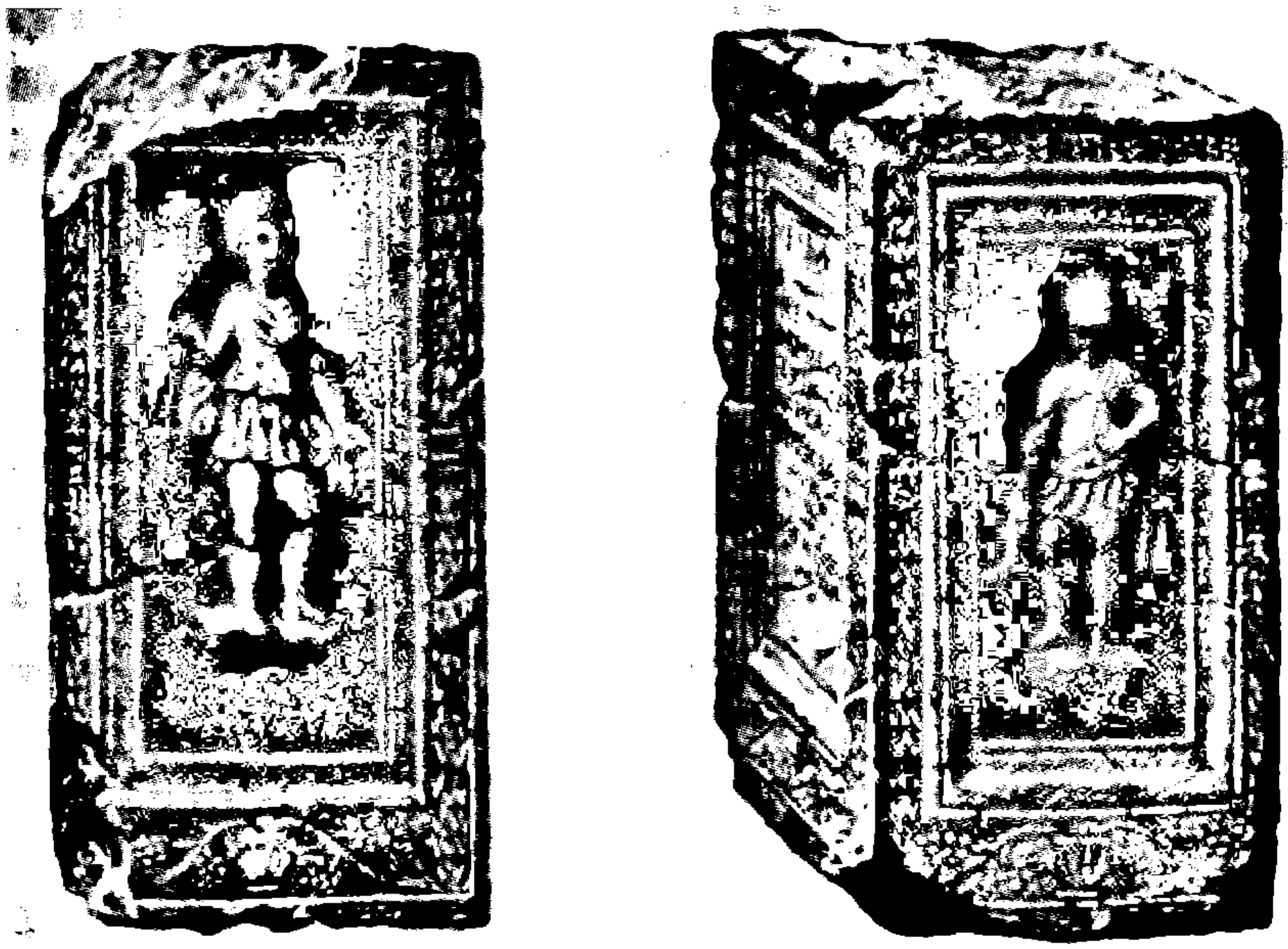
店房，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那些榨橄榄油的房间；右（西）厢是一栋壮丽的住宅。庄院里的其他显目的建筑物如平面图所示：船坞（B）、鱼池（E）、大浴室，即 *thermae*〈温泉浴池〉（F）、码头上的长廊（K）、长廊尽头一座像亭阁似的建筑（*diaeta*〈消夏厅〉）（L）、另外一座周围绕以圆柱、中间有 *atrium*〈正厅〉的 *diaeta*〈消夏厅〉（H）、一个花园（S）和一个大水槽（V）。关于伊斯特利亚大庄院一般供水状况以及关于大布利俄尼岛上这所庄院的蓄水槽，参看 A. 格尼尔斯撰文，载《*Strena Buliciana*》（塞尔维亚文）（1924 年），第 138 页起。

伊利里亚人混居，后者则几乎全是色雷斯人所居住。关于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诸省，迄至目前尚无任何概括性的著作堪与 C. 朱利安、F. 哈佛菲耳德、F. 曲蒙、K. 舒马赫和 F. 施泰林等人关于帝国中的克勒特人地区和日耳曼人地区的著作相比，因此，我们必须对伊斯特利亚、亚德里亚海沿岸、多瑙河及其支流地区的一般社会经济状况作一番比较详细的描写。

伊斯特利亚在该地有史之初即非一个野蛮人的地区。在那些所谓 *castellieri*〈砦堡〉的土著市镇（其中有些后来为罗马城市所代替）中所进行的发掘，显示出此地早在迈锡尼后期就曾达到高度的文明。罗马人很早就移居伊斯特利亚（主要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时），这里开始全面罗马化，至少沿海的大城市都如此——例如，特尔杰斯特（若从行政组织的角度看来，此城并不属于伊斯特利亚）、帕伦丘姆，尤其是有着美丽港口的波拉。这些城市的市辖区大部分属皇帝们和住在本城中的意大利人所有，这些意大利人中只稍微混有土著的血统。（撇开常见的各种各族的免奴以及一定数量的希腊人和东方人不谈。）勒卡纽斯氏是波拉最显赫、最活跃的意大利家族之一。就其在各个经济方面的活动而言，这一家可与阿魁累亚的巴尔比攸斯氏相提并论。该家族中人遍布于波拉各处，



1. 多瑙河旁的埠头和城市



2. 达尔马提亚地方一个开鞋铺的财主

图 42　多瑙河流域的经济生活

图 42 说 明

1. 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浅浮雕。罗马,图拉真广场。C. 契科里攸斯:《图拉真记功柱上之浮雕》(德文),图 XXV 和正文 ii,第 155 页起;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第 339 页 27 和 28。

图拉真第二次远征启程时的情景。兵士们把出征用的装备装上一只内河航船。图拉真本人、他的幕僚和一小队禁卫军准备登上另一艘设有篷舱的御舟。桨手无疑地是公民和外省的土著。岸上有一座建筑完美、环以城堡的大城市,可能是多瑙河流域的一个城市,也许是萨夫河上的锡什亚;城外有一个石建的圆形剧场。剧场附近可以看到那 *navalia*〈埠头〉,即该城市的内河码头,码头上有堆栈和两座拱门,其中一座拱门(离河近者)顶上砌着一辆 *biga*〈双马车〉。在这个记功柱上到处都雕刻着海港和河埠的图形,但任何一个都无法肯定其确指何地(参考 K. 累曼—哈尔特累本:《地中海的古代港湾建筑》(德文),载《克莉约》(德文),增刊 14,1923 年,第 228 页起)。从本图这幅雕刻可以看出多瑙河地区沿河埠头是何等的重要。当然,那些埠头并非专为军事目的而修建的。

2. 斯克拉尼地方所发现的墓地祭坛(达尔马提亚)。C. 帕奇:《罗马达尔马提亚行省考古碑铭研究(七)》,载《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学术报导》(德文),ii,1890 年,第 155 页,图 63—64。

祭坛上有一段残缺的铭文,几乎无法辨读。坛的两面刻着同一个人的像。其一面,这个人穿着当地的服装站在那里,右手执一杖,左手执一束谷穗;另一面,这个人成了一个鞋匠,右手拿着一只靴子或靴楦头,身边有他行业的工具。这幅雕刻很具体地描写了一个土著最初在一个小城市里当鞋匠起家,而后来弄到一笔田产;或者是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即一个地主或农民因为在市镇上开一鞋匠铺,获利不少,从而增多了收入。

有勒卡纽斯氏本宗的子孙,也有族内各人手下的免奴和免奴的子孙。

这些人把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垦殖土地方法带到了伊斯特利亚半岛。伊斯特利亚南部几乎全部变成了一个橄榄园，波拉港口中的岛屿也都是这样，其中尤以大布利俄尼岛为最甚。这个岛上有座美丽的庄院，庄院是由一所确实华贵的府邸和一个庞大的农庄组合成的，已经被 A. 格尼尔斯全部发掘出来了。这座庄院是罗马世界中（无论意大利或外省）这一类大庄院中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外，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和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已经发现并部分发掘了许多宏丽的庄院（它们都是大庄田的中心）遗址和许多零星分布的农舍（它们可能是那些庄田中的组成部分）残迹。它们看上去很像蓬佩伊和斯塔别的庄院，所不同者，这里不集中生产葡萄酒（大概也生产葡萄酒，但产量不太大）而集中生产橄榄油。蓬佩伊的庄院和伊斯特利亚的庄院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不是中型庄田的中心，而是（至少就我们所熟知的情况来说）正规的大地产的中心，这种大地产的形式与高卢、不列颠、比利时、日耳曼尼亚和阿非利加等地所见者相似。

住在伊斯特利亚城市中的意大利人还在特尔杰斯特和波拉附近开设大规模的砖瓦厂和壶瓮厂。这些砖瓦和壶瓮行销于伊斯特利亚、达尔马提亚和整个多瑙河流域。占有大庄田的意大利人可能还收购城市后面的山区里的土著部落所生产的羊毛。当然，有一部分羊群本就属城里人所有，而由他们的奴隶牧放。著名的伊斯特利亚羊毛衣服就是用这种羊毛制成的，这种羊毛衣服与高卢所产的稍微粗糙和比较朴素的羊毛衣服相互竞逐。

这个半岛的腹地和特尔杰斯特市背后的地区的罗马化程度要差得多。特尔杰斯特本身原先是一个伊利里亚人的居住区，后来

成为克勒特人卡尔尼部的一个村落。我们已经引用过那件谈到卡尔尼部和卡塔利部附属于特尔杰斯特的碑文(戴索:《拉丁文碑铭选录》6680):这些部落的生活情况大概是原始的乡村生活。它们的"酋长"变成了罗马公民,但部落中其他成员大概始终没有取得罗马公民资格。伊斯特利亚的伊利里亚部落情况与此相同,这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拉丁文碑铭(如在芮萨克丘姆和皮款土姆境内所见者)可以看出来。

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以及上梅西亚部分地区的伊利里亚人不是纯种。最先定居于这些地方的是色雷斯人。随后来了伊利里亚人,他们奴役了色雷斯人。再后又出现了克勒特人,他们同一些最重要的伊利里亚部落(亚德里亚区域北部的利布尔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亚普迪亚人和梅泽亚人以及南部地区的陶兰戚亚人、恩克累亚人和阿尔迪亚人)混合起来了。伊利里亚人开始与罗马人接触之时(在公元前三世纪),他们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有史生活,这一点正与西班牙的伊伯利安人相似。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他们已经受到后期米诺斯文明的深刻影响。他们很早就与希腊人接触。在这些影响下,他们发展了自己独有的一种物质文明,这种文明还受到亚德里亚海隔岸意大利那边的同族人的文明的影响。它所表现的许多显著特色都是很有趣的。

从社会方面看,各个伊利里亚部落生活在一种颇为原始的状态下。他们生活的显著特色与伊伯利安人的特色非常相似。各部落和氏族都分据丘陵或山岭的峰顶,筑成城堡式的市镇作为他们的中心;畜牧业和农业是他们主要的职业;从某些例子看到,这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每隔八年就在部落和氏族成员中重新

分配一次土地。同西班牙的伊伯利安人一样，伊利里亚人也时常组成君主统治下的较大的政治单位——起先有阿波洛尼亚附近的恩克累亚人和埃皮达姆努斯附近的陶兰戚亚人，后来有阿尔迪亚人，最后有达尔马提亚人。但是，这些邦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团结统一，与其说它们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毋宁说它们是部落与氏族的一种不甚紧密的联盟。

罗马人对待这些伊利里亚人和克勒特—伊利里亚混种人的方法与对待伊伯利安人和克勒特—伊伯利安混种人的方法相同。他们很早以来就与沿海诸城市发生外交和商业的关系，并保护伊利里亚地区旧有的希腊人居住点和希腊城市。在迭次反对领导部落的长期战争中，罗马对于伊利里亚人事务的这种影响愈加强，外交和商业的关系也就愈密切。到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时，伊利里亚人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虽说有些部落还保持名义上的独立），大批意大利的商人和放债者就在这时移居于沿海较重要的城市。就是这些人，他们和早先的希腊侨民以及或多或少有点希腊化的土著们一道从事海上的贸易，这种贸易自远古以来就是这些城市的命根子。他们借助于伊利里亚人擅长的航海术，伊利里亚人素来是有名的海盗。这些人现在到商船队里充任水手来了，后来帝国的腊万纳舰队中的船员有相当多的人就是由他们之中找来的（与埃及人服务于米塞努姆舰队的情况相同）。当伊利里亚地区最后并入罗马帝国的时候（在奥古斯都时期，始于公元前 33 年左右，以及在紧接着他的几代继承人时期），罗马人把这些城市改为了屯市：塞尼亚、亚德尔、萨洛纳、纳罗纳和埃皮道鲁姆是最先改为屯市的。把它们改为屯市意味着建立几乎纯意大利式的都会生活中心。每

1. 潘诺尼亚的一个银行家

2. 潘诺尼亚的一个矿工

3. 达尔马提亚的一位主母

图 43　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实业

图 43 说 明

1. 潘诺尼亚的一座墓碑的下段。发现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博物馆。我所写的论文，载《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罗马学组报导》(德文)26，1911年，第 278 页，图 2；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ii，第 160 页，2。

图为一个银行家或实业家的公事房。这个银行家(着罗马服)坐在一把椅子上，靠近一张折叠式的壁桌。他的左手拿着一本簿册，那是他的账簿(*codex accepti et expensi*〈流水账〉)，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袋子，袋内装着钱币——一天的收入。桌前站着一个奴隶，正拿着 *adversaria*〈记事册〉或 *ephemerides*(日记账)在报他的日账。关于罗马人的簿记，请看 R. 拜格贝：《罗马的会计制度和记账方式》(德文)(1904 年)，并参看 C. 巴尔特撰文，载《古典语言学周刊》(德文)1905年，第 13 页起。关于潘诺尼亚的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请看 A. 赫克勒尔撰文，载《*Strena Buliciana*》(塞尔维亚文)(1924 年)，第 208 页起。

2. 一座还愿祭坛(?)上的浅浮雕。未完成的雕刻。发现于圣马丁—阿姆—巴克尔(潘诺尼亚)的采石场区附近。普图伊博物馆。V. 斯克腊巴尔撰文，载《*Strena Buliciana*》(塞尔维亚文)(1924 年)，第 159 页，图 9。

一个矿工(也许更像是矿工的祖师神埃尔库勒斯或西耳瓦努斯·萨克萨努斯)在一个矿坑里，半裸着身体，用一把沉重的矿锄或锤子敲打他前面的矿岩壁。他的身旁有一些采掘好的大理石板。这幅图使我们联想起斯塔

图 43　4. 梅西亚的农业

丘斯关于达尔马提亚金矿的那段人人知道的描写(*Silvae*〈森林集〉,iv. 7. 13以下):"quando te dulci Latio remittent| Dalmatae montes ubi Dite viso| pallidus fossor redit erutoque | concolor auro?〈那儿就是达尔马提亚人的山岭,阎王爷时时降临,颜色惨淡的苦工在那里开采着颜色惨淡的黄金,安逸的罗马人啊,你什么时候才把他们的苦难减轻?〉"值得提出的是,斯塔丘斯把达尔马提亚和西班牙都看作主要的黄金产地(*Silvae*〈森林集〉,iii. 3. 89—90,参看1. 2. 153)。参考本书图 35-1(西班牙的矿工)。

3. 一具石棺的座石。发现于萨洛纳。斯普利特博物馆。〔K. 普里亚特利撰文,载《达尔马提亚考古学与史学通讯》(塞尔维亚文)53,1950—1951 年(斯普利特,1952 年),第 142 页和图 Xll。〕属于公元四世纪。

一个 *femina stolata*〈主母〉的胸像,她无疑是本地贵族阶级中人。我发表此图应感谢 M. 阿布拉米奇教授的惠赠。

4. 下梅西亚的乌耳梅土姆地方所发现的墓地 *CIPPUS*〈界碑〉。布加勒斯特博物馆。《拉丁文碑名集录》iii. 12491;V. 帕尔万:《罗马人之最初定居于多瑙河口》(罗马尼亚文)(1923 年),第 52 页起,图 31—33;参看上页图 4。

这块 *cippus*〈界碑〉树在某个名叫 C. 尤留斯·C. f. 夸德腊土斯的人的墓上,此人是 *territorium Capidavense*〈卡皮达瓦辖区〉的 *princeps loci*〈头人〉兼 *quinquennalis*〈五年任长官〉。碑的上部是西耳瓦努斯神像,他是保护农业和畜牧业之神;下部是一个人在耕田。碑的另一面可以看到一个树林里有一群牲畜。

个屯市都分得大片优等的可耕地。许多屯民都变成了家道兴旺的地主,他们多半用土著充做佃户和佣工。住在这些城市里的某些家庭倒是新土地的真正拓荒者。他们在达尔马提亚的平原地方修盖庄院,并把在意大利和伊斯特利亚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经营方法介绍到这里来。他们最先从事的活动是伐木和畜牧。后来才生产谷物,再后才种植葡萄和橄榄树。除城市以外,还在境内建立了两处驻扎选军的城堡,一在布尔努姆,一在德耳米纽姆,另外有几十个较小的堡寨。但是,到了韦斯帕西安时期,虽然有些较小的堡寨

仍然保留下来，而选军却从达尔马提亚调往潘诺尼亚去了。这些军事建筑无疑大大有助于该邦的罗马化。其中之一，即布尔努姆的城堡，占有周围大片的牧地。

当时文化逐渐深及达尔马提亚境内的内地。在伊利里亚部落中广泛招募新兵逐渐造成了一个多少有些罗马化的土著贵族阶级，这个阶级就是那些在辅军中服役期满之后回到本部落或本村落的退役军人组成的。韦斯帕西安委任这些贵族阶级分子在部落生活中负领导之责，而且，除了他们和一些意大利移民之外，他还在达尔马提亚的都会化市镇和城堡等处造成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他在此地所推行的政策与在西班牙所推行的政策相同，也是从同一目的着眼的。部落组织不能保证安全。而另一方面，罗马又需要部落为辅军部队供应新兵。要解决这个困难，唯有分裂部落，并把控制权交给那些多少罗马化了的、或至少驯服了的成员，他们都曾在罗马军队中服过役。为选军供应新兵的义务也委给了他们。自然而然——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与西班牙相似的一点——许多新城市都从山顶上迁到了平原：对于罗马人而言，位于平原上的城市要比那位于崇山峻岭顶上的鹰巢安全得多。

新兴的自治市通常得到大片肥沃的土地，那是从部落领地里分割出来的。这些土地大多分给了新培养成的公民；而部落领地中余下的土地则仍保留在其原主手中，那些人组成乡村居民，不在公民户籍之列，仍然是裔民。从经济方面来看，这种客户中有许多人逐渐变成了住在城里的富裕地主的佃户。除农业以外，省内以及与他省之间的商业活跃兴旺起来了，地方工业亦然。在富饶的德里努斯谷地的一个自治市市民的墓地祭坛上刻着死者的两个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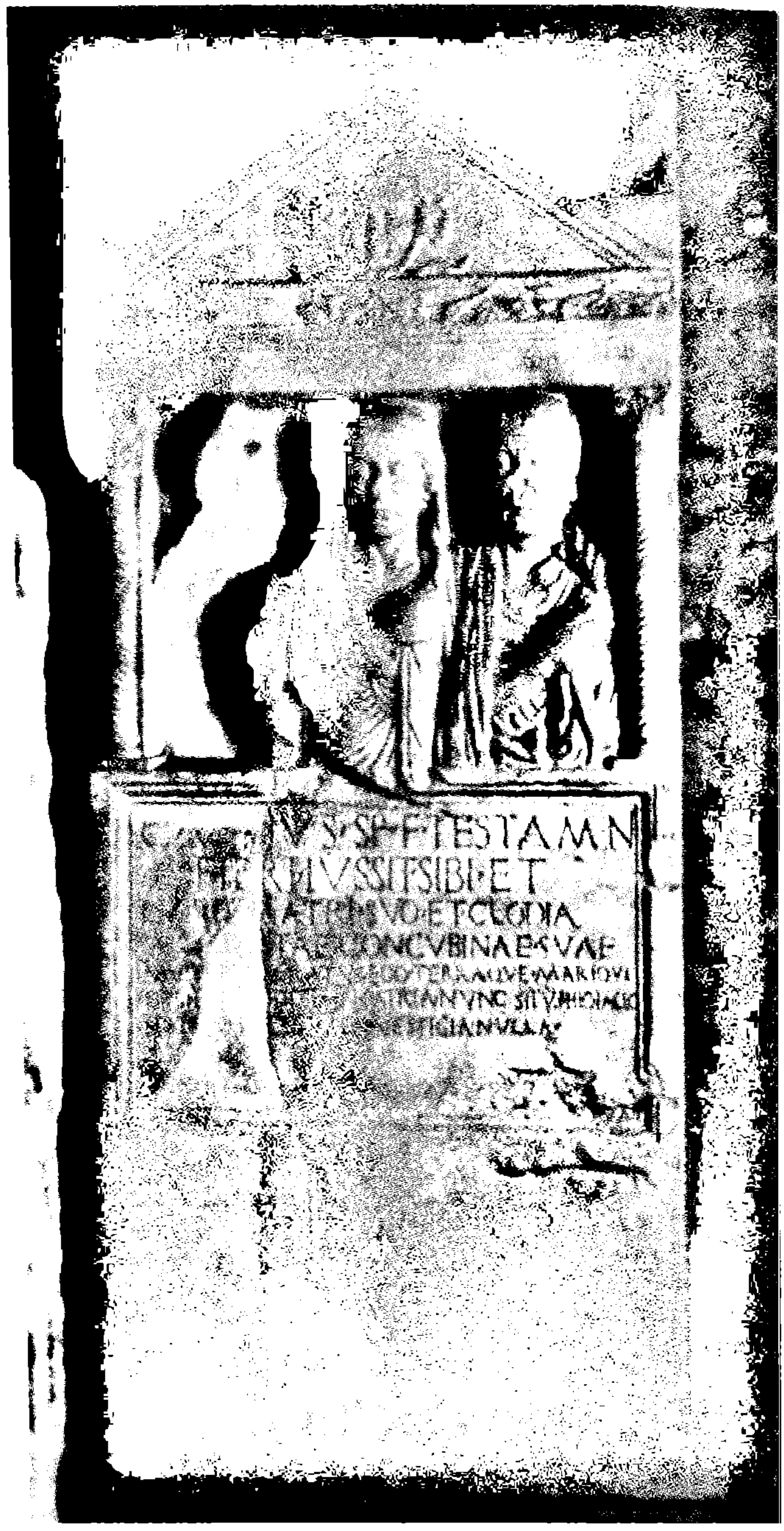


图 44　达尔马提亚的生活和行业:达尔马提亚的一个船夫

图 44 说 明

墓碑。发现于萨洛纳的拜占庭时代墙壁中，发现时已残缺。斯普利特博物馆。〔M. 阿布拉米奇：《萨洛纳古堡壁中出土之墓碑》（塞尔维亚文），载《达尔马提亚考古学与史学通讯》（塞尔维亚文）50，1928—1929 年（斯普利特，1929 年），第 56 页起；K. 普里亚特利撰文，载《达尔马提亚考古学与史学通讯》（塞尔维亚文），53，1950—1951 年（斯普利特，1952 年），第 142 页起，和图 VIII。〕属于公元一世纪。

碑的上部为死者的胸像。底端有一只帆船。铭文云：*C. Utius Sp(uri) f(ilius) testament(o) | fieri iussit sibi et | P. Utio fratri suo et Clodia(e) | F[au]stae concubinae suae. | Mult[a per]agratus ego terraque marique | debit[um re]ddidi in patria, nunc situs hic iaceo. | Stat l[apis e]t nomen, vestigia nulla.*〈斯普里攸斯之子 C. 乌丘斯指定由本人与其兄弟 P. 乌丘斯及其妾克洛迪雅·法乌斯塔执行遗嘱。余曾远游海陆各方，终返故乡，而长眠于此土。树石勒名，免遭践履。〉〔＝《一年来的碑铭学》（法文）1933 年，74。〕C. 乌丘斯无疑是一个商人或一个船长，最可能是前者，因为他在他的押韵铭文中谈到曾游历陆上和海上各处。他的出身微贱是值得注意的。我发表这张照片应感谢 M. 阿布拉米奇教授的惠赠。

在这石刻的一面上，他是一个地主，手中拿着一束谷穗；在另一面上，他是一个鞋匠。城市贵族阶级中的某些人大发其财，拥有大片耕地和牧场：因为他们是富人，所以充任帝国的官职，爬到骑士阶级，甚至能在罗马元老院中有一席位。

这些土著城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多克勒亚，它起先是多克勒亚特斯部的坞壁。它是被一位俄罗斯的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而发掘的结果则由的里雅斯特的一位意大利学者予以整理和发表。在韦斯帕西安统治时期，这个市镇变成了一个自治市。该

市公民系由土著中的头人、退役军人以及从萨洛纳和纳罗纳迁来的移民组成的。这个城市不久就繁荣富庶起来了：我们发现本城阔绰的地主们修建了一个大广场，场内有一座美观的市政厅，还修建了许多神庙和一个很大的浴池。达尔马提亚内地许多城市（例如亚德尔后面的阿塞里亚）的情形，可以说与此相同。值得提到的是，这些城市中没有一个被赐予屯市地位。最后一个屯市还是克劳迪亚斯建立的（克劳迪亚—埃库姆屯市）；虽然阿德里安曾经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自治市，但即使在他统治时期，也没有一个达尔马提亚城市得到更高的法定地位。政府的政策与我们在西班牙所见者相同，并且对待这两地的政策显然是出于同一动机。建立自治市的目的在于破坏达尔马提亚的部落生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已经达到了罗马化：这是走向罗马化的一个步骤，而不是一个大功告成的庆典。而且，使城市和乡村彻底罗马化并非罗马政府兴趣所在，因为那样一来，国家就不能再为选军和辅军部队补充精良的新兵了。在这种情况下，无怪罗马化的工作在达尔马提亚始终没有完成。就是在城市中，居民也根本没有彻底罗马化，至于市辖区则更差了。再者，还有许多部落始终没有都会化，继续过着旧式生活。在达尔马提亚各个部落间划分畛域的界碑上所刻的许许多多铭文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的特点就是从未采用过一种纯罗马式的“陌分制”，即一种区划田地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曾在潘诺尼亚、达契亚和阿非利加推行过。很清楚，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老式耕种土地的方法仍然保留下来，因而不需要采用罗马土地分 *centuriae*〈陌〉之法。在这里，只需要在部落与新建的自治市之间公平划分土地就行了。

从经济方面看，达尔马提亚最吸引罗马人的条件之一乃是丰富的铁矿，土著们自远古以来即已开采这种矿产了。对罗马人说来，占有这些铁矿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多瑙河驻军的兵器武装就取给于此；其绝顶重要性相当于高卢铁矿之于莱因河驻军。因此，自然皇家行政当局刻不容缓地攫取了这些铁矿，由皇家财务使负责监管，而由专门的承包商经营。矿上所用的劳动力是由土著部落供应的，这些部落成员几百年来已经习惯于这种工作。至于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工作，我们却毫无所知，不过我们可以设想其情况当与西班牙矿场的情况相似（在西班牙，曾把一个一个矿坑发租给个别的开矿者）。

两个潘诺尼亚和上梅西亚这些住着克勒特—伊利里亚人或色雷斯—伊利里亚人的边省，其社会经济发展类似于达尔马提亚。这些地带是多瑙河边塞上帝国军事生活的主要中心。我们不打算叙述征服这些地方并实行军事占领的经过。蒙森及其合作者在拉丁碑铭《集录》第三卷中已经对这方面精述无遗了。蒙森还在他的《罗马史》第五卷中概括了这个过程的全貌。一些奥地利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在若干最重要的军营地如佩托维约、劳里亚库姆、卡尔嫩土姆、阿昆库姆等处所进行的发掘补充了新的史料。本书的目的只要对这些行省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现象略加叙述就够了。

多瑙河中游、萨夫河和德拉瓦河上的城市生活的发展过程是由罗马大军事中心决定的，这个大军事中心先在萨夫河，后来逐渐转移到德拉瓦河，最后转移到了多瑙河。萨夫河上的锡什亚和锡尔米攸姆，德拉瓦河上的佩托维约和木尔萨，多瑙河上的文多博纳、卡尔嫩土姆、布里杰戚约、阿昆库姆、辛季杜努姆、维米纳秋姆

和腊戚亚里亚，以及倔强的达尔达尼亚人地区的斯库皮，全都是驻扎选军的大堡寨，其中有些一直到罗马统治结束时仍然如此。木尔萨就是多瑙河舰队的主要兵站。然而，罗马军队并非屯驻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占住这个地区的有克勒特人、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伊利里亚人的部落，他们并没有被罗马人消灭干净。事实上，即使不是所有的堡寨、至少大多数堡寨都建筑在克勒特人、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的大村落的紧邻地方。在卡尔嫩土姆附近肯定存在过一个这样的村落；锡什亚是伊利里亚人的一个重要的市镇，即科拉皮亚尼部的首府；斯库皮是达尔达尼亚人的城砦，而腊戚亚里亚是梅西亚人（色雷斯人）的城砦。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从土著部落那里割取了大片肥沃的田地、草场和树林等等，拨归堡寨管辖。碑铭文中往往提到 *prata legionum*〈军田〉。在公元二、三世纪时，通常都把这种土地租佃给兵士们开垦；但是，选军管辖地区内的大部分土地并不直接由兵士们垦种，而交给村落居民，他们的义务大概就是把他们的田地、草场、森林、鱼池等处的部分出品缴纳给堡寨，并以人力支助士兵。一个属于卡尔嫩土姆堡寨的兵士的墓地 *cippus*〈界碑〉上有一幅很好的图画，描绘着兵士使用土著劳动力的情形。在那拱形碑额上刻着死者手执一根 *virga*〈棍棒〉，他领着一辆乡下的大车，大车由两头牛拉着，赶车的是一个伊利里亚农民，这个农民拿着一根鞭子和一把斧头。显然，这个兵士是奉命去替堡寨伐木材的，为此他雇用了附近村落里的一个农民（见图 74-2）。

由此可知，选军管辖地区和住在这个地区上的土著部落都是处在军事当局的管理和控制下的。我们不知道这些军田的范围有

多大。难以设想凡是住在多瑙河附近的部落的土地严格地说都被当作各个选军军团的管辖地区。但不论 *prata*〈军田〉的大小如何，总之，堡寨的发展在多瑙河流域各行省中到处都是一致的。在堡寨附近逐渐兴起了平民住宅区，即所谓营市。另一方面，属于选军管辖的土著村落也逐渐有外人侵入了，这些外人大多数就是有关堡寨的原先的士兵，他们定居在土著村落里，组织成一个罗马公民团体，带来了罗马人的风俗习惯并使用拉丁语。例如，我们知道在阿昆库姆附近就有一个这类居民团体。它十分兴旺，名为 *vici Vindonianus*〈文多尼亚努斯村〉，其中有些成员甚至是罗马骑士。这些土著村落逐渐与军寨的营市合并成一个居住区，具有了一个真正城市的外貌。广场、市政厅、浴池、剧院和半圆形剧场修建起来了，街道铺平了，并且还建造了城市型的房屋。最后，这个营市和土著村落的混合体终于获得了自治市或屯市的权利。

多瑙河流域各省中那些严格说来不属军寨管辖、而仍保持其部落组织的地区，则归皇帝所委任的军事长官（*praefecti*〈都护〉）或本省总督统治，至少在公元一世纪时是这样的，其情况与达尔马提亚相同。著名的安东纽斯·纳索就曾任过科拉皮亚尼部的都护。但都会生活在这些地域内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有些主要的村落改为自治市，而另外一些则不由自主地接受了罗马退役军人屯市的头衔。如潘诺尼亚的萨瓦里亚、索耳瓦和斯卡尔班戚亚、上梅西亚的乌耳皮亚纳、马尔古姆和奈苏斯等城市就是这样兴起的。罗马退役军人屯市的头衔也授给了潘诺尼亚的佩托维约和上梅西亚的斯库皮，这两个城市原来都是重要的驻军堡寨。这类市镇和村落变为罗马城市当然意味着土地产业权自转变一开始就有所改

换。膏腴之地授给了屯民或新城市的公民；贫瘠之地则留给了部落里的普通成员。拨给屯民的田地通常按罗马方式划分成陌。在这些屯市和自治市的辖区内，大片田地逐渐集中到了少数地主手中，有些是土著和退役军人，有些是外来人。例如，在乌耳皮亚纳的辖区内，一些大庄田在公元三世纪时归元老院议员阶级中某个名叫 C. 富里攸斯·屋大维亚努斯的人所有。在辛季杜努姆附近，有一个土著 *princeps loci*〈头人〉为自己及其家属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坟墓，墓上辉煌夺目地画着图形，并装饰着墓主及其家属的雕像。毫无疑问，这些大庄田上的劳动力一部分由土著居民提供，一部分则由奴隶提供。奴隶是由多瑙河对岸买来的，那儿的奴隶买卖甚为活跃。

公元二、三世纪时，究竟有多少土地仍归土著部落所有，有多少村落没有归属存在于潘诺尼亚和上梅西亚的某个城市，我们不能断言。像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地区无疑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其古老的部落组织，也许始终如故。就是在属于城市和军寨的地区内，生活也仍然保持其乡村性，这个地方始终未曾彻底都会化和罗马化。我们只要看一看潘诺尼亚和梅西亚的墓碑，就可以看出土著们保持其原始的风俗习惯到何种程度。

达契亚省的面貌与此不同，那是罗马人在多瑙河沿岸最后获得的一个行省。在图拉真所进行的残酷战争（共两次战役）以后，在对土著中的优秀分子进行一连串的剿杀以后，达契亚变成了一个积极推行屯民运动的地方，只有某些个别地区还留给了土著部落。该省的金矿都由达尔马提亚人——皮鲁斯特人——采掘，他们从其故乡来到这里。可耕地经过大量，分配给屯民，屯民大多来

自东方(例如来自加拉戚亚等处)。我们还必须记住,在这条新边塞上驻有强大的戍军。在许多繁华的城市里居住着一群包括退伍兵士以及希腊和东方的商人等等在内的闲杂人。土地是富饶的,新迁来的住户又得到各种各样的有利条件。各城市很快就兴起了一个殷富的资产阶级,这一点我们不需惊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阿普卢姆的一个经商兼地主的家族在本省生活中所占的地位相当于巴尔比攸斯氏在阿魁累亚和在诺里库姆与潘诺尼亚等省中的地位。

达契亚的原始居民以色雷斯人为主,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力量雄厚,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色雷斯人与伊利里亚人一样,属于印欧人种,在文化上和宗教上同马其顿和希腊的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色雷斯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反抗从东南西北四方入侵的敌人的长期斗争史。斯基台人、伊利里亚人、克勒特人和马其顿人都曾打算征服色雷斯人的地方,但都失败了。罗马人成功了,这是在巴尔干和特兰西瓦尼亚山脉中、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平原上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以后才获得成功的。

我们对色雷斯人的社会经济生活所知极少。他们只留下一件文字史料,而这件史料我们还不能理解。考古材料迄今仍感不足。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他们是一个以农为业的民族,生活集中在乡村里而不在城市里。他们的村落有些筑有城堡;其中之一可能是国王所住的地方,也就是一个或许多部落的首府。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都会生活中心:我们从未听说它们的工商业有多大的发展。村落里的居民始终是农民,是种地者、猎户、渔夫和牧牛人。他们的内部组织是部落式的。部落间

的物物交换采取季节性集市的方式，这种方式迄今仍然是许多斯拉夫民族的商业生活的主要特色。

色雷斯人最早与罗马人接触是在下梅西亚的多瑙河下游。下梅西亚直到克劳迪亚斯兼并了巴尔干的色雷斯人以后才组成一个帝辖行省，直到图拉真进行达契亚战争以后才组成一个正规属于皇帝统辖的行省，但事实上，这个地区自奥古斯都和提贝里攸斯时起就已臣服于罗马了。最先承认罗马宗主权的是黑海西岸的希腊城市，那原先都是富强的希腊生活中心地——伊斯特利亚、托米、卡拉提斯、迪约尼索波利斯、鄂德索斯。这些城市想要在某些方面恢复其旧日的繁华，唯一的机会就是在多瑙河和黑海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当罗马政府以一连串的堡寨（埃斯库斯、诺韦、腊戚亚里亚，以及图拉真时期始建立的杜罗斯托鲁姆和特雷斯米斯）保证了多瑙河下游的安全以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沿岸附近的色雷斯部落为环境所迫变成了罗马堡寨和旧希腊城市两者的腹地。如果在多瑙河与黑海之间的沃土地带不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经济组织，那么，无论堡寨也好，城市也好，粮食都得依赖遥远地区的供应，而那种粮食的进口是靠不住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罗马人才如此积极关心建立下梅西亚行省，才对黑海沿岸罗马边塞内外的希腊城市——位于德涅斯特河口（提腊斯）、第聂伯河口（鄂耳比亚）和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希腊城市——的事务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只要达契亚继续维持独立，即使极力垦殖多布鲁甲也仍不能使罗马军队和城市得到足量的粮食供应。因此，从俄罗斯南部输入进口物资大受欢迎；这就意味着罗马政府必须对黑海尽巡逻之责而对俄罗斯南部的希腊城市必须予以武力保护。

图 45　多瑙河边塞和达契亚塞内地方
（图拉真记功柱）

图 45 说 明

1—2. 罗马城图拉真记功柱的下部。罗马，图拉真广场。C. 契科里攸斯：《图拉真记功柱上之浮雕》（德文），图 IV－XX，正文 ii，第 17 页起；K. 累曼—哈尔特累本：《图拉真记功柱》（德文），1926 年，图 V—VI。

记功柱雕刻图的第一栏〈自下而上。——译者〉是为了让人一眼看到多瑙河下游的概貌。观者作为站在达契亚这边，即河的左岸；所描绘的是罗马那边，即河的右岸。第一部分（图 1，第一栏）画的是多瑙河下游低平的河岸上一路堡寨林立，这段河身流经现代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罗马那边岸上有高起的木楼（*burgi*）防守着，木楼四周环以栅栏。这些木楼的下层作为辅军屯戍兵士（包括骑兵与步兵）的住房，楼上有走廊以资了望，在走廊上可以守望敌情，并可举火为号。木楼旁可以见到木料和草料堆，那可能是修补木楼的材料和马匹的刍秣，但更可能是准备举烽火的火把（冯·多玛斯策夫斯基：《罗马圆柱广场上的马尔库斯记功柱》（德文），第 109 页（附注））。第二部分（图 2，第二栏，左段）画的是河上更加文明的生活。军士们正在用船装运军用品，或者是从多瑙河口的希腊城市以及南俄罗斯溯流而上，或者是从北意大利和阿魁累亚顺流而下；一只驳船上装载葡萄酒，另一只驳船装载兵士们的沉重的行囊。河岸上有两个村庄或罗马人的码头和堆栈——那就是后来城市的原点——两处都围着栅栏。远处有崖坡临河而起（图 2，第一栏，右段）。一个城市建筑在多瑙河的高岸之上，兵士们正把葡萄酒往城里送。在这个山城的后面，有一座坚固的碉堡俯临两条要道，其一通往内地，另一条沿着河岸。这幅浅浮雕很精彩地概括了罗马军士们在多瑙河上所完成的军事工程和开化工作。这些城市和码头都是象征性的，不可能与多瑙河上任何居民点符合。上一层（第 2 栏）开始是图拉真第一次出征达契亚地带的故事。皇帝渡河以后，在他的军营前面当众宰牲祭神，营中可以见到高大的御帐（图 1，第二栏）。往下的情节中有一幅是图拉真向他的军队致誓师词（图 2，第二栏）。其余的图大多画的是在罗马人占领的地方建筑碉堡的工作，这工作是为了巩固罗马军队的后方。图 1，第三栏是在一个河边筑堡，河面上可以见到一座新修的桥；图 2，第三栏是修一架木桥和一个石碉堡。因

为罗马人打算长期居留在这些地方，所以所有这类的建筑都绝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罗马人的贸易和文明随着军队前进，渡过这些桥梁而集中于这些新修筑起城堡的罗马生活中心。

下梅西亚的情形和达契亚、色雷斯相同，这儿的都会化运动是在征服达契亚以后由图拉真奠定基础的。当罗马军队从腊戚亚里亚和埃斯库斯的营地转移到辛季杜努姆和特雷斯米斯去以后，图拉真就把罗马屯市的资格赐给这两个旧营地附近兴起的居民点，他还建立了一些新城市，如特罗佩乌姆—图拉亚尼、尼科堡—阿德—伊斯特鲁姆、马尔契亚堡等。尽管如此，这个地区始终没有全面罗马化；它仍然是一个荒村旷野之乡。

对该省的社会经济进行组织工作，首先涉及地产所有权的改变。土地被分成属于堡寨、属于希腊城市和属于土著居民的领地。有些土著居民是罗马人移殖到那里去的，罗马人强迫他们从现代保加利亚的山地和多瑙河对岸迁过来。就军事管辖区而言，在下梅西亚所采取的措施与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和上梅西亚的措施并无两样，其发展亦沿着同一道路进行。在古老的希腊城市中，罗马人首先致力于恢复正在衰落中的经济生活，吸引新移民以增加城市的新生力量。十分清楚，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扩大这些城市的辖区而把许多土著村落划归城市辖区之内。他们很轻易地把罗马公民权赐给新旧市民。那些改属于城市的村落居民当然没有参预城市的政府。从罗马人的观点来看，他们一直是裔民，而从城市的观点来看，他们是“近郊居民”(*incolae*，πάροικοι)。另一方面，城里人一旦在乡村里弄到田地，他们就变成乡村的成员了。由于他们是乡村里最富裕的成员，所以他们和乡村中的土著长老们一道被

尊为乡村里的“元老院”,他们就以这个资格选举或指定“头目”,即 *magistri* 或 *magistratus*。某一个辖区内所有的村落轮流选定一个人来代表这个辖区。这个人的头衔是 *quinquennalis*〈五年任长官〉,他的职责大概是在各村落的地主中分派应缴给国家和城市的租税以及分派应出的力役。

在土著部落的辖区内发展着同一类型的体制。在这里,乡村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也是罗马公民,他们大多是退役军人和从多瑙河流域其他行省迁来的人。这些新侨迁户当然是推行罗马化的主要力量,但事实上他们始终未能将土著居民吸收进来而使之彻底罗马化。他们与少数比较有钱而已经受罗马文明同化的土著们一样,都是富裕的地主。但这些地主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而占绝大多数的乃是替他们耕种土地的农民和佃户。

下梅西亚以南,即现代保加利亚的山区和丘陵地带,这里的色雷斯人曾经是鄂德里斯王朝的臣民,但从克劳迪亚斯的时候起被并入罗马的色雷斯行省,他们保持自己古老的组织、自己的部落生活和乡村生活将近百年之久。成千上百的村落散布于丘陵、山岭、溪谷、平原之中。这些村落里的居民都是勤劳的农民、种地者、牧人、种园人、猎户,正与他们今天的情形一样。他们为罗马军队提供健勇的步兵和精良的骑兵。为了使这样的士兵能够源源不断地送到无数色雷斯步兵营里去服役,罗马政府让这个地区保持其原有的内部组织,一如过去在国王统治之时。主要的单位是村;若干村组成一个“乡”(*κωμαρχία*);一个部落所有的村,换句话说,就是聚合一些“乡”,总起来代表这一个部(*φυλή*)的行政单位和领域单位。最后,一个部或一个以上的部形成一个州(*στρατηγία*),由一个

渠帅统辖。

罗马人带来了和平，色雷斯农民有好机会把农产品卖给罗马军事基地的管理人员和卖给沿海各希腊城市（黑海沿岸的梅森布里亚、安基亚卢斯、阿波洛尼亚，爱琴海沿岸的埃努斯、马罗芮亚、阿布德腊）的商人，因此他们发财致富了。他们举行季节性集市（ἐμπόρια）的旧式部落市场逐渐发展成真正的市镇。罗马政府也建立了若干新市场，如皮祖斯的集市，这就是日后城市的胚胎。罗马公民来到这里，定居在最富饶的地区。在一段时期内，罗马政府仍然采取消极的态度，没有努力发展色雷斯的都市生活；对于内地少数旧希腊城市（菲利波波利斯）的生活也未加干预。克劳迪亚斯时期建立了一个罗马屯市（阿普里），弗拉维攸斯氏时建立了另一个屯市（窦耳土姆）。首先认真促进城市发展的是图拉真，这与他在多瑙河上和东方的军事行动有关，那就是建立新的达契亚行省和重新整顿梅西亚。为了加强对本省生活的控制，他需要更大的、组织得更完善的中心城市。新的城市建立起来了，这些城市几乎全都用的是希腊名字，并多少有些希腊居民和希腊习惯（奥古斯塔—图拉亚纳或贝雷亚、普洛提娜堡和图拉真堡），此外，还把自治市的组织和自治市的权利赐予了某些村落，如塞尔迪卡（索非亚）、鲍塔利亚、尼科堡—阿德—芮斯土姆、托皮鲁斯和安基亚卢斯，这些地方变成了庞大繁荣的居住区。这类新城市都是个别加以组织的。其中没有一个原先是罗马屯市。有些城市有自行造币之权，但在它们的钱币上，在城市名字之旁可以见到本省总督的姓名。在这里，和在达契亚与梅西亚一样，建立这些新城市大概吸引来了新居民，特别是来自东方的居民。阿德里安继承其前任的政策。

著名的美丽城市阿德里亚堡至今仍以旧名见存于世(爱德尔纳)。

这个政策真正使都市生活传播开了吗？它使这个地方希腊化了吗？我们说希腊化，是因为在巴尔干，希腊的影响太强烈，以致不容许有罗马化。我很难设想这个政策达到了这些目的。它的后果是：使一个包括移民和富裕土著的城市资产阶级同其他居民分开，使乡村增加了额外负担，取消了若干 *strategiai*〈军州〉而代之以城市辖区。但是，色雷斯尽管有了城市，它仍然是一个以乡村、以村民团体、以小自耕农为主的地方。对于这些农民说来，城市是祸害，不是幸福，我们从著名的斯卡普托帕雷的碑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第十一章里将谈到这件碑文。农民们也十分谨慎地固守他们生活和宗教中的一切特点。我们所发现的公元二、三世纪的许多遗迹证明：即使在罗马时期，色雷斯的某些富豪地主的墓葬仍然按照古老的斯基台—色雷斯的仪式(也有克勒特的成分)，以马车盛尸，葬在砖石冢中。在保加利亚的山岭中，今天还可以见到有人穿着罗马时期的墓碑上所常见的那种古式的色雷斯服装。在该地的基督教教堂中，可以见到那无名大神的神像，我们发现罗马时期有无数献给这位大神的还愿碑，这位神是一个猎人和战士，骑着他的色雷斯马在奔驰，农民们把他当作基督教的大“英雄”圣乔治来供奉。

与色雷斯毗连的马其顿行省(包括佩奥尼亚以及有迪腊基攸姆和阿波洛尼亚在内的亚德里亚海沿岸之地)除了东面沿海一带以外，其余的地方始终没有积极推行过都会化运动。马其顿王国的实力系以马其顿的农民和乡村为基础。在马其顿战争时期，该邦损耗惨重。在罗马共和国统治之下，这里遭受蛮族多次的抄掠。

后来到了内战期间，它又同特萨利一起成了罗马将军们的战场。无怪这片沃土上的居民不如国王统治时候那样稠密了。一来此地户口凋残、二来又当军事要冲(从意大利经埃尼亚戚亚取道巴尔干半岛往东方的大路就从马其顿经过)，因此奥古斯都打算在该省推行罗马化运动，至少要使其一部分地区罗马化；他把半由退役军人半由平民组成的屯民送往许多重要地点(迪腊基攸姆、菲利皮、丢姆、佩拉、卡散德雷亚、比布利斯)，又把罗马自治市的权利赐给其他一些地方，如首府贝雷亚、主要港口特萨洛尼卡、培奥尼亚人地区的斯托比等地。迁去的罗马人是够多的，足可免被马其顿城市那些多少有点希腊化的居民所同化，并足可使皇帝在该省的罗马人中征募为数不少的禁卫军军士。如常见的那样，新迁居户大多变成了地主，他们不仅在城市生活中、而且也在乡村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许多元老院议员家族都在马其顿有大田庄。然而，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该邦的经济主流依然是土著部落和无数的村庄，特别是农民和牧民的山村。

关于希腊(阿凯亚行省)在帝国时期的一般社会经济概况无须细述。总的情况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是一片贫困和户口递减的景象。迪约·克里索斯托姆对欧贝亚所作的著名描写当然是虚构的。他在塔尔锡安演说辞中所作的一般陈述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但是，他所描叙的基本要点无疑是合乎真实的，那就是户口凋残和田野大片荒芜。希腊许多大神殿在帝国时期的经济景况显然证实了迪约的描写。从德尔斐的碑铭文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德尔斐神殿的收入主要来自属于神殿的土地和畜群。在阿尔卡迪亚的利科苏腊地方所发现的一件碑文证明这个城市和当地的神殿全都

贫困之至，要是没有一个有钱的市民的帮助，它们就付不出应缴给罗马人的税款。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希腊的工商业已经一蹶不振。就农业而言，希腊大概是地中海区域中最贫瘠之地了。无怪希腊人大量迁往有较多发展机会的地方去，其中大多数是有才智的、受过教育的人。但是，如果说这块地方几乎完全荒芜不堪，则亦未免过甚其词。各城市中仍然有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这是由一些像克罗芮亚的普卢塔尔克之类的地主构成的。希腊比较肥沃的地方也仍然生产谷物、橄榄油、葡萄和葡萄酒。其中有些产品（阿提卡的橄榄油、某些岛上的葡萄酒）甚至还输往外省。与希腊化时代相同，地产集中在少数住在各城市里的家族手中。可想而知，这些城市资产阶级的田地上所需要的劳动力通常是由奴隶和佃户供应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不认为普卢塔尔克对希腊全貌所作的那段著名的描写乃是未可尽信之辞。普卢塔尔克心目中所想象者还是特米斯托克勒斯和佩里克勒斯的黄金时代的希腊。那样的希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经　济